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英·甘地传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引子

在南亚次大陆的西北部，雄伟的喜马拉雅山的西陲，有一个神秘的谷地，它就是克什米尔。那里山峦起伏、烟雾缭绕、湖泊密布、风光旖旎、令人神往……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南亚次大陆，尤其是在传统的印度教社会里，自古以来是以种姓来区分人的。潘迪特就是印度众多种姓中的一个，也是印度教的最高级种姓婆罗门中的一种，“潘迪特”的意思是“学者”，尤指精通梵文、科学、法律和印度宗教的学者。因此，“潘迪特”意味着受人尊敬。

潘迪特种姓就生活在风景如画的克什米尔山谷。他们的外表保留着古代雅利安人的典型特征：身材高大，皮肤白皙，鼻梁高挺。他们人数不多，生活的范围相当狭小，但他们却极有个性，竭力保持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特征；他们学识渊博，目光敏锐，志向远大，而且适应性强，具有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

也许是耐不住山区的贫穷，或许是因为受不了当地穆斯林统治者的苛政，几百年前，有些潘迪特开始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克什米尔故土，到南部平原地区谋生或寻求发展。潘迪特一旦离开了家园，很少有再留恋故土的。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不论是旁遮普的酷热，还是拉贾斯坦的荒漠，都不能过于勾起他们对克什米尔那连绵不绝的群山、美丽动人的樱花、冰雪融成的河流的思念。他们一旦在拉合尔、斋普尔、德里、亚格拉或阿拉哈巴德定居下来，就不再像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那样总是期待着返回家园。

公元 1716 年的一天，风和日丽，天气晴朗。雾霭初散的克什米尔山谷里，走来了一个中年人。他约摸三十四五岁年纪，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眉宇间显露出一股英气，两眼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的装束虽然朴素，乍一看甚至还略显土气，但却流露出一种书卷气质。

中年人走得很急，从他那背着简单的行囊上，一看就可知这又是一位南下的移民。

这位中年人并非等闲之辈。他自幼饱读诗书，学富五车，是个著名的波斯文和梵文学者。他的故乡克什米尔虽然美丽，但毕竟是个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穷乡僻壤，不是一个能使他充分施展才华和实现抱负的理想场所。因此，他迫切希望到外面去闯一闯。于是，他加入了移民的行列。不过，与有些移民不同的是，他不是到与克什米尔邻近的旁遮普，他的目的地是更南更远一些的德里。

经过多日的长途跋涉，中年人终于来到了旁遮普平原上。与山区相比，平原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那里一马平川，河渠纵横；田野里新禾吐穗，麦浪翻滚，许多农人在里面辛勤劳作。中年人以前一直生活在山区，初见平原，不禁为眼前的景象所陶醉，遂放慢脚步，边走边欣赏起来。然而，他终究无心饱览这美丽的田园风光，他似乎有某种使命在身。只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散发着浓重的田野泥土气息的空气，又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

又不知过了多少日，日上三竿的时候，中年人终于从遥远的地平线上望见了一座巨大的城池，一座高耸的尖塔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城池的旁边，有一条银练似的白带飘过。行人告诉他，前方就是德里，那座尖塔是著名的库

特卜塔，那条银练便是滔滔奔流的朱木拿河。啊，到了！德里终于到了！中年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德里是莫卧儿帝国的首都。雄才大略的阿克巴大帝曾在此君临天下，他的孙子沙杰汗还在城的东北角建造了印度历史上最大的皇宫。该皇宫因其城堡和内部的主要建筑物皆用红砂石砌成，呈赭红色而以“红堡”见称。然而，他们的后裔并未能保住他们昔日的荣光。1707年奥朗则布皇帝死后，莫卧儿王朝便江河日下、辉煌不再。不过，帝王们仍竭力想保持住君王昔日的威严和帝国表面的繁荣。

到达德里，已是黄昏时分。中年人见天色不早，决定就近找个旅店住下。第二天一大早，他将一切收拾停当，从行囊里拿出一件虽算不上华丽倒也整洁的白罩衫穿在身上，然后背起行囊，找到店主，结了帐，末了向他打听红堡所在地。店主从他手中接过钱时，不由得打量了他一眼，觉得这个陌生的外地汉子穿着打扮普普通通，看不出有什么来头。他不明白他打听皇宫禁地干什么，但他还是告诉了他。

出了店门，中年人径直向红堡方向走去。走着走着，他发现这样走似乎太慢，他知道皇上此时正在早朝，他必须在早朝未散以前赶到那里见到皇上。不然，他又得在旅店再住上一夜。于是，他叫了一辆人力车，快速向红堡奔去。

半个时辰以后，车夫拉着中年人来到了红堡西面的拉合尔门。中年人付了车钱，没有即刻进宫，打量起这座宫门来。坐车时他曾听车夫说起过这座宫门，说它是红堡五座宫门中最大的一座，气势宏伟。现在看来，车夫所言不虚，但见整座拉合尔门遍体赭红，在阳光的辉映下，煞是好看。拱门高达10多米，宽7米有余。城楼上有凉亭、塔柱，还有一个宏大的护门楼。城墙足有三层楼高。拱门口西边各站着两名值星官，另有卫兵若干名把守。不时有身着各色官服的官员们从拱门进出。看到这里，中年人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皇宫的确不同凡响。”

约摸看了几分钟，中年人这才正了正衣冠，向宫门口走去。值星官拦住他，进行盘问。中年人向他们通报了自己的姓名，说明了来意，他说他要见当朝皇帝法鲁克西尔。听了中年人的话，几名值星官感到颇为吃惊，不由得一齐再次仔细打量了一眼中年人，觉得他除了相貌端正外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他凭什么要见皇帝呢？见值星官这种神态，中年人只得道明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这位中年人名叫拉志·考尔。几个月前，法鲁克西尔皇帝巡视克什米尔，听当地人说那里有个名叫拉志·考尔的人博学多才，只可惜无用武之地，便叫人将他找来问学。经过亲自面试，法鲁克西尔皇帝发现此人果然是满腹经纶，名不虚传，又见他生得仪表堂堂，心中甚为喜爱，觉得他是个人才，蜗居在这个小山沟里未免有些可惜，便对他说道：“朕有意让你入朝为官，不知你意下如何？”拉志·考尔一听，觉得喜从天降，心想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吗？便赶紧答应下来，谢主隆恩之后，他告别了皇上，匆匆回家，打点行李，安顿了妻儿老小，第二天便上路了。只因关山阻隔，交通不便，走了好几个月才到德里。

听了中年人的叙述，几位值星官还是将信将疑。他们商议了一下，决定派一个人先去禀报，再作计较。

法鲁克西尔皇帝当时正在觐见宫接见大臣，处理政务，听说克什米尔的

拉志·考尔来了，急忙命人宣他进宫见驾。值星官这才放行。

拉志·考尔由一名值星官引领，走过一条长廊，穿过奏乐宫来到觐见宫，见了皇帝，施礼毕。法鲁克西尔皇帝先是他向大臣们作了一番介绍，当即派他到法院供职。为了特别表示恩宠，他还将一座座落在运河边的宅院和一片包括若干个村落的土地赐予他，作为他的封邑，并让他随后把家眷也迁到德里来。

受到皇帝如此的垂青和恩宠，拉志·考尔感到既惊喜又荣耀。为了纪念这件光耀门庭的盛事，他在自己的姓名后加上了“尼赫鲁”一词，这个词在乌尔都语中的意思正是运河。从那时起，考尔-尼赫鲁便成了这个家族的姓氏。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知从何时起，原姓考尔逐渐从姓氏中去掉了，并为人们所遗忘，倒是后加的“尼赫鲁”一直保留了下来。

拉志·考尔-尼赫鲁，这个背井离乡到德里来“捞世界”的克什米尔婆罗门，就是本传传主英迪拉·甘地的先祖。他当年恐怕做梦都未想到，250年后，他的后裔中会出现一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子！

英 · 甘地

一、一代女杰的童年

这个女孩胜过一千个儿子

在现今印度北方邦境内、圣城瓦拉纳西的西部不远处，座落着一座既古老又现代化的城市——阿拉哈巴德。印度一代伟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就诞生在这里。

同印度其他古城一样，阿拉哈巴德也经历了漫长的悠悠岁月，阅尽了人间的沧桑。包括往世书在内的纪元前许多年的印度教古经中都有关于这座城市的记载。不过，它那时并不叫阿拉哈巴德，而是叫普拉雅克。这是虔诚的印度教徒给它取的名字，意思是“千堆圣火之地”。根据印度教神话，大神毗湿奴曾将世上之水制成甘露，有几滴就落在这里。它还有一个古老的别名“三河口”。这是因地取名，因为它正位于印度第一大河恒河、朱木拿河以及神话传说中的悉罗湿代底河的会合处。

河流在古印度人的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因为河流是他们生命的源泉。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沿河岸而建的城市便大都成了他们的宗教圣地；像普拉雅克这样的三河会合之所更是注定要成为圣地，更何况毗湿奴神曾在此洒下过甘露。于是，古往今来，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们成群结队地从各地来到这里沐浴，以洗去罪孽，使灵魂得到净化。阿拉哈巴德之名系 16 世纪大名鼎鼎的阿克巴大帝所钦赐，意思是“真主的宅邸”。这无异于给这座本来就神圣的城市又罩上了一层神圣的灵光。

在这座圣城中，有一座圣寺。它便是著名的巴拉德华古寺。这一名称得自上古传说中的一位哲人。他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一个人物，因信仰虔诚，学问渊博而受人尊敬。就在这座圣寺的对面，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宅第，它的名字叫阿南德宫，意思是欢喜宫。

这是一座很大的建筑。它占地面积很广，不仅可以容纳房主一家人和众多的仆役，而且可以容纳许多长住的客人。欢喜宫周围有高大厚实的围墙和雕梁画栋的游廊。围墙内有一座大花园，花园里种满了各种奇花异卉。它们竞相怒放，争奇斗艳，引得众多彩蝶在花丛中上下翻飞。欢喜宫内设有一个室内游泳池，池子的两边分别配备有一排男女更衣室。欢喜宫内有许多仆役，备有好几匹骏马和矮种马以及许多猎犬。

不用说，欢喜宫是一家富豪的宅院，那么它的主人是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莫蒂拉尔·尼赫鲁！

每年的 11 月是印度北方一年中最美的时节，秋高气爽，清凉宜人，这时人们大都喜欢到户外去活动。

在这金秋时节，欢喜宫花园里的花朵也比在其他季节里显得更加可爱。早在几个星期前，辛勤的花匠便把一簇簇杂交的庚申蔷薇花坛修剪得整整齐齐，并给这种精心培植的名花施了第一次有机肥料。花坛上有好几种多年生植物和葡萄都已开花。欢喜宫前草坪旁的柠檬树已挂果，溢出扑鼻的芳香。从大芒果树厚厚的簇叶中，不时传来阵阵鸚鵡的叫声。这些可爱的小家伙正在争吃阿拉哈巴德的名果番石榴。这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欢喜宫将有喜事临门。

1917 年 11 月 19 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那天，天气特别好，阳光明媚，晴空万里。但欢喜宫里的人们都无心欣赏这美丽的景色，他们怀着喜悦而又

紧张焦急的心情，在等待着一个婴儿的降生。

聚集在欢喜宫大厅里的，除了尼赫鲁家的直系亲属外，还有不少堂兄弟姐妹和姑母姨妈，甚至还有一些从大老远的地方赶来的远亲。场面看来是够大的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将诞生的这个婴儿非同寻常，是欢喜宫主人莫蒂拉尔-尼赫鲁的长孙。

年过半百、颇具绅士风度的莫蒂拉尔像往常一样镇定自若。由于心情特别愉快，他不时地与周围的人谈笑。他已将一切安排停当。他唯一的儿子、年方 28 岁即将做父亲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却不像他父亲那样轻松。尽管他表面上竭力装出一副平静自然的样子，但从他那踱来踱去的脚步声中，不难揣度出他内心的紧张、焦虑和不安。

为了招待好来宾，同时也为了松弛一下大厅里紧张的气氛，仆人们比平日更加忙碌。他们不断地穿梭般往来，手里端着盘子，为女眷们送上软饮料，为男人们递上威士忌加苏打。但人们的注意力似乎都不在这上面。

按照印度教的传统风俗习惯，女人的第一个孩子通常是应回娘家生的。娘家在临产前几个月照料孕妇，承担分娩的全部费用，再把产妇送回婆家，这被看作是娘家应尽的义务。据说娘家这样做是出自这样一种心态：担心女儿嫁到婆家不久，因在婆家的地位尚不稳固而受委屈。

豁达开朗、早已欧化了的莫蒂拉尔可不管这一套，他决定破除这个陈规旧俗，让儿媳妇就在自己家中生产，并请当时最好的苏格兰医生来接生。

“哇——”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婴儿终于降生了。等候在大厅的人们终于长吁了一口气，他们接着都不约而同地朝产房方向望去，急切地想知道生下的是个小少爷还是个小公主。

“恭喜先生，是个美丽的小公主。”医生出了产房，向婴儿的父亲报告道。贾瓦哈拉尔听了这话非常高兴。

可客人们听了，不免有些失望。但为了安慰主人，他们都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女孩也不错嘛！”“女孩乖，好养！”

客人们的安慰话对女主人斯瓦鲁普·拉妮并不起作用。她掩饰不住失望的心情，脱口而出地说：“哎呀，真可惜不是个男孩！”

也难怪斯瓦鲁普·拉妮会这么说，因为自摩奴时代起，传统的印度教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的重男轻女的社会。尽管尼赫鲁家族的生活已相当欧化，尽管斯瓦鲁普·拉妮也曾几次随丈夫到欧洲游历，但这并没有改变她的宗教信仰。她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笃信正统的印度教教义。她在欢喜宫内专辟有自己的小天地，每日按时行印度教礼仪，诵经祷神。

正在兴头上的莫蒂拉尔对妻子的偏见大为光火，他大声反问道：“我们自己抚养子女的时候，难道对他们另眼相看过吗？你要知道，贾瓦哈拉的这个女儿有可能胜过一千个儿子呢！”

在场的人们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莫蒂拉尔当时赌气说出的这句话竟会成为一个预言，而且是一个实现了的预言！

婴儿的名字凝聚了尼赫鲁家族几代人的智慧和希望。她的全名叫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妮-尼赫鲁。英迪拉是莫蒂拉尔取的，源出于莫蒂拉尔自己的母亲之名。他的母亲一生都非常坚强，从不向命运低头。莫蒂拉尔以她的名字为孙女命名，一来是借此表达对母亲的怀念，二来是希望这个女孩长大后像她的曾祖母一样坚强。普里雅达希妮是婴儿的父母取的，意即“光艳照人”。显然，父母希望自己的女儿长得美丽动人，世界上哪个做父母的又不是这样

呢？至于尼赫鲁，不用说，那是她的姓。此外，她还有一个小名叫英杜。

由于尼赫鲁家族是名门望族，故婴儿出生的消息传开后，在当时的印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贺信、贺电从全国各地像雪片一样飞来。其中有一封是著名的政治家、诗人、素有“夜莺”之称的萨罗吉妮·奈都夫人写来的。无独有偶，她把婴儿的出世看作是“印度新的灵魂”的诞生。像莫蒂拉尔一样，奈都夫人的话同样具有惊人的预见性。

苏格兰大夫的报喜话并不是一句恭维话，这个女婴实在太漂亮了。她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圆圆的小脸红扑扑的，鼻梁高耸，整个看来活像一个刚刚烧制出来的瓷娃娃。

几天以后，斯瓦鲁普·拉妮用一条精美的克什米尔大围巾将婴儿紧紧地包裹起来，抱着她出了内室，向一间厢房走去。她这是要去满足一个老人的心愿。

这个老人名叫孟希·穆巴拉克·阿里，是一个老穆斯林。他在尼赫鲁家当了一辈子仆人，晚年当上了总管，被人们尊称为孟希翁。孟希翁虽是一个下人，但欢喜宫的上下人等都很尊敬他，就连主人莫蒂拉尔夫妇对他也很尊敬。不幸的是，老人到晚年患了癌症。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在去世前亲眼看看贾瓦哈拉尔的孩子、欢喜宫未来的主人，否则他死不瞑目。像其他的普通人一样。孟希翁当然也打心眼里希望婴孩是个男孩。

婴儿送来了。为了不致使老人失望，谁也没有向他讲明婴儿的性别，孟希翁还以为她真是一个儿子呢。他伸出一双枯干的手，将婴儿抱过来，看了又看，按照宗教习惯为她频频祝福祈祷。“真主保佑，东家终于后继有人了！”末了，孟希翁这样说道。

几天以后，这个善良的老人，带着愿望满足后的微笑和对恩主的忠心，终于乘鹤而去了。

不平凡的家世

尽管欢喜宫的人们对婴儿是个女孩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见，但莫蒂拉尔却决不这样看。他是阿拉哈巴德闻名的大律师，受过西方教育。他志存高远，目光远大，充满睿智，遇事极有主见。只要是他坚定了的信念，或是拿定了的主意，任何人或风俗习惯都休想动摇或改变。他认为生男生女一个样，那些对生女孩感到失望的人不过是千百年来束缚人们的陈旧的宗教观念和传统思想在作怪。

莫蒂拉尔认为，旧思想、旧观念对人们不贻害无穷的，它束缚人的思想，泯灭人的个性，扼杀人的创造才能和勇敢精神；人们若一味遵循旧礼教、旧思想，按老传统办事，将会一事无成。

莫蒂拉尔的思想很有见地。实际上，尼赫鲁家族的发迹史就是一部不断地同老传统、旧观念作斗争的历史。就拿这个家族的先祖拉志·考尔-尼赫鲁来说吧，当年，他如果也像克什米尔的大多数居民一样，困囿于传统习俗而不敢走出山谷一步，到外面去闯荡一番的话，那么尼赫鲁家族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显赫和荣耀了。

拉志·考尔-尼赫鲁蒙受皇帝召见、赐官封邑后，他的新生活开始了。他认为这下好了，可以一展自己的才华了。不料命途多舛，好景不长。1719年，他的恩主法鲁克西尔皇帝被大臣废黜并处死。没有皇上的荫庇，拉志·考尔

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这也不足为怪，尼赫鲁家族的前途和命运从一开始就是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当时莫卧儿帝国已处于分崩离析之中，最后的覆灭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是留下来呢？还是退回克什米尔老家？拉志·考尔面临着前途和命运的又一次大抉择。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还是留下来。

不管后来的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政局如何动荡，环境如何恶劣，拉志·考尔都坚持了下来，他还把这种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顽强品质传给了他的后人。

后来的几十年中，印度历史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英国东印度公司取代已衰朽的莫卧儿帝国，在印度建立起殖民统治。善于审时度势，也是尼赫鲁家族的一个特点。拉志·考尔的一个后裔拉克什米·纳拉扬·尼赫鲁敏锐地洞察到时局的变化，他不失时机地在18世纪后期在英国人开办的萨克尔公司内谋得一职，充当该公司驻已无任何实权的莫卧儿皇帝宫廷的首席代表。他是最早在英国殖民机构中任职的印度人之一。

1857年，印度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大起义，德里成了起义的中心。当时拉克什米·纳拉扬·尼赫鲁的儿子，也就是英迪拉的曾祖父干迦·德哈·尼赫鲁正担任德里市市长。起义军杀掉了德里及其附近城市密拉特的一些英国人。因此，在起义被血腥镇压下去以后，英国殖民者便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他们废黜了莫卧儿的末代皇帝巴哈都尔沙，将他流放到缅甸的仰光。他们还枪杀和绞死了20多个王公。他们对封建王公尚且如此，对一般平民百姓则更是肆意屠杀。

一时间，德里的上空为腥风血雨所笼罩。为了免遭杀害，惊恐万状的居民纷纷逃离这座恐怖的城市。干迦·德哈一家也加入了大逃亡的行列。他们要去的目的地，是位于德里东南方的亚格拉。亚格拉曾经是莫卧儿王朝的第二大城市，那里有举世闻名的泰姬陵。

就在这次逃亡途中，干迦·德哈一家经历了一次大的风险。一队英军拦住了他们。原来，有一个英国小女孩失踪了。这些兵看到干迦·德哈的女眷中正好有个皮肤白皙的小女孩，就起了疑心，以为这个小女孩就是那个英国女孩。他们不知道带有明显的雅利安人特征的尼赫鲁家族的人们的肤色也是白皙的。在那动荡的年代，横蛮的英国兵单凭怀疑就足以把他们全家吊死在路旁的大树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幸亏干迦·德哈（他本人不懂英语）的一个儿子懂英语，讲明了真相，那些兵才放他们走。一家人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亚格拉。

1861年，干迦·德哈撒下身怀六甲的妻子，撒手西归。三个月后，他的遗腹子莫蒂拉尔出生了。莫蒂拉尔的童年是不幸的，他还在娘胎里父亲就去世了。他根本不知道父亲长得是个什么模样！

此后不久，莫蒂拉尔的大哥班西·德哈-尼赫鲁进入英国殖民政府的司法部，以后又被派往各地任职，和家人很少往来，故维持全家人的生计的重担就落在了莫蒂拉尔的二哥南德·拉尔·尼赫鲁的肩上。南德·拉尔·尼赫鲁精明强干，专攻法律，先是在亚格拉当律师，后来，省高等法院从亚格拉迁至阿拉哈巴德。为了便于拓展业务，精明的南德·拉尔又率领全家随迁到那里。

莫蒂拉尔自幼聪颖过人，且敢作敢为，自尊心极强。他先是在家里学会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初步接触了伊斯兰教的经典和文化；同时他还从家族

的女性那里接受了印度教的信仰。12岁那年，他开始学英语，并且很快就掌握了它，从而接触到第三种文化即西方文化。莫蒂拉尔一生受到三种文化的熏陶，这对他本人后来的成长道路乃至他的子孙后代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父女的自由平等观念以及政治不受宗教影响的观点，莫不可溯源于此。不过，相形之下，在这三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对尼赫鲁家族的影响更大。

对当时的印度人来说，要想跻身上流社会，获得丰厚的收入。当律师几乎是唯一的途径。莫蒂拉尔从他二哥的亲身经历中深深地领悟到了这一点，决心也像他那样当一名大律师。他大学毕业后，先是在坎普尔的初等法院当了三年见习律师，然后回到阿拉哈巴德正式挂牌开业。不久，他的二哥南德拉尔去世，年仅26岁的莫蒂拉尔成为一家之长，担负起养活一大家人的重任。

莫蒂拉尔工作非常努力；他精通业务，尤其精通许多老练的律师都视为畏途的极为复杂而混乱的民法；他的英语也相当棒，在法庭辩论中讲起来如行云流水般流畅；此外，他还把亡兄生前的业务范围都继承了下来。所有这一切，使他很快在同行中脱颖而出，成为红极一时的大律师。

随着业务的顺利开展，莫蒂拉尔的收入直线上升，短短几年工夫，他就从第一次接案中只挣到5个卢比猛增到月薪2000卢比。这在当时的印度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有了这笔钱，莫蒂拉尔不仅能毫不费力地养家糊口，支付晚辈的教育费用，甚至可以过英国上流社会那样的生活。

莫蒂拉尔会赚钱，也会花钱，他从不在钱的问题上打算盘。贾瓦哈拉尔曾这样写道：“父亲不想存钱，他认为存钱是没有本领尽量赚钱的表现。他爱玩，喜欢过好生活，所以钱虽然赚得不算少，花得也快。我们的生活方式一天比一天欧化。”

1900年，莫蒂拉尔用赚来的钱建造了欢喜宫。后来，他又在它一边的空地上建造了一幢更现代化的两层楼房。新楼房的样式很奇特，上面是一个圆顶状结构，看上去像一只巨大的婚礼蛋糕。它建成后，莫蒂拉尔为它取名欢喜宫，而把原来的老欢喜宫改称自治宫，将它捐献给了印度国大党，供其开展活动之用。

莫蒂拉尔家的生活既是奢华的，也是欧化的。他们家是整个阿拉哈巴德市第一个装有自来水和电灯的。屋内陈设相当考究，所有的精美家具和帷幔都是莫蒂拉尔不惜花巨资从欧洲购买的，在当时的印度堪称一流。早在1904年，他就拥有了自己的小汽车，而当时的联合省省长还没有汽车。后来他又从欧洲先后购买了一辆菲亚特和一辆兰西亚。他还拥有当时连许多英国人都不具备的照相机。莫蒂拉尔平日的装束打扮也是欧化的。他西装革履，头戴便帽，谈吐文雅，唇上蓄着骑士式的小胡子，俨然一副英国乡绅的派头。莫蒂拉尔一家的进餐方式也是欧化的。一家人围坐在一张可供24人坐的大餐桌周围，使用的是最昂贵的瓷器和银刀叉。莫蒂拉尔的业余生活甚至也是欧化的，比如在大草坪上开茶话会、打网球、骑马打猎。当然，在莫蒂拉尔所有的欧式生活方式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让子女受的欧式教育。他为两个女儿雇请的家庭教师是英国人，他让儿子上的是英国的大学。

尽管莫蒂拉尔刻意追求英国贵族的生活方式，但他并不亦步亦趋地模仿他们。除按欧洲衣式进餐外，他和家人时常也按印度传统方式进餐：将装满食品的银盘整整齐齐地摆在矮木桌上，一家人席地而坐，用手取食。他闲暇时除了喜爱打欧式网球、骑马打猎外，还喜欢印度式的摔跤。他虽然厌恶印

度教社会的闭塞和狭隘，也不喜欢印度教的种种清规戒律，但他并不反对它的基本伦理准则，更不干涉家人的信仰自由。他甚至为妻子斯瓦鲁普·拉妮和孀居的妻妹拉吉瓦蒂各设了一间祈祷室，让她们每天安心地在里面诵经祷告。

莫蒂拉尔还特别喜欢交际。他家经常是宾客盈门，高朋满座。来宾中既有印度人，也有欧洲人；既有一般平民，也有像联合省省长那样的达官贵人。为了满足不同客人的不同口味，欢喜宫里设有三个厨房：一个由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厨子理厨，专门烹制欧式菜肴；另两个由印度教厨子掌勺，分别烹制素食的和非素食的印度食品。不论是哪一式的，菜肴的烹制总是以味美可口而又考究为原则。莫蒂拉尔还喜欢饮酒，如遇知己，更是狂斟豪饮。他的酒窖里常年珍藏着的是堪称全印一流的佳酿。他在待客的时候，喜欢和客人们一边喝着葡萄酒或加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一边海阔天空地神侃。在此过程中，他不时来几句得体的波斯文诗或阿拉伯文诗，或是说几句俏皮话，借以活跃气氛。

1897年，尼赫鲁家族在欧美人面前第一次露了脸：莫蒂拉尔的长兄班西·德哈·尼赫鲁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其间，他在伦敦参加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纪念的观礼，在华盛顿拜会了麦金莱总统。两年后，莫蒂拉尔本人也访问了欧洲。此后十年中，他又数度飘洋赴欧。

尼赫鲁家族在社会上最出风头的时候是1911年。那年，莫蒂拉尔夫妇应邀出席英王兼印度皇帝乔治五世巡游属地时在德里举行的正式接见。能够受到英王的接见，莫蒂拉尔夫妇既激动万分，又得意洋洋。他们赶忙给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儿子贾瓦哈拉尔打电话，叫他火速代为定制赴会穿的宫廷礼服。儿子不仅照办了，还特地为父亲在奈顿铺子定制皮鞋，在特拉维累铺子定制手套，在希思铺子定制礼帽。他还为父亲配了宝剑和其他饰物。可以想见，莫蒂拉尔穿上这副行头，该是何等的气派、神气！在那次接见中，莫蒂拉尔夫妇受到了极为体面的礼遇。他们被安排在联合省副省长的专用帐篷里，出席了所有的隆重仪式，并被安排在最显要的位置上，英王和王后一再特地向他们点头致意。

莫蒂拉尔18岁结婚，可妻子却过早地去世了。她所生的一个儿子也没有活下来。莫蒂拉尔又娶了一房妻室，她就是斯瓦鲁普·拉妮。她生的第一个儿子夭折了。1889年，她又生了一个儿子，他便是传主的父亲、大名鼎鼎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人们一般习惯以尼赫鲁家族的姓氏专指他。后来她又相继生下了两个女儿——维贾雅拉克希米·尼赫鲁（人称潘迪特夫人）和克里希娜·尼赫鲁。

莫蒂拉尔一心想把他的宝贝儿子培养成一个贵族，把他送到英国著名的贵族子弟学校——哈罗公学读书，后来又让他在剑桥大学和内殿法学协会学习。1912年，尼赫鲁在获得律师资格后回到印度，在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供职。

1916年，尼赫鲁同考尔家族的卡玛拉·考尔结婚。与尼赫鲁家族一样，卡玛拉也出身于克什米尔的潘迪特种姓，在血统和财富方面足可与前者相比肩。这桩婚姻堪称门当户对。卡玛拉的父亲是德里的一个富商。她的祖上曾在斋普尔土邦做过大官，获得过“阿泰尔”的称号。“阿泰尔”一词的意思是“不可动摇的”。这个称号充分表明了考尔家族的成员的个性特征：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任何人都强迫不了。这种个性对卡玛拉的影响很大。后来，

英迪拉又从母亲身上把这种个性继承了下来。

与尼赫鲁家族不同的是，考尔家族相当正统，甚至有些保守，没有受到西方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影响。卡玛拉虽然聪明过人，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她没有受到她的小姑们那样的西式教育，这一点虽然在订婚后以请英籍家庭教师为她补习英语的方式来补救，但还是不尽人意。这成了日后婆母不中意和姑子们奚落她的借口。

在尼赫鲁家族的主要成员中，只有莫蒂拉尔还比较爱卡玛拉，因为这个儿媳妇是他自己亲自为儿子选定的。婆婆斯瓦鲁普·拉妮对她总没有好印象，觉得她配不上自己的宝贝儿子。卡玛拉的大姑子维贾雅拉克希米更是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她常因卡玛拉不熟悉西方的社交礼节而故意使她出丑。比如她常在客人们面前取笑卡玛拉，说她在餐桌上如何用错了刀叉，或者在与交谈中如何用词不当。她还在父兄面前编造她的坏话。

婆婆对媳妇的态度与婆婆自身的生活经历有关。俗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斯瓦鲁普·拉妮做媳妇时，曾经受到她的二嫂即莫蒂拉尔的二哥南德·拉尔的妻子的压制，憋了一肚子气无法发泄，几十年后她本人成了婆婆，她的媳妇自然也就成了她的出气筒；至于姑嫂之间不和，那也是一个家庭中常有的事。

当然，这个家庭内部的不和睦，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实际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印度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在一个家庭中的表现。

由于是包办婚姻，尼赫鲁起初对妻子也不太满意，因而不大主动去关心她。对妹妹在他面前所讲的有关卡玛拉的坏话，他虽然不相信，却未加责备和制止；对母亲对待卡玛拉的蛮横举止，他也不曾加以劝阻。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与妻子之间才逐渐培养起一些感情。他终于意识到从前亏待了妻子。

卡玛拉生性敏感，自尊心极强，同时也具有高度的自我克制和忍让的传统美德。尽管受到婆婆的挑剔、姑子们的虐待和丈夫的冷遇，她还是尽量克制自己，默默地忍受，不与他们发生冲突。如果有时候实在受不了，她就悄悄地回到自己的房里，独自伤心落泪。在这样的时候，常常只有女儿英迪拉陪伴着她。

然而，这个外表柔弱、逆来顺受的女子的内心，却潜藏着顽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这是她从她的家族继承下来的，这使得她在某些关键时刻，甚至比尼赫鲁家的男人们显得更加坚定和有主见。英迪拉后来回忆说，当她的父亲准备放弃原有的职业，放弃奢侈的生活方式，跟随圣雄甘地参加政治斗争时，几乎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唯有她的母亲卡玛拉勇敢地站出来给予支持和鼓励，使父亲得以毅然决然地迈出转折性的一步。而这不仅使她的家庭，而且使整个印度的现代史为之面目一新。

在英迪拉成长的过程中，尼赫鲁家族的主要成员都无疑对她产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然而，就性格方面而言，对她影响最大的，既不是她的父亲尼赫鲁，也不是她的祖父莫蒂拉尔，而是她的母亲卡玛拉。

母亲对英迪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英迪拉童年时代目睹了母亲的不幸遭遇，这使她形成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决不允许任何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她；母亲的百折不挠的坚强性格成了她日后从事政治斗争的巨大力量源泉，使她具有不达目的誓不休的惊人意志。

卡玛拉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是英迪拉的好母亲。

动荡的年代

英迪拉的童年是幸福的，她成长在一个充满了爱的环境里。作为一家之主的莫蒂拉尔，对她尤其是宠爱备至。他自称“念念不忘英迪拉”，把她看作是天真无邪的化身，一想到她就感到安慰。他经常给她买礼物。英迪拉也承认，她完全被他宠坏了。

有一年夏天，莫蒂拉尔带家人到达尔豪谢去避暑，他给小英迪拉准备了一匹相当不错的小马。英迪拉骑着骑着，忽然感到不舒服。这下可把莫蒂拉尔急坏了。他东瞧瞧西看看，发现问题原来出在马鞍上，便立即发了一封急信，给留在阿拉哈巴德的尼赫鲁，要他马上送一副好马鞍去。

英迪拉对她的祖父也怀有同样的感情。她不仅爱他，而且很钦佩他。祖父的个性以及他对生活的无限热情，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甚至喜欢他的大笑。有一次，她在接见来访者时回忆说，莫蒂拉尔的形象好像永远充满了整个屋子。“我现在意识到他的身材并不那么高大，可那时候我感觉到他非常高，非常大，似乎可以拥抱整个世界。”

英迪拉的祖母斯瓦鲁普·拉妮对她也算得上是宠爱的，尽管她曾对英迪拉是个女孩感到失望过。斯瓦鲁普·拉妮平时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同她的寡妹在祈祷室里度过的。祈祷室是她们专有的小天地，没有她的允许，这个家族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得擅入。唯独英迪拉的那双小脚可以随时跨进来，而且事实上她总是受欢迎的。斯瓦鲁普·拉妮专门为孙女准备了一个橱柜，里面放着她爱吃的各式糖果糕点。小英迪拉每次来，斯瓦鲁普·拉妮总要拿出一些给她吃。调皮的小英迪拉在饱尝了精美的食品之后，还给祖母取了一个绰号——“橱柜儿奶奶”。

斯瓦鲁普·拉妮的寡妹拉吉瓦蒂给予英迪拉的是另一种爱。作为一名寡妇，她笃信印度教，严守妇道，不沾荤腥，生活十分简朴。她自然拿不出能让小英迪拉欢心的糖果，但是，她有她的招数。小英迪拉爱听故事，拉吉瓦蒂便把自己所熟知的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的故事讲给她听。她告诉她罗摩王是如何起兵惩罚暴虐无道的罗刹王罗婆那的；神猴哈努曼又是如何神通广大，帮助罗摩王救出了妻子悉多的；在俱卢之野战斗中潘达伐斯又是如何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最终取得胜利的。这些故事平时没有人讲给她听，小英迪拉觉得非常新奇，常常听入了迷。

英迪拉的双亲时常因参加政治斗争而被捕入狱，不能亲自抚养女儿。但他们对她的关心和爱都是无限的，在英迪拉成长的过程中，她的父亲尼赫鲁曾给她写过 200 多封信，对她的成长、学习和生活进行及时的指导、关心和鼓励。母亲卡玛拉经常让她跟她一起做祷告，教育她要坚强。

至于欢喜宫的仆人们对英迪拉的伺候就更不必说了。每当她迈着小脚蹒跚学步时，总有一个成年人紧跟在后面，以防她在那些大房间里的又硬又滑的水磨石地板上跌倒，或者在花园里追逐彩蝶时，受到树丛中暗藏的眼镜蛇或毒蜥蜴的侵袭。

然而，由于生逢乱世，英迪拉童年的幸福是短暂的。随着尼赫鲁家族的主要成员相继卷入政治旋涡，她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童年也一去不复返了。

在那动荡的年月，每一个印度人的命运都与整个印度民族的命运息息相

关，英迪拉也不例外。

自从 1757 年普拉西战役，英国殖民者开始入侵印度以来，印度各族人民就一直在进行着反抗英国殖民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这些斗争起初如涓涓细流，到整整一个世纪后的 1857 年，终于汇成了汹涌澎湃的具有全民族性质的反抗英国殖民者的巨大浪潮。由于种种原因，这场起义的烈火最终被残忍狡猾的英国殖民者扑灭了。

大起义失败后，印度陷入了暂时的沉寂。但是，人民是压不垮的，反抗的烈火终究是扑不灭的，只不过这烈火燃烧的方式变了，不再以大起义的形式来燃烧。

民族的出路在哪里？祖国的前途在哪里？一代代先进的印度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在进行着艰难的探索。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觉醒，意识到要想同英国殖民者作斗争，只有组织起来。

于是，在加尔各答，在孟买，在马德拉斯，在浦那，一个个地方性的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渐渐地，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到 19 世纪 80 年代，全国性的民族主义的政党组织终于出现了。

1885 年 12 月 28 日，来自印度各地方民族主义组织的 72 名代表在孟买隆重集会，宣告了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印度国民大会党的诞生。尽管成立之初的国大党在组织上不健全，在政治上不成熟，拿尼赫鲁的话说，只不过是“穿着晨服，戴着高级礼帽，裤缝熨得笔直”，讲着英语的中上层绅士们的集会，但是，它的成立毕竟标志着印度资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对唤醒印度全民族的民族意识，推动印度民族运动的蓬勃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能够随着政治形势和客观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克服自身的弱点，与时俱进。

像世界上的大多数政党那样，国大党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派别斗争。在印度独立前的几十年中，国大党的党内派别斗争主要表现为温和派和激进派之争。起初，温和派以效忠英国为前提，满足于向殖民政府请愿、抗议、提意见；激进派则高举起自治的大旗。后来，温和和激进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温和派主张通过缓慢的宪法途径取得大英帝国领属下的自治；激进派则公然以争取民族独立相号召。有趣的是，两派之争也反映到了尼赫鲁父子身上：父亲比较温和，而儿子却相当激进。

莫蒂拉尔认为，印度的前途，在于在英联邦中取得自治领地位；而儿子的前途，则在于当一名印度文官，充当“英国统治的桥梁”，或者是像自己一样，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律师。他常以自己以及家属能跻身官场而感到荣耀。他的儿子尼赫鲁则不同。他是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早在去英国留学之前，他就对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和剥削有亲身体会和切肤之痛。后来在英国哈罗公学读书时，他又接触到费边社会主义学说，对英国殖民者的专横跋扈极为愤慨。他梦想有朝一日能够“手持利剑，为保卫和解放印度而战斗”。他立志要像他所崇拜的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那样，成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政见不同的父子俩经常发生激烈的争执，儿子嫌老子过于温和，老子说儿子不过是年轻人的冲动。克里希娜曾说：“家里的气氛总是很紧张，没有人敢随便说话，生怕触怒父亲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虽饱含政治热情，却苦于找不到救国的良方。

就在这时，“一道闪电划破了黑暗，清除了我们眼睛上的翳障”，使尼

赫鲁仿佛在一夜之间从一个西方贵族式的知识分子和少爷，转变成为一个印度民族民主革命的坚强战士。

这个对尼赫鲁影响至深的人物，就是被印度人民尊称为圣雄的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圣雄甘地比莫蒂拉尔·尼赫鲁小八岁，也是位律师，受的也是西方式的教育，而且是在英国拿的学位。但与欧派十足的莫蒂拉尔不同，他丝毫也没有欧化。

24岁那年，甘地来到南非，为当地的印度人社团办案。他原计划只呆一年，结果呆了21年。在此期间，他领导印侨开展反对南非政府制定的具有明显种族歧视性质的《印侨管理法》，发明了著名的“萨蒂亚格拉哈”即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法。1915年，他回到祖国，又将它介绍给自己的同胞，用以反抗英国人。

对于甘地的学说和斗争方法，国大党内部起初争论不休，尼赫鲁父子也看法不一。莫蒂拉尔认为非暴力不合作无异于“仲夏的疯狂”；而尼赫鲁不但认同，而且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去。但无论如何，甘地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以及他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法，对整个印度和尼赫鲁家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印度和尼赫鲁家族产生影响的，除了圣雄甘地这个重要人物以外，还有两件性质截然不同的事件，即发生在英迪拉出生那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和两年后发生在旁遮普阿姆利则的杰利安瓦拉-培大惨案。前者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它对印度的意义在于它给予印度人民以精神上的鼓舞；而后者则是印度民族运动的转折点，它促使印度民族进一步觉醒。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印度资产阶级抱着英国于战后给予印度自治的幻想，全力支持英国作战。尽管印度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战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战后它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印度资产阶级的幻想变成了肥皂泡，人民的满腔希望也化成了一盆冰水。他们看穿了殖民者的嘴脸，纷纷起来开展斗争。

对印度人民提出的基本要求，凶残的英国殖民者不但不予以满足，相反准备镇压，他们抛出了臭名昭著的《罗拉特法案》。根据该法案，殖民政府平时可以实施戒严令；地方当局有权拘捕任何被怀疑为反政府的嫌疑犯，可不经审判而监禁，或不准辩护而判刑；警方有权解散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英国殖民者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印度人民强烈的反抗怒火。阿姆利则大惨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1919年4月13日是印度北方的一个重要节日。那天天气很热。大约两万名群众利用这个节日来到锡克教圣城阿姆利则的杰利安瓦拉-培公园举行和平抗议集会。这个公园四周都被建筑物的高墙围住了，只有一个狭窄的出口。驻守当地的戴尔将军率一队英军闻讯赶来，包围了公园，未经事先警告便下令对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79人，打伤1200人，其中许多是妇女儿童。事后，戴尔这个双手沾满了印度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不仅未受到惩办，相反还得到了英国统治阶级的奖赏。

死难者的鲜血教育了国大党，也教育了莫蒂拉尔·尼赫鲁。他终于明白：独立和自由不可能靠英国人赐予，而必须通过斗争才能取得。莫蒂拉尔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善如流。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他变得简直比他的儿子还要激进，更接近甘地。父子俩终于站在一起了。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在国大党

阿姆利则年会上，莫蒂拉尔被推选为国大党主席。

1920年12月，国大党在那格浦尔召开年会，这次会议成了国大党历史的转折点。会议最大的历史功绩，一是确立了圣雄甘地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确认了他所提出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政治纲领。其主要内容包括退回殖民政府授与的封号、勋章、爵位和荣誉职位；抵制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以及英国式学校；抵制洋货，尤其是英国的纺织品；拒绝纳税；等等。二是健全了党的组织。在中央设立工作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主持全党的日常事务；在地方上按语言分省的原则，分别在城乡建立基层委员会。会议还决定大量吸收工人农民入党。这样，国大党便从一个上层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的讲坛，转变成为一个具有明确的斗争目标，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全国规模的民族主义政党，从而掌握了对民族运动的领导权。

圣雄甘地发起和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很快得到了举国上下的热烈响应。近三分之二的选民拒不参加参事会的选举，律师们纷纷放弃他们的业务，大批学生从西式学校中退学。民间自行组织仲裁法庭，自办国民学校。抵制洋货、焚烧英布的事件到处发生，有时烧布还伴随着群众集会。圣雄甘地还亲自到会参加烧布。一位目击者写道：“圣雄点燃那高高的洋布堆，景象蔚为壮观。广大的观众、燃烧的布匹、充满激情的演讲人，一同掩在渐深的夜空之下。”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早已人满为患，可大家却毫无惧色，反而以坐牢为荣。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尼赫鲁家族也积极响应国大党和圣雄甘地的号召，投身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洪流中。莫蒂拉尔毅然丢弃了在英国希思铺子定制的礼帽和在特拉维累铺子定制的手套，再也不去殖民政府大厦赴宴。父子俩脱下了昂贵的赛维尔罗西装，不再戴软呢帽和打丝绸领带，改穿用“卡迪”土布做成的紧身裤和无领印度衫，改戴也是用“卡迪”做成的甘地帽（一种轻便的尖顶帽）。若干年后，英迪拉回忆起幼年的情景时，她已想不起她的父亲和祖父曾穿过西装。

尼赫鲁父子不仅改变了装束，而且也抛弃了原来的生活方式。莫蒂拉尔辞去了省立法议会中的席位，结束了曾给他带来万贯家财的律师生涯。欢喜宫里的那个独立的欧式厨房关闭了，大酒窖里再也见不到精美的陈年佳酿了。马房解散了，仆役人数也大大减少。那些从伦敦和其他欧洲城市买来的名贵家具被付之一炬。这一切表明，尼赫鲁家族同过去彻底决裂了。1921年，莫蒂拉尔在从山区疗养地写给甘地的一封信中，谈了他的变化。他写道：一只黄铜炊具代替了原先的那两个厨房；一个孤零零的仆人代替了昔日的大群跟班；打猎已改为长途漫步，枪支弹药已换成了书报杂志；进餐方式已改为只在正午饱餐一顿，不再“按照英国派头进早餐、午餐和晚餐了”。

尽管欢喜宫的草坪修剪得像往日一样齐整好看，芒果在炎热的季节按时成熟，但是，随着尼赫鲁家族日益深入地卷入政治漩涡，欢喜宫那祥和的气氛、安定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紧张、动荡、麻烦和不安接踵而至。

初经风雨

1921年11月，英国威尔士亲王访印。圣雄甘地宣布进行全国性罢工、罢市，以示抵制。英印殖民当局予以镇压，大肆搜捕运动领导人，英迪拉的祖父莫蒂拉尔和父亲尼赫鲁也在被捕之列。这是他们第一次被捕。当时英迪

拉年仅 4 岁。当法庭开庭审讯时，英迪拉就坐在祖父的怀里。当她眼睁睁地看着祖父和父亲被押进监狱时，她内心的悲哀和痛苦是无法形容的。她只好流着泪独自回家。以后她的父亲多次被捕，在她 13 岁前，他就被判罪定刑达五次之多。

参加反抗斗争有时还要付出血的代价。有一次游行示威，英迪拉的父亲领头走在最前面。这时一群警察骑着高头大马，挥舞着大木棒，凶神恶煞地冲过来，照着人群劈头盖脸地一阵乱打。尼赫鲁首当其冲地遭到毒打、被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衣服也被撕破了。但作为圣雄甘地的忠实信徒，他对警察的毒打既不躲避，也未进行还击。

尼赫鲁家族的其他成员，也先后不同程度地卷入了争取自由的反英斗争。这些人中，要数英迪拉的母亲卡玛拉态度最坚定。在阿拉哈巴德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她全然不把在场的大批英国军警放在眼里，用宏亮的嗓音勇敢地把丈夫几天前曾因此被指控为进行煽动性活动的同一篇讲话再讲了一遍。

不肯再当顺民的尼赫鲁家族自然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的敌视。于是，警察成了欢喜宫的常客。他们闯入英迪拉家，不是抓人，就是拿东西。1971 年，英迪拉·甘地在一次接见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访问时，对当时她家中的气氛曾作过这样的描述：“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时，警察不断来抄家，没收了我们的家具和杂物，还要抓人，我们不得不藏起了违禁的印刷品。当时我虽然还小，但这一切我都有份。……我参加了游行和集会，我的童年是十分没有保障的。人们今天不晓得明天谁还会活着，谁还会在这屋子里，而下一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时英国殖民当局，对于参加争取自由运动者的惩罚，通常是处以有期徒刑和一大笔罚款。尼赫鲁家的人按照圣雄甘地制定的政策，宁愿坐牢而拒交罚款。于是警察就时常跑到欢喜宫来抄家，以物抵罚金。他们几乎抄走了一切拿得动的东西，如家具、地毯、窗帘、水晶玻璃制品、瓷器、衣服等，在警察局里高价拍卖。对此，一向达观的尼赫鲁家族中人并不以为意，但小英迪拉却抑制不住满腔的怒火。当祖父和父亲第一次被捕入狱，警察第一次上门抄家时，年仅 4 岁的她便握紧小拳头，怒气冲冲地向警察冲过去，大声叫道：“不许你们拿走那些东西，那是我家的。”

英迪拉很早就经受了暴风雨的洗礼。她 5 岁那年，她的祖父和父亲执行圣雄的政策，决定将家中所有的英国货（主要是纺织品）付之一炬，尼赫鲁全家都参加了这个活动，小小的英迪拉也在父母面前争吵着要去。父母嫌她太小，没有同意。她就跑去找爷爷，一向宠爱小孙女的爷爷同意了。这件事对英迪拉的影响很大，以致若干年后她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她在《甘地夫人自述》中曾这样生动描述道：

在我的印象中最生动的一幕，是我们第一次焚烧外国衣物的情景。至今我还能感受到那个日子的激动情绪，还能想象起大平台上堆得满满的衣物——多么贵重的料子！多么可爱的色彩！跳上衣服堆，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在堆积如山的天鹅绒、罗缎和纱绸上面玩捉迷藏，真叫人开心啊！也就是在这一天，我发现连我的父母都管不住我了。人人都去看烧衣服的篝火了，嫌我年纪太小，安排我去睡觉。我向祖父求情，他向着我，那时候和那以后他总是向着我的。可是到了火堆跟前，我几乎睡着了，看到的只是扔在衣堆上的燃烧着的木柴，火光摇曳，火苗乱窜。

尼赫鲁家的这把大火轰动了阿拉哈巴德，也轰动了全印度，一时间成了

人们争相谈论的热门话题。

几个星期以后，小英迪拉又经受了良心和责任感的第一次考验。有一天晚上，她家来了一位女客人，是从巴黎回来的亲戚。她给英迪拉带来了一件漂亮的绣花上衣。母亲卡玛拉微笑着拒绝了。她对客人说，从现在开始，全家人只穿手工纺织的土布“卡迪”。

客人对此大为不解，同时对送礼遭拒感到有些不快。当她发现卡玛拉的皮肤被粗糙的“卡迪”都磨得红肿了时，忍不住对卡玛拉大声嚷道：“我看你们全都发疯了。你是大人，你想生病那是你的事，可你没有权利叫孩子受罪！反正我已经把给她的礼物带来了，要还是不要，你看着办吧。”

见客人生气了，卡玛拉不好再说什么，她决定让女儿自己拿主意。于是，她把英迪拉喊来，对她说道：“英杜，好孩子，姨姨给你捎来了一件外国产的上衣，非常漂亮，你喜欢的话就穿上吧。可是，首先你得想想我们焚烧洋货的那场大火。在我们大家都穿‘卡迪’的时候，你乐意穿上这洋玩意儿吗？”显然，母亲这样说，意思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希望女儿不要接受。

常言说得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即使是小女孩也不例外。这件精美的绣花上衣对小英迪拉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强了，她情不自禁地伸出小手去摸它。就在快要摸着的时候，她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迅速把手收了回来，坚决地说：“把它拿走，我不要穿这个！”

“为什么不穿？难道你不喜欢漂亮的东西吗？”客人失望地问道。“我喜欢……我喜欢……但是……”小英迪拉把平日从大人们那里听来的那些似懂非懂的道理复述了一遍。

听了小英迪拉的话，客人颇感惊异，同时也觉得这个小女孩不简单，不过她还想逗她一逗，便说道：“好吧，小圣人，你不喜欢这件衣服，我会把它拿走的。可是你还有一个洋娃娃，那又该怎么办呢？”

这话客人本是随便说说，小英迪拉可当了真。那个洋娃娃是她的心爱之物，要对它作出留还是弃的抉择，这对一个年仅五岁的小女孩来说，也是太难了。一连好几天，围绕着这个问题，她的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以致她吃不香，睡不安，沉重的思想负担把她压得喘不过气来。

终于，小英迪拉作出了决定。她拿着洋娃娃艰难地走上屋顶平台，点上火把它烧掉了。随着灰烬四处飘散，她的眼泪直往下淌，接着她病倒了，发了几天烧。

这件事在英迪拉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以致她一生都讨厌擦火柴。

英迪拉的童年是孤独的。尽管她出生在充满了爱的家庭，但这种爱对她来说极为短暂；再说长辈之爱在性质上属于另一种。她缺乏同辈的爱，尤其是缺乏手足之情。她是个独生女，既没有兄弟姐妹，欢喜宫里也没有与她同龄的孩子。因此，她时常感到孤独。每天晚饭后，她都必须穿过一条黑魑魑的长走廊，独自回到自己的卧室，再爬上一张凳子打开电灯。尽管她内心害怕极了，但这个倔强而早熟的孩子却不愿告诉任何人。她不想让任何人分担她的恐惧，宁愿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这个儿时养成的性格，对她后来都有影响。

英迪拉童年时代的生活也是极不安定的。她幼小的心灵时常受到政治风波的冲击。随着她的家族日益卷入政治旋涡，长辈们进监狱成了家常便饭，以致监狱几乎成了他们的另一个“家”。作为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英迪拉

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心理是极为矛盾的。每次被迫与亲人们分别固然令她肝肠寸断，可亲人们出狱的时刻对她来说则更为痛苦。因为她担心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又会被再次关进监狱，好不容易盼来的家庭团圆转瞬间又会化成一场梦；再说，亲人们从监狱里被放出来，往往还意味着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火在渐渐熄灭，或者是因圣雄甘地的追随者们超越了运动的界限而被甘地自己掐灭了，这又使她多了一层不高兴。

英迪拉在政治上显得相当早熟。她玩的游戏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大凡孩子都爱玩娃娃，尤其是小女孩。一般孩子的玩法，无非是让两个娃娃结婚；或者是在娃娃的脸上抹上红粉，眉心上涂上吉祥痣，再给娃娃的手上戴上一副闪闪发光的玻璃手镯，设想自己将来能够戴上金手镯；或者是给每个娃娃分发糖果；如此而已。

英迪拉玩娃娃时，她的念头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转到政治方面去了，让那些娃娃扮演她亲眼目睹或从大人那里听来的如何同英国人作斗争的情景。有时候，她用一些积木搭成一间小房子，把它当作一家对圣雄甘地的呼吁置若罔闻而继续出售洋货的商店。然后，她给一些娃娃披上印度产的白土布，让它们竖立在商店的周围，仿佛是国大党人在它的各个出入口布置纠察线，敦促顾客抵制这家商店，拒购它的商品。最后的结果是顾客全部厌恶地走开了，“坏”店主不得不关门停业。这种情景是她按照她亲眼目睹的妈妈和姑姑在实际斗争中的做法设想出来的。有的时候，她玩的游戏更加严肃。她用泥巴捏成一批小娃娃，给其中一些戴上圆圆的棕色软木遮阳帽，让它们扮演英国兵；给另一些裹上小红头巾，让它们代表听英国主子指挥的印度巡捕。英国兵端着枪，巡捕们拿着长长的大木棒，一副趾高气扬、凶神恶煞的样子。在它们的对面，一排身穿白土布、手持国大党党旗的娃娃正严阵以待。这是一群示威者。它们虽然没有武器，可一个个威武不屈。她把这一排娃娃向前移动，做出反抗的样子，同时自己高呼从大人们的政治集会和游行中听到的一些口号。那些兵士和巡捕也恶狠狠地向前移动，一面舞枪弄棒，威吓殴打那些示威者。示威者跌倒了又爬起来，高举着旗帜，更加情绪激昂地高呼口号。斗争的结果无疑又是示威者获胜，英国兵及其走狗印度巡捕扔下遮阳帽、头巾和木棒，狼狈逃窜。

英迪拉还常自编自导活报剧。她把家里仆人的孩子组织起来，排成队，率领他们游行。她学着母亲平时的打扮，内穿一条紧身棉布裤，外罩一件白色长衫，头戴一顶甘地式尖帽——这是国大党志愿人员的制服，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她一边走，一边领头喊口号。孩子们一个个跟着她走，跟着她喊口号，同时挥舞着紧握着的拳头表决心。游行完了，英迪拉还要登上院子里的一张桌子，向孩子们发表演讲。有时候她对听众是一群孩子感到不满足，便把欢喜宫里的花匠、清洁工等仆役都召来，让他们一起参加“公众集会”。

然而，英迪拉很快就对这类游戏感到厌倦了。因为游戏中的情景毕竟只是虚拟出来的。这个饱含政治热情的小姑娘开始渴望为自由斗争做点实事。她满足于仅仅扮演一个国大党志愿人员。可究竟该干什么呢？她弄不清楚，因为她当时毕竟还太小，只有七八岁。她跑去问甘地。甘地虽是一代伟人，是印度人民心目中的圣雄，可对于一个孩子的询问还是给予认真的答复。他叫她组织儿童手纺协会。

当举国上下响应圣雄的号召抵制洋货、焚烧英布的时候，甘地自己又在探索以国货取代洋货的途径了。1924年，他发动了自纺运动。于是，小小的

纺车一时间成为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者、进行非暴力斗争的武器和象征。别看这件事乍看起来不那么起眼，在短期内看不出有多大的效果，但它不久就迫使几家英国纺织厂停产关门；同时它也使印度人民通过纺纱劳动，切身体会到自己是正在参加这场伟大的民族斗争，让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唤醒自己的民族意识。因此，自纺运动的意义，不在纺纱本身，而在纺纱之外。圣雄的用心，可谓良苦。

听了圣雄的话，小英迪拉的眼睛突然放出光芒。她把小手一拍，说道：“组织儿童手纺协会，自己纺纱，这可比做游戏有意义得多，咦！我怎么没想到呢？”说完，她便一溜烟跑回家去了。望着英迪拉远去的背影，圣雄会心地笑了。连这么小的孩子都有如此强烈的爱国心，圣雄理应感到欣慰。

回到家里，英迪拉又犯愁了：到哪里去弄纺车呢？她想起了她的爷爷莫蒂拉尔，她知道爷爷最宠爱她，一定会满足她的要求。“对，找爷爷去。”可她找遍了欢喜宫，也没见到爷爷的影子。于是，她跑出庭院，继续寻找她的爷爷。忽然，她看到草坪一角有个老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纺纱，知道那正是爷爷，便叫了一声，跑上前去，一下子爬到他的背上，用一只手挽住爷爷的脖子，同时伸出另一只手调皮地一把捏住了爷爷的一撮胡须。

“调皮鬼，快下来！爷爷的胡子都要被你揪下来了。”莫蒂拉尔知道是孙女来了，连忙停下手中的活计，把她抱在怀里，亲了亲她的脸。

就这样，躺在爷爷宽广的怀抱里，捏弄着爷爷的胡须，小英迪拉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爷爷，我想自己学纺纱，可我没有纺车，您把您的这架纺车给我吧。”

“什么？”莫蒂拉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你想要纺车学纺纱，你这么小个人儿，怎么做得了这样的事呢？还是去玩你的那些娃娃吧。”

见爷爷不答应，小英迪拉满脸不高兴。她一个劲儿地嘟哝道：“这可是甘地爷爷出的主意，他还让我组织儿童手纺协会呢。甘地爷爷都没有嫌我小，您却嫌我小。我今年都满七岁了。我可不想再玩那些娃娃了。让我试试吧，爷爷！”

莫蒂拉尔见拗不过她，只得答应。他先是手把手地教她。英迪拉本来聪慧，极有灵性，不一会儿就学会了。接着，莫蒂拉尔就把这架手摇纺车送给了她。

小英迪拉别提有多高兴了，她认认真真地纺纱，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来做。为了把自纺运动的精神传达到更广阔的地区，使更多的人了解运动的意义，投身到运动中来，国大党人纷纷带着纺车下基层，到乡村开展宣传活动。英迪拉也跟着父亲和其他一些国大党人，离开阿拉哈巴德，到邻村去做宣传工作。尽管在那些未经整修、满是坑洼的地区旅行十分辛苦，可她一点儿也不怕。到了村里，当党员们向村民们讲解自纺运动的意义时，她就坐在那里一本正经地纺起纱来，仿佛是在为他们的讲解作着注解和示范。

自纺运动给英迪拉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她甚至将一块自己纺织并缝制的手帕保存了数十年之久，尽管它做工粗糙，甚至“厚得够呛”。

英迪拉最引以为自豪的童年政治活动，是组织猴子队。那年她才13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革命高潮结束后，印度民族运动沉寂了数年，到20年代后期才逐渐复苏。1928年5月，国大党在孟买召开会议，试图就自治印度的政府形式达成一致意见。三个月后，以莫蒂拉尔·尼赫鲁为主席

的一个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文件，即所谓的“尼赫鲁报告书”。它的要求并不激进，仅仅是要求殖民当局给予印度以自治领地位。然而，尽管这个要求已经温和得不能再温和了，英国殖民者仍然拒绝接受。

既然连在大英帝国的范围内的自治要求都不能实现，不如干脆争取取得完全的自治——脱离英国而独立。1929年12月，国大党在拉维河畔的历史名城拉合尔召开年会。选举英迪拉的父亲、年仅40岁的尼赫鲁为国大党的新主席，决定以1月26日为独立节。尼赫鲁以主席身份发表演说，表明今后全党的斗争目标是率领人民争取完全的独立，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仅仅是取得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那样的自治领地位。

拉合尔年会通过了关于争取完全独立的目标决议。这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是国大党政治斗争目标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标志。关于这个决议，还有一个与英迪拉有关的插曲。决议是尼赫鲁亲自起草的。打印好后，尼赫鲁曾让英迪拉念给他听。英迪拉本来是试着念念，可父亲却严肃地要她好好念。她念完后，父亲便对她说：“好，既然你已经念过这个草案了，你就得身体力行！”英迪拉对这句话的理解比对所有有关自治领地位和其他方面的谈话理解都要深刻得多，以致她第一次弄懂了完全独立是怎么回事。

1929年12月31日子夜，当新年的钟声敲响之时，尼赫鲁亲手升起了印度国旗。在高高飘扬的旗帜下面，尼赫鲁带领人们宣誓：一定要争取使印度获得完全的自由。1930年1月26日，印度人民举行盛大的游行、示威和集会，欢庆印度的第一个独立节。国大党利用人民群众空前高涨的政治热情，发起了新的文明不服从运动。

当时，殖民当局实行食盐专卖，禁止私人从海水里提取食盐。圣雄甘地决定以破坏食盐法作为突破口，揭开这场运动的序幕。为此，他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食盐进军”。3月12日晨，甘地带着他的79名弟子步行24天，于4月5日抵达印度西海岸的海边小村落丹迪，取海水煮盐。为防不测，甘地依次指定了如他遭逮捕的后继领导者。此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印度历史学家马宗达描述道，甘地在行进途中“受到了能使皇帝也产生妒意的尊敬和热烈的欢迎。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起来，将道路清扫干净，路上撒满花瓣，当圣徒们经过时人们还垂首下跪。”

圣雄甘地的一口煮盐锅将印度全国煮沸了。人民群众自发起来，开展各种各样的反英斗争：自制食盐，哄抢官盐；辞去公职：拒不纳税；罢工罢市；抵制洋货。一场新的大规模印度民族运动的浪潮就这样被甘地的煮盐锅掀起来了。

新的政治形势又一次影响了英迪拉。在政治上日益成熟起来的她不仅早已厌倦了玩娃娃的游戏，而且对参加自纺运动也感到不满足。她的要求更高了，她要加入国大党。这个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因为她才12岁，离18岁的法定年龄还相差好大一截呢。

生活中有这样一种人，你不让他干的事情，他偏要干。尼赫鲁家族的人就是如此。哼，不让我入党，我就自己建立一个组织，让那些小瞧人的人看看！小英迪拉的执拗劲儿一上来，那可是九头牛也拉不回。

可是，给组织取个什么样的名称呢？这个12岁的娃娃陷入了沉思之中……“有了”，她忽然一拍大腿，兴奋得叫起来，“就叫猴子队吧！”原来，她想起了她的姨奶奶拉吉瓦蒂给她讲过的《罗摩衍那》中的那个神通广大的神猴哈努曼的故事。

哈努曼以其超凡的胆识和大无畏的气概，历尽千难万险，帮助英雄罗摩向邪恶残暴的楞迦王罗婆那开战，从他手中夺回了罗摩的妻子悉达。这个动人的神话传说曾使小英迪拉一次次淌下激动的热泪。

1000多名猴子般聪明伶俐的男女儿童聚集在欢喜宫的草坪上。英迪拉站在高台上，借助于一个成人的声音传递发表演讲，宣告了猴子队的成立。

当时，无论是她家的大人们，还是当地的殖民机构，谁也没有把猴子队当回事。英迪拉的祖父在狱中获知此事后，给孙女写了一封信。在信的末尾，他以开玩笑的口吻写道：“我建议给这个组织的每一位成员都装上一条尾巴，尾巴的长度将视其级别高低而定。”

尽管大人们不把猴子队放在眼里，但是英迪拉并不气馁。她决心以实际行动证明猴子队的存在价值，纠正大人们对它的看法。

在英迪拉的监督下，猴子队的孩子们的确做了许多工作，如缝缝补补、悬挂国旗、为游行的人们做饭菜、为开会的人供应茶水、代不会写字的坐牢者写信以及对被警察打伤的国大党志愿人员进行急救等等。

他们还传递消息，搜集情报。在这方面孩子们往往具有大人们所不具备的优势。若干年后，英迪拉曾对《麦考尔》杂志的记者阿诺德·米凯利斯描述过当时的情景：

有时候，一幢房子可能“被警察包围住，你不能将信息传递出去。但是没有谁会注意一个在警察封锁线上跳进跳出的孩子，没有谁会想到他可能会做出一些什么事情来；而恰恰正是这个孩子却默记住了信息的内容，并把它送到目的地。……坐在警察局前面的警察常常谈一些当时发生的事情——什么人将被逮捕，什么地方将被查抄等等。四五个在外面玩造房子游戏的孩子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然而往往就是他们把消息传给了搞运动的人。精明的孩子们简直成了称职的地下工作者！掩人耳目，不为人注意，这正是他们从事收集和传递情报工作的优势所在。

作为猴子队的首领，英迪拉常常表现出过人的机智和胆识。有一次，国大党的最高执行委员会开会，制订文明不服从运动的新计划。警察闻讯赶来，包围了会场所在地的那幢房子，与会者为保护党的机密，便把会议的记录和文件匆匆地塞进汽车后面的行李箱里。英迪拉拿起一个书包，不慌不忙地坐在后座上，叫司机把车开出去。当车开到大门口时，一个警察拦住了它，以怀疑的目光朝车里打量。英迪拉撅起小嘴，恼怒地说：“我要去上学，你拦住我的汽车干吗？如果我迟到了，你可要负责！”警察一听这话，觉得这个小姑娘肯定来头不小，看那副派头，还有她乘坐的汽车，一定是个富家小姐。于是，他赶忙闪身一旁。“吱——”的一声，汽车一溜烟开走了。这个警察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竟然让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给耍了。

英迪拉有时担负的任务更艰巨，甚至超过了一个孩子所能负荷的界限。有一次，在离英迪拉家不远的个村子里，自由运动战士与英军交火了，有些人挂了彩。但在当时，医生怕被人告发，不敢白天出诊，要等到晚上才能出来。这样，有些重号伤员如得不到及时救治，就会有生命危险。英迪拉便率领猴子队的孩子们去照料。她还把自家的一间大房子改为病房。英迪拉后来回忆说：“这是我从事服务工作的开始，当时，我才十二四岁。”

猴子队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大人们不得不对这帮孩子刮目相看，再也没有人小看他们了。

领导猴子队的那段时间，英迪拉非常快乐，因为她终于能为自由运动做

点力所能及的实事了。遗憾的是，这种快乐没有持续多久。1931年2月6日，她敬爱的祖父莫蒂拉尔因病去世了。

这个噩耗对于尼赫鲁家族来说，不啻晴天霹雳！莫蒂拉尔在其有生之年，一直是支撑欢喜宫大厦的支柱。这个家族的每一个人，无不蒙受过他的荫庇。如今，这根支柱倒下了。用尼赫鲁的话说，连欢喜宫似乎都成了“孤独荒凉的”地方，它的“生气好像一去不复返了”。尼赫鲁丧父后的痛苦心情溢于言表。

英迪拉失去祖父的悲痛心情丝毫不亚于她的父亲。打她呱呱坠地的那天起，祖父就对她充满了无限的爱。就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星期，他还给英迪拉的父亲写过信，告诉他她是如何将原先养鹿的旧木屋改造成一座可以静心读书的凉亭的。一直到他去世的前几天，他还在为心爱的小孙女操心，想出花样逗她乐。这样一个老人，突然离她而去，叫她怎能不柔肠寸断？

二、转徙不定的游学生涯

由上学引起的争论

像走马灯似地不断地上学、停学、转学，这是英迪拉学生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

这个特征与当时印度的时局密切相关。

英迪拉的学生时代，正是印度处于激烈动荡，印度人民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与英国殖民者进行反复较量的时代。尼赫鲁父子深深地卷入了这场伟大的斗争中。他们忙于从事各种政治活动，又常常遭到逮捕。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多少时间来顾及英迪拉的学业。至于卡玛拉，由于身体不好，长期生病，稍好的时候也多是与丈夫一起从事政治活动，她也管不了女儿的学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英迪拉的教育漠不关心；相反，他们极为重视，尽一切可能予以关心。英迪拉五岁那年，尼赫鲁正在勒克瑙监狱服刑。他因着急女儿的教育问题，便写信回家，希望家里对英杜的学业作出安排。他还无不遗憾和欠疚地说，他本来能够不费力地把她教育好，怎亲身陷囹圄，无能为力。

1921年，卡玛拉因自己忙得不可开交，同时嫌已成了国大党总部的欢喜宫过于喧闹，不得不把年仅四岁的英迪拉寄养在德里的娘家，让她上了当地一所规模不大，却相当贵族化的幼儿园。尽管外公外婆对她十分宠爱，教师对她也另眼相看，但她因为想念双亲和祖父，几个月后又回到了欢喜宫。

在该让英迪拉受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上，尼赫鲁父子之间曾发生过严重的分歧。

细心的读者已经知道，莫蒂拉尔是一个欧派十足的人。他极力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推崇西式的教育，为能让家族中人受到这种教育而感到骄傲。后来他虽然追随圣雄甘地走上了自由运动之路，但他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对教育的看法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他的儿子尼赫鲁尽管受到比他更严格的西式教育，但他对这种教育的理解却与乃父大相径庭。他认为这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出一大批讲英语的土著，“来充任英国官僚机构中的低级官员及办事人员”，这种教育具有麻痹学生思想的危险性。因此，他对殖民当局历年来在印度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并无好感。他担心若是女儿在这样的学校受教育，将来会成为一个“自己国家的陌生人”。

这场父子间的争执起因于国大党的一项决议：作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一部分，西式学校也在被抵制之列。当时的西式学校大多是英国殖民者官办的，也有少数是私营的。人们纷纷响应国大党和圣雄的号召，让孩子从西式学校退学，同时建立私立国民学校供他们读书。但是，这些学校因盖建仓促，大多校舍简陋，师资缺乏，条件艰苦。1923年，六岁的英迪拉就读的阿拉哈巴德现代学校就属于这类学校。

莫蒂拉尔虽然也追随圣雄甘地，赞同他的主张，但他对不合作运动的热忱远未达到他儿子那样狂热的程度；他也很难完全放弃他毕生所持的贵族阶级的价值标准。他认为让孙女在这样的学校读书，会断送她的前程。不出几个月，他突然把她转到一所虽是私立的但也是欧化的本地学校——圣塞西莉

亚学校。这所学校由三名英国女教师主持。

尼赫鲁对他父亲的这个做法极为不满。他担心英迪拉会被那三名英国女教师培养成一位典型的马菲特小姐，就像那些完全欧化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学生。他认为圣塞西莉亚学校即使不是一所官办学校，单凭其全盘欧化性质也应予以抵制。

父子俩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谁也说服不了谁。尼赫鲁便给圣雄甘地写了一封信，请他出面解决他与父亲之间的纷争。作为尼赫鲁家的良师益友，圣雄当然不愿看到他们父子俩发生龃龉，但又想极力避免不恰当的干预。他给他的老友莫蒂拉尔写了一封信，替尼赫鲁求情。他在信中把尼赫鲁描绘成他所认识的印度青年中最孤寂的一个。

其时，莫蒂拉尔正在印度北部的边陲小城西姆拉。他本来就对儿子从政治观点出发反对英迪拉在圣塞西莉亚学校就读感到不满，看了圣雄的来信，他益发恼怒，当即向圣雄发了一封电报，说尼赫鲁向他描述的情况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圣塞西莉亚学校与政府毫无关系，英迪拉上那儿读书并不违反不合作运动的原则；他莫蒂拉尔之所以要那样做，完全是为了使英迪拉能与同龄儿童做伴，而不是为了考虑她的学业。

这场风波最后以妥协告终。英迪拉退出圣塞西莉亚学校，也不再回到阿拉哈巴德现代学校，就在家里念书。

英迪拉自己对上圣塞西莉亚学校也本能地反感。这一来是因为学校所教的课程与生活毫不相干，使她感到味同嚼蜡；二来是因为她的装束与同校其他孩子不同。她穿的是厚若麻袋的土布“卡迪”服，而别的孩子穿的是欧式服装。小孩子本来就有从众心理，更何况她那时已经有了朦胧而朴素的民族意识。因此，在上什么学校的问题上，她实际上不约而同地站在了她父亲一边。

在家里，英迪拉从亲人们那里受到的教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她父亲常给她讲述爱国志士的故事。这些爱国志士有意大利的加里波第、南美的玻利瓦尔以及法国圣女贞德。她酷爱描写这类人物故事的书籍。其中圣女贞德的故事尤其令她着迷。贞德也是个女孩子，她所处的环境与她也颇为相似，她反抗的也是英国人。当她七岁时第一次读到圣女贞德的故事时，她就向父母表示决心做另一个贞德。

有一天，英迪拉的小姑克里希娜发现她站在欢喜宫的阳台上，一只手扶着一根大柱子，另一只手高高举起，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在对一群听众发表演说。克里希娜感到非常惊讶，问道：“你在那儿干什么呀，英杜？”英迪拉的眼睛闪着炯炯的光芒。她一本正经地答道：“我正在练习做贞德。”

除了关心女儿的学习以外，尼赫鲁对女儿的身体也很关心。英迪拉自幼身体比较孱弱。尼赫鲁认为体育运动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因此，他不仅自己坚持锻炼身体，同时督促女儿也锻炼身体，其目的一来是想使女儿的身体健壮一些，二来是借此锻炼女儿的意志。她要求女儿每天都坚持跑步，并且注意跑的姿势。他还教她学游泳。他教的方法很简单，只是把她推到水里，然后让她自己设法浮出水面。此外，他还教她学习骑马、滑雪。

尼赫鲁父子虽然对英迪拉宠爱有加，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放松对她的要求。相反，他们的要求很严格。英迪拉后来回忆说，除了在她特别小的时候，她过的简直是一种斯巴达式的生活。

转学于瑞士与印度之间

英迪拉的母亲卡玛拉似乎注定是个多灾多难的女人。打从嫁到尼赫鲁家起，她就没有过一天舒心日子。婆母的冷眼、小姑的虐待，使她长期郁郁寡欢。她在英迪拉之后曾生下一个儿子，可没几天就不幸夭折了，这对她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些都严重影响到她的健康。1925年11月，她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一种可怕的疾病，通常被看作是不治之症。

毫无疑问，必须马上进行治疗，否则卡玛拉将性命难保。但在20年代的印度，医学界对肺结核病还是束手无策的。很显然，必须尽快将病人转到国外去治疗。医生建议去瑞士，那里是当时所有遭受肺结核病的折磨且又付得起旅费的病人的最佳去处。

尼赫鲁这时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尽管他刚刚接替其父担任国大党总书记的要职，工作特别繁忙，但他还是听从医生的劝告，在得到甘地的同意后，暂时离职，陪妻子去瑞士治疗。英迪拉与他们同行。1926年3月，他们到了湖光山色、风光旖旎的日内瓦。

他们原以为只需几个月就可打道回府的，由于卡玛拉的病情好转得太慢，他们不得不在瑞士呆了一年零九个月。其间大部分时间在日内瓦，卡玛拉在那儿得到了初步治疗，继而又转到山区胜地芒塔纳。为了帮忙料理家务和同英迪拉做伴，英迪拉的小姑克里希娜也来了。

由于是第一次出国，也由于是九年来第一次单独与父母相处，英迪拉非常高兴。她曾把在瑞士度过的那段时光看作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到瑞士后，她被送到日内瓦国际学校读书。

这所学校是国际联盟的一批官员主办的。校舍是一所小巧别致的别墅，无论从哪间教室朝外看，都能看到美丽的山景。学校共有75名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英迪拉当时年仅九岁，几乎每天都由父亲接送。父女俩一同在林间小道中行走，真是其乐融融。

日内瓦国际学校设置的课程新颖别致，符合孩子们的口味，与味同嚼蜡的阿拉哈巴德圣塞西莉亚学校形成了鲜明对照。所有课程一般都安排在上午上，下午是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的时间。活动地点是在效外的奥内克斯。活动内容从实用园艺、手工操作到体操、钢琴和五月柱舞蹈，无所不有。这些都是英迪拉所喜欢的。英迪拉对待学业的态度也很认真。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当时教她法文和社交的老师厄内斯特·戈斯内尔夫人如是说。

后来，英迪拉离开了国际学校，转到贝克斯新闻学校上学。这所学校是由海默琳女士开办的。直到晚年，她还对她的学生英迪拉印象很深。她回忆说：“她以胜利的微笑招呼每一个人，在同伴中很有威望。……英迪拉对于自己的国家有清晰的认识，并决心把她从外国力量中解脱出来……”这两个学校英迪拉都很喜欢，若干年后她还一直与它们保持着联系。

由于尼赫鲁要参加国大党的马德拉斯年会，英迪拉不得不开心的学校，于1927年12月随父母回到了印度。此时，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尼赫鲁已不再坚持当初的观点，而主张东西合璧。于是，英迪拉进入了阿拉哈巴德的圣玛丽亚教会学校，但同时家里还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她学习印地文。

但是，在这所教会学校里，英迪拉却快乐不起来。那里的大多数女孩子是英印混血儿，血缘联系使得她们十分亲英；孩子们动辄受到欧洲修女们的

责备，或英印混血儿教师的训斥。由于受不了过多的约束，英迪拉经常逃学。

1931年初，英迪拉家接二连三地发生变故。先是他的父母双双被捕入狱；他们从狱中获释不过旬日，英迪拉的祖父又去世了；而且他的父亲时常面临再次被捕的危险。这些变故使英迪拉的教育问题再次变得严重起来，她已不宜再在阿拉哈巴德教会学校读书。如何让她不受干扰地接受较正规的教育又成了当务之急。

就在此时，一个好友的出现帮助尼赫鲁夫妇去掉了这块心病，他便是孟买杰出的年轻教徒贾汉吉尔·吉瓦吉·瓦基尔。他们是在1931年3月底的国大党卡拉奇年会期间相识的。

作为一个教育家，瓦基尔深受诗圣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教育思想的影响。他和妻子库恩弗芭伊曾在泰戈尔开办的圣蒂尼克坦国际大学生活和工作过多年。他认为，不论是印度传统的教育制度，还是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所建立的教育制度，都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前者已明显落后于形势，不能满足20世纪印度的需要；而后者从根本上说则是一种奴化教育，容易使印度人变成对西方亦步亦趋的人，并在此过程中逐渐丧失掉自己固有的文化特征。因此，必须实行一种新的教育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前两者，又包含了它们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应当是印度传统教育和现代西方教育优势的互补和结合。

为了实践自己的教育思想，瓦基尔在妻子库恩弗芭伊的帮助下，在浦那城创办了一所名为“儿童自立学校”（后更名为“学生自立学校”）的学校。在国大党的卡拉奇年会上，他把自己的办学设想、宗旨和具体情况向尼赫鲁作了汇报。正为女儿的求学问题犯难的尼赫鲁听后喜出望外，当即决定等度过一个短暂的假期后，让英迪拉到瓦基尔夫妇开办的学校去读书。

卡拉奇年会一开完，尼赫鲁夫妇乘女儿到浦那上学的时间还未到的余暇，决定带她去锡兰（今斯里兰卡）进行短暂访问。锡兰位于印度东南面的海洋上，是个美丽的岛国。那里草木繁茂，山清水秀，风光绮丽。印度与锡兰有着友好交往的悠久历史。公元前3世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印度孔雀王朝国王阿育王曾派他的儿子到锡兰传播佛教。从那时起，这个岛国便布满了佛教的名胜古迹、香火庙堂。在去锡兰之前，父亲曾给女儿讲了许多有关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事。他们在那里呆了大约一个月，遍访了该岛的几乎所有的历史古迹。

从锡兰回来后，英迪拉又随父母一起去南印度旅行。她回忆说：“由于那里的生活方式别有风味，我们又有了一番新的体验。过去我虽然也和父母一起下过乡，但只是白天去，从未在哪个村子住下来过，最多也不过呆一个晚上就走了。但是在南印度，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小镇上度过的。我们和一些非常正统的家庭一起生活，还在井边洗涤。”

英迪拉所说的“新的体验”，主要是指对种姓制度的认识。作为一种等级制度，种姓制度在印度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对印度的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乃至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影响至深。中国人所熟知的印度电影《流浪者》，反映的就是种姓制度方面的问题。

种姓制度的实际情况在印度是千差万别的。它在北印度并不那么严格，在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响至深的尼赫鲁家族中则更是几至于无了，以至儿时的英迪拉在家中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她家的仆人中有一些是不可接触者，她祖父的贴身仆人哈里就是其中之一，可祖父拿他同家庭成员一样看待，

有时还让他与家人一道进餐。

但在南印度，种姓制度就严格多了。整条整条的街道只许婆罗门行走，不许不可接触者通行。为了避免麻烦，每到一地，他们不得不将哈里说成是婆罗门。

英迪拉在南印度所见到的更多的事情使她对种姓制度有了切身的感受，逐渐懂得了种姓问题是怎么回事。例如喀拉拉邦就有这样的习俗：南布迪里婆罗门种姓家的长子只能与同种姓家的女子结婚；次子则可以娶较低的婆罗门女子为妻，但婚后他不能与妻子儿女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因为他们虽然也是婆罗门，却属于较低的亚种姓。

英迪拉一行人曾在一家做客，并与主人同桌进餐。当时这家的男主人不在家，而在另一个小镇上，这个小镇正是英迪拉一家人下一站要去的地方。他们便提出打算到那个小镇后顺便去探望一下他。这本是客人酬答好客的主人的一种友好的表示，不料主人的儿子听后却面露紧张和不安之色，说道：“请留点神，不要对我父亲说我们在一块儿吃过饭，他知道了会大吃一惊的。”很显然，在这家人看来，同外人一道进餐也是忌讳的。

在印度，对妇女的歧视现象也极为突出。作为一个女人，英迪拉的母亲卡玛拉就曾遭受过不平等的待遇，不过比起千千万万的印度妇女，她的处境还算是好的。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卡玛拉后来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在这次旅行中，她曾在海德拉巴市发表了一次演说。她号召妇女们走出深闺，不要做男人的奴仆。她的演讲因触及妇女的切身遭遇，所以极富感染力。妇女们听了备受鼓舞，有些人当真按她所说的那样去做了。这件事在这些妇女的家中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她们的丈夫纷纷向英迪拉的父亲写信抗议，说他的妻子“在那儿煽动我家的女人”。

结束了在锡兰和南印度的旅行和游历后，1931年5月，英迪拉到浦那去，开始了她将近三年的求学生涯。然而，英迪拉并未感受到多少快乐。这一来是因为这是她平生第一次独自一人到另一个离家有1000英里之遥的地方去生活和学习，离乡背井、举目无亲的境况使她备感孤独、寂寞和凄凉。尽管瓦基尔夫妇对她相当爱护，她还是觉得和他们不易相处。她常常晚上躺在床上暗自流泪，或者有时到大操场一角去流泪，聊以自慰。二来是因为与其他的住读生相比，她的年龄偏大。她当时年近14岁，是住读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而且，她长得老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大。这成了她的心理障碍，使她时常感到腼腆，与同学相处感到不自然。三来是因为她对新学校感到不适应。尽管瓦基尔夫妇抱着良好的主观愿望，想把他们的学校办成熔印度传统教育和现代化西方教育的优点于一炉的新式学校，但是，由于学校尚处于实验阶段，无先例可资仿效，因此，从孩子的眼光看来，这所学校基本上是失败的，至少没有达到创办者本人预期的效果。孩子们感到最不习惯的，是它的校风过于严谨，课程既紧张又刻板。

由于硬骨头的瓦基尔夫妇不愿从殖民政府那里得到任何资助，浦那学生自立学校的创立和运转是很艰难的。校舍原是一座老式的平房。据说一个世纪前英印总督韦尔斯利勋爵到浦那作短暂停留时，曾在这所平房里住过。到瓦基尔夫妇把它弄到手并改作校舍时，这座房子已今非昔比，失去了往日的气派，露出了因年深日久而破败衰朽的迹象。瓦基尔夫妇住一间屋子，英迪拉和十几个寄宿的孩子住另外几间。这几间房屋实际上具有多种功能：白天当教室，夜晚当宿舍。学校的生活非常简朴，伙食很差。

在此期间，英迪拉家中又发生了一些变故。在到达浦那几个月后，她的大姑母维贾雅拉克希米被捕了；那年的年终，她的父亲再度被捕入狱，一关又是一年零八个月；她母亲的健康状况也开始再度恶化起来。

姑母被捕后，她的三个女儿因无人照料，也被送到了英迪拉所在的学校。她们都很小，最大的只有7岁，这样一来，照料她们，帮助她们适应陌生的新环境，便成了英迪拉这个不满14岁的少年的沉重负担。除此以外，她还有一个额外的负担。瓦基尔夫妇录取了一批贱民子女，他们的日常生活主要靠英迪拉和瓦基尔夫妇的女儿贾伊来料理。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生活重负，使她不堪负荷。

在浦那读书期间也有令她高兴的事情，尽管这类事情很少。其中一件是与圣雄甘地相见。

1932年9月，为了抗议英国政府的教派自治裁定书，圣雄甘地在狱中宣布绝食，说如果英国政府不将它取消，他将绝食至死。教派自治裁定书是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圆桌会议上抛出的，它规定印度各教派（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基督教徒等）只准选举与自己信仰相同的人到各级立法机构里去作为他们的代表，各个教派的席位是固定的。殖民者的用心极为险恶，其目的是企图使印度的宗教信仰分歧永久化、扩大化。圣雄甘地看出了这一点，决心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与之相抗争。

圣雄的绝食，引起了全印举国上下的悲愤和不安。当时也在狱中的尼赫鲁获悉这个消息后大为震惊。他在致英迪拉的信中说：“他（指甘地）在我的小天地里占据了极大的位置，这个小天地在摇晃，在动荡，似乎到处是黑暗和空虚。……难道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吗？”

英迪拉因年幼，还不能像她父亲那样将圣雄当作师尊来崇拜，但她对圣雄的爱同样是强烈的，只不过这种爱在性质上属于另一种——一种孩子般的纯真朴素的爱。她觉得甘地爷爷是个慈祥而又和蔼可亲的老人，而这样的老人是不应该饿死的。

由于担心甘地爷爷会饿死，英迪拉带着她的三个表妹去探监。关押甘地的耶拉夫达监狱离她的学校只有几英里远。当她见到甘地爷爷那瘦骨嶙峋的样子时，不禁伤心地哭了。末了，她告诉他，为了表示声援，学校里的全体同学已绝食一整天，并且为他祈祷。她还告诉他，她如何“收养”了一个贱民的小孩。甘地听了这话很高兴，因为他平生热衷于贱民事业，不遗余力地为提高贱民的地位，改善他们的待遇而奔走，这次绝食主要也是为了贱民的利益。

甘地的绝食斗争基本上达到了他预期目的。英国殖民政府虽然没有取消裁定书，却不得不宣布废除其中引起人们最强烈反对的条款。一星期后，甘地停止了绝食。

与父亲相见，是使英迪拉高兴的另一件事。

一年以后，尼赫鲁从狱中获释。他因思念女儿太甚，顾不上回家，就迫不及待地直接去浦那看望女儿。父亲的到来使英迪拉喜出望外。尼赫鲁在浦那呆了几天，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里同女儿、三个外甥女以及其他孩子在一起，与他们做游戏，讲故事给他们听，甚至为他们制作玩具。

对英迪拉来说，尽管在浦那的三年是忧伤多于快乐，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没有收获。

在音乐、舞蹈和装饰等艺术方面本来就有天赋的瓦基尔夫人由于受过圣

蒂尼克坦国际大学的熏陶，更加精于此道。她不仅对宝石花饰和花卉装饰颇有研究，而且还从印度尼西亚带回了印度已失传的“蜡防印花法”。她后来在浦那儿童自立学校开设了艺术课，讲授这些装饰艺术。她还聘请了一位孟加拉教员，教授曼尼普尔舞蹈。比起那些呆板的课程，这些艺术课令英迪拉感兴趣多了。

后来，浦那发生了瘟疫，英迪拉所在的学校迁至孟买。1934年4月，她在那里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被圣蒂尼克坦大学录取。

就在英迪拉通过大学入学考试的前两个月，她收到了父亲打来的电报，告诉她他又被捕了。对于被捕入狱，尼赫鲁家族中人已经司空见惯，能够以一种平常之心泰然处之。尼赫鲁在狱中写给女儿的信中提到这件事时，其笔触是相当幽默而风趣的：“我又回到了我另外的‘家’。”“该是我回来的时候了。由于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我很累，迫切需要休息一下。……现在我将大量休息。”“我希望这个消息不会使你有一丝一毫的忧虑。微不足道，何足挂齿。”

俗话说，人的胆子是吓大的。英迪拉从四岁时她的祖父和父亲第一次被捕时起，就开始同监狱打交道了，她已经养成了处变不惊的心态，具备了应付突发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如她在给父亲的回信中说的：“我已习惯了这些突发事件，学会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过分吃惊，而且我等待关于你被捕的消息等了很久，因此并不特别难以承受。”

考试结束后，英迪拉利用间歇去克什米尔度假，与她的姑父潘迪特先生和姑母潘迪特夫人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克什米尔是英迪拉的祖籍，那里的山山水水都引起了无限的遐思和眷恋：“我觉得它是我曾经到过的最美丽的地方”，“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无论什么地方，都能看到周围白雪覆盖的高峰和美丽的喷泉。我想，任何地方都不能和克什米尔相提并论。”此外，克什米尔的物产——无论是颇具艺术性的绣花披肩、纸型木刻，还是樱桃、草莓等水果和白杨、齐纳树等树，以及风土人情，没有一样不令她喜欢和着迷。

拜泰戈尔为师

1934年7月，英迪拉进入圣蒂尼克坦国际大学，从而了却了她父亲的一桩心事。尼赫鲁本来就希望女儿结束了在浦那的学业后能到那里去上大学，故早在此前半年即1934年1月便曾与妻子卡玛拉一起去那里访问过。那所大学给他们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尼赫鲁在给英迪拉信中说：“我很喜欢圣蒂尼克坦，妈咪也是如此。”“那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

尼赫鲁没有说错，圣蒂尼克坦的确是个好地方，是个读书的最佳处所。它位于距加尔各答约90英里的波尔普附近。这里原是一片荆棘丛生的莽莽荒原，居住着落后的山达尔部落民。泰戈尔的父亲晚年忽然萌生出家之念，便离开加尔各答的旧居，只身来到这片荒原，在三株老树下搭起一个茅屋，隐居下来，垦荒种地，坐禅说教。他把此地命名为“圣蒂尼克坦”，意思是“和平村”或“寂乡”。1901年12月，泰戈尔带着理想和对未来的憧憬，从他父亲手中接过这片荒园，开始在上面建屋种树。经过长达20年的艰苦创业，终于，一株株、一行行的树种起来了，长成材，蔚然而成了森林；一幢幢房屋盖起来了，已然成为村落。1921年，他在寂乡书院的基础上，创办了著名

的国际大学。

一提起诗圣泰戈尔的名字，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油然而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在那幽静的园林深处，浓荫覆地，鸟儿竞歌，溪水潺潺，芳草如茵。一位目光矍铄、神情恬静、美髯飘逸的老人正沉浸在这世外桃源般的大自然中，也许正沉入与神灵契合的冥想之中，也许正在构思着优美的新诗作……这便是泰戈尔！

世人对泰戈尔作这样的想象不足为怪，因为圣蒂尼克坦就是这样的一个“世外桃源”：一幢幢小木屋掩映在浓密的林荫中，四周的山达尔人悠然自得地骑着牛、吹着牧笛穿行其间，毫不相忤。园中横贯着一条古来的牛车道，在砂粒上印出辙迹。挽车的牛角上包着发光的金属，牛项上环绕着一串小铃铛和彩色璎珞，农人把它装饰得如自己亲爱的伙伴。到处都弥漫着和平友善的气息，即使是在人畜之间也概莫能外。这就是和平村——一个真实的“世外桃源”。

1913年，泰戈尔因其哲学诗《吉檀迦利》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驰誉世界文坛。印度人更是将他奉若神明，尊称他为“古鲁代弗”，意即“师尊”。尼赫鲁对泰戈尔非常敬佩，在他的心目中，泰戈尔的地位仅次于圣雄甘地。

像她的父亲一样，英迪拉也非常敬佩泰戈尔，并且几乎达到了崇拜的程度。她在《甘地夫人自述》中这样说道：

泰戈尔师尊无疑是个伟大的诗人，但比诗人更伟大。诗作仅是他的一部分贡献。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我们以有这样一个印度同胞而感到莫大的光荣。宣称他只是属于印度，那是不正确的。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留下了印记。他是我们所珍视的印度文化的象征。我认为，事实上印度的许多伟人也都为这种文明作出过贡献，并以现代的语言加以阐述，使之更易为一般人所理解。但师尊却讲得最深入浅出，融会贯通。师尊的思想、诗歌、祷文与任何狭隘意义上的文化毫无共同之处，它们涉及许多方面，例如自由，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还包括从无知、迷信、偏执和狭隘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他的全部思想和意图就是把人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上去。

英迪拉和泰戈尔之间很快便产生了情谊。那时师尊已年愈古稀，身高体瘦，白髯飘垂，长袍盖脚，俨然如一位古希腊的圣贤。当他在丛林中漫步，或者在简陋茅舍的台阶上闲坐的时候，学生们会走近他，恭恭敬敬地行触脚礼，并提出各种问题向他请教。英迪拉起初不敢打搅他，直到后来他温和地责怪她不理睬他时才去。她后来回忆起与师尊在一起的情景时说：“在许多晚上，我们坐在他的脚旁，谈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静悄悄地看他作画。他常常会高声背诵或朗读。这些都是充满宁静乐趣的时刻，是足以珍惜的回忆。”

英迪拉很快就喜欢上了国际大学，并称之为“伟大的学校”。这首先出于她对它的创办人——诗圣泰戈尔的尊敬和爱戴以及大学的办学宗旨。她认为，泰戈尔之所以把学校命名为“国际大学”，是因为他欲“将永恒和瞬间结合在一起，使无垠的宇宙和有限的乡土相一致”；“他希望每个大学生都能成为一个‘世界公民’，没有狭隘的观念，并敢于这样说：‘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英迪拉喜欢国际大学，还因为它满足了她的某些夙愿。这所大学的田园风光和安宁静谧的气氛，使一直生活在喧嚣纷扰之中的她耳目一新。她曾对来访者说，她以前一直置身于人群、闹声、冲突和暴力之中，颇感痛苦；而

在圣蒂尼克坦，她的这种痛苦已不复存在了。她在这里经受的，不是游行示威者呼喊的仇恨口号和警察们回敬他们的喝斥辱骂，而是一片寂静；打破寂静的往往是泰戈尔的配乐诗篇《拉宾德拉·桑吉特》的美妙曲调，或者是校园的密林中的鸟儿的歌声。甚至学生们的闲谈，也富有音乐色彩，因为大多数学生的乡音孟加拉语是印度最优美的语言之一。拿英迪拉的话说，“孟加拉语讲起来又甜又美”；“我似乎到了另一个世界”。

英迪拉对圣蒂尼克坦大学怀有好感，还有一层原因：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与同她年龄相仿的人做同学，而在她以前上的学校里，她要么是和年龄比她大的成年人在一起，要么是与年龄比自己小的儿童为伴。这一点使她原有的心理障碍荡然无存了，她的腼腆性格也有所改变。

到国际大学后不久，英迪拉很快就适应了学校的生活，因为她在浦那学校已过惯了俭朴的生活，连泰戈尔对此都感到惊讶。他原以为她出身富豪之家，未经历过这样艰苦的生活。

在圣蒂尼克坦，学生们每天凌晨四点就得起床，洗衣服，打扫房间，吃早饭，到外面空地上参加全体师生员工的集会，唱校歌和赞美诗歌，然后在树林中听课。课程除了专业课外，还有音乐、舞蹈和绘画。英迪拉对印度古典的曼尼普尔舞兴致很浓，而且颇有造诣。她的舞蹈才能甚至受到了泰戈尔的夸奖。每天日出和日落时，学生们还要静坐片刻，冥思默想，与大自然神交。

对英迪拉来说，快乐的时光似乎总是那么短暂。在圣蒂尼克坦读书还不到一年，她就不得不离开这里。其时，她的父亲还在狱中，她母亲的健康状况又急转直下。几乎是与英迪拉到圣蒂尼克坦念大学的同时，她的病情就开始进一步恶化。1934年8月，尼赫鲁利用11天的短暂假释，曾去探望过她。英迪拉闻讯也匆匆赶回阿拉哈巴德与双亲团聚。丈夫和女儿的到来，使卡玛拉的心灵得到了一丝慰藉，她的病情也一度稍有好转。但这是回光返照，一俟丈夫重新入狱，女儿返校之后，她的病情便依然如故。几周之后她被转到位于喜马拉雅山麓阿尔摩拉附近的博瓦里疗养所去疗养。10月底，当局将尼赫鲁转到阿尔摩拉监狱，允许他每月探望妻子一两次。几个月之后，英迪拉的祖母在久病之后又中风了。这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

1935年，鉴于卡玛拉病情严重，在印度恐无望治愈，医生劝她再次到欧洲去治疗。官方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迫使尼赫鲁改变态度，便放出风来，说尼赫鲁只要保证从此以后不再参与政治，哪怕是口头保证，就可以获释去陪伴妻子。作为一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尼赫鲁虽然很想与妻子在一起，分担她的病痛，但要他作出这样的保证是不可能的；同样，作为一名民族主义者，卡玛拉也不希望丈夫为了自己而改变政治立场，尽管她当时身体已极度虚弱，经常因发高烧而昏迷。这样，陪伴她的重任就不可避免地落在了英迪拉的肩上。

1935年4月，英迪拉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曾给她带来欢乐的圣蒂尼克坦，告别了师尊泰戈尔。与她的堂舅马丹·阿塔尔医生一起陪母亲赴欧洲治病。临行时，师尊泰戈尔和同学们都来送别。他们也舍不得她。泰戈尔在给她父亲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以沉重的心情向英迪拉告别。她是我们这里的瑰宝。我细心观察过她，对你抚育她成长的方式感到敬佩。她的老师们异口同声地称赞她，我也知道她在同学中深得人心。但愿情况好转，使她不久就能回到这里继续求学。”

然而，情况并未如泰戈尔所希望的那样发生好转。1936年2月28日，受疾病折磨多年的卡玛拉终于在瑞士洛桑去世。这实在太可惜了，她死时还太年轻，年仅36岁，正值人生的盛年。不过，她可以含笑九泉了，因为她死时最亲的亲人——丈夫（尼赫鲁已在她去世前5个月无条件地获释）和女儿都守候在她的身边；而且她的女儿年满18岁，已经长大成人了。

在萨默维尔学院

尼赫鲁失去了爱妻，英迪拉失去了母亲，其悲痛都是不可言喻的。尼赫鲁早年对这个依父母之命而娶来的妻子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他们的感情是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培养起来的。可就在他们的感情日浓，相互间难以割舍的时候，她却离他而去了。对英迪拉而言，尽管小时候爱她的人很多，但若就对她的影响而言，恐怕在整个尼赫鲁家族没有人能与她的母亲相提并论。尽管如此，情势却不容他们一直悲伤下去。国大党已再次选举尼赫鲁当主席，历史把他推到了印度政治舞台的前沿。他不再只属于他自己和尼赫鲁家族，他属于全印度；而英迪拉则面临着继续求学的问题。

是上美国史密斯学院、法国巴黎大学，还是上英国牛津大学，英迪拉颇费了一番踌躇。经过慎重思考，她选择了后者。其原因主要为：英国消息灵通，与印度关系密切，能听到许多有关印度的消息，能够使她与家庭和印度联系起来；她父亲在英国有许多朋友和熟人；她的恋人费罗兹·甘地当时也在英国读书。而巴黎则相当闭塞。美国她根本就不愿去。

选报牛津大学后，为了准备考试，英迪拉开始自学。其时她尚在瑞士贝克斯，由于当地人不知道牛津大学要考些什么，她决定到英国去找人请教。

经人引荐，英迪拉于1936年10月去英国西南海滨城市布里斯托尔的巴德明顿学校，找校长贝克小姐。得知英迪拉的来意，贝克小姐认为英迪拉无论如何不能在贝克斯再自学下去了，应该马上到她的学校去。英迪拉接受了贝克小姐的建议，决定离开贝克斯，去巴德明顿学校补习。她上的是高中毕业后上的第六班。

在巴德明顿学校，校长贝克小姐很重视时事。每周一上午，英迪拉和同学们都要参加时事讨论会，讨论国际时事。为了届时能胸有成竹地参加讨论，英迪拉细心地阅读报纸，并能结合亲身经历，撰写有关希特勒等国际知名人物及事件的文章。

1937年3月，英迪拉如愿以偿，顺利地通过了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的入学考试。她在巴德明顿短暂而紧张的补习从而告一段落。

同年4月，日夜思念祖国、惦记父亲的英迪拉终于回到了印度，随父到东南亚的缅甸和马来西亚去访问。这是她自1931年访问锡兰以来第一次与锡兰人以外的亚洲人接触。

尼赫鲁父女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英迪拉还经历过一次激动人心的场面。马来西亚的妇女们组织了一次盛大的宴会，邀请尼赫鲁父女参加。当时尼赫鲁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已预定要参加其他一些会，不能出席宴会，英迪拉本人遂成为座上宾。但妇女们坚持要她父亲去，哪怕只一睹他的风采也行。尼赫鲁拗不过这些热情的妇女，只得约定顺便去露一下面。与会妇女见到尼赫鲁后，高兴极了。为了表示对印度人民的支持，她们当即进行募捐活动。她们把这些本应交给英迪拉的捐款交给了尼赫鲁。由于尼赫

鲁只是顺路去看看，故在接受了捐款之后他就走了。尼赫鲁走后，这些妇女感到很为难，不知怎么待英迪拉才好，便决定再组织一次募捐。英迪拉后来在回忆募捐场面时说：“妇女们一到会就取下自己的手镯、项链和身上其他的装饰品，并解囊相赠。我在那里坐着，捐献的东西不停地撒在我的头上和衣裙上。有些人没法接近我，就从稍远地方把捐献的财物扔过来，我的头还挨了几下硬币呢！”

1937年10月，英迪拉正式到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上学。不久，她便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她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她“感到好像早已住在萨默维尔”，“已完全陷入对牛津的爱”。

在萨默维尔学院，英迪拉学习的课程主要有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和人类学。她还广泛阅读有关艺术、考古学、建筑学及宗教等方面的书籍。她还加入了英国工党，成为学生支部的成员。她父亲的一位朋友克里希纳·梅农当时在英国工党里很活跃。他要英迪拉参加一次大会，在会上宣读她父亲特地为大会起草的一份文件。她想，照本宣科地读读文件又有何妨？于是，她冒着违反牛津学生不得离校的校规的危险，答应了梅农的要求。

然而，出乎英迪拉意料之外的是，梅农突然在那次会上宣布尼赫鲁小姐要讲话，这使她感到既惊讶又恐惧。虽然她以前曾在猴子队的集会上讲过话，但她从未对成年听众发表过演说。若干年后，她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次节目中讲述了这段往事。她说，由于过于害怕，“我当时简直连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最后，我还是讲了几句。听众中有一个醉汉说：‘她不是在讲话，她是在尖叫。’听他这么一说，听众当堂哄堂大笑，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在公众面前讲话了。”

在牛津学习期间，英迪拉还开展了广泛的社交活动。她接触了当时的一些知名人物，如文学家爱德华·汤普森、乔治·萧伯纳、历史学家费歇、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等。她对这些名人十分崇敬，但决不崇拜。此时她已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自我判断能力。甚至连圣雄甘地也没有使她完全拜倒。她对甘地所说的话并不完全赞同，感到“他的有些思想已经过时了”。她曾因著名经济学家哈罗德·拉斯基的一种见解说服力不强而拒绝接受。

在萨默维尔学院学习一年后，1938年秋，英迪拉又随父访问了一些欧洲国家。当时西班牙正在打内战。为了表示对西班牙人民的支持，英迪拉很想去那里看看。由于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他们都认为去那儿危险），英迪拉最终没有去成。

英迪拉随父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泽林和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英迪拉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旅行是“一次有意义而又令人忧愁的经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为战争的阴云所笼罩，人民“害怕随时会遭到德国人的袭击。他们面带愁容，沉浸在悲哀的气氛中”。

由于在捷克斯洛伐克连日奔走，英迪拉疲惫不堪，到达布达佩斯时，终于病倒了。经检查，她患了肋膜炎。她在当地的一家医院住了两个星期的院，刚能走动，又被转入英国伦敦的一家医院，接受尼赫鲁家族的一位世交——班达里医生的治疗。

1939年元月，英迪拉回印度住了几个月。4月，她启程离开印度，5月返回伦敦。由于身体仍然虚弱，她不得不接受班达里大夫的劝告，于5月下旬离开伦敦再次去瑞士疗养。当她重返英国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为了躲避此时正横行于欧洲的纳粹军队，英迪拉不得不绕道西班牙。当时西

班牙已处于佛朗哥统治之下，情况也很糟糕，尤其是食品奇缺。

由于不慎丢失了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到伦敦的飞机票，而再弄到机票十分困难；乘船回英国又很危险，德国潜艇经常在这一带海域活动。英迪拉不得不在里斯本滞留一个月。后来，经班达里医生、克里希纳·梅农和费罗兹·甘地等人多方奔走，英迪拉终于得到了一张机票。她在布里斯托尔机场着陆的当晚，就遇上了德国对英国的空袭。

英迪拉原打算从瑞士回到英国后就到萨默维尔学院继续完成学业，但战争已使这成为不可能。当时希特勒的闪电战已经开始。英国经常遭到空袭和轰炸。英迪拉勇敢地加入了红十字会志愿工作队，参加救护伤员的工作。她后来回忆说：“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车上，燃烧弹像雨一样倾泻下来，我身上除穿了一件莎丽外没有别的。一个抬担架的人把他的铜盔扣到了我的头上说：‘你不戴钢盔，想死呀？’当你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时，你很自然会想到去帮助别人。”

由于战争不断升级、扩大，1941年的英国国无宁日，和平似乎遥遥无期。英迪拉继续求学的希望已完全破灭，她不得不在未拿到学士学位的情况下，与费罗兹·甘地一道乘船回国。两年后，芳龄18的玛格丽特·罗伯茨（即后来的撒切尔夫人）迈入了萨默维尔学院的门槛。几十年后，这两个了不起的女性分别成了东西方两个大国的首脑，萨默维尔学院也因此而闻名世界。

这次航行航线曲折而漫长。为了免遭德国潜艇的袭击，船队走的是500年前葡萄牙水手达·伽马到达印度的航线——沿大西洋南下，绕过好望角，穿越印度洋再到印度。尽管有兵舰护航，但还是有几艘船被击沉了。因此，这次航行对英迪拉来说可谓惊心动魄。

然而，对英迪拉来说，更为刻骨铭心的，是英国人对印度人的侮辱。这种强烈的感受从她在南非的开普敦登岸时起就已产生了。

当时的南非是一个典型的白人种族主义者统治的国家。它的统治者史末资将军曾有这样一句“名言”：“一个人的肤色就是他的护照。”有色人种在这里受尽歧视。帮英迪拉在旅馆里预订房间的人竟然无权走进这套房子的客厅，原因就在于他是个深肤色的印度人；而英迪拉和费罗兹因皮肤白皙而被误认为是白种人，没有受到任何粗暴的对待，但这并未能使她心中的屈辱和愤怒减轻分毫。更使她感到惊异的是，饱受白人歧视的当地印度人居然对地位比他们更低下的黑人同样歧视。

南非的非洲人为了表示对英迪拉的欢迎，曾专门租下一个大会堂，请她与会发表演讲。由于在英国有过一次演讲的教训，英迪拉本不打算演讲，但当她参观了非洲铁路工人的条件极差的生活区时，她不禁义愤填膺。这位曾发誓再也不在公众面前讲话的尼赫鲁小姐按捺不住，出人意料地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她讲了班图人和其他非洲人所遭受的种种不平等待遇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她的讲话见报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受到了非洲人的热烈欢迎，但当地的印度人却大为光火。

英迪拉耐心地告诫她的印度同胞，说：“你们必须与非洲人取得谅解。他们今天虽然不可能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但是也许10年、20年后，统治这个国家的正是他们。到那时你们的子孙后代将怎么办？”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预言！英迪拉说这番话时还不满24岁。

仿佛是为了要印证这个印度姑娘的预言，半个多世纪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党领袖纳尔逊·曼德拉领导南非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迎来

了黑人与白人和平共处的自由民主的新南非。当年那些受到英迪拉告诫的当地印度人倘若还有人健在的话，不知他们会对尼赫鲁小姐的这个预言作何感想。

1941年4月，英迪拉在历尽艰辛之后，终于与费罗兹·甘地一起到达孟买，回到了她朝思暮想的祖国。一个月后，他们到达了阿拉哈巴德。她的游学生涯至此宣告结束。

另一种教育

由于时局动荡以及家庭的变故，英迪拉不断地上学、停学和转学，她的学校教育是不完备的、不系统的。所幸她有一个极关心她成长的好父亲，他对她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学校教育的不足。

尼赫鲁对女儿进行教育的最主要方式是书信。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这与尼赫鲁的自身经历不无关系。他本人很早就参加了政治斗争，平时作为甘地的追随者和国大党的领袖，他工作极为繁忙；如果不是忙工作的话，他有许多时间是在铁窗中度过的。而英迪拉又不停地转学。他们父女俩经常分离，这就决定了他教育女儿的主要方式只能是鸿雁传书。

从1922年10月起，尼赫鲁便开始给女儿写信，当时英迪拉才五岁。由于孩子年龄太小，尼赫鲁最初几年的信大多写得简短，但充满着对女儿无限的爱意，内容多是对女儿身体健康成长的关心，如“父亲向亲爱的女儿问好”（1922年10月17日）；“随信寄给你一只汽球”（1923年10月8日）。而英迪拉的回信则大多充满了幼儿的童稚，如“对不起，我病了。……我会尽量听话。你们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1926年6月6日）；“问妈咪我的跳绳是否在那里，我找不到了”（1926年7月27日）。

英迪拉七岁前给父亲的回信都是由大人代笔。也许是觉得看了这样的信不尽己意，也许不想及早开始培养女儿的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尼赫鲁在英迪拉六岁时便要求她自己写信。就这样，在父亲的鼓励下，1925年6月30日，年仅七岁半的小英迪拉终于向父亲写出了第一封信。尽管这封信只有短短的四字“问候爸爸”，却足令尼赫鲁欣喜若狂。他终于看到爱女的亲笔信了。

随着英迪拉一天天长大，父女俩文字交流的内容开始逐渐从日常生活琐事、衣食住行过渡到一些富含人生哲理和寓意的故事上来。1928年8月，英迪拉11岁时，尼赫鲁给她写来这样一封短信：

你知道这个故事吗？一天夜里，拿破仑正在散步。他发现一个哨兵睡得很香。根据军纪这是严重违纪，站岗的士兵是不能睡觉的。但拿破仑没有叫醒这个士兵，而是拿起他的枪，开始替他站岗。

就这样，尼赫鲁以其渊博的学识以及仿佛与生俱来的幽默，把一个个大道理，用深入浅出的文字讲给他的女儿听，使她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在学校中受不到的教育。

尼赫鲁给女儿的信之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和价值，就在于它们具有超乎一般家信之上的深层意蕴。且看尼赫鲁对信的独到见解：

实际上，什么叫信？不完全是新闻的罗列，虽然包括新闻。人们所写的大多数信只是生老病死、婚姻及家庭琐事的记录。然而信远不只这些，它们是，也应该是作者的部分人格，真正自我的影子。

它们还是，至少努力表现和反映写信双方的某些人格，因为作者一心想着正在为之写信的那个人。这样，真正的一封信是两者——写信人和收信人——

的奇妙而明显的混合体。这样的一封信，对于所涉及的双方都是有相当价值的。

正因为如此，尼赫鲁写给女儿的信，常常是熔知识教育和政治道德教育于一炉。这方面的完善结合，《世界历史一瞥》堪称典范。这是 1930 年 3 月到 1933 年 8 月间尼赫鲁从各个监狱写给英迪拉的信。与其他信件不同的是，这些信件写成后很少邮寄，而是在最后一封信写成之后，由尼赫鲁本人一并交给了英迪拉。

虽然作者把这些书信称为“为青年人而写的历史随笔”，旨在勾勒出世界历史的轮廓，但其中饱含着尼赫鲁的个人品质、思想感情以及对女儿的道德和人生观教育，只不过这些被尼赫鲁以高超的说理能力和文字驾驭功力，融化在了字里行间，看不出丝毫空洞说教的痕迹。

1930 年 10 月 26 日，按照印历，这一天是英迪拉的 13 岁生日。就在这一天，已第五次被捕并被关在阿拉哈巴德奈尼中心监狱的尼赫鲁，给女儿写了一封长约 1500 字的信，以表达对她生日的祝贺。这是一位父亲送给女儿的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而且是书信集《世界历史一瞥》的第一篇，也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作。它说理透彻，文字隽永，如行云流水，流畅自然，堪称世界书信史上的精品。在我们看来，它不仅是写给英迪拉的，即使说是写给全世界的儿童的也不为过。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儿子的信》、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傅雷的《傅雷家书》具有同样的价值。因此，即使在此将它全文照录，恐怕也不至于浪费篇幅。

致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妮
十三岁生日

过生日你已习惯了接受礼物和祝福。你仍然会得到美好的祝福，但在奈尼监狱中我能送给你什么礼物呢？我的礼物不可能是物质的、固体的，只能是摸不到的，是精神和大脑的，比如赠给你一个美丽的童话——这是任何监狱的高墙都阻挡不了的。你知道，亲爱的孩子，我是多么不喜欢说教，或施舍什么忠言……

因此我决不能像布道般地说教。那怎么办？信代替不了交谈，至多只是一厢情愿。因此如果我说出听起来像是忠言的话，不要像吞苦药一样接受它。想象着我给你提出建议，让你思考，就像我们真正在谈话一样。

你在历史书中读到民族生活中伟大的时刻。我们读到伟大的人物以及伟大的事件，有时候在梦中、在回忆里我们想象自己回到了那些年代，像古代的英雄一样干英雄的事业。你还记得当你第一次读到贞德的故事时，你是多么地神往，以及你要像她那样做人的雄心壮志吗？普通人常常是没有英雄气概的。他们只是想着面包、黄油，想着孩子，想着家庭的烦恼等等。但如果整个民族都充满信心干一项伟大的事业之时，即使不普通人也可以成为英雄，这样就产生了激动人心的、划时代的历史。伟大的领导人本身有某种能力，能激起整个民族，使之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

你出生的那一年——一九一七年——就是历史上伟大的年代之一。一个伟大的领导人，怀着对穷苦人的满腔的热爱和同情，使他的人民在历史上写下光辉的永远不会被忘记的一页。就在你出世的那个月份，列宁发动了伟大

革命，改变了俄国和西伯利亚的面貌。今天，印度的另一个伟大领导人，同样怀着对于受苦人满腔的爱，并且迫不及待地要帮助他们。他激励着我们的人民去从事杰出的事业，做崇高的牺牲，以便他们能再次得到自由，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穷苦人、受压迫者可以抛弃压在身上的重担。巴甫吉 躺在监狱中，但是他的号召的魔力不知不觉深入印度成千上万个人的心。男男女女，甚至儿童们，都走出小小泥窝，成了为印度自由而奋斗的战士。在今天的印度，我们正在创造历史，你和我都有幸看到这一切的发生，并在这场宏伟的戏剧中扮演某种角色。

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我们应该怎样表现？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不能说什么角色会落到我们肩头；但不论是什么角色，让我们记住：我们决不能做任何有损于我们的事业，有辱我们的人民的事。如果我们决定做印度的战士，我们就享有印度的荣誉，这种荣誉是神圣的信任。我们也可能常常手足无措。判断正确与错误并不容易。不论什么时候有所怀疑，我想请你运用一个简单的测试。这个方法会帮助你。决不要做秘密的事，或你想掩盖的事。因为想掩盖，就意味着害怕，而害怕是可耻的。要勇敢，其他的人就会一呼百应。如果勇敢了，就不会害怕，就不会做任何感到羞耻的事。你知道，在我们伟大的自由运动之中，在巴甫吉的领导下，是没有秘密和掩盖的空间的——我们什么也不必隐瞒。我们不害怕我们的所做所言。在阳光下干事业，光明磊落。即使是私生活也是如此。让我们与太阳交朋友，在阳光下工作，不做见不得人的事。当然私生活我们会有，也应该有，但那与保密截然不同。亲爱的孩子，如果你这么做了，你就会成长为光明磊落的孩子，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都无所畏惧，镇定自若。

我给你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然而我要说的话还有很多很多——一封信哪能包括得下？

我说过，你有幸目睹正在我们的国家进行的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你还有一位虽然身材瘦小，但勇敢而杰出的母亲。一旦拿不定主意，或有什么困难，再也不会比她更好的朋友了。再见，小家伙，祝你成长为勇敢的战士，为印度服务。

爱并祝福！

爸甫

尼赫鲁除了以书信方式对女儿进行教育以外，还把书信看作是父女间维系感情的纽带、沟通感情的桥梁。不论是在狱中，还是在外地，甚至是在奔驰的列车中，尼赫鲁都要给女儿写信。英迪拉也是如此，无论是在学校，在异国他乡，在航行的轮船上，每到一地，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写信。哪怕是学业大考在即，她也要写上几笔。写信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如果因为种种客观原因，如在转徙途中，行踪不定或处于动荡环境，而不能及时收到对方的来信的话，另一方就会感到非常焦急，坐卧不安，甚至是度日如年。

也许是出自情感慰藉的需要，他们写信很勤，有时候两封信之间的间隔日期非常短，以致他们常常等不及收到对方的来信就匆匆写出第二封、第三封信……这点也与常人通信不同，因为他们不是为写信而写信，写信的目的并不在写信本身，而在写信之外。

尼赫鲁教育女儿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囿于书信一途。当他们父女重逢的时刻，无论是在家里，还是旅途中，尼赫鲁总不用漫谈的方式对女儿进行教育。在漫谈时，尼赫鲁用的不是老师向学生灌输知识的口吻，而是以讲故事的语气，给她讲述世界上的奇闻轶事、各国概况和人生哲学。不论是在日内瓦步行送她上学的时候，还是在与她一起做游戏、滑雪的时候；也不论是在游历欧洲各国的时候，还是在旅经锡兰观礼佛教圣迹的时候，尼赫鲁总是把所到之处引人入胜的故事、掌故随时讲给女儿听。在浩渺的星空下漫步于欢喜宫的园林，他会告诉她茫茫宇宙的奥秘；在巴黎参观卢浮宫博物馆，他会如数家珍地向她讲述那些各个时代的伟大艺术家及其作品；看到报纸上刊登出一则政治新闻，他会向她讲解什么是法西斯，为什么它既与自由民主的英国为敌，又同苏维埃俄国交战。

无庸讳言，这些书信和谈话对一个年仅十余岁的孩子来说，还是相当深奥的。英迪拉也回忆说：“其中大部分深奥得我不能理解，我记住了一些，但许多都忘却了。”但是，尼赫鲁是站在高的起点上对女儿进行教育的，这体现了他的严格要求和良苦用心。许多年后，当英迪拉自己步入政坛后，她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我意识到，这些信件有助于我正确地看待事物，帮助我形成自己的思想，这是其他任何教育都无法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尼赫鲁给女儿的信，不仅影响了英迪拉本人，还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印度。

英迪拉所受的教育除了来自学校和父亲的书信、谈话外，还来自书本，也就是来自她的自学。不过，这个自学的习惯也是她的父亲帮她养成的。1924年6月，当英迪拉刚开始上学读书时，尼赫鲁就在致她的一封信中说：“我准备送你两本书，你应该读一读。”在后来的好多次通信中，父女俩都要提到书，常常是父亲帮助女儿制订阅读计划，或开列书单，女儿则向父亲汇报读书的进展和心得体会。

欢喜宫里有一个很大的藏书室，有藏书近6000册，大多是尼赫鲁每次访英期间精心选购回的。尼赫鲁本人就是一个求知欲极强的人。他读的书也很博杂，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杰罗姆的《三人同舟》，从尼采到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著作，无所不读。受他的这种博览群书的良好习惯的影响，英迪拉很小的时候，就读完了莫里斯·梅特林科的《蜜蜂的一生》、《蚂蚁的一生》和《白蚁》等科普读物、《格林童话集》以及萧伯纳、狄更斯和莎士比亚作品的儿童版。不过，他建议她读的书有不少对一个孩子来说过于艰深。她十岁生日那天，他送给她一本赫·乔·威尔斯的《生命的科学》，他在生日祝词后加了一句：“别让它的篇幅给吓倒了。”尼赫鲁对女儿的教育本来就是高起点，严要求，他给她开列的书目也不例外。

一个好的习惯一旦养成，往往会使一个人受益终生。即使在日后担任了日理万机的总理要职，英迪拉还是见缝插针地挤时间读书。1971年的一天，她访问英国，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因气候恶劣，中转停留的时间延长了几个小时，她便派人到伦敦市场上买来刚出版尚未行销印度的新书阅读起来。

书籍对英迪拉的影响也很大。她后来回忆说：“《悲惨世界》是一本给我印象极为深刻的书，我读的是法文本。这本书生动极了，很久以后，在我完全长大成人

时，书里的种种情节还历历在目。我觉得这本书对我的社会哲学思想的形成也有影响，它使我对贫困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

三、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桩婚姻，两种宗教

1941年4月，当英迪拉回到阿拉哈巴德的时候，她的父亲尼赫鲁还在台拉登的狱中。她便径直去台拉登看望他，并告诉他她要同费罗兹·甘地结婚。女儿的决定使父亲感到惊讶。

父亲的惊讶并非没有缘由。直到20岁以前，英迪拉都还在宣称“终身不嫁”。

按照常理，结婚是人生的转折点。一般的女孩子都把它看作是青春花季的顶点，是“二人世界”生活的开始。她们常常充满了对未来婚姻生活美好的憧憬和向往。但对印度女孩子而言，婚姻并非一定都伴随着幸福。因为在印度这个男权主义相当严重的国度，结婚通常意味着女孩将失去娘家的保护，不得不将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一位仅仅依靠父母之命或媒妁之言而确定的，也许只是在婚礼前见过一面的那个男人，而这个缺乏感情基础的男人不一定靠得住；一旦他靠不住，新娘在婆家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印度传统的大家庭中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有可能使她如履薄冰、度日如年。

不过，英迪拉之所以一度不想嫁人，却并非出于这种担忧，因为她与普通的印度女孩子不同，她是大名鼎鼎的尼赫鲁的女儿，没有人敢把她怎么样。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英迪拉一度宣称“终身不嫁”呢？按照她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她怕家庭的牵累会影响她从事政治活动；她要成为另一个贞德，这种想法已经转变成为一种对民族事业既迫切又现实的责任感。

不过，对于女儿“终身不嫁”的誓言，尼赫鲁并不在意。他只是把它看成是业已长大成人的女儿的一个害羞的表示，这是绝大多数女孩子在说这话时的相同心态。

俗话说，“女大十八变”。到了19世纪40年代第一春，英迪拉已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了。昔日那个瘦弱单薄、头发略显蓬乱、身穿印度土布“卡迪”服的小女孩不见了。她身材修长苗条，皮肤白皙得常常被人误作欧洲人，清秀的脸庞上恰到好处地镶嵌着一个高耸的鼻梁和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两片柳叶似的眉毛安卧在明眸的上方，鼻下的樱桃小口里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这一切加上落落大方的装束和得体的饰物，活脱脱是一个仙女下凡。这样一个如花似玉、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少女，她的心底不可能不掀起爱的波澜。

所以，真正令尼赫鲁感到吃惊的是，女儿改变态度的速度太快，过于突然。尽管“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道理他比谁都懂，但临到自己的爱女就要离开自己，他的心理上一时半刻还是接受不了。更使他感到吃惊的是，她所要嫁的对象竟然是费罗兹·甘地！

英迪拉打算结婚的消息传开后，在欢喜宫内外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包括她家人在内的许多人都对这桩婚姻感到不满和愤怒，因为这是一次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的结合。

乍看起来，费罗兹·甘地与圣雄甘地同姓，不明就里的人们也许会以为他们之间会有点什么瓜葛，但实际上两者不仅完全无涉，宗教信仰也毫无共同之处：圣雄甘地信仰印度教（它也是包括尼赫鲁家族在内的大多数印度人信仰的宗教），而费罗兹·甘地则信仰祆教。

作为两种不同的宗教，印度教与祆教无疑从教义、礼仪到风俗习惯都有很大的差异。惟其如此，英迪拉与费罗兹·甘地的婚姻才引起了几乎所有印度人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关于印度教，因下文还要提到，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单说这祆教，原本并不是印度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老家在伊朗。祆教起源于古代波斯，本名琐罗亚斯德教，这是因创立者之名而得名。早在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米底时期，该教即已开始形成，在波斯帝国时期形成统一的宗教仪式，而在萨珊波斯时期达于极盛，成为古代伊朗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该教主张善恶二元论，认为宇宙中历来就有善与恶的斗争。光明、清静、创造等是善端，黑暗、恶浊、不净等是恶端。善端的最高神是阿胡拉·马兹达，恶端的最高神是阿赫里曼（凶神）。善恶两神势不两立，始终处于斗争之中。斗争的结果是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善神必将战胜恶神。祆教特别崇拜火，把火看作是光明的象征。因此又称拜火教。

公元651年，随着萨珊波斯被阿拉伯人所灭，祆教盛极而衰的厄运也就开始了。为了免遭宗教迫害，祆教徒要么被迫改宗伊斯兰教，要么是逃往他乡。外逃者中有几百人逃到了印度西海岸。

较之国内之同胞，这些祆教徒的命运要好一些。他们受到了相对来说比较具有宽容精神的印度教徒的比较宽容的对待，因此，这区区数百人才得以生存下来。以后经过1200多年的漫长岁月，他们的人数有所增加，但在整个印度仍占极少数。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很小，甚至比克什米尔的潘迪特婆罗门社会还要小。为了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特征，使其不致被印度教的汪洋大海所淹没，这些祆教徒除了接受当地的语言以外，在信仰方面坚决反对与异教调和。他们也不赞成祆教徒与异教徒通婚。这一点与克什米尔的潘迪特婆罗门有共同之处。

地处印度西海岸的祆教徒与克什米尔的潘迪特婆罗门还有一个明显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的智商都相当高，文化程度也很高，几乎都没有文盲；并且都产生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乃至世界影响的人物。克什米尔的婆罗门以尼赫鲁家族为典型代表，而在祆教徒中，涌现了像印度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著名领袖达达拜·瑙罗吉和费罗兹沙·梅达那样的政治名流、印度首富贾姆谢特吉·塔塔那样的工商界巨子以及像印度最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霍米·巴巴博士那样的科技奇才。祆教徒在印度军界也颇有建树。自印度独立以来，他们当中曾产生了一位陆军司令和一位空军司令。不过，像克什米尔的潘迪特那样，祆教徒从总体上看，是一个主要从事商业和其他各种专门职业的中产阶级的群体。

印度的祆教徒大多居住在孟买。英国人统治印度后，有些人为了经商和寻找就业机会，开始迁往内地谋求发展。甘地家族就是这少数内迁者之一。

费罗兹·甘地其人

费罗兹·甘地生于1912年，在家中排行老么。两岁时，他那当海军轮机军官的父亲就把全家迁到了阿拉哈巴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费罗兹的父亲必须长期随军出海。临行时，他把妻子、女儿和两个儿子托付给了在阿拉哈巴德达弗林夫人医院当外科医生的妹妹，以便有个照应。这样，费罗兹·甘地便住进了姑母家。

小费罗兹先是在一个女子学校读了三年书。由于他的父母生他较晚，从

小放纵和娇宠惯了，他在家里任意胡为，常使哥哥感到头痛。他在女校也调皮捣蛋，不服管束，许多老师和女同学都怕他，把他看作是一个小怪物。七岁那年，他进入英语方言男子学校。那里有许多同学对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也有所顾忌。不过，他也结识了一些朋友。

12岁那年，费罗兹加入了童子军，与童子军的副团长克夏瓦·德瓦·马拉维亚（此人后来成了尼赫鲁的内阁部长）很要好。他们的友谊一直维持了数十年之久。

费罗兹参加独立自由运动较晚，但一旦他有了参与意识，他的政治热情便像不可阻挡的洪流那样迸发出来。不过，他具有这种意识纯属偶然，不像英迪拉那样从小就受到参政意识十分浓厚的家庭的影响。

1928年，16岁的费罗兹中学毕业后，进入当地由美国传教士开办的尤因基督教学院。就在这一年的2月，英国政府派出一个以约翰·西蒙为首的皇家委员会，来研究所谓的印度宪政问题。这个委员会的七名委员都是清一色的英国人，由他们来研究印度宪政问题，这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因此，该委员会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已日益觉醒的印度人民的抵制。他们所到之处，都无一例外地掀起了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示威的浪潮，“西蒙，滚回去！”的怒骂声响彻云霄。为防不测，当委员会成员外出时，殖民当局不得不在沿途布署大批军警。

同其他大城市一样，阿拉哈巴德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抵制西蒙委员会的示威游示。这座城市以往曾多次发生过类似的政治骚动，但这些对于还没有政治意识的费罗兹来说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虽然这个少年精力充沛、劲头十足。

但是，这个不甘寂寞的少年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特别爱看热闹。只不过以往每次看热闹都是平安无事，看完拉倒，而这次看热闹却看出麻烦来了。当警察的哭丧棒照着示威群众劈头盖脸一阵乱打的时候，正在人行道边靠着自行车漫不经心地看热闹的费罗兹，也冷不防挨了一闷棍。

回到家中，本来因无端遭打而憋着一肚子火的费罗兹又遭到哥哥费厄登的一顿暴打和姐姐泰米娜的数落。他的兄弟姐妹渴望进入政府机关，他们不希望这个小“捣蛋鬼”毁了他们的前程。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警察的一闷棍和兄长的痛打把这个浑浑噩噩、仿佛永远也长不大的浑小子打醒了。他自小养成的执拗性格和逆反情绪一下子上来了：你们不让我参加政治运动，我偏要参加！像他这样的人一旦具有参与某种活动的意识，他的态度会比一般人更坚决。从此，费罗兹以极大的热情，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自由运动中去。尽管每次参加国大党的游行示威后他都照例要遭到家人的痛打，但这并不能动摇他参加政治运动的坚强意志，也不能使他的政治热情减低分毫。

1930年，18岁的费罗兹第一次尝到了铁窗的滋味。他入狱后不久，他那一刻为儿子担忧的母亲拉蒂迈就哭着赶到欢喜宫，碰巧遇到了正在那儿作短期逗留的圣雄甘地，便请求他责备她的儿子，不该荒废学业、不听家人的劝告。圣雄甘地对这位母亲对儿子的一片爱心表示理解，但同时温和而又坚定地指向她指出，她儿子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她应该为他感到骄傲，而不应该拖他的后腿；争取印度的独立，对一个人来说，主要的不是他靠用功读书得到的学位有多少，而是他自己被捕下狱的次数有多少。他还说：“如果能有七个像费罗兹这样的青年，我们就能够在七天内赢得独立。”

就在 18 岁那年，费罗兹加入国大党，成为阿拉哈巴德市党部的一名成员。这是他政治上的一个新起点。更使他感到欣喜的是，他儿时的好伙伴、曾任童子军副团长的克夏瓦·德瓦·马拉维亚在市党部身居要职，并且已经取得了尼赫鲁的信任。靠着马拉维亚的引荐，费罗兹开始进入欢喜宫，介入尼赫鲁家族的生活圈子。有人说，一个偶然事件有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确，马拉维亚的这一引荐改变了费罗兹的命运。从此以后，他的命运便与尼赫鲁家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费罗兹待人真诚、友爱且颇具幽默感，即使是警察用大棒打人那样恐怖的事情，到了他的口中，也会变成让人忍俊不禁的故事。这个惹人喜爱的小伙子很快便成了尼赫鲁家一位受欢迎的朋友。

其实，早在费罗兹进入欢喜宫前的几个月，也就是圣雄甘地发动“食盐进军”的那些日子，他就认识了英迪拉。其时，英迪拉还在圣玛丽亚教会女校读书。英迪拉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在费罗兹·甘地求学的地方，举行了一次升旗仪式。我记得他就是在这个地方第一次碰到我的。有人在那儿升旗，我跟着队伍前进。突然间警棍飞舞，升旗的那个人被捕了。他把旗子递给我，说：‘别让它倒下。’”也许就在那个时候，在费罗兹的心中已经播下了对英迪拉爱的种子。但他也许没有料到，几个月后，他已能够传奇般地经常出入英迪拉家，与她为伴。

出于对英迪拉的爱，费罗兹对英迪拉和她的母亲卡玛拉尤为忠诚。

每当卡玛拉按照国大党的指示参加政治活动时，费罗兹总是提着一个盛着茶点的小盒子，不无得意地跟着她。甚至在她出席政治集会时，不管会开得多么久，他都拿着那个珍宝般的小盒子自始至终侍奉在她的左右，不肯把它搁置一边，或者是委托别人照管一下。

遇到卡玛拉患病，费罗兹更是像伺候亲娘一样精心侍奉，而这对他来说是很不容易的，甚至是充满危险的，因为卡玛拉患的病非同寻常，是传染性极强、令人谈虎色变、在当时被称为绝症的肺结核。

卡玛拉的病情确诊后，一般人由于害怕传染，唯恐避之不及；即使是一些近亲，碍于情面偶尔去探望，也只是稍坐片刻就匆匆走掉。只有费罗兹一直守候在她身边，细心地看护她，不断地编故事和小道新闻，给她解闷。他甚至乐意为她洗痰盂，而这类脏活就连欢喜宫里的清洁工也是不大愿意干的。有一次，卡玛拉病得厉害，被送到山区的一个疗养院去疗养，费罗兹就定期去探望她。后来，卡玛拉因病情恶化，转到瑞士洛桑的一家医院治疗。当时，费罗兹正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便常常请假去瑞士探望她。

费罗兹虽然爱英迪拉，但他并没有让这种感情外露，而是将它深深地藏在心里。这个颇有心计的小伙子深知，如果过早地表露自己的爱情，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会适得其反，甚至还有被逐出欢喜宫的危险。因为在印度这样相当封建而保守的社会中，婚姻多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性被严格地隔离开。青年男女之间一旦产生了恋情，就必须设法避开长辈的耳目；如果在言谈举止上稍欠庄重，一旦被发现，就会立即遭到干涉。尼赫鲁家族虽然在某些方面十分欧化，但在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与行为准则上仍然相当传统。因此，费罗兹不得不谨慎从事。

然而，爱的火花迟早总会迸发出来。1934 年的某一天，把爱埋藏在心底达四年之久的费罗兹再也按捺不住了，终于第一次鼓足勇气，向英迪拉表露了心迹，并且大胆地将此事告诉了她的母亲。但英迪拉的心事当时并不在这

上面，她认为费罗兹这样做实在过于造次、唐突，并为此而大为光火。

不过，英迪拉的母亲显然是喜欢上了这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联想到平时和自己患病期间他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就是亲生儿子也还不过如此啊。因此，当她知道了费罗兹对女儿的恋情后，并没有加以干涉；而英迪拉呢？尽管没有接受他的爱情，但对他这个人倒并不怎么反感，相反还为他对待自己母亲的言行所感动。这实际上给了费罗兹继续追求她的机会。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随着时间的流逝，英迪拉逐渐喜欢上了这个憨厚的小伙子。尽管她仍然没有答应他的求婚，但她在情感上却越来越离不开他了，以至当她母亲去世后，英迪拉选择上哪所大学时，费罗兹成了影响她作出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若干年后，英迪拉在回忆起这件事时，还直言不讳地说：“我选择牛津大学的一个原因，是费罗兹那时在英国。”

在英国留学的那段时光，英迪拉也的确受到了费罗兹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他们俩并不在一个城市读书，但费罗兹经常从伦敦跑到牛津去陪伴她。英迪拉无论是参加英国工党的会议和克里希纳·梅农的印度联盟的会议，参加艺术展览会，看戏或者下馆子，还是到欧洲其他地方去参观游览，费罗兹总是不离她的左右，时刻为她排忧解难，仿佛稍不注意，别的男人会把她抢走似的，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独占花魁的迹象。这种迹象已被经常到英国旅行的英迪拉的精明的姨母希拉·考尔夫人看出来。不过，令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们的交往并未越雷池一步，从中很难觉察出他们是在谈恋爱。

在这种微妙的事情上，一个已婚妇女也许还不及一个青春少女敏感，这也许是因为女人一旦结婚以后，她对少男少女情感的感觉比起她当姑娘时要迟钝一些；而同处于婚嫁年龄的少女对另一名少女的恋情的感觉也许就要灵敏得多，对方在这方面任何一点哪怕是微小的变化都休想逃过她的眼睛。英迪拉在伦敦曾一度和一个名叫香塔·甘地的印度女同学合住在一套小公寓中。有一次，费罗兹来邀英迪拉去看戏，英迪拉为了免招室友的猜疑，就拉上香塔·甘地一同前往。尽管如此，细心的室友凭着她的“第六感官”仍然发现了他们的恋情。

无论是姨母的感觉，还是室友的观察，都没有错，英迪拉的确是爱上了费罗兹。功夫不负有心人。费罗兹以锲而不舍的追求，终于赢得了姑娘的芳心。1937年9月底至10月初，当正值20岁妙龄的美丽少女英迪拉乘“印度总督号”游轮回英国途经巴黎时，在蒙马特大教堂的台阶上，她公开地接受了从英国闻讯赶来接她的费罗兹的求爱。费罗兹简直欣喜若狂了。

细心的人们也许会留意到英迪拉在选择私定终身的地点和时间时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她选择巴黎，是因为它是一座堪与伦敦齐名的闻名世界的大都市。在这样一座城市公开自己对恋人的爱情具有特别的意义，何况她对巴黎一向怀有好感。当初当她为上大学而颇费踌躇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有种因素限制的话，说不定她会到巴黎上大学；她选择教堂是为了表示严肃和庄重。教堂是神圣之所，而婚姻又是人生大事，不能不认真对待；她选择十月，是因为那是收获的季节。春华秋实，象征着她与费罗兹爱情的成熟。几年以后，当英迪拉回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当时正值夏末秋初，巴黎正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中，我真正感到心情愉快而又年轻……”

“全世界都在反对这桩婚事”

决定是作出了，但冷静的英迪拉并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连她的父亲都被蒙在鼓里。四年后，当这对年轻人的恋情挑明后，却遭到了四面八方的反对。拿英迪拉自己的话说：“全世界都在反对我和费罗兹的婚事。”他们对这种结局并非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没料到反对的声势竟是那么大，那么激烈。这反对首先来自尼赫鲁家族。

尼赫鲁尽管一向思想开通，但当他听说英迪拉要嫁给费罗兹时，仍不免感到惊讶和烦恼。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表示反对。

尼赫鲁对费罗兹谈不上有多少好感，费罗兹对这位老人的心态也总摸不透。他们两人在欢喜宫虽也曾进行过几次交谈，但那纯粹是一个职高位尊的国大党领导人对一个崇拜自己的晚辈的垂青和恩宠而已。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也非常正式和拘谨。尼赫鲁也并非不知道自己患病的妻子主要是这个小伙子在照料，但他并不对他的这种行为表示鼓励和感激，更不喜欢他总是在爱女身边打转转。这种心态在他写给费罗兹的信中有所流露。有一次，费罗兹从瑞士向尼赫鲁写来一封信，兴致勃勃地向他描绘了他给英迪拉拍的照片，还随信寄去了几张。对此，尼赫鲁反应非常冷淡，他在回信中写道：“如果你照了这些照片，那么我祝贺你。”费罗兹看了，只觉得好像是被当头泼了一盆冰水。不过，他虽然感到委屈和难过，但并没有抱怨什么。

尼赫鲁反对这桩婚事，其心态是相当复杂的。有人认为宗教信仰不同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尼赫鲁对宗教信仰问题看得很淡，更何况他的家族中人与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联姻也不乏先例：他的两个妹妹都嫁给了非克什米尔潘迪特家族的男子，其中小妹克里希娜的丈夫的种姓还低于她，这在种姓制度中被视为“逆婚”，是大逆不道的；英迪拉的两个表妹都嫁给了穆斯林。

尼赫鲁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对这桩婚姻本身不太满意，他有点怀疑费罗兹是否能够给自己的女儿带来幸福。

尼赫鲁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英迪拉和费罗兹在家庭背景上有着天壤之别。英迪拉出身于名门望族。尽管她家为投身自由运动已放弃了豪族般的生活，但按印度标准仍属富足之列。别的不说，她的家人能够毫不费力地频繁地出国游历观光，仅此一点，就是普通印度家庭所望尘莫及的。而费罗兹的家庭属贫寒之列。他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长大后虽然也到英国留过学，受过高等教育，但直到他要娶英迪拉为妻时，都还没有找到固定的职业，没有可以维持自己和妻子生活的收入。尼赫鲁根据他本人的婚姻经历，认为家庭背景的巨大反差会引起两口子彼此不能互相适应的严重问题。他与妻子卡玛拉之间并非缺乏感情，但因为两人家庭的背景不同，他们有时也会发生摩擦；何况他的女儿和费罗兹在家庭背景上的差异较之他与卡玛拉在家庭背景上的差异还要大得多，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矛盾和摩擦（这一点已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英迪拉和费罗兹在各自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同。英迪拉基本上是在爱的氛围中长大的。她的祖父莫蒂拉尔·尼赫鲁对她自不必说，可谓含在嘴里怕化了，拿在手上怕飞了。他对她的要求从来就是有求必应，她要月亮，他不会摘星星，连英迪拉自己都说她被他宠坏了。即使是她的祖母、被她称作“橱柜儿奶奶”的斯瓦鲁普·拉妮也对她宠爱有加，尽管在英迪拉出生时，她曾为她不是个男孩而表示过惋惜和遗憾。被她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祈祷室，平

时没有她的许可，任何人都休想踏进半步，唯独小英迪拉可以随便出入，并且还能从奶奶的橱柜里得到各种味美可口的糖果点心。母亲卡玛拉也很爱英迪拉，只可惜她的生命太短暂，不可能给予女儿长久的爱。尼赫鲁在妻子去世后，更是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到了女儿的身上。由于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独立自由事业，他和女儿在很多时候都是天各一方。但即使女儿远在天涯海角，他的心也总是与她在一起。不论何时何地，也不论多么忙，他都要抽时间频繁地给女儿写信，关心她的学习，询问她的身体状况。每逢获悉她生了病，即使是微感不适，他也会感到焦虑不安，马上写信或拍电报给她周围的医生和朋友，请他们帮忙治疗和照料。尼赫鲁对女儿的爱和关怀真可谓无微不至，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之一，恐怕一点儿也不夸张。

与英迪拉在家中众星拱月的地位相比，费罗兹在家中的地位可就差多了。从印度社会的传统上讲，作为一个男孩，又是排行老幺，费罗兹在家中理应是受宠的。但因为家境贫寒，这种受宠的程度也就大大地打了折扣。试想一个差不多举家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的家庭又能给予他多少爱呢？所以，费罗兹从小看得最多的是母亲的眼泪，听得最多的是姐姐的抱怨，领教得最多的是哥哥的拳头。

这样一个费罗兹，又能给英迪拉多少爱呢？尼赫鲁没有理由不表示怀疑和担忧。

除了家庭背景和两人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外，英迪拉和费罗兹在长相上也不太般配，在个性上也有颇大的反差。英迪拉身材修长而略显单薄，皮肤白皙，美丽可人，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无不具有贵族气质；费罗兹则五短身材，矮胖结实，言谈举止一看就是出身于平民阶层。英迪拉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且讷言，时常老半天不说一句话，更不会把内心的想法轻易示人；费罗兹则性格外向，善结交，谈起话来滔滔不绝。不管遇到什么人，哪怕与他只有过一面之交，他都能与对方海阔天空地侃上一通，有时不免显得有点吵人。迥然不同的性格如果处理得好，可以相得益彰，起到互补的作用，弄得不好则往往是引起矛盾和冲突的导火线。这也是尼赫鲁所担心的。

于是，尼赫鲁与女儿进行了一次艰难的谈话，试图说服她改变初衷。他把自己的种种忧虑都告诉了女儿，并指出婚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她必须三思而行。他认为英迪拉选择费罗兹，主要是因为她接触的圈子太小，交友太少所致，这其中也含有感情用事的成分。如果仅凭在英国读书时费罗兹曾给予过许多帮助，就答应嫁给她，那未免失之草率；如果再过一段时间，有机会接触到别的小伙子，她也许会找到一个比费罗兹更为理想的人选。

作出的决定如果能够轻易地改变，英迪拉也就不是英迪拉了。任凭尼赫鲁嗓子说干，嘴唇说破，英迪拉还是不为所动。尼赫鲁，这个印度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曾经说服过多少印度青年投身到民族运动的洪流中去，但这一次在女儿的婚姻问题上却败下阵来。

英迪拉的婚姻抉择，也受到了她的两个姑姑的反对，但她依然初衷不改。

万般无奈之下，尼赫鲁又想起了德高望重的圣雄甘地，决定请他出面解决这件事，就像当年他与父亲之间为了英迪拉该上哪所学校的问题发生了争执而请圣雄出面解决一样。不过，那一次圣雄是站在尼赫鲁一边，这次却是基本上站在两个年轻人一边。当然他的做法相当委婉。在持赞同态度的同时，他向费罗兹宣讲了传统的礼教，并要他作出保证，未经尼赫鲁的允许，决不

与英迪拉结婚。圣雄的态度如此，尼赫鲁当然也就无话可说了。

尼赫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从善如流。他一旦意识到反对无济于事时，便立刻改变了态度，反倒成了这对恋人的坚定的支持者。他可不想为此事得罪他的宝贝女儿。

尼赫鲁家族的这一关好不容易才通过，来自费罗兹家的阻碍却又出现在前方。英迪拉和费罗兹的婚姻真可谓好事多磨。

费罗兹家的反对主要是出自担忧。他们认为两家相差太悬殊，费罗兹娶英迪拉是高攀，而这势必造成日后小两口夫妻生活的不平等，从而导致婚姻的不和谐。他们宁愿费罗兹找一个门户相当的小家碧玉，而不愿他娶一个英迪拉那样的名门闺秀。

这一次却是尼赫鲁自己出面，化解了费罗兹家人心中的疑虑。

英迪拉和费罗兹心想这下该松口气了吧，不料更大的反对浪潮正在等着他们。这反对来自公众的舆论。

事情起自举行婚礼的前一个月，在勒克瑙出版的亲政府的《先锋报》的第一版上刊登的一则关于英迪拉和费罗兹订婚的新闻。这条新闻很简短，引起的抗议风潮却是声势浩大。一些狂热的印度教徒认为英迪拉决定嫁给异教徒是对印度教的侮辱。他们责问：难道千百万印度教青年中就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对象吗？他们还对作为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的尼赫鲁居然对这种婚姻持容许态度表示不解和不满。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会鼓励其他教徒群起效尤，从而危及印度教的纯洁性。

这则新闻发表后不到一个星期，很多正统的印度教报纸，便纷纷以社论形式，对这桩婚事进行批评，甚至以此攻击圣雄甘地和尼赫鲁。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写信表示愤慨，进行指责。一时间，英迪拉感到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反对”他们的婚事。

面对巨大的反对浪潮，尼赫鲁不得不在报上发表声明，以温和而又庄严的笔调斥责那些批评者。他指出：“婚姻是一件个人和家庭的事情，它主要影响双方当事人，部分影响他们的家属。……我长期以来抱这样的见解：虽然父母可以并且应该在这方面向子女进行忠告，但选择和最后决定必须由双方当事人作出。那项决定如果是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就必须加以实施，而父母或其他人就不应该进行阻挠。当我确信英迪拉和费罗兹要结婚时，我欣然接受他们的决定，并告诉他们，我将为他们祝福。”

面对众多的谩骂信，圣雄甘地也坐不住了，他在《贱民》周刊上撰文，反击那些谩骂者。他竭力为这桩婚事辩护，认为费罗兹并没有什么过错；在谩骂者看来，他唯一的罪过就是他是一个袄教徒。圣雄甘地还说，他反对任何人为了结婚而改变各自的宗教信仰，而英迪拉和费罗兹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且，他们的结合是有感情基础的。费罗兹很早就和英迪拉家有来往，他曾经照料她患病的母亲多年，他们两人之间产生感情并发展到爱情是既正常而又光明正大的事情。

尼赫鲁的声明和圣雄甘地的支持终于使这场意想不到的轩然大波平息下去了，再也没有人对这桩婚事表示反对了。然而，潜藏在尼赫鲁内心深处的那层隐忧却总也挥之不去。细心的读者从他的声明中多少可以体会到他的无奈。他是在确信英迪拉和费罗兹的婚姻已不可更改时，才“接受他们的决定的”，这实际上是顺其自然。在女儿婚姻这件事中，他实际上扮演的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女儿的决定已经作出，并且毫无商量的余地，作父亲的再一意

孤行地反对下去未免不智。

事情真是一波三折。巨大的反对的浪潮虽然平息了，一个新的难题又出现在这对恋人的面前。按照当时的婚姻法规定，信仰不同宗教的男女双方结婚必须放弃各自的宗教信仰。英迪拉的小姑克里希娜与 G.P. 胡第兴结婚时就是这样做的。英迪拉与费罗兹虽然都不是那样笃信宗教，但却都不愿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最后还是德里的一位教授找到了解决的方法。他从卷帙浩繁的吠陀经中找出了几句正好适用于不同信仰间通婚的赞美诗，以此来证明这桩婚事的可行性。

现在，一切问题都已不复存在，该择日完婚了。

隆重的婚礼

婚礼该在哪一天举行，看起来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其实不然，弄得不好，也会给结婚双方及其家人带来不快。“就定在 1942 年 3 月 26 日吧。”有一位热心人搬来了闻名世界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建议道。

3 月 26 日，这可是个黄道吉日！它是个吉利的双日；更重要的是，它是神话传说中的英雄罗摩的生日。热心人的提议获得了人们的一致通过。佳期既定，婚姻的序幕也就正式拉开了。

一般说来，印度人的婚姻是相当讲究的，只要条件许可，人们总是尽量办得像样些、体面些。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婚姻毕竟只有一次。

受过西式教育、思想开通的英迪拉和费罗兹对此却看得很淡，他们打算婚礼从简，只邀请至亲和挚友参加。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圣雄甘地，心想一定会得到他的同意和赞许，因为这位伟人一向注重和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圣雄这次却一反常态地建议他们大操大办，大宴宾朋。

面对这对面露惊讶之色的新人，圣雄缓缓地道出了他的理由。他认为，既然他们的婚事已经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他们的婚礼就必然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和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婚礼过于简朴，就有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两家人已经被公众舆论所吓倒，连举行一场体面的婚礼的勇气都没有，只好偷偷地结婚了事，看来尼赫鲁并不是真心诚意地表示同意和为他们祝福。

圣雄到底是圣雄，他的想法似乎总要比别人高出一筹。两个年轻人对他的这番高论心悦诚服，决定照他的话去做，尽可能把婚礼操办得既隆重又热闹。

随着婚期的一天天临近，欢喜宫的人们又忙碌起来了。因莫蒂拉尔、卡玛拉、斯瓦鲁普·拉妮等人相继去世，尼赫鲁经常入狱和英迪拉长年在外国求学而被关闭了的大部分房间已被重新打开。清洁工和装饰工将每间房屋打扫并装修一新，再挂满彩灯和彩球。整个欢喜宫都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人们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个个笑逐颜开。

大自然也似乎善解人意。其时，严寒的隆冬已经过去，酷热的夏天尚未到来。天空湛蓝湛蓝的，空气清新得沁人心脾。桃红柳绿，百花盛开，就连榕树和菩提树也都披上了新装，好一派印度北方的春光！

欢喜宫的花草植物也都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即将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们。

尼赫鲁书房前的那棵巨大的楝树上结满了鲜枣般的绿果；芒果树下铺着一层厚厚的落花；椭圆形的草坪四周，鲜艳的玫瑰花正竞相怒放；欢喜宫外田野里大片黄芥菜花随风摇曳，恰似万点繁星在闪烁。即将做新娘的英迪拉比花朵还要美丽。她面如桃花，艳若玫瑰，亭亭玉立，楚楚动人，脸上荡漾着羞涩而幸福的微笑。

从来不慕虚荣的英迪拉的结婚礼服，并不是人们结婚惯用的那种用华贵的厚织锦做的婚礼专用莎丽，而是一件普通红色棉布莎丽。但她却极喜欢，并以穿它为荣。因为它是尼赫鲁在狱中亲手纺纱并编织而成的，饱含着一个父亲对女儿无限的爱，自然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她对另一件衣物也同样珍爱，那是一件卡迪服，是圣雄甘地亲手纺线编织而成的。

英迪拉也没有佩戴任何贵重的珠宝首饰，尽管她的母亲卡玛拉生前曾给她留下了不少。她只买了一些五颜六色的玻璃手镯，并用一些鲜花作饰物。朴实无华，本身就是一种美。

新郎费罗兹的打扮也相当朴素，但不失庄重。他穿的是用手织的印度白土布做的传统的阿其康（一种扣紧领口和长及膝部的上衣），里面穿的是无领衬衫和紧身裤，头上戴的是白色尖顶帽。这几天他显得特别高兴。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盼望同英迪拉结婚已盼了八九年，如今这一天就要到来了，他怎能不高兴呢？

众多的宾客从全国各地甚至从国外应邀赶来，涌向欢喜宫，参加这对新人的婚礼。广大的阿拉哈巴德市民更是不请自来。昔日宽敞的欢喜宫早已是人满为患，不绝的人流仍向这里涌来。后来的人们已无法安置。有些人只得爬到欢喜宫的树上，为的是一睹新人的风采。

1942年3月26日，艳阳高照，万里无云。婚礼如期在一个较小的围场里举行。围场四角竖着四根9英尺高的粗木柱，上面按照印度教的传统盖上大香蕉叶和芒果树枝，象征着人与自然相接近；中间用干树枝点燃一堆圣火，树枝上浇上纯奶油，加上芬芳的植物，烧起来香气扑鼻。

英迪拉由三个多月前已经获释的父亲尼赫鲁领着，来到一个设在圣火旁的绸垫座位上坐下。费罗兹坐在她身边，尼赫鲁则坐在他们的对面，他的身旁放着一张空椅子，那是为纪念妻子卡玛拉而设的。

按照传统，婚礼上必须诵念吠陀圣歌。由于吠陀经是用古典的梵文写成的，连僧侣都感到晦涩难懂，那些行礼时需要用到的吠陀经圣歌便被事先译成了英文，并被印到了精美的折纸说明书上，以方便来宾。

第一首圣歌是要求新人忠于“正法”。僧侣们向火中浇奶油。按照他们的解释，纯奶油象征思想，浇奶油的匙代表思想转变为行动，火则代表人们生命中的普遍的精神。英迪拉和费罗兹面对炽烈的圣火，表示决心要将一生献给引导人类前进的光明的事业，并且祈求他们的“心灵中充满了对所有人的爱”。

第二首圣歌是献给“人对自由的爱以及他们维护这种爱的决心”。新娘诵道：“如果世上有任何人胆敢剥夺我的自由，神主啊，我这里手持利剑，准备抵抗到底。我祈求普照大地的自由之光，请它从四面八方将我们照亮。”

仪式中最隆重的一部分是“坎亚丹”，即将新娘交给新郎。仪式责成新郎在达磨（精神和道德生活）、阿拉塔（财经）以及揭磨（行为）等方面都必须“尊重对方，克制自己，与新娘情投意合”，不得怠慢新娘。

唱完圣歌，尼赫鲁把英迪拉的手放在费罗兹的手里，将她莎丽的一角结

在费罗兹的阿其康上，让他们手挽手，围着圣火走七步，这标志着婚礼结束。从此时起，英迪拉·尼赫鲁小姐变成了英迪拉·甘地夫人。备尝艰辛之后，这对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亲友们都走上前来，围住英迪拉，一边向她身上洒玫瑰花瓣，一边唱赞美诗，鼓励她保持印度妇女的传统美德、尊严和荣誉。

按照通常的惯例，一对新人结婚以后一般要进行蜜月旅行，英迪拉和费罗兹也不例外。

那么，该到哪儿去度蜜月呢？英迪拉提议到克什米尔去。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更重要的是，那里是英迪拉的故乡，有她生命的根。从孩提时代起，英迪拉就不断从长辈那里听说克什米尔如何神奇，如何美丽。那片热土曾引起她的无限向往。尽管她在学生时代曾去过一次，但这远远不够。她的父亲尼赫鲁对克什米尔的描绘颇能表达她的心声：“这片土地是如此美丽，如此富于魅力，我被深深吸引住了，也被震撼了，整天着了魔似地陶醉其间，乐而忘返。如果说，有一位妇人，其美丽超凡脱俗，令人叹为观止，那么她就是克什米尔……”

对于新娘的提议，新郎当然表示赞同。

三月的克什米尔，春光融融，气候宜人。尽管山谷四周的山峰上仍旧覆盖着皑皑白雪，但山坡上已经是鲜花盛开。山谷里雏菊花、樱花和杏花更是竞相怒放，远远望去，就像是铺了一层厚厚的彩色地毯。新婚燕尔的英迪拉和费罗兹手挽着手，徜徉其间、饱览着大自然的风光。他们游览莫卧儿时代的花园，沿着杰卢姆河边散步，在宁静的达尔湖上泛舟，去山里作短途旅行，偶尔也去斯利那加的水上百货商场购物……

克什米尔的美丽风光的确令人陶醉、流连忘返，足以令人忘却人世间的一切纷扰和烦恼。善解人意的尼赫鲁，也巴不得这对新人能在那里尽可能多呆些时日，以便“尽情地享受那份美丽”。然而，这只不过是尼赫鲁的一个良好的愿望罢了。克什米尔并不是世外桃源，时局已不容他们一直沉浸在蜜月的幸福之中，印度又一轮的政治风暴眼看就要爆发了。

四、为自由而斗争

另一个“家”的滋味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日，英印总督林利思戈宣布印度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英国殖民政府未经征询印度人民的意见，连印度的中央立法机构也未过问，就把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绑上了战车。此举“伤了印度的心”，尼赫鲁如是说。

然而，殖民政府又岂只是“伤印度的心”，它还要“剥它的皮”。为了维护殖民统治，在对德宣战后，它又颁布了《印度国防法》等一系列法令与条例，实行战时独裁统治，增加军费开支，招兵买马，加紧备战；镇压一切反英反战运动，压制工农群众；同时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故伎，再次允诺在战后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企图诱使国大党支持它的战争政策。

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教训，国大党这次没有轻信殖民当局的“诺言”。它的态度是，并非不可以支持英国的战争努力，但有一个条件，即英国必须保证战后给予印度完全的独立与自由。圣雄甘地宣称，自由的印度会站在英国一边反对日本和德国，不自由的印度则将与英国作战。然而，国大党的条件遭到了殖民当局的断然拒绝。

国大党决定采取对策，于同年10月宣布它执政的英属印度七个自治省实行总辞职，以抵制英国的战时政策。1940年10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同意甘地的主张，决定发动“个人萨蒂亚格拉哈”即个人不服从运动。运动的参加者均由甘地挑选，一个一个地进行，一个人被捕后由第二个人递补，而不发动群众运动。甘地挑选的第一个人是维洛巴·巴维，他在发表一次反战演说后被捕。接着被捕的是尼赫鲁。随着运动的缓慢开展，大批国大党人相继被捕入狱。“个人萨蒂亚格拉哈”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日军进展神速，于1942年3月占领仰光，直接威胁印度的大门。英印殖民当局在感到震惊之余，急忙释放参加个人不服从运动的国大党人，又派掌玺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赴印，就宪法草案与印度领导人进行磋商。

克里普斯计划除了重申在战后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以外，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新内容，因而遭到了国大党的拒绝。同年4月，圣雄甘地在《贱民》周刊上撰文，发出了要求英国“撤出印度”的口号。他对英国人说：“你们在这里住得太久了，什么好事也未做。离开吧！让我们从此一刀两断！”经过激烈的争论，国大党于8月接受了甘地的主张，通过了“撤出印度”的决议，要求英国立即结束在印度的统治，否则将发动广泛的群众性的文明不服从运动。

英国殖民当局一意孤行，于8月9日在全国进行大逮捕。国大党尚未来得及行动，就遭到了致命打击，被宣布为非法组织。甘地、尼赫鲁等领袖又一次被捕入狱。但印度人民是压不垮的，在缺乏领导的情况下，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有的甚至拿起武器，开展武装斗争。

指1937年7月国大党根据殖民政府在1935年颁布的《印度政府组织法》参加竞选，在获胜的马德拉斯、联合省、比哈尔等七个自治省中组成的省政府。

“八月风暴”遭到了殖民者的血腥镇压，数万人被捕，940人遭枪杀，1630人受伤。死难者的鲜血染红了次大陆的土地。

对印度民族来说，这真是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对英·甘地来说，又何常不是这样呢？她并没有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之中。她深知，没有国，何言家？印度一天不独立，人民一天不自由，她的小家庭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她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政治斗争的洪流中去。然而，英·甘地毕竟是一个成家之人，她不可能再像做姑娘时那样毫无牵挂地干她想干的任何事情，她必须承担一定的家庭责任；再说，此时由于姑母维贾雅拉克希米也遭到逮捕，她必须帮助照料她那三个未成年的女儿；还有人谣传她父亲尼赫鲁和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已被押往蛮荒的安达曼群岛，这也令她焦虑不安。

英·甘地为不能迅速投入自由运动而产生的苦闷，在一个月后得到了消除。维贾雅拉克希米的大女儿钱德拉莱卡因参加一次大学生政治示威游行而被捕。维贾雅拉克希米的丈夫雇了一个中国保姆，照看两个小女儿。此时，关于她父亲被流放到安达曼群岛的谣言已破，他是被关押在德干高原南部的艾哈迈德纳加尔的一座古堡里。这样，英·甘地既无需照料两个表妹，也不必再为父亲担忧，可以放心地投身自由运动了。

当时，国大党尚有一个领导人未被捕，他就是日后接替尼赫鲁任总理的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英·甘地便在他的手下工作。由于国大党已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为了免遭逮捕，夏斯特里、费罗兹和其他许多人决定转入地下。英·甘地仍进行公开活动，做些宣传鼓动、筹集经费之类的工作。不久，她经受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考验。

费罗兹曾经就读过的阿拉哈巴德尤因基督教学院定期举行升旗仪式，一般要升国旗，唱爱国歌曲《班德—马塔拉姆》，喊几句口号。若在平时，这种仪式不会引起殖民当局的注意。但此时正值“撤出印度”运动期间，殖民者的神经高度紧张且过敏，认为这类活动具有相当大的煽动性，应予以取缔。

有一次，学生正在广场集合，准备参加升旗仪式。英·甘地也来了，这使学生们的热情更加高涨。突然，传来一阵警笛声，一队警察和军队赶来，包围了会场。警长命令他们解散。学生们报之以嘲弄、怒骂和响亮的口号声。警察随即对与会者大打出手。一个手持国大党党旗的青年遭到的殴打最为严重。就在他支持不住而即将倒下时，他将旗帜交给站在身旁的英·甘地，要求她接过去继续举起。

面对穷凶极恶的警察，英·甘地毫不畏惧。她从青年手中接过旗帜，将它高高举起。虽然遭到警察的毒打，她仍紧握旗帜，决不让它倒下。她深知，旗帜是国大党的象征，如果被警察抢去，就等于是宣布英国人胜利、国大党失败；如果旗帜倒在地上，在混乱中遭到践踏，就是亵渎圣物。她宁死也决不让这两种情况发生。

升旗事件发生后没几天，有消息传来，说警察要抓英·甘地。对被捕入狱，英·甘地一点儿也不怕；相反，她把这当作是求之不得的事。她甚至为她没有在升旗事件中被捕而感到遗憾。在当时的印度，以国大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无不把被殖民当局逮捕看作是光荣的事情，因为这说明他们是为印度的独立自由而战的坚强战士。20多年来，英·甘地不止一次地亲眼目睹自己的祖父，父母、姑姑以及其他亲人走进监狱，每次她都既为他们感到担忧，也为他们感到自豪。现在，该轮到她拥有这份荣耀了。

尽管英·甘地毫不惧怕甚至有些盼望入狱，但她认为不能束手就擒，应

该在被捕前还为自由运动做点事，至少也应该组织一次集会。

当时殖民当局禁止人们举行集会。由于国大党已被取缔，报纸又受到了严格的检查，只能通过口头传达会议通知。集会的头一天，英·甘地躲在一个地方留宿。第二天，集会时间一到，她就出现在会场——一家电影院旁的广场上，参加集会的人们也不约而同地从不同的地方赶来。英·甘地向他们发表演讲，但还没讲上几分钟，军警就闻讯赶来了，把会场团团围住，把枪口对准集会的群众。一个英国兵命令她停止演讲，见她不予理睬，便持枪向她逼来，枪上的刺刀几乎碰到了她身上。这时，正在楼上观察动静的费罗兹见妻子有危险，奋不顾身地冲下楼来，大声喊道：“你们要么开枪，要么马上滚蛋！”他的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一下子暴露了，夫妻俩一同被捕了。

眼看军警就要将英·甘地抓走，与会者群情激愤，纷纷冲上来与军警厮打，不准他们带走她。一名国大党妇女死死抓住她的一只胳膊，与军警展开了拉锯战。这下可苦了英·甘地，她后来回忆说：“我想我真要被撕成两半了。”

英·甘地终于被军警带走了。这是她平生第一次入狱，用她父亲尼赫鲁的话说，是第一次到另一个“家”去。从1942年9月11日被捕，到1943年5月13日获释，英·甘地在这个“家”里足足呆了八个月，饱尝了这个“家”的滋味。

起初，英·甘地和她的丈夫被关在同一座监狱——阿拉哈巴德的奈尼中心监狱（不久，费罗兹被转到另一座城市的一座监狱中去了）。在早些时候被捕的姑母维贾雅拉克希米和她的大女儿钱德拉莱卡也被关在这座监狱。由于是一座中心监狱，奈尼监狱比普通监狱大，可以关押2000多名犯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生活条件比普通监狱好。监狱的女牢由两个大院子组成，中间隔着一道高墙，分别关押政治犯和刑事犯。关押政治犯的院子共有两间小窝棚，英·甘地与她的姑母和表妹以及另外二十来个女政治犯就住在里面。

尽管英·甘地对监狱生活并不陌生（她从孩提时代起就经常到监狱去，不是旁听家人受审，就是去同父亲进行既宝贵又短暂的20分钟会面），尽管她对入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当她一踏进监房时，才发现这另一个“家”的生活之艰辛和条件之艰苦实在远远超乎她的想象。对她来说，八个月的狱中生活是一种特殊的经历，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窝棚的顶是用泥巴糊成的，每逢天雨，棚顶就漏得像筛子。不下雨时，棚顶上就会掉下大块大块的泥巴，犯人一不留神就会挨砸。窝棚的四壁有好几处已经破裂，狱卒们不但不砌好，反而钉上铁栅，以便监视犯人。这可苦了女犯们。苍蝇、蚊子、蝙蝠、癞蛤蟆、老鼠、蟑螂甚至毒蛇纷纷从裂缝处钻进来侵扰她们，使她们不得安宁。

犯人们的生活费很少。英·甘地每天只有9个卢比，按照当时通行的兑换比率，还不到1先令。这笔钱必须用来支付全部生活必需品以及供煮饭用的柴禾的费用。米饭和扁豆本来就少得可怜，而且常掺有沙子；糖里满是尘土；牛奶里加满了从墙外水压泵里抽来的清水。

监狱里的物质生活固然苦不堪言，精神生活的贫乏则更令人难以忍受。

英·甘地回忆说：

在监狱外的所见所闻与在监狱内的亲身经历之间有多大的不同啊！没有人在狱中呆过（不论时间多长）的人，绝对想象不到一个人在那里会怎样地陷于一种麻木的精神状态之中。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写的那样：“度日如年，

了无尽期。”我们每天生活都很单调，备受刁难和恶意侮辱。佩西克·劳伦斯说过：“犯人的生活基本上是非人的生活。”

犯人们像动物一样被圈在一起，失掉了个人的尊严。他们不仅与世隔绝，消息闭塞，而且也看不到任何鲜艳、美好、柔和与雅致的景物。地面、墙壁以及周围的一切都是泥土色的，就连我的换洗衣服也带上了这种色彩。我们的食物也有沙土味。透过监狱的铁栅，夏季的热风、狂暴的风沙、雨季的暴雨、冬天的严寒不断向我们袭来。别人每月还能有一两次亲人探监或能收到一两封书信，可我却什么也没有……

不过，英·甘地和她的姑母潘迪特夫人对这些都能泰然处之。她的表妹因年幼，更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她们几乎给窝棚里的一切都取了名。她们先是给自己的那一方小天地取了专名：英·甘地的小天地叫“琴博拉索山”，此名得自美洲安第斯山脉中的一座山峰的名称，象征着“一切都是美丽的，但又是遥远的”；潘迪特夫人的小天地叫“蓝色画屋”，得自她被捕时从家里带来的一条当铺盖用的蓝色毯子；钱德拉莱卡的小天地叫“欢迎”。她们把临时搭起来的三人合用的一个炉灶称作“欢喜宫厨房”，把熄灯后用的那盏灯叫做“金星”，把一瓶缺了盖儿的发油命名为“无头伯爵鲁珀特”，把监狱里的一只猫叫做“梅希塔贝尔”。它常常将分给她们的牛奶喝得精光。

监狱的生活空间十分狭小，坐牢的人如果不自己找些事做，往往会感到寂寞难耐，日子难捱。

英·甘地可不是个日子难打发的人，即使是身陷囹圄，她仍是有计划地、有条不紊地做着她认为该做的事情。她把这段时光看得非常宝贵，认为正好可以利用它来好好看点书，充实充实自己。她为自己拟订了读书计划，将每天的日程作了周密的安排，然后不受任何干扰地学习起来。

英·甘地托人从欢喜宫带来了满满一箱书，她还从姑母和表妹那里借书来看。她的读书兴趣非常广泛，天文地理、文学科技乃至市井小说无所不看。其中包括厄普顿·辛克莱的《斗争的根源》、柏拉图的《理想国》、乔治·萧伯纳的剧本、世界文学选集，甚至还有华人作家林语堂的作品。

尼赫鲁一向很关心女儿的读书情况，他把自己在艾哈迈德纳加尔监狱看过并喜欢的一些书寄给女儿，其中有《希腊戏剧选》、吉尔伯特·默里译的《阿尔赛蒂斯》。使英·甘地感到遗憾的，是看不到报纸。除读书以外，她还帮表妹学习法语。

英·甘地得到看守的许可，还和表妹一起把大院子的一部分改成了花园，种上花草和蔬菜。金莲花和三色堇长势喜人。这既使监狱的生活环境和她们日常单调的伙食得到些许改善，还为她日后家庭烹饪，做一个好母亲打下了基础。

英·甘地也像她父亲一样，关心、教育年轻的犯人。她从拘留所的囚犯中收了一批学生，教他们读书识字。也许是考虑到以后自己也要做母亲，她对一位带着婴儿的犯人特别留意。她不仅教她识文断字，还教给她如何照料孩子的书本知识。当然，她也从这位年轻母亲那里学到了一些照料孩子的实际本领，这对她后来自己抚养孩子很有帮助。

1943年5月初，监狱当局告诉英·甘地和她的姑母，只要她们表示以后不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就可以马上出狱。这种有条件的释放，当即遭到她们的断然拒绝。几天以后，英·甘地被释放了。不久，她的姑母也获释了。8月，费罗兹也获得了自由。只有尼赫鲁仍在狱中。英·甘地把这八个月的铁

窗生活看作是她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她认为这锻炼了她的性格和人格。

初为人母

出狱后，英·甘地和费罗兹双双回到欢喜宫暂住。本来，他们婚后曾在离费罗兹家不远处租了一幢平房——费罗兹不愿被人误解为他娶英迪拉是为了想得到尼赫鲁的荫庇，分享他家的荣耀和权势。由于英·甘地的祖父母及母亲均已去世，两个姑姑出嫁后离开了阿拉哈巴德，父亲尚在狱中，欢喜宫实际上已经空了，需要有人照料。

这段时间对英迪拉和费罗兹来说，相对比较空闲，他们见欢喜宫的大花园因无人照管而显露出荒芜的迹象，便对它进行精心的整理。费罗兹对此很在行。他给树木花卉喷药杀虫，修剪树枝和灌木。他培育的牡丹花朵大、色泽鲜艳。英·甘地虽然对花卉也很感兴趣，但因体力不济，只是偶尔去花园帮丈夫种花。她对玫瑰和水仙情有独钟。他们的辛勤劳动，使荒芜的花园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那时候，由于国家卷入战争日深，印度人民的生活异常艰难，许多人失业，就连喝过洋墨水的费罗兹也找不到合意的工作，只能兜些保险生意：有时候以他在欧洲旅行时所拍摄的照片为题材写些文章，挣点稿费。但这两方面的收入既微薄又不稳定。

小两口因生活拮据而烦恼，也因父亲出狱遥遥无期而焦虑。唯一使他们感到快乐与安慰的，是1944年8月长子的出世。

作为一个女人，英·甘地的看法也许比较传统。她认为女人生来就应生儿育女，做母亲是个崇高的天职，否则作为一个女人就不称职，就不完整。她直言不讳地说，她结婚就是想生孩子。为此，自打决定嫁给费罗兹时起，她就有意识地学习关于生育和照料孩子的书本知识，后来在狱中又留心观察有孩子的犯人是怎样带孩子的，为将来生儿育女作准备。为了生孩子，她甚至甘冒一定的危险。由于她的身体一向柔弱，有个大夫说过，她要是怀孕就有可能活不了，她还把这个看法写了下来。这样一来，当她真的怀孕后，便遇到了不少麻烦，连她在阿拉哈巴德的私人医生也因为有顾虑而不敢为她看病。为了有人照料，她不得不到孟买她的小姑母克里希娜·胡第兴家去生孩子。

不畏艰险不畏难，英·甘地的个性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如此。医生的劝告丝毫也阻止不了她生孩子的决心。事实上，英·甘地分娩相当顺利，并没有受多少苦，也没有遇到其他麻烦。

他们给孩子取名为拉吉夫·拉特纳·甘地。这个名字糅合了英·甘地三个最亲爱的人即她的双亲和丈夫的名字：“拉吉夫”意为“荷花”，与卡玛拉同义；“拉特纳”意谓“珍宝”，义同贾瓦哈拉尔；而甘地则无疑是费罗兹的姓。

那时候，尼赫鲁仍被囚禁在艾哈迈德纳加尔的古堡里。殖民当局对他这样的“要犯”控制很严，不准他同家人见面，严格检查他所发出或收到的每一封信，对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信不是加以扣留，就是故意延迟传递日期。性格内向的他感到孤寂和郁闷，以致他在写给小妹克里希娜的一封信中曾悲观地表示，如果再隔很久才能获释，不知他们是否依旧相识。就在这时，他

获得了第一个外孙出世的消息。这消息使他感到意外的快乐，给他孤寂而郁闷的心灵带来了莫大的安慰。

也许是心有灵犀，英·甘地很理解父亲在狱中的心情，虽然她本人坐牢时并没有父亲那样的感受。她有两个亲人为伴，而父亲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为此，她决定想方设法让父亲看看孩子。她费了不少周折，打听到一个消息：警方要把她父亲转到另一座监狱去，途中可能要在阿拉哈巴德的奈尼监狱停留一晚。她不知道这消息是否可靠，但仍决定试一试，便与费罗兹一起，抱着小拉吉夫来到奈尼监狱的外面等着。到了深夜，尼赫鲁终于被押来了。英·甘地站在昏暗的路灯下将孩子举起来。能在此时此地见到自己的女儿、女婿和小外孙，年过半百的尼赫鲁真是喜出望外，不禁百感交集，老泪纵横。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盟国取得了胜利。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艾德礼出任首相。比较务实的工党政府急于解决印度的立宪难题，下令释放国大党领导人。于是，尼赫鲁于这年6月获得了自由。英·甘地再也不必为父亲担心了。

1946年12月，英·甘地又生下了次子桑贾伊。这次她倒希望生个女儿，所以他和丈夫事先只想好了一些女孩的名字，桑贾伊之名是临时取的。

从结婚一直到印度独立时，英·甘地的主要精力是用在致力于充当母亲和妻子的角色，不大参加政治活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觉得她自己的童年过得不正常，充满了孤独和不安，她要拿出足够的时间来照顾她的两个孩子。

英·甘地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还颇有一套理论。她认为母亲对孩子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孩子们之需要母亲的抚爱，犹如幼苗之需要阳光雨露一样。对一个母亲来说，她应当经常把孩子放在首位，因为孩子们对母亲有着非常特殊的依赖”；“最好的教育是以身作则”；“真正的爱并不是迁就孩子，让他们随心所欲，而是要随时约束和教育他们”。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英·甘地不赞成那种把孩子托付给他人带的想法，尽管她有条件那样做。她尽可能自己带孩子。不管她多么忙，多么累，多么不舒服，她总要和儿子一块玩一玩，教他们读书。她认为，问题不在于在孩子身上花多少时间，重要的是对花这种时间抱什么样的态度。

英·甘地教育孩子也很讲方式方法。长子拉吉夫本是个活泼、愉快的孩子，但自打他的弟弟桑贾伊出世后，他便开始感到闷闷不乐。一般说来，小孩子都有这种本能的嫉妒心理，害怕新的孩子出世后，会同自己争夺父母之爱；加上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如搬家等，小家伙显得不高兴，脾气很暴躁。英·甘地当时身体也不舒服，人一有毛病也容易生气，但她尽量克制住自己。她考虑到要是责骂他，情况会更糟，会更加激起他的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所以她尽量同他讲道理，告诉他，她还是像过去一样爱他，他不该吵吵闹闹。如果讲道理还不起作用，她便设法转移他的注意力。

有一次，小拉吉夫又无端地发脾气，英·甘地劝他不要这样。儿子说：“我有什么办法？我不想哭可总也忍不住。”母亲建议他去花园看看喷泉。打那以后，每逢她看到他要流泪时，就轻声说“喷泉”，他便走开了。英·甘地知道，孩子毕竟是孩子，花园里有许多东西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会很快忘掉一切烦恼。

孩子长大后，英·甘地送他们到寄宿学校上学。孩子们不在身边，她也

有时间做其他的事，或者到全国各地去旅行，只有在假日才同他们在一起。她像父亲当年那样，不断地给儿子们写信，至少每星期写一封，对他们进行教育，让他们知道母亲一直在惦念着他们。

英·甘地深知，抚养孩子，不仅要把他们养大成人，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坚强的意志和勇敢精神，以便将来能够从容不迫地适应社会和生活的要求。因为生活中既有快乐也有忧伤，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而这些是从书本中学不到的，必须由父母亲来着意进行灌输和培养。

英·甘地在这方面的教育是成功的。拉吉夫还不到12岁时，因病得动一次手术。医生怕孩子恐慌，本想对他说手术并不痛苦；但英·甘地认为，孩子已经懂事了，这样做反而不好，便实话实说，告诉拉吉夫手术后有几天会疼痛，而这疼痛又必须由他自己忍受，其他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他。作为一个母亲，她真希望能代替孩子忍受痛苦，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英·甘地正是明白这一点，才教育孩子一定要学会自己忍受痛苦。结果，在整个手术的过程中，拉吉夫一下也没有哭，也没有叫喊，硬是挺了过来。医生说，这在成人中都是少见的。

英·甘地还注意着力培养孩子们的独立人格和自立意识。她注意到有许多人都把孩子看作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希望他们秉承己志或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长，但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这实际上是给孩子套上了无形的枷锁，捆住了孩子想象的翅膀，会泯灭他们的个性，压抑他们的生活热情，甚至是扼杀他们的创造力。她对著名诗人、哲学家卡利尔·吉布兰的一首诗颇为欣赏。诗的内容是这样的：

孩子们自有孩子们的头脑，
能百般爱护他们哟，
却无法让他们跟着父母跑。
孩子们的心啊正在飞往未来世界，
锁得住他们的身呀，锁不住他们的心。
未来世界呀无法找寻，就连梦中也无法找寻。

因此，英·甘地认为，真正懂得爱孩子的父母，就会尊重孩子的个性和爱好，赋予他们以勇气和自信，培养他们的独立人格和创造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只能作一个旁观者，听凭孩子自行其是，不予劝阻，不加指导。对孩子进行必要的指导是父母的责任，但父母应力戒以自己的个性去影响孩子或者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们。

英·甘地真是一位称职的好母亲！

独立的代价

英国与美、法联手，终于战胜了德、意法西斯，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但它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它的实力遭到了极大的削弱，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辉煌不再，要想保持其庞大的殖民地已力不从心。新上台的工党政府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还算识时务，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印度这颗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而且决定一经作出，其行动速度之快甚至连几十年来一直在争取祖国独立、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的尼赫鲁等印度民族领袖们也感到吃惊，因为在此以前英国佬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这么爽快过。

1947年8月14日的夜晚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徐徐的微风给酷热的夏夜带来了一丝凉意，随风飘来的阵阵浓郁的茉莉花香和仙人掌的芳香给腥咸的空气带来了一抹沁人心脾的清新。千百万印度人怀着激动的心情，仰望茫茫星空，在等待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

此时此刻，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那日后成为印度议会大厦的大圆顶大厅里，正在进行一场严肃的权力移交仪式。印度临时政府领导人尼赫鲁从最后一位英印殖民总督蒙巴顿勋爵的手中郑重地接过了象征权力的权杖和英王乔治六世的贺信。

15日凌晨，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尼赫鲁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多年以前，我们对印度的命运立下了誓言，现在该是我们履行誓言的时候了。……在午夜钟鸣之时，当整个世界还在沉睡的时候，印度醒来了，它获得了新生和自由。”德里红堡的上空升起了第一面国大党三色旗，这标志着印度从此摆脱了英国长达190年的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和新生。英·甘地有幸观看了整个权力交接仪式。她兴奋地说：“这是我生命中最骄傲、最激动的时刻。”

然而，这独立是来之不易的，它是印度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用鲜血乃至生命换来的。

自从1757年普拉西战役印度开始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以来，印度人民就没有停止过斗争，但一直到国大党成立以前，这些斗争都是旧式的斗争，斗争的形式是武装起义和暴动，斗争的参加者主要是农民和手工业者，领导者是封建主。这些斗争最终都遭到了失败，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是旧印度的最高辉煌，为旧式斗争划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

1885年国大党的成立，标志着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上了一个新台阶。尽管国大党本身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严重缺陷，但它毕竟是一个先进阶级——资产阶级的代表。它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系统，有具体的斗争目标。从那时起，从达达拜·瑙罗吉到提拉克，从圣雄甘地到尼赫鲁，一代又一代先进的国大党人为了找到一条适合印度国情的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从1919年杰利安瓦拉-培的枪声，到1942年的“八月暴动”，无数印度人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终于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由。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尼赫鲁家族——印度人民为之骄傲的家族——经历了比常人更多的磨难和痛苦。从莫蒂拉尔到英·甘地，这个家族祖孙三代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在殖民当局的铁窗里呆过，其中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人从1921年12月至1945年6月就先后九次入狱，累计坐牢时间达近十年之久。

这独立的代价是惨重的，它是在印度丧失了五分之一的土地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前提下取得的。

在印度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度，宗教教派冲突自古以来便是印度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征之一。在众多的教派冲突中，最突出的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这种冲突由来已久，原因复杂。两派在教义、教规和生活习俗上都相距甚远。印度教以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为其宗教和社会的基础；而伊斯兰教则宣称人类平等。伊斯兰教接纳皈依的印度教贱民，使得印度教的高级种姓把穆斯林也连带看作不可接触者。印度教信仰多神，崇拜偶像，崇尚音乐和舞蹈；而伊斯兰教信仰唯一的真主，不拜偶像，清真寺朴实无华。印度教实行严格的内婚制；伊斯兰教基本上也是实行内婚，但不如前者严格。

自从 13 世纪初入侵北印度的穆斯林建立德里苏丹王朝后，这两大教派的矛盾和冲突便开始了。随着穆斯林势力在印度的不断扩张，这种矛盾和冲突逐渐加剧，并因与阶级压迫相交织——占人口少数的穆斯林为统治者，广大印度教徒沦为被统治者——而更形复杂。从 15 世纪起，两大教派中都有不少人进行宗教改革，试图调和彼此的矛盾，弥合因矛盾冲突而造成的裂痕，但是都没有成功，就连雄才大略的莫卧儿帝国的一代明君阿克巴大帝依靠其至高无上的皇权强制推行的以“普遍宽容”为宗旨的宗教改革，在他去世后也归于流产。可见这种矛盾实在太深，难以调和。

当英国殖民者的枪炮声响彻整个印度之时，几乎就在一夜之间，穆斯林在印度的特权地位成为流水落花，一去不返。在新的统治者面前，昔日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一起沦为了被统治者。

按理说，相同的处境和所要面对的共同敌人，应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比较容易地走到一起。遗憾的是，他们彼此都存在的教派利益至上的观念妨碍了他们的联合：更糟糕的是，这种教派利益至上观念被狡猾的英国殖民者利用了。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挑拨离间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关系，终于从这里找到了突破口。“分而治之”是英国殖民者的惯用伎俩，也是他们统治印度的根本方针。

英国殖民者离间两大教派的关系最明显的举动，就是一手策划了 1905 年分割孟加拉的阴谋和全力支持旨在与印度国大党相抗衡的、带有教派政治组织性质的穆斯林联盟的成立。殖民者的挑拨使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分歧无可挽回地发展下去了。

穆斯林联盟成立之初，就同国大党唱开了对台戏。它支持分割孟加拉，反对抵制英货，在立法会议选举中把穆斯林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单独选举，阻止穆斯林参加国大党，号召保持对英国殖民者的忠顺。

从 1913 年起，穆斯林联盟开始发生一些转变。它的奋斗目标已由为穆斯林争取更多的席位改为通过宪法手段争取实现印度的自治，这就与国大党相接近。1916 年，两大政党达成协议，实现了暂时的合作。但由于双方教派主义倾向仍然存在，它们的根本矛盾仍未得到解决。随着国大党力量的发展，特别是 1937 年至 1939 年它在七个省掌权，穆斯林及其政党穆斯林联盟又开始感到疑惧和不安，而国大党内某些领袖所具有的印度教气质和国大党政策中某些大教派主义表现，更助长了他们的疑惧心理，使教派问题更趋严重化，致使他们当中产生了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巴基斯坦运动。

1940 年 3 月，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召开年会。真纳面对 10 万听众，首次公开提出要求按民族和教派把印度分成几个自治国家。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巴基斯坦的决议。从此，建立巴基斯坦成为穆斯林联盟的主要斗争目标，也是日后穆盟与国大党争执的最大症结所在。穆盟的这种要求为英国殖民者一再推迟结束在印度统治的时间提供了口实，致使国大党提出的任何关于独立的建议几乎无一不在这个问题上搁浅。英国统治者总是说，国内的其他政治势力会反对的，这个其他政治势力主要是指穆斯林联盟。

1946 年 8 月 16 日是穆斯林联盟孟买会议上确定的为穆斯林争取建立巴基斯坦国的“直接行动日”，印度许多大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印回两教教派的流血冲突。加尔各答市在 3 天的残杀劫掠中，至少有 5000 人丧生，2 万人受伤，10 万人无家可归。大屠杀很快从加尔各答蔓延到达卡，从东孟加拉蔓延到比哈尔、孟买、艾哈迈达巴德和拉合尔。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仇杀已发

展到无法遏止和丧失理性的地步，并且以内战的规模在迅速扩大。到 1947 年 3 月，印度已成为“一艘舱中满载弹药而在大洋中着火的船”。

印度局势的急剧恶化，使英国政府急于脱身，便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东南亚盟军总司令的蒙巴顿将军出任印度新总督。这位将军快刀斩乱麻，很快便于 6 月初提出了以印巴分治为主要内容的蒙巴顿方案。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国大党被迫接受了甘地所说的“活体解剖”，承认巴基斯坦国。因此，印度的独立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不幸的是，印度还将继续付出代价。

救助难民

早在分治前即已开始的教派骚乱和仇杀因分治而加剧。在印度一方，大批穆斯林被杀害，财产遭抢劫；在巴基斯坦一方，大批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遭屠杀。两国仇杀少数教派的怒潮遥相呼应，达到了不可遏止的程度，甚至连政府官员、警察和军队都卷了进去。一个又一个村庄被焚毁，大量无辜的居民遭杀戮；仇杀波及城镇，使得城镇一片恐怖，到处是纵火、抢劫和虐杀，整个市区被夷为平地，某些昔日繁华的闹市变成了死亡和坟墓的世界。据估计，直接死于仇杀者超过 10 万人，加上疾病、饥饿及水旱灾害造成的死亡，总数逾 50 万。一位西方目击者曾这样描述教派仇杀所造成的恶果：“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可能完全估计到分治给几百万无辜人民——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所带来的空前灾难。旁遮普、西北边省和信德省经历了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阿姆利则和德腊-伊斯梅尔汗的整个市区都被彻底夷平，……拉合尔变成了死城。”

教派仇杀引发了巨大的难民潮。死亡的威胁迫使大量居民外逃。据估计，整个动乱期间从印度逃往巴基斯坦的难民为 650 万人；从巴基斯坦逃到印度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则达 500 多万。

为了控制局势，新成立的印度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成立紧急委员会，制止教派仇杀和难民流徙，设立难民营，做好难民的救济和安置工作。

英·甘地也勇敢地投入了制止教派仇杀和安置难民的工作中去。

1947 年 9 月，教派仇杀和骚乱波及德里的时候，英·甘地正带着孩子住在穆索里。她经常乘小汽车往返于德里和穆索里之间。后来德里局势危急，家人通知她不能回德里。她回答说：“正因为局势危急我才更应该回去，而不应该呆在这儿。”当晚，她就带了两麻袋土豆连夜赶回德里。火车在离终点站不远的地方临时停车，这时英·甘地通过车窗发现有一群人正在追捕一些人，便下车设法解救了一个人。回到德里后，她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与约翰·马泰伊夫人一道在难民营工作。

有一天，她们从难民营回家，路上遇到 200 多个人正在追赶一个人，便叫司机停车。司机是个穆斯林，不敢停车。她说：“你必须停车，否则我就跳下去。”司机还是没有停，但放慢了车速。英·甘地跳下了车，向人群跑过去，拽住他们正在追赶的那个人，把他拉到自己身后。那些追赶者问：“你想干什么？”

“我要救这个人的命，你们要杀就先杀我吧。”英·甘地从容不迫地答道。

那些人并不知道她是尼赫鲁的女儿，就说：“你认为我们不敢杀死你

吗？”

英·甘地说：“当然谁都能杀死我，但是你们不会这么做，你们也没有这个胆量。”

就这样，英·甘地以她的勇敢和镇定，救了这个人，并把他送到医院抢救，救活了这个头部负了重伤的人。

这件事英·甘地没有告诉任何人，但不知怎么搞的圣雄甘地知道了。他感到很满意，随即又派她到穆斯林难民区去工作。

到了穆斯林难民区，英·甘地发现穆斯林的境况的确很糟糕。他们没有食物，不敢外出。到处脏乱不堪，霍乱流行。在那里，英·甘地和其他人一起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清扫脏物，派人给穆斯林难民运送粮食，让医生为生病的难民治病等，还拯救了一些可能被杀死者的生命。她尽其所能地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做一些调解工作，举行过有两个教派一起参加的座谈会，其中最后一次座谈会的规模还较大，与会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约 500 人。

对于英·甘地所做的这一切，圣雄甘地非常满意；英·甘地也经常向他汇报工作。

1948 年 1 月 30 日，圣雄甘地在他的德里住所比尔拉宅准备出席晚祷会时，被一名名叫戈德塞的大印度教主义狂热分子枪杀了。噩耗传来，全印度立即沉浸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之中。英·甘地感到极为震惊。就在甘地遇刺的前一天，她还同他见过面。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会见竟成永诀。甘地之死给尼赫鲁父女造成的悲痛简直是无法形容的。甘地是尼赫鲁政治上的引路人、导师；在莫蒂拉尔去世后，他在很大程度上又扮演了他父亲的角色。尼赫鲁在广播讲话中说：“我生命中的光明从此消失了，到处是一片黑暗。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英·甘地在她的《自述》中，对甘地之死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和哀悼，同时也对一代伟人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圣雄甘地的去世，不仅对国家是个沉重的打击，对我个人也是极大的悲哀。他对我们的家庭和对印度的影响太大了。我简直无法想象印度怎么能没有他。全国人民和国大党似乎都是围绕着他这个中心前进的。就是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召开会议时，人们只要知道他在国内某地，还能够接触到他，就会感到莫大的安慰。我也明白圣雄甘地的去世对我父亲意味着什么，在他的生命中这是何等无法弥补的损失。

对甘地了解的深浅，是每个人衡量本身的变化和成熟的尺度。他活着的时候，我的许多同龄人都觉得很难了解他。我们当中有些人认为他有一股狂热劲，并对这股劲头很不耐烦，而且觉得他的某些概念模糊不清。我们当然承认他是位圣雄，但对他使政治带有神秘色彩这个问题，同他作过争论。不仅我们这一代人如此，我父亲在自传里也描述了他和他的同代人在把甘地思想纳入自己的思想时感到何等困难。在经历了民族运动的盛衰之后，我父亲方能够逐渐地理解甘地，而且能够把甘地思想的基本要点融合到自己思想中去。他把甘地叫做“魔术师”，还致力于用当代的语言阐述甘地的思想，使它更易为人们所理解，扩大它在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中的影响。

.....

对我来说，圣雄甘地是永生的。他体现着人类最高的道德水平。他生活在现代，但是他吸收了人类过去最美好的一切，而且着眼于未来。他的崇高思想是永不泯灭的。他的许多言论和著作都是为了解决最紧迫的问题，有些则供个人修养之用。他的才智并非源自理性知识，他是通过自己一生的实践

来形成自己的思想的。

五、尼赫鲁的得力助手

总理府的女管家

1946年9月，尼赫鲁当选为临时政府首脑。印度独立后，他又当选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国家初建，百废待兴，许多事情都需要他亲自过问、操心。此时的尼赫鲁，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忙碌，也比任何时候都感到孤独，他是多么需要有个亲人来帮帮他啊！他的大妹维贾雅拉克希米自然帮不了他，因为她已被调到联合国工作和担任大使职务。他的小妹克里希娜与丈夫住在孟买，孟买与德里相距太远，她来一趟不容易，显然要她帮忙也不现实。唯一能帮他的只有女儿英·甘地了，她所住的勒克瑙离德里很近，乘车只需一夜即可到达。

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一般都重视办报，以报刊为阵地宣扬民族主义观点，为独立自由运动摇旗呐喊。尼赫鲁家族也不例外。莫蒂拉尔生前曾在阿拉哈巴德办了一份报纸，名为《独立报》。1938年，尼赫鲁又以勒克瑙为基地创办了《国民先驱报》。1942年，该报为响应圣雄甘地发起的“撤出印度”运动而一度停刊，1946年11月复刊。尼赫鲁因忙于政务，再也无暇顾及报业，便聘请女婿费罗兹·甘地出任经理，经管该报业务。于是，身怀六甲、大腹便便的英·甘地随夫移居勒克瑙。

头脑灵活、善于随机应变的费罗兹的确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完全能够胜任岳父交给他的工作。他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报业在他的经营下蒸蒸日上。自己的事业终于走上了正轨，大儿子活泼可爱，小儿子也即将出世，他的生活终于从动荡转入了安定。现在，费罗兹只想拥着娇妻爱子，过安定美满的小家庭生活。

此时此刻，无论是尼赫鲁还是费罗兹，无疑都特别需要英·甘地。这使她感到左右为难：是搬到德里去陪伴和帮助父亲，继续参与政事呢，还是留在勒克瑙，作一名家庭主妇，侍候好丈夫和孩子呢？英·甘地面临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抉择，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的确，要作出这样的抉择并不容易。英·甘地虽然受过西方教育，但传统文化对她的影响也很大。印度教传统总是力图把妇女塑造成贤妻良母的形象。家庭观念很强的英·甘地并不反对做一个贤妻良母，相反，她乐于尽一个家庭主妇的传统职责，料理家务，相夫教子。她的丈夫是那么能干，又那么爱自己；儿子又是那么漂亮聪明；他们在勒克瑙的住宅虽不及欢喜宫或尼赫鲁在德里的新官邸那样富丽堂皇，倒也舒适，充满温馨。他们的小家庭也实在太诱人了。

但是，对英·甘地来说，断然抛弃政治，做一个彻底的家庭主妇却又心有不甘。她的家族本来就有参与政治的传统。受家庭熏陶，她本人从小就对参与政治感兴趣，以致她玩玩具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长大成人后，随着她受到的西方教育越来越多，这种兴趣也益发浓厚。再说，父亲现在身居要职，每天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照料怎么行呢？何况，父亲是在为国家和民族做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帮他不啻是为国家分忧，为民族解难。因此，无论是为国家计，为父亲计，还是为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计，都应当到德里去，到父亲的身边去。

一时作不了决断的英·甘地只好在德里和勒克瑙之间来回奔波。女儿的

到来当然使尼赫鲁喜不自胜。费罗兹起初也并不反对妻子为岳父分忧，他自己对参与政治也很热心，也就不好干涉妻子了。因此，在最初的两年里，各方皆大欢喜，彼此相安无事，只是苦了英·甘地。她不得不在两个城市间穿梭般往返，往往是在勒克瑙住半个月，在德里住上半个月。尽管常常感到身心疲惫，但只要父亲和丈夫、孩子都满意，她也毫无怨言。

俗话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尼赫鲁的工作越来越忙，也益发离不开女儿，以致英·甘地常常在回到勒克瑙与丈夫和孩子团聚不久，就会收到父亲的加急电报：“有重要贵宾到，速回！”看样子，两方面都想兼顾已不可能，英·甘地最终不得不作出一边倒的选择，尽管这选择是痛苦的。到1948年底，她带着两个儿子搬到了德里，以那里为主要的家。

这样一来，费罗兹不高兴了。他真后悔当初同意妻子的主张，但为时已晚。此事开始为他们的夫妻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将主要精力用于帮父亲的忙、为他分忧的抉择一旦作出，英·甘地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新的工作中去。她决心尽量把每件事办好，当一名总理府称职的女管家。

英·甘地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帮父亲搬家。

即使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搬家也绝非易事。西方有谚云：搬家三次如同失火一次。总理府搬家就更不容易了。尼赫鲁的原住所是位于约克路17号的一栋两层小楼（后被命名为莫蒂拉尔·尼赫鲁宫）。当了总理后，这座小楼不宜再住下去了。尼赫鲁接受了当时尚在任的印度总督蒙巴顿勋爵的建议，决定将总理府迁至昔日驻印英军总司令的官邸去。

新总理府名叫“蒂恩·穆蒂”，由于大门前竖有象征印度三军的铜像，故又叫三像府。它同北面原为英国驻印的总督府的总统府正好在一条直线上，出门就可看到雄伟壮观的总统府。这是一座巨大的房子。由于久无人住，它显得既脏又凌乱，仅积起的尘土就有几寸厚，到处是蛛网、纸屑。看来，搬迁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打扫和装修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无疑，这对年轻的英·甘地来说，既是个不大不小的考验，也是她施展才干的一个机会。

事实证明，英·甘地的确有运筹帷幄的才能。她先是让人拿掉了挂满四壁的历届英军将领那身着军服佩有耀眼勋章的真人般大小的画像，把它们都送到国防部去，然后让人把房子打扫得一尘不染，装饰得典雅、华贵而舒适。

为了给总理府增添一些欢乐祥和的气氛，英·甘地还养了一些可爱的动物，其中有尼赫鲁最喜爱的丹麦种大狗，还有一对来自锡金的熊猫、三只小老虎（其中有一只后来被来访的南斯拉夫铁托总统看中，带回了贝尔格莱德）以及不计其数的、五颜六色的鸟。看管这些动物，也是英·甘地日常事务的一部分。

英·甘地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帮父亲接待来宾。这些来宾既有外宾，也有本国人。作为政府总理，尼赫鲁几乎每天都要接待来访的外宾。按照印度的礼节，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等贵宾来访，通常头两三天住在富丽堂皇的总统府，以后就移住总理府。总理府还对印度普通平民乃至地位最低下的贱民开放。每天早晨都有几百人来要求见见总理，也有人是有难处来找总理帮助解决的。

接待来宾并非易事，必须十分注意礼节。英·甘地说：“这正像踩钢丝

一样，既要尽可能保持正规的礼节，以免冒犯那些最爱挑剔的贵宾，又不能破坏人情味，要使得这种场合既轻松愉快，又颇有家庭风味。”

各国都有各国的风俗习惯。就是在印度本国，由于人们的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也有很大的差异。就拿吃饭来说吧，此事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印度教徒忌食牛肉，穆斯林忌食猪肉。除此以外，有些习俗已经交叉。如有的人吃荤，有的人吃素；有的人并非绝对地吃荤或吃素，有些吃荤的人在一周的某几天又吃素；而吃素的人中，有的吃鸡蛋，有的吃鱼，有的除不吃鸡以外什么都吃。真可谓情况各异，禁忌繁多，一人难调百人口。英·甘地硬是拿出“走钢丝”的过硬本领，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尽量做到让每一位来宾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当然，在这方面英·甘地也有过教训。总理府常在下午6时或7时宴请客人。英·甘地发现在这种场合客人们吃得不多，就以为每次都是如此。后来有一次总理府又宴请一批客人，人数同过去差不多。宴会本打算在室外举行，不料客人们刚到，突然雷雨交加，不得不临时改在室内举行，可室内很闷热，有两个客人当场晕倒了；而且更糟的是，客人尚未完全到齐，先到的那些客人就把食品吃光了，弄得她很尴尬，只好临时供应面菜卷和干果、坚果等应付局面。打那以后，再举行宴会，英·甘地就十分注意多准备一些食品，并作好在室内或室外举行的两手准备。她甚至还专门预备了记录本，将所有来宾的饮食爱好记录下来并汇编成册，以便日后查考以及为宴会作准备时参考。

经过数年的锻炼，英·甘地不仅已成为总理府称职的女管家，而且成了尼赫鲁的心腹和顾问。事实上，能够长时间地在尼赫鲁的身边工作，这本身便是一个极好的进身之阶。英·甘地“无冕之王”的位置是多少人梦寐以求想得到却无法得到的。

英·甘地开始直接参加一些政治活动。每逢外国领导人来访，就广泛的国际问题同尼赫鲁交换意见时，她总在场；每逢国大党领导人、政府官员或在野党党魁等政界要人同尼赫鲁讨论国家大事时，她也都在座。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她既帮助了尼赫鲁，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政治经验。由于尼赫鲁公务繁忙（他每天工作达16个小时左右），脾气又不好，渐渐地，有些官员害怕直接找他谈问题，便通过英·甘地转达；尼赫鲁本人也对他的同僚和下属说过，有事可以和他女儿谈。于是，英·甘地更是成了沟通尼赫鲁与他的僚属们的桥梁。

就像小时候不怕祖父莫蒂拉尔的脾气一样，成年后的英·甘地也不怕她父亲的脾气。不管他发多大的脾气，她总有办法让他冷静下来。有时候她还当着他人的面责备他不该发脾气。由此可见英·甘地对尼赫鲁的影响力。

1955年，尼赫鲁出席万隆会议，希望亚非国家接受印中两国总理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亚非团结，相互信任，支持中国参加万隆会议，但会上有的人却说这是“共产主义集团的新帝国主义”的建议，骂尼赫鲁的不结盟的政策是“不道德的”。尼赫鲁气得脸色发青，几乎跺着脚走出了会议大厅。英·甘地就严厉责备父亲不该冲动。

又有一次，美国舞蹈家马撒·格雷厄姆率领一个现代舞剧团到印度演出，尼赫鲁应邀前往观看。可他对现代舞并不感兴趣，在座位上烦躁不安。由于他坐在前排，这样有失礼貌，英·甘地就小声责备他，使他安静下来。演出结束时，英·甘地同尼赫鲁的女友蒙巴顿夫人一起，把他硬从座位上推出，

让他把一束玫瑰花献给格雷厄姆小姐。

陪父出访

英·甘地不仅仅是作为总理府的女主人帮助尼赫鲁接待来宾，还时常陪同他出国访问。他们访问过美国、苏联、中国和法国，参加过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各国领导人会议，出席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礼，会见过杜鲁门、丘吉尔、赫鲁晓夫、铁托、纳赛尔、苏加诺等世界著名政治家。所到之处，她都受到了第一夫人般的礼遇。

1948年，英·甘地随父对英国进行印度独立后的第一次访问。此时印度仍是英联邦内的一个自治领。尼赫鲁访英主要是去参加英联邦总理会议。英国对英·甘地来说，并无新奇之处。不过是给她提供了见见旧师故友的机会罢了。后来印度不满足于仅仅取得的自治领地位，要求获得不仅是实质上而且是形式上的独立，建立一个有民选总统的独立自主的共和国，但在是否继续留在英联邦内的问题上，印度各党各派、朝野上下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完全脱离英联邦；有的则认为留在英联邦内也未尝不可。英国不仅希望这颗昔日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留在英联邦内，还希望它继续归顺英王。尼赫鲁经过与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谈判，最终商定了一个折衷方案：印度成为共和国后，仍留在英联邦内，但不再归顺英王。

一个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了赢得独立和自由进行过无数次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斗争的民族竟然想同过去的统治者保持一定的关系，这使英国人士感到意外。战时曾坚决反对并极力阻挠印度独立的前首相丘吉尔显然也对此表示怀疑。1953年，英·甘地随父去英国伦敦参加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礼。在一次宴会上，英·甘地不无惊奇地发现丘吉尔（此时他已再度执政）就坐在她身旁。突然，丘吉尔问她：“不久前，我们还互相仇恨，如今竟像朋友一样交谈，这不奇怪吧？”英·甘地大度而不失礼貌地答道：“温斯顿爵士，我们并没有恨你。”可这位首相的话却不那么大度：“但我是恨你们的，我是恨你们的。”他大概对失去印度这个最大的殖民地仍心有不甘，耿耿于怀。

1949年，英·甘地随父访问美国。这是她第一次到这个世界上发达的国家访问。但这次访问给她留下的记忆却并不美好。她见识了这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雄厚、物产之丰饶和美国式的奢华铺张，也领教了美国人的自大和无知。美国人认为尼赫鲁身为一个穷国的总理，一定会经受不住美国巨大的物质财富的诱惑，会对他们提供的经济援助感恩戴德。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便在尼赫鲁父女面前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甚至以恩人自居。他们不止一次不加掩饰地以教训的口吻对这位多少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印度总理说，印度只有一心一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能兴旺发达。本来一向就以孤傲著称的尼赫鲁对此极为愤慨，他以同样的傲慢回敬了既浅薄无知又粗鲁无礼的山姆大叔。

英·甘地不仅访问了前宗主国和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访问了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与出访美国时相反，她访问这两个国家时心情却很舒畅。

英·甘地访苏是在1953年参加英国女王的加冕典礼后，是独自一个人去的。随着多次随父出访，此时的她在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能够独自担当出

访大任。此时，斯大林刚刚逝世，苏联对印度的看法（认为印度 1947 年获得的独立和自由是虚假的，不过是把政权从英国殖民者手中转移到了一批急于代表英国主子统治国家的印度人手中罢了）已经发生改变，对印度客人的欢迎已经表明了东道主的态度。英·甘地在当时的印度驻苏大使梅农夫妇的陪同下，访问了苏联的许多地方。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的绮丽风光令她陶醉，马策斯塔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即已闻名的硫磺浴更使她身心爽快。所到之处，她美丽的外貌和光彩照人的莎丽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连她的名字也令俄国人迷恋，以至若干年后一位苏联驻印大使告诉她，生于她当年访问过的那些地方的小女孩有许多都取名“英迪拉”。

1955 年 6 月，英·甘地再次访问苏联，这次是与父亲一起去的。他们受到了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后来，苏联领导人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回访印度。英·甘地作为接待委员会主席，负责了接待工作。

1954 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访问印度，受到印度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尼赫鲁父女的友好接待。周恩来这次访印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与尼赫鲁一起制定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人称“潘查希拉”）。这五项原则后来成为国际公认的处理国际事务和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同年 10 月，尼赫鲁父女回访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分别接见了尼赫鲁父女，并与之亲切会谈。对新中国的访问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英·甘地还记得当时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的情景，她在《自述》中说：“毛没有来过印度。我后来听说，他曾等待我们向他发出邀请。要是我们邀请了他访问印度，许多事情也许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我们当时知道他有这一想法，他就会是这个国家最受欢迎和尊敬的客人。”英·甘地为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和卓越的外交才能所倾倒：“我喜欢周恩来。他见多识广。……他对外交事务尤为老练和成熟。他观察事物总比别人要胜一筹。”

有意思的是，在 40 年代初，英迪拉还曾接待过蒋介石夫妇。她在《自述》中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蒋介石政权失败的原因：“他们富有，属于上层阶级，不像我父母那样密切联系群众和穷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他们的统治怎能持久呢？”

在英·甘地陪父访问的国家中，看来她对印度尼西亚及其领导人苏加诺颇具好感。这也许是因为这个国家与她的祖国具有相似的历史命运，还因为苏加诺与她的父亲尼赫鲁具有较多的共同点：他们都具有对祖国的献身精神；具有同样的理想，即不仅为独立自由，为建立一个国民政府而奋斗，而且要使每个人的生活有所改善；他们都喜欢发表长篇演说。英·甘地说，“苏加诺是最具吸引力的人物之一”，“我们喜欢苏加诺”。

英·甘地通过陪同父亲频频出访，直接参与外事活动，亲眼目睹了父亲与外国高级领导人打交道的全过程，从而在无形之中培养了自己的外交能力。这为她以后独立地从事外交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已经具有了一定经验的英·甘地在外交场合实际上已成了尼赫鲁的得力助手，有时候她适时的恰到好处的插话起了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如 1955 年 6 月尼赫鲁父女的那次访苏时的情况就是如此。尼赫鲁出访的目的，是要求苏联对印度的重工业和基础工业提供西方所不愿提供的经济技术援助。但尼赫鲁生性高傲，羞于开口求援，而务实的英·甘地则在父亲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

会谈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结果两国很快达成了协议。

帮父拉选票

印度独立之初，英·甘地尚未正式进入政界。当时正值分治动乱期间，她一方面设法保护受印度教徒追杀的穆斯林，另一方面协助父亲做从巴基斯坦逃回的印度教和锡克教难民的安置工作，尽可能帮他们排忧解难。

难民中有个名叫萨蒂亚的 20 岁左右的妇女。她的父亲是个铁路扳道工，死于教派仇杀：她自己在童年时被火车压断了双腿，只能用双手撑着地走路，天长日久，她的身体变成了畸形，惨不忍睹。她几乎丧失了生活的勇气。英·甘地决定帮助她。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她安上假肢。但这件事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办。当时全印度唯一能造假肢的工厂只有一家，即远在浦那的假肢中心，而且是专为军队服务的。英·甘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几个月时间才说服国防部长巴尔德夫·辛格同意开一个先例，允许该厂为萨蒂亚配一双假腿。萨蒂亚配上了假腿，并以顽强的毅力学会了使用假腿的方法，人也变得自信了。她告诉英·甘地，说她找到了如意郎君并已订婚。她本人的那个高兴劲儿自不必说，英·甘地也为她高兴。由于有了萨蒂亚这个先例，英·甘地又乘机向厂方做工作，厂方终于答应长期向平民开放。英·甘地对普通百姓的爱心，由此可见一斑。

因分治造成的动乱结束以后，英·甘地主要从事妇女儿童福利和权益保障工作。她曾担任过印度儿童福利会主席、国际儿童福利协会副主席和社会福利会的会员。她还在德里发起成立了儿童合作组织，即后来的儿童宫。

1951 年，英·甘地开始陪父亲到全国各地进行竞选活动。在喜马偕尔邦，人们要求她作该邦 1952 年大选的候选人。英·甘地没有答应这个要求，但同意推荐另一名妇女为候选人。其实早在圣雄甘地在世时，国大党的北方邦领袖戈文德·瓦拉布·潘特就曾建议英·甘地参与北方邦的政治活动，竞选邦议员。由于孩子尚小，需要照料，英·甘地没有接受这一建议。

在一次竞选活动中。尼赫鲁收到昌巴地区的选民来信，希望他到昌巴去。他接受了这一邀请，但不久发现自己根本去不了昌巴。那里距离偏远，在预计的时间里无法到达，延期到又不行，因为他的竞选日程已经排满，若在昌巴拖长了时间，势必影响到后面的竞选安排；但接受了邀请，不去又不行，那将会失信于民。一向为父分忧的英·甘地经过考虑，向父亲建议由她代他跑一趟，向选民们解释尼赫鲁不能亲自前往的原因，并代表他向他们致意。英·甘地此行非常成功。她这次单独参加竞选活动纯属偶然。尼赫鲁从中看出了女儿的政治才能，以后凡是他自己因种种原因去不了的地方，就都由她代他前往。

除了帮助父亲竞选外，英·甘地还帮助丈夫费罗兹进行竞选活动。费罗兹的选区赖巴雷利位于阿拉哈巴德和勒克瑙之间，范围很大，他一个人跑不过来，便常常在选区图上划一道杠，对妻子说：“这一半归你，那一半归我。”

然而，直到此时，英·甘地还说不上已经独立地步入了政界，因为她无论是陪父竞选，还是代表父亲或帮助丈夫参加竞选，都是为他们拉选票，终究不是她自己为自己而进行的参政活动。如果把这些活动也叫做她的政治活动的话，充其量也只能说是间接参政，是她日后独立从事政治活动的预演。

六、两个转折点

初入政坛

有位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漫长，但紧要处就那么几步。英·甘地紧要的几步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迈出的。

英·甘地第一次在印度政治舞台上公开亮相是在1955年，那年她进入了国大党的工作委员会。

工作委员会是国大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共有21名成员，其中14名通常是由党主席提名，另外7名由党的全国委员会选出。1955年，接替尼赫鲁担任国大党主席的U.N.德巴邀请英·甘地进入该机构。U.N.德巴此举的目的有二：一来是感激尼赫鲁对自己的栽培。很显然，没有尼赫鲁的提携，他是当不上国大党主席的；二来是以此讨好英·甘地，以便通过她这个桥梁加强与尼赫鲁的联系。英·甘地当然清楚U.N.德巴的用意，故她在接受邀请后，表示要经过选举而不是主席的提名进入工作委员会。她自己也希望如此，以免授人以柄，说她并不是凭自己的本领而是靠父亲的荫庇进入工作委员会的。选举结果，她以得票第一而如愿以偿。进入工作委员会，表明英·甘地已在通往权力之巅的漫漫长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尽管这一步并不大。

进入工作委员会后，英·甘地分管妇女工作。她主持组建了国大党的妇女部。在此以前党内还没有单独的妇女部。这段时间，她把主要精力都用于妇女工作。这工作虽然不能说不重要，但在印度那样的男权国度里，也不可能引人注目。因此，她的工作并没有引起新闻界和公众的多少注意。尽管如此，英·甘地还是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无论做什么事，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这是英·甘地的信条。她也不急于表现自己。当工作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不放过任何机会竭力同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套近乎的时候，她却宁愿站在一边。

然而，印度政坛上的一颗新星毕竟已经冉冉升起；而且，它一旦升起，便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直上云天。当然，这颗新星的上升不可能说一点儿也没有借助太阳的力量和光辉，但它主要靠的是自己的加速度。

1956年，英·甘地在她家乡阿拉哈巴德市当选为国大党市委主席。在此期间，她初展才华，暂时平息了阿拉哈巴德市党委内的争执。当然，她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派系斗争。不仅是她，换了别人，哪怕是她的父亲尼赫鲁，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派系斗争本来就是政党政治的痼疾。

1957年，英·甘地经U.N.德巴提名，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国大党中央选举委员会（该委员会权力很大，相当于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就在这一年，印度举行第二届全国大选。英·甘地第一次独自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竞选活动。

此时，英·甘地的声望与日俱增，以致只有她能够影响尼赫鲁了。

尼赫鲁的地位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稳固的，在印度独立之初的三四年中，他一直受到一位国大党元老，即年长他14岁，身为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和邦务部长的帕特尔的牵制。他们分别是国大党内民主势力与保守势力的代表。他们势均力敌、旗鼓相当，以致人们把这个时期称作是“双头政治”时期。帕特尔虽身为副总理，但由于他控制了国大党的组织和财政大权，故拥有相当大的实权。在处理党政重大问题时，他常不与尼赫鲁商量而自作主张。尼赫鲁虽身为总理，但其决策要想在国大党内获得通过，就必须事先取得帕特尔

的同意。正如一位印度学者所说的那样：“尼赫鲁虽然在制定外交政策上是自由的，但在国内问题上，如果没有帕特尔的同意，他作不出多少决定。”两人在诸如教派冲突、文官制度乃至后来的印度总统人选等许多党政重大问题上都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其中最大的冲突是围绕国大党主席人选问题展开的。在1950年9月的国大党纳西克年会上，帕特尔提名党内保守派人物坦东为主席候选人；尼赫鲁则提名民主派代表人物克里帕兰尼。党主席候选人之争，实质上就是尼赫鲁与帕特尔两人的公开较量。选举结果，坦东以微弱多数获胜。帕特尔一派自然喜不自胜，但好景不长，帕特尔于同年12月病逝。树倒猢狲散，失去了保护伞的坦东被迫于1951年9月辞职。尼赫鲁当仁不让地自任国大党主席，控制了选举委员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从此确立了他的党和国家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开创了西方学者所说的“尼赫鲁时代”。

其时，在争取独立与自由的运动中曾经与尼赫鲁一起打天下的老资格领导人多已谢世，初露头角的新秀都是靠着他的赏识和提拔才位尊权显，再也没有人能向他发出挑战。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人拥有权力的大小，几乎完全取决于尼赫鲁对他们的信任程度。就连那些自认为资格较老、政治根基比较稳固的高级官员，在发表意见时，也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几乎从不发表与他的观点直接相抵触的意见，要谈也只是谈他们所擅长的那方面的问题。例如：克里希纳·梅农对外交和国防事务的精通，在独立后的印度罕有其匹，因此他在这两个方面的意见，尼赫鲁一般是采纳的；但在国内问题上，梅农却不敢大胆发表意见。内阁要员艾哈迈德·基德瓦伊在克什米尔问题和印度穆斯林少数民族问题上的建议对尼赫鲁颇具影响力，但在其他问题上却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石油部长克夏瓦·德瓦·马拉维亚因成功地结束了外国石油公司对印度石油工业的控制而深得尼赫鲁的赏识，但他的发言权也仅限于有关石油工业的范围。即使有人试图发表与尼赫鲁意见相左的言论，也必须小心翼翼地、转弯抹角地私下说出。上面所说的这几个人资格都比较老，而且与尼赫鲁一向私交甚笃。克里希纳·梅农在英迪拉留学英国期间还曾帮助过她。克夏瓦·德瓦·马拉维亚是尼赫鲁北方邦的同乡，早在30年代即已取得了他的信任，可以自由出入欢喜宫。费罗兹·甘地正是靠着他的引荐才得以与尼赫鲁家族结缘的。这些人尚且要时时谨防触犯尼赫鲁，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只有一个人可以就大到国际形势小到一座公园的拟建计划等各种问题随便发表意见，她就是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她在同他说话时甚至可以不考虑措辞和态度。老实说，在尼赫鲁的一生中，除了他的父亲莫蒂拉尔、圣雄甘地和帕特尔，还没有人敢以这样的口气和态度同他讲话。

作为尼赫鲁的女儿，英·甘地无疑具有很大的特权，但她决不加以滥用；相反，她始终充当着父亲权力宝座卫士的角色。她清醒地意识到，父亲位极人臣，又不大听得进不同意见，这对他和国家决不是好事，因为这样必然会导致阿谀逢迎之风盛行，致使忠臣寒心，善于投机钻营的小人得志。她以敏锐的目光，警惕地注视着他周围的每一个人，及时提醒他对那些想方设法想同他套近乎的人多加提防，尽可能与他们保护距离；同时劝告他对持不同政见者尽量采取宽容态度。

中印度的政治家德瓦卡·普拉沙德·米什拉就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在独立前夕，他曾站在尼赫鲁的反对派一边反对过他，并因此而被尼赫鲁开除党籍，赶出了政治舞台。十年后，米什拉终于意识到自己错了。他通过克夏

瓦·德瓦·马拉维亚向尼赫鲁表示悔过，愿重新投入他的帐下效力。可难忘前仇的尼赫鲁对米什拉昔日骂过他的那些话仍记忆犹新，不肯让他担任任何要职。他的几个同僚也怀疑米什拉动机不纯，劝他不要起用他。而英·甘地则认为既然米什拉已经幡然悔过，便劝父亲捐弃前嫌，委以重任；并提醒他，中央邦首席部长职位因前首席部长去世而空缺，正好可以让米什拉来补这个缺。尼赫鲁经过考虑，终于采纳了女儿的意见，同意米什拉重新入党，旋即提拔他当中央邦的首席部长。当然，知恩图报的米什拉日后成了英·甘地的心腹和谋士。

这一切表明，英·甘地这颗政坛新星已经升上了天空，而且还在不断地上升、再上升……

国大党的新主席

1959 年对英·甘地来说是不平常的一年，是她人生旅程中的里程碑和政治生涯中的转折点。就在这年的 2 月，在国大党的那格浦尔年会上，年仅 41 岁的英·甘地当选为印度国大党的主席。她是尼赫鲁家族中继莫蒂拉尔·尼赫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之后担任此职的第三人。25 年后，他的儿子拉吉夫·甘地还将担任这一职务。同一个家族中的人，在南亚最大国家的最大政党的最高职位上实现了四连冠，这在印度现代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老实说，英·甘地出任这一要职，在当时的印度，无论是政界内外，还是朝野上下，都是颇有些风言风语的。有人说，她之所以当选，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乃父的荫庇；而尼赫鲁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女儿通过当党主席积累一些从政经验，将来好接他的班。

也有人说，她的当选与她的前任 U.N. 德巴和内政部长戈文德·瓦拉布·潘特的有目的的支持有很大关系。前者为了让英·甘地当职，自己宁愿在任期未到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党主席职位；而后者对英·甘地任职起初并不愿支持，后来经过考虑、权衡才同意。他们还分析说，德巴和潘特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讨好英·甘地，让她影响尼赫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世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无风不起浪。这些说法或传闻，也许并非毫无根据。然而，它们究竟具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人们恐怕谁也无从知晓，更无法证实，只能满足于猜测了。如果说尼赫鲁没有一丁点儿想让女儿将来接班的念头，那也不真实；如果说尼赫鲁执意要让女儿接班，也缺乏强有力的证据，因为有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他临去世前所作的一切安排显然都并不是直接为了他的女儿，而是为了夏斯特里，而且实际上是夏斯特里直接接他的班的。尼赫鲁并非神算家，他不可能料定夏斯特里在继任总理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会死去，而英·甘地会接上他的班。也许这样的解释更合乎情理一些：尼赫鲁有心为女儿接班创造一些条件，但又不直接指定她为自己的继承人；至于她将来是否一定能接上班，就要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第二种说法的可信程度显然更大一些。德巴和潘特等人想通过英·甘地影响她的父亲，这是有可能的，但毕竟也没有强有力的证据予以证实。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究竟该由谁出任国大党主席的职务，而在于当选者做出了多少实绩。一个人，哪怕他身居高位，甚至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职位，如果工作毫无建树，也只能是一个庸人、一个尸位素餐者，而这样的人无法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任何位置。

英·甘地的任期并不长，只有短短的 11 个月。她之所以提前辞职，表面的理由是她丈夫因患心脏病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她父亲年届古稀，显得老态龙钟，他们都需要她去关心、照顾，继续任职必然会因公务繁忙而无暇兼顾；深层原因是她在工作实践中感到自己的资历还不够深，领导和管理这样一个全国性大党有些力不从心。此外，她惊奇地发现，她在任职期间，她在许多问题上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都在事实上站到了她父亲的对立面，而这是违背她的初衷的，也是她所不情愿的。

英·甘地的任期虽然短暂，她所做的事情可不少。对她当时的所作所为该怎么看，今天的人们往往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对她个人而言，这 11 个月的党主席任期却是她政治生涯中的一段宝贵的时光，为她后来的政治生活积累了不可多得的经验。

英·甘地首先是在工作作风上做文章，想给党内外人士造成一种精力充沛、充满热情与活力、办事干练、果断的印象。她总是准时在上午 9 时到党部办公室上班，一直工作到下午两点半才回家。只有在尼赫鲁要她出席午宴时才稍微提前下班。她还忍受着长达近一年的肾结石病的折磨，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她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的每一个邦。她的行动无疑起了一定的表率作用，党的各级干部见主席如此，也都纷纷转变工作作风。

英·甘地接着对党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某些大胆的改革。为了使党的机构显得朝气蓬勃，充满生机，她认为有必要改变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使之年轻化。为了达到目的，她不惜拿自己的父亲开刀，劝他和某些年老资深的领导人退出党的工作委员会，更换了像阿图尔亚·高士那样被认为动不得的领导人，起用了一批年轻有为的新人，充实工作委员会的领导班子。

英·甘地还做了这样一些工作：设立难民安置办公室，处理穆斯林问题和土地等其他问题；整顿财务，改变了负债累累的状况，使党的各个部门的经费都有所节余；甚至破天荒第一次将国大党党部向社会公众开放，使平民百姓也能随便地迈入国大党中央党部的门槛，反映情况，谈问题。

英·甘地的改革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显得成熟而老到，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与她的前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是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独立以来人们对国大党及其领袖的印象。以前的国大党似乎隶属于政府，是政府的一个仆人，现在却成了一个按自己意愿行事的主人；国大党主席也从一个唯唯诺诺、唯政府总理马首是瞻的“跟班”变成了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领导意识的人。英·甘地的改革举措之大胆、行动之迅速，令潘特那样的老资格领导人也不得不暗自称奇和佩服。当然啰，不是英·甘地，谁敢劝尼赫鲁退出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呢？除非他吃了豹子胆！

不过，英·甘地的改革也并非总是成功。为了培养干部，她专门募集了一笔 10 万卢比的经费，以甘地格兰为基地，培训了 100 名干部。但她的继任党主席对此事却不那么重视。结果受训者失掉了工作，好不容易募集来的钱也被挪作他用。英·甘地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努力付诸东流。此事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她的任期太短，也有考虑不周、不切实际的因素。

除了对党务进行整顿和改革以外，英·甘地在她短短的任期内还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情是失败的。但失败的原因并不在她，而在于她的父亲尼赫鲁。就在她当选为党主席的那届那格浦尔年会上，国大党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全国 50 万个乡村中实行合作耕种。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决议因不切实际，加

上宣传上的误导（农民把合作耕种理解成了集体耕种，这意味着他们那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块土地会被收归集体，所以极力反对）而失败。其实，在年会上也有代表意识到这个决议不符合印度国情，根本行不通，但为了迎合它的提出者尼赫鲁，仍然投票赞成。最高决策者出现了失误，作为执行者的英·甘地也就徒唤奈何了。

第二件大事是解散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政府、此事曾引起颇大的争议。

在 1957 年第二届大选中，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选举中获胜，组成了以其领导人南布迪里巴德为首席部长的邦政府。这在当时的印度和国际上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美国人甚至惊呼喀拉拉已变成“印度的延安”。这件事在国大党内更是造成了极大的震惊和不安。因为共产党通过走议会道路上台执政（尽管只是在一个偏远的蕞尔小邦），无论在世界现代史上，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以往共产党成功地夺取政权，都是靠的枪杆子即通过暴力革命，如苏联和中国。

喀拉拉邦位于德干半岛的南端，北接卡纳塔克邦，东邻泰米尔纳杜邦，南濒印度洋，西临阿拉伯海。该邦是一个小邦，地少人稠。面积仅 38863 平方公里，人口却逾 1700 万，人口密度是全国人口密度的 4 倍。该邦也是一个穷邦。工业不发达，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人口占全邦总人口的 86%，主要农作物是橡胶、可可、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粮食不能自给，人均年收入为全印最低；文化落后，文盲充斥；宗教关系错综复杂，印度教徒、天主教徒和穆斯林各有其活动地盘，该邦的学校也大多控制在他们手中。

针对这些情况，印度共产党执政伊始，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改革措施有两个。一是土地改革。以立法形式规定土地持有的最高限额，将多余土地征收来分给无地农民；保护佃农利益，禁止地主夺佃。二是教育改革，把私营学校和教会学校纳入邦政府管制的轨道。这些改革措施受到了农民和其他中小阶层人民的欢迎，但因触犯了该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各教派的利益而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平时门户之见很深的天主教徒和印度教奈尔种姓集团为了共同的利益，反对共同的敌人而联合起来。

究竟该如何对待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政府，国大党的领导层意见不一。尼赫鲁的态度比较谨慎。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政治家，他当然不愿看到共产党在一个邦内执政。但他同时也认为，共产党是通过合法途径取得邦政权的，如果通过中央政府直接将它推翻，恐怕会遭到世人的非议和责难。故他倾向于建议共产党邦政府在邦内实行全民公决，以决定上述两个改革法案的命运。为此，他与南布迪里巴德进行过长时间的谈判，但没有结果。

身为国大党主席的英·甘地可没有她的父亲尼赫鲁那么多的顾虑，她也不想同印共领导人南布迪里巴德磨嘴皮子。她的头脑只为一个意念所占据：尽快结束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的统治。

为了搞垮共产党的邦政权，英·甘地可谓不择手段。她不顾国大党一向标榜的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原则，怂恿天主教徒、印度教奈尔种姓联合反对邦政府。同时，她还逼她的父亲和内政部长潘特明确表态，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以所谓无法维持法律和秩序为由解散邦政府。1959 年，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会议在新德里召开，主持会议的英·甘地强烈要求中央政府对喀拉拉邦政府进行干涉。为找借口，她一手策划了该邦的多次反共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人为地制造所谓“动乱局面”。同年 7 月，印度总统 R. 普拉沙德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以“恢复法律和秩序”为名，解散了喀拉拉共产党的邦政

府，对该邦实行“总统治理”。在六个月后重新举行的选举中，为了防止喀拉拉邦共产党东山再起，英·甘地竟允许国大党与它的宿敌穆斯林联盟握手言和，组成选举联盟，使共产党终遭失败。

此举招来了一片非议。党内有许多人认为她这是在拿原则做交易，就连那些担心共产党在喀拉拉邦再次上台的人也感到震惊。但英·甘地毫不理会，照样我行我素。她对原则有自己的见解。国大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她的原则。在英·甘地看来，穆斯林联盟固然可恨，但它毕竟与国大党的政党性质相同——都是资产阶级政党，阶级基础相似，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和，起码可以暂时站在一起；而国大党和共产党则无论在政党性质、阶级基础，还是意识形态上都有本质的不同，势若水火。所以，英·甘地宁可让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分享政权，也不能容忍共产党独掌政权，即使是在一个偏远的边陲小邦。

第三件事是说服尼赫鲁按语言邦原则分割孟买邦。与上一件事不同，这件事引来一片赞扬声。

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仅人口在 1000 万以上的民族就有 14 个，但没有一个民族、一种语言超过总人口的半数。英国征服印度后，为了统治之便，曾以行省和土邦为单位作为行政区划，把这些民族地区分割得支离破碎。这自然引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根据语言原则重新划分行政区。国大党也曾把这一条作为它的斗争目标之一写进了党纲。但它在独立后却并未践诺，这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并曾一度导致大规模骚乱。尼赫鲁政府不得不顺乎民意，于 1956 年按民族和语言重新划分邦界。但还有几个地区被政府以情况特殊为借口而未重划，其中有一个是孟买邦。该邦有两大主体民族，即操古吉拉特语的古吉拉特人和操马拉塔语的马哈拉施特拉人。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孟买市的归属上。孟买是仅次于加尔各答的印度第二大城市，居民 400 多万，其中大多数是马哈拉施特拉人，但大部分工商业却为古吉拉特人所控制。对尼赫鲁坚持设立双重语言邦——孟买邦的主张，这两个民族都不满意，都要求重建语言邦。此事曾引起多次骚乱甚至是流血冲突。

在这个问题上，英·甘地比她的父亲显得务实而明智。她看出了这件事情潜在的危险性：如果处理不好，国大党的威信将受到损害，下次大选就有可能失败，至少会失去孟买地区选民的支持。她认为，人们既然无力避免某件事情发生，就应尽可能以最佳方式来处理它。因此，她主张顺应两大民族的要求，将孟买邦一分为二。在这个问题上，孟买邦的首席部长耶·巴·恰范也与英·甘地观点相同，他们一起去做尼赫鲁的工作。尼赫鲁最终同意收回陈命，于 1960 年 5 月将原孟买邦按两大主体民族分成了马哈拉施特拉和古吉拉特两个邦。孟买市归属马哈拉施特拉邦，但古吉拉特人可继续在该市投资，经营工商业。问题解决了，两邦居民皆大欢喜，此时已卸任的英·甘地也因此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乍看起来，潘特他们当初赞成让英·甘地出任国大党主席的目的似乎是达到了。英·甘地对她的父亲的确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为无论是在对待喀拉拉共产党邦政府问题上，还是在处理孟买邦问题上，英·甘地都没有按她父亲的意志办事。然而，如果潘特等人据此认为英·甘地是在按他们的主观愿望行事，那就错了。因为英·甘地显然不是按任何人（包括她的父亲尼赫鲁）的意志办事的，而是按她自己的原则办事。这个原则就是前面说过的

国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她在上述两件事上都与尼赫鲁不同，就是从不同侧面体现了这个原则。同意按语言划分孟买邦是为了争取民心，为国大党在后来的大选中获胜创造条件；搞垮喀拉拉的邦政府，也是为了让国大党控制该邦。

英·甘地在任国大党主席期间，还非常重视国际事务，如建立国大党非洲事务委员会、非洲事务印度委员会，谴责南非和英属尼亚萨兰的种族歧视，同情民族主义运动，反对殖民主义等。她还访问了一些非洲国家。

夫妻反目

几乎与政治上发生转折的同时，英·甘地的人生旅程中出现了另一个转折点——她与当初的如意郎君费罗兹·甘地之间发生了情感危机。这两个转折都对英·甘地影响极大，尽管它们截然相反。一时之间，我们的传主经历了大喜大悲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

少女时期的英迪拉看问题毕竟没有她父亲成熟而老到。尼赫鲁对女儿婚姻的那些隐忧的确是有先见之明，这已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遗憾的是，当时已堕入情网，被炽热的爱情之火烧得几乎不能自持的英迪拉未能听进父亲的忠告，她那本来明亮的大眼睛由于为幸福的光环所笼罩而出现了盲点，以致她看到的几乎全是恋人的优点和长处，终至酿成后来婚姻不和的苦果。“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也许是一条永恒的真理。

客观地说，英迪拉和费罗兹的婚姻的确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两人在许多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除了性格迥然不同以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家庭背景的不同，正如尼赫鲁当初所说的那样。

家庭背景所包含的因素很多，如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以及宗教信仰等。曾经在印度舆论界和公众中引起轩然大波的宗教信仰的差异，在受过西方教育的费罗兹看来倒是无关紧要的；相反，他对两家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差异倒是颇为在乎。

费罗兹出身寒微，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这种状况对他的成长是有影响的，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的性格和心理的扭曲。不用说，他的内心深处潜藏着一定的自卑感，但这种自卑却常常以极度的自尊表现出来，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要面子。这种自尊发展到极至，会使他对任何其他人对有关他与妻家关系的话题都极为敏感；哪怕是一句善意的玩笑，也会使他感到不快，他会把它看作是对他的嘲笑。例如，他对老百姓公开称他为“驸马”就觉得难以忍受。

乍看起来，“驸马”这个称呼使人容易联想到“乘龙快婿”，表明妻子娘家人权尊位显，有王侯之尊；“驸马”本人也往往因此而显得荣耀，地位也较常人高出许多，以至于人们在这样称呼他的时候，说不定还得带上一个“爷”字。但是，在印度这样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驸马”就不一定是一个令被称呼者感到荣耀的称谓，相反会使他产生一定程度的羞辱感。因为这个称呼往往隐含有巴结权贵之意，而一个堂堂七尺的男子一旦被人认为是靠岳父而生活，就会被人瞧不起，看作如同在大厦房梁上建窝筑巢的燕雀一样。费罗兹与英迪拉结婚后不久就提出与岳父分居另过，正是基于这种心态。他不愿被人误解，以为他娶英迪拉是为了巴结尼赫鲁，分享欢喜宫的荣耀和权势。

如果说婚后英·甘地能够随夫在勒克瑙一直过下去，两人也许会相安无事。偏巧尼赫鲁也需要她。这就不能不在小两口的夫妻生活中埋下纷争的种子。最初的两三年内，费罗兹尚能忍受，可时间一长，他就逐渐感到难以忍受了。形影相吊的他呆在勒克瑙终日闷闷不乐，对妻儿远离他住在豪华的总理府，将他孤零零一个人抛在那里感到不满。尽管妻子有时携子来看他，他也有时出差到德里，但这种短暂的团聚根本无法代替正常的夫妻生活。性格外向的费罗兹有时会当着妻子的面，把他的不满和委屈发泄出来。

随着英·甘地越来越深地卷入政治，费罗兹对妻子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烈。两人的关系日趋紧张，他们的矛盾和冲突也越来越表面化、公开化了。

这样的事若是发生在普通家庭，也许没有什么大不了，也不会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可若是发生在引人注目的第一家庭里，情况就完全两样了。有关尼赫鲁的任何家事都会被看作国家大事，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这些人中，既有善意的，也有居心叵测者。许多饶舌者更是将总理的女儿与女婿的分居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添油加醋地加以传播。有人甚至说英·甘地为了靠近权力宝座而抛弃了费罗兹；有人则说夫妻分居与费罗兹那双“不安分的眼睛”有关。这些谣言从来都是既得不到证实，也不好被戳穿的，因为对谣言的任何辩解和反驳都会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反而会加快其传播的速度，扩大传播的范围。这些谣言对费罗兹和妻子之间的隔阂在客观上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1年11月至1952年2月，印度举行独立后的第一届全国大选。在国大党赢得全国胜利的同时，费罗兹也在北方邦的赖巴雷利选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选入印度人民院，成了一名议员。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年后的第二届大选中，他在同一选区再度当选为议员。

在印度，一个人一旦当选为人民院议员，按规定就可以住在德里，得到一幢专供议员使用的小平房。当选

为议员后，费罗兹从勒克瑙搬到了德里。起初，他住在尼赫鲁的总理府官邸内。不久以后，他拿到了房管部门分给他的那幢小平房的钥匙，就立即独自一人从总理府搬了过去，尽管他完全可以继续住在总理府。费罗兹提出分居的理由是：作为议员，他需要经常接见选民、政界同事以及其他各色人等，而这些人并不是都适合于进入总理府的。

乍看起来，这个理由冠冕堂皇，无懈可击，但实际上只不过是费罗兹的一个借口罢了。人们常说世界是奇妙的，它的奇妙之处有时就表现在同一件事情往往因为时间、环境等因素的变迁而具有不同的性质。如果说十年前还是一介布衣的新郎费罗兹不想与尼赫鲁共居一处，是出自避免遭别人误解他是想借岳父大人作为进身之阶的心态的话，那么，十年后身为人民院议员的费罗兹仍然不想与尼赫鲁住在一起，则主要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他与岳父的关系以及与妻子的感情已经有了明显的无法弥补的裂痕。

为了避免引起外人过分的猜测和关注，费罗兹每天上下班后还是照例去总理府同尼赫鲁和英·甘地一道进餐。他同他们的关系也仅至于此，他把此事看作是如同外交礼仪般地例行公事。正因为如此，他才感到机械、木讷和不自在，他的家庭与尼赫鲁家族在家庭背景上的巨大差异至此时已经暴露无遗。

平民出身的费罗兹在尼赫鲁家感到有诸多的不习惯，比如他不习惯于以尼赫鲁家族中人的身份，身穿考究的礼服，参加那些极为正规的宴会以及宴

会上那些必不可少的客套应酬；不习惯于岳父和妻子那种优雅矜持的言谈举止；不习惯于他们在即使没有任何外人的家宴上也要按照严格的西方上流社会的那套礼节进餐的作派，而这对于一向洒脱惯了，且喜欢边吃饭边谈笑的费罗兹来说无异于是一种酷刑般的难受；不习惯于……有了这诸多的不习惯、不自在，费罗兹不想住在总理府也就是自然的了。

人们如果细究一下费罗兹与他的岳父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这种关系是相当微妙的。无论费罗兹承认与否，他实际上在许多方面都是受惠于尼赫鲁的。当初如果没有尼赫鲁的帮助，在经济上尚未完全自立、还谈不上有任何资历的费罗兹是根本不可能成为《国民先驱报》的经理的。他之所以能在1952年当上人民院议员，与他跟尼赫鲁的翁婿关系也多少是有关系的。当上议员后，颇有名气的全国性大报《印度快报》之所以愿意以优厚的报酬聘请他在报社兼职，除了费罗兹本人此时已成了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外，它的负责人更看中的恐怕还是他与尼赫鲁的至亲关系，可以利用他与总理府保持密切接触，从中得到一些内幕消息；同样地，也正是由于他是尼赫鲁的女婿，一些消息灵通人士才肯将机密消息透露给他。尽管如此，费罗兹还是极反感别人将他与他的岳父家扯在一起。他竭力想给公众一个这样的印象：他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个人奋斗的结果，并没有依赖任何人。为了向公众表白这一点，他不惜时常在公开场合与尼赫鲁父女唱对台戏，甚至是让他们难堪。

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当尼赫鲁正责备国大党员们不该把妻子儿女也带来时，坐在后排座位上的费罗兹马上大声嚷道：“我可没有把我的妻子带到这儿来。”这话引起了哄堂大笑，把严肃的会场给搅乱了。当时英·甘地正站在尼赫鲁身旁，费罗兹的话不免使他们父女俩一时都感到难堪。

还有一次，是在招待来访贵宾的宴会上，费罗兹对安排给他的座位不满意，便向礼宾司司长夫人、宴会的组织者之一塔拉·阿里·贝格提出要求调换。当后者告诉他座次是英·甘地最后确定的，只有她才能改变时，费罗兹不禁怒气冲冲地当众大吼：“我不想和她说！”

平心而论，费罗兹这个人还是颇有才华的。他聪明过人，幽默诙谐，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能在瞬间把一个忧心忡忡、满脸愁云的人逗乐，也能随心所欲地制作出令儿子爱不释手的玩具，还能把满园的花卉侍弄得争奇斗艳、芳香四溢……对于这些本领，熟悉他的人常常称羡不已。

然而，这些常人眼中的本领在费罗兹本人看来也许不过是雕虫小技，他的才能更体现在政治方面。作为平民政治家，他待人热情诚恳，对穷人和地位低下的人富有同情心，在民众中享有较高的声望。1943年，当他刑满获释后与英迪拉一起回到欢喜宫时，他就曾以其为人谦和，平等待人而深得仆人们的爱戴。他所在的选区赖巴雷利有100多万人口，其中大多数是穷人，居住在经济落后的乡村。每当议会休会时，有时甚至是在开会期间，费罗兹总要离开德里，离开那有冷气设备的舒适的议会大厦，到他的选区走一走，同他的选民们谈话，访贫问苦，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每到一地，他不住豪华的宾馆饭店，而宁愿与选民们同吃同住。他同他们谈话时，用的是当地农民的方言，而不是他本人在阿拉哈巴德和德里讲惯了的标准的印地语。选民们都愿意与他接近，与他交心谈心，与他交朋友。不管公务多么繁忙，也不管乘坐敞篷吉普车在尘土飞扬或崎岖泥泞的乡间小道上跋涉是多么辛苦，一般说来，平均不到三个月，他就要进行一次这样的访问，以保持同选民的密切接触。他之所以能在五年后在赖巴雷利得以连选连任，就是因为他

赢得了选民的心。

作为一名议员，费罗兹在人民院中并不随便开口讲话。但只要他发表演讲，往往直奔主题，切中要害，层次分明，言简意赅。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敢于直言，不畏权贵，刚直不阿。

1954年，费罗兹开始在议会中崭露头角。他曾在议会的一次讲演中，无情地揭露了一家商业机构盗用大批保险基金的不法行为。他的演讲语惊四座，出尽了风头，令人刮目相看。费罗兹早年从事保险业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也在这次讲演中派上了用场。很快，该商业机构的经理被逮捕，所有的人寿保险公司被收归国有。

此后，费罗兹又接二连三地发射出几枚“重磅炸弹”。公众崇拜他，为他欢呼，称他为“巨型杀手”。1958年，他的声望达到了他一生中的顶点。他在议会中揭露了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丑闻，迫使涉嫌此丑闻、深受尼赫鲁赏识的财政部长T.T.克里希纳马查里引咎辞职。费罗兹演讲时那确凿翔实的引证，辛辣的讽刺技巧，令所有人会者为之动容。费罗兹因此而名声大噪。

然而，即令费罗兹才华盖世，他的政治前途也只能到当议员这一步，无望进入内阁。因为他锋芒太露，简直是咄咄逼人，常常搞得人难堪，有哪一位总理愿意让他这样的人入阁当阁员呢？就连总理本人也拿不准这个“巨型杀手”会在何时何地冷不丁地扔出一枚“重磅炸弹”，把他也惊出一身冷汗来。在议会的休息室里，费罗兹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年轻的和普通的议员以及对尼赫鲁有意见的人，在被称为“费罗兹角落”的一角边喝咖啡边纵论政事，而那些年长的以及公开表示崇拜尼赫鲁的人则赶紧走开。

费罗兹与英迪拉的关系无可挽回地恶化下去了。到1957年底，他甚至将与尼赫鲁父女象征性的联系也斩断了，不再定期到总理府就餐，而是越来越频繁地在外面吃饭。不过，费罗兹的不满和痛苦由于他那外向的性格在各种场合（公开的或私下里）得到了宣泄，而英·甘地呢？她的内心世界又如何呢？人们不得而知，因为她生性内向，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发表过关于她与丈夫关系的言论。英·甘地逝世一年后，当人们看到了已公开出版的她生前写给友人多萝西·诺曼的信，才知道她心中的痛苦丝毫不亚于费罗兹；而且惟其深藏内心，未曾得到宣泄，其痛感愈甚。

“我已处于一场家庭危机之中。”“我们的家庭生活一直不快活，现在依然没有任何改变。这种伤害和不愉快对我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但是我仍觉得遗憾，错过了生命中最奇妙的东西，不能与另一个人拥有一种完美无瑕的关系……”“在家里，费罗兹一直对我表示不满。我当上国大党主席以后，他对我甚至流露出一种敌对情绪，似乎空气中都弥漫了这种情绪。”英·甘地在信中这样写道。

1959年7月，随着印度共产党执政的邦政府被解散，喀拉拉邦危机达到了沸点，费罗兹与英迪拉的关系也降到了冰点。这场危机在当时搞得沸沸扬扬，引起了印度朝野上下的普遍关注，许多人对英·甘地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但英·甘地惊讶地发现，批评最为激烈的，不是别人，却是自己的丈夫费罗兹。这自然令她痛苦万分。

费罗兹认为，解散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之举“愚蠢透顶”。他在议会里发表演讲，公开抨击英·甘地在喀拉拉邦问题上的政策；他不停地在克里希纳·梅农、K.D.马哈雅瓦拉等富有同情心的部长们之间穿梭般奔走，劝说他们站出来就喀拉拉邦问题发表政见；他与新闻界和评论家们密切进行联系，

对报刊评论施加影响……看得出来，他是在尽量同妻子唱反调。

费罗兹在喀拉拉邦问题上如此强烈地反对妻子，不是没有缘由的。这首先在于他们在对待共产党政权上的政见和态度不同。他们在英国留学期间，与印度共产党的许多党员都有来往。这些党员中有些人后来在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政府中担任要职。但这并不影响英·甘地对共产党的总体看法和态度。在她看来，共产党是一回事，她与共产党员的个人交往是另一回事。她从不把这两个问题搅和在一起。所以，尽管与某些共产党员有私交，但这并不妨碍她尖锐地抨击共产党组织，说它是“印度的祸根”，必欲将其搞垮而后快。

与妻子的高度“理智”相比，费罗兹要感情用事得多。作为一名国大党员，他与妻子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相同的阶级基础，打心眼里也不希望印度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但是，碍于与有些共产党员深厚的私谊，他做不出反对喀拉拉邦政权的事情；而且，他还认为，共产党在印度并未形成气候，只是在远离国大党政权中心的极南端的一个贫困小邦里取得了政权，对握有全国政权的国大党还远未构成威胁，并不值得如临大敌，惊慌失措。再说，共产党的邦政府毕竟是通过选举的合法途径上台的，如果对其采取极端措施，会使老百姓对执政的国大党一向标榜的民主自由产生怀疑，从长远看，这将产生“更加不良的影响”。

不可否认，费罗兹激烈地反对英迪拉的喀拉拉政策，除了政见不同外，这期间还夹杂有夫妻感情不和的成分。如果他们的关系好一点，他的反对可能会有所节制。

英迪拉与费罗兹紧张不和的夫妻关系终于以1960年9月费罗兹因心脏病去世而划上了句号。他死时年仅48岁，正值人生的盛年，令人扼腕叹息。

无论党内党外，知道内情的人们都认为费罗兹的病逝，与他同英迪拉痛苦的婚姻不无关系。曾与费罗兹夫妇过从甚密的印度著名记者因德尔·马尔豪特拉在他为英·甘地所写的传记中，记录了费罗兹生命历程中最后几年的情形。他写道：由于对婚姻的绝望，费罗兹对政治也失去了兴趣，不再发表言辞偏激的政见，也不再热衷于报道揭丑，制造轰动性新闻。他开始大量吸烟，还无视国大党的禁酒令，经常酗酒，有时甚至喝得酩酊大醉，以致在1958年9月患了心脏病。从1959年初起，费罗兹已完全不去总理府。他与人说话提到英迪拉时，也一改过去说“英杜”或“我妻子”的习惯，而是称“英迪拉·甘地夫人”，这明显表明了他同妻子的关系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疏远。他把喀拉拉共产党邦政府的垮台也看成个人政治上的失败。此后他的性格越来越乖僻，动辄发怒，这显然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加速了他病情的恶化和最后的死亡。

世上之事往往就是这样奇怪：一种东西，当人们拥有它的时候，也许并不觉得它有什么价值，也不会想到要去珍惜，但一旦失去，人们才发觉那是珍宝。英·甘地在丈夫死后的心情正是如此。

曾几何时，当费罗兹猛烈抨击英·甘地的喀拉拉政策的时候，她对丈夫的愤怒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此时此刻，面对丈夫的骨灰，英·甘地似乎清醒和冷静了许多。她想起了从前跟丈夫一起生活时的那些幸福快乐的时光，想起了丈夫给她的爱。她甚至几乎忘却了她与丈夫以前曾有过不和。一种无限的悲伤和痛苦从她的心底油然而生。她曾对一位作家说：“在我生命中，最震颤我的死亡莫过于我丈夫的死……”“当我处于困境时，面对无尽的压力时，费罗兹总是站在我一边。”甚至在丈夫死去好几年后，英·甘

地还能触景生情地想起他。有一次，她在听贝多芬的音乐时，情不自禁地对朋友们说道：“尼赫鲁家族的人对音乐都没有什么兴趣，是费罗兹让我们享受到了西方古典音乐的美妙。”她对丈夫的眷恋之情溢于言表。

无独有偶，当病情急剧恶化时，不久于人世的费罗兹也忽然想起了妻子以前对自己的好处。弥留之际，他还一遍又一遍急切地向围在病榻旁的人们询问英迪拉什么时候可以到，说他很想在临死前见上妻子一面。然而，他这个最后的愿望终未能得到满足——其时，英·甘地正在从喀拉拉邦飞返德里的飞机上，他只好带着无限的遗憾永远离开了人世。

对此，人们不禁要说，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可是，事情往往就是如此。否则，人类浩瀚的词汇海洋里也就不会有“遗憾”“后悔”一类的词汇了。

七、通向权力之巅

巨星陨落

1964年5月27日，一个阴沉闷热、乌云密布的日子。印度人民的优秀儿子、印度自圣雄甘地以来最杰出的人物、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英迪拉·甘地的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双充满睿智的光芒的大眼睛永远地闭上了。一颗巨星陨落了！噩耗传来，举国同悲，群山垂泪，江河呜咽，整个印度都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哀悼他们敬爱的好总理。

对于父亲的逝世，英·甘地并非没有预感。还在国大党主席的任内，她就发现年届古稀的父亲已明显地显出衰老的迹象。他老态龙钟，背也驼了，面部浮肿，两眼深陷，出现暗晕。因此，照料父亲便成为她提出辞去党主席职务的原因之一。1964年1月，国大党在奥里萨邦首府布巴内斯瓦尔举行年会。就在这次年会上，尼赫鲁突然中风病倒。此后，英·甘地以及尼赫鲁的同僚们都认为他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尽管有预感，但当那一天真正来临时，英·甘地还是承受不了。是啊，她与尼赫鲁之间的父女情，远非一般的父女情可比。自从祖父和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几乎成了她唯一可以倾真心的亲人。从某种意义上讲，父亲是她的精神支柱，可是现在这根支柱倒下了。这巨大的打击，使她极度悲伤，神情恍惚，不知所措。她实在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

在印度这样的宗教意识极为浓厚的国度里，像尼赫鲁那样宗教意识淡薄的人是不多的。他一向提倡世俗主义，要求死后也按非宗教的仪式安葬自己。早在十年前，他就在遗嘱中写道：“我死后不要举行任何宗教仪式，因为我不相信它。……我的愿望是把骨灰撒到阿拉哈巴德旁的恒河里。这没有宗教上的考虑。就我而言，从童年时代开始，我就深深地爱恋着会合于阿拉哈巴德的恒河和朱木拿河，特别是作为‘印度之母’的恒河，它是印度世代文明的象征。”英·甘地却出人意料地违背了尼赫鲁本人的愿望，为他安排了一个传统的印度教葬礼。

到了葬礼举行的那一天，成千上万的印度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他们敬爱的总理的葬礼。人流汇成了一个巨大的长龙，绵延十余公里，一眼望不到尽头。人们默默无语地走着，有的人禁不住失声痛哭。脸色惨白、双眼含泪的英·甘地带着家人走在人群的最前列。

尼赫鲁的遗体被运到了神圣的朱木拿河旁的火葬场地。他的小外孙桑贾伊点燃了葬礼的柴堆，印度教僧侣们围着柴堆吟诵起祭礼的祷文。

望着安卧在柴堆之上的父亲的遗体 and 升腾的烈焰，英·甘地觉得父亲的灵魂也随着那摇曳的火苗升到了九天之上。在默默地为父亲祈祷和祝福的同时，她想起了他那曲折而光辉的一生。

尼赫鲁是争取印度独立和自由的坚强战士。这位出身名门望族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印度民族运动的峥嵘岁月里，满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情，抛弃了优裕的家庭生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民族运动的洪流中，并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尽管在此过程中他曾先后九次被捕，坐牢近十年，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为实现印度的独立和自由而献身的坚强信念，直到赢来印度独立的曙光。

尼赫鲁是印度共和国的缔造者。印度独立之初，面临着因分治而造成的大规模的教派冲突和仇杀的严重危机。作为政府总理，他领导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就基本上控制住了难民潮，制止了教派仇杀，使社会生活逐步趋向正常化，人民逐渐安居乐业。在这场动乱面前，尼赫鲁和他的新政府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与此同时，他又领导他的政府对印度境内因历史原因形成的大大小小的数百个土邦进行了归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完整。

印度独立之初，殖民地色彩还相当浓厚：国家的性质是英联邦内的自治领；英国总督和许多文官、军官都留任，英军仍驻扎在印度的国土上；举行一切重大仪式，都必须在仪式开始时，演奏英国国歌《上帝佑吾王》，而印度国歌只能在仪式结束时演奏。

为了尽量淡化殖民地色彩，尼赫鲁大力推行“印度化”政策：削弱总督权力，使其成为仅仅是由总理推荐、由英王批准的象征性的最高行政职务，并于1948年6月由印度人拉贾戈帕拉查里接替蒙巴顿出任印度总督，原总督属下的行政会议也让位于以总理为首、向立宪议会而不是总督负责的部长会议。对邦一级政府机构也实行与中央相类似的改组，使实权掌握在以首席部长为首、向邦立法议会负责的部长会议而不是省督的手中；命令英军全部撤回英国，结束其对印度近200年的军事占领；废除陆军总司令统辖陆海空三军的旧制，实行三军分立，分别设总司令，均向国防部负责，而国防部长则是文职，各级军官逐渐过渡到由印度人担任。在“印度化”基本实现后，1950年1月26日，新宪法生效，印度完成了从自治领向共和国的过渡。

在印度共和国时期，尼赫鲁担任政府总理共14年。在此期间，他在国内政策上实行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方针，在外交政策上坚持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领导他的政府和人民把印度建设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具有一定国际声望的国家。

尼赫鲁提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构想虽然与1954年他的中国之行有直接关系，但这个构想的雏形实际上早在此前20年即已开始在他的脑海中形成。1955年1月，在国大党的阿瓦迪年会上，他的这一构想被以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并获得了通过。

然而，尼赫鲁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实际上是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印度的甘地主义和苏联—中国发展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混

合体。其主要内容是：在经济上实行1948年工业政策决议规定的混合经济体制，由社会拥有或控制主要生产资料，在相互竞争中促进公私营经济同时发展，配合农村土地改革和乡村建设计划，促进印度工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在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在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用和平民主的方式，革除社会封建流弊，实现“社会公正”和“国家财富公平分配”的社会目标。由是观之，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改良的印度式的资本主义。这一点就连较有远见的印度大垄断资本家G.D.比尔拉也看得很清楚。他说：“只有在国大党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里，印度资本主义才能生存。”尼赫鲁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的构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中出现的新思潮之一，体现了这些国家在走资本主义老路行不通的情况下，结合自己的国情和民族特点，试图走一条资本主义改良的新路，以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现代化

的一般趋势。

按照尼赫鲁的这一构想，国大党政府实行了经济政治的一系列改革。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和实行计划经济。土地改革从 1949 年公布土改委员会的报告开始，分两个阶段进行。前一阶段着重以支付补偿金的形式废除柴明达尔土地所有制和保障租佃关系，后一阶段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以规定土地持有的最高限额为主要内容。土地改革的结果是使大约 2000 万户富裕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作用；而旧式的柴明达尔地主因直接经营农业，加上又得到了政府的大笔补偿金，开始向经营地主转化，促进了印度农业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但租佃改革和对土地持有实行最高限额则基本上是失败的。

尼赫鲁政府工业发展战略的蓝本是 1948 年 4 月颁布的工业政策决议。这个决议确立了实行公私营部门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体制，划定了公营和私营经营的范围，规定把军火、原子能、铁路运输等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划归国家经营，允许私人经营轻工业和部分其他工业，对私营企业保证十年内不考虑国有化问题，对外资企业也一视同仁。

1950 年 3 月，尼赫鲁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开始主持制订发展经济的五年计划。应当指出，印度的经济计划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有本质的不同，它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自由竞争与垄断相结合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实行的。它对私营经济起诱导性的作用，又刺激又控制，通过采取行政措施（许可证制度、审批手续等）、立法措施（工业立法、外汇条例、反垄断法等）和经济措施（分配投资、原料的导购与分配、信贷、税收、价格等），把私人资本纳入国家预定的轨道。

尼赫鲁亲自主持了前三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工作。由于独立之初百废待兴，人民的吃饭问题尤为突出，故“一五”计划以发展农业为主。但尼赫鲁认为，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必须以经济的繁荣作保证，而经济的繁荣又必须以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为前提。因此，从“二五”计划开始，他将经济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上来。该计划执行的结果使印度的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使印度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但也出现了政策上的失误，主要是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比例失调，基本建设规模过大。

尼赫鲁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构想在政治方面的体现，就是要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其主要内容是实行议会民主制和社会民主化。1964 年 1 月，国大党在布巴内斯瓦尔年会上还正式把尼赫鲁所说的社会主义定为“民主的社会主义”，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种姓的社会”，以达到“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

1950 年 1 月生效的印度共和国宪法规定，印度实行议会民主制和责任内阁制。中央立法机构实行两院制。上院称联邦院，由 250 名议员组成，其中 12 名由总统指定在文学、科学、艺术以及其他领域内具有专门学识或实践经验的人担任，其余的均由邦立法议会的议员选出。该院为常设机构，不得解散。议员任期六年，每两年改选其中的三分之一。下院称人民院，由 525 名议员组成，从年满 21 岁以上的公民中普选产生。每届人民院任期五年，期满

柴明达尔产生于莫卧儿王朝，是土地的实际耕种者与封建国家之间的包税人。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这些包税人成为国家法律承认的地主阶级。柴明达尔制是印度独立前农村最主要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全部改选，但总统有权提前解散。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国会可通过法律自行延长任期，但一次不得超过一年。紧急状态取消后，延长的任期不得超过半年。下院的多数党领袖出任内阁总理。

宪法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对外关系的最高代表。总统由联邦国会上下两院议员和邦议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任期五年。尽管总统在法律上是国家的最高元首，但国家的行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以总理为首的内阁手中。总统无权自行选择总理，只能任命人民院中的多数党领袖为总理；各部部长也是由总理提名，报总统批准。总统最重要的权力是在全国或部分邦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只要总统认为发生了下列任何一种情况即可宣布实行：发生战争、内部骚乱或外来侵略；某邦政府已不能按宪法的规定进行正常工作；全国或某邦的财政稳定与信用受到了威胁。

由于总理既是议会中的多数党领袖，又是部长会议的首领，这种特殊地位使总理成为印度政治生活中的中心人物。他不仅领导着部长会议，事实上他也领导着议会和整个国家。部长会议由总理和全体部长组成，向人民院集体负责。全体部长共进退。只要人民院对一名部长通过不信任案，部长会议就要总辞职。另外，议会如果拒绝通过政府的财政预算或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部长会议也应总辞职；否则就要由总理建议总统解散人民院，提前举行新的大选。部长会议的核心是内阁，它由总理和内阁部长组成，是政府的领导机构。总理在部长会议中居最重要地位，他有出面组阁，改组政府和免除部长职务的权力。对部长会议决议持不同意见的部长，只有一个选择，即要么执行，要么辞职，决不允许公开反对。在紧急状态期间，总理的权力更大，因为实行总统治理实际上是直接由联邦政府对整个国家或某个邦实施控制和管理。

在尼赫鲁时代，印度共进行了三次大选，每次都是国大党以多数票获胜执政，尼赫鲁出任总理。

尼赫鲁还努力促进社会民主化，让共产党组织合法化，保障人民基本的民主权利，如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还通过立法形式，革除印度教社会的一些陈规陋习，如童婚、内婚制和嫁妆等。

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以及民族关系问题上，尼赫鲁顺应历史潮流，在人民的推动下，于 1955 年按语言邦原则，对邦一级行政区划进行了重新划分，满足了大部分邦人民的要求。

在外交上，尼赫鲁为印度制定了不结盟政策，把它当作对外关系的基石。其具体内容是反对战争和殖民主义，保卫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不参加任何一个集团”，“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外交关系”。这种超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维护各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行多方面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外交政策，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54 年，尼赫鲁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经过协商，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些原则在后来的亚非会议上得到了确认。

尼赫鲁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实际上与他在国内推行的走“中间道路”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如果印度参加了军事集团，就会成为大国的附庸，就会被卷入战争；即使不参战，国家的经济利益也会大受损失。只有不结盟才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印度的独立发展。

尼赫鲁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提高了印度在国际上的地位，为印度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同时，这项政策并没有妨碍印度从大国那里得到实惠。在他执政

期间，印度得到了总额达数百亿卢比的外援，其中近一半来自美国。

当然，尼赫鲁的内外政策也有一些失误，如人口激增；农业收成不稳，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粮食以及日用品短缺；经济结构中的农轻重比例失调，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物价上涨，外汇不足，财政拮据；民族邦改组不够彻底，引起西北部锡克人和东北部的那加人和米佐人的强烈不满；对外关系方面与巴、中关系恶化；等等。由于尼赫鲁时代的印度共和国尚处在初创阶段，他出现这些失误也是难免的。总的来看，尼赫鲁的功绩是第一位的，失误是第二位的。他不愧为新印度的缔造者。

英·甘地从回忆中醒来，她觉得父亲的一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不平凡的一生。他老人家一生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实在太累了，也该休息了。英·甘地在众人的簇拥下，遵照父亲的遗嘱，将他的骨灰徐徐撒入滔滔恒河之中，一边喃喃地说：“父亲，你生前那么热爱恒河，你是恒河的儿子，现在就让你回到恒河母亲的怀抱里去吧。”

谁是尼赫鲁的继承人？

尼赫鲁去世后，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任命内政部长 G.L.南达为临时总理，组成看守内阁，筹备新总理的选举工作。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谁是尼赫鲁的继承人？

其实，早在尼赫鲁在世之日，国大党内外就已经有人在私下里议论这个问题了。在整个 50 年代，还没有人敢（哪怕是私下里）谈论这个问题。那时候，作为国家和国大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尼赫鲁的地位坚如磐石，无人可以摇撼；他的形象高山仰止，他人难以望其项背。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尼赫鲁本人降低了他在党和人民中的威信，动摇了他的地位。尼赫鲁一生英雄盖世，晚年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误认为经过了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印度已足以与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抗衡，以致在 1962 年主动挑起了大规模的印中边界战争。他万万没有想到，军事力量并不薄弱的印度军队在强大的中国军队面前竟是那样不堪一击。印军的溃败在印度举国上下造成了极大的震惊和恐慌，降低了尼赫鲁的威信，动摇了他的地位，也加速了他的衰老，日益显露出将不久于人世迹象。他主宰印度党政事务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他的继承人问题发表议论的胆子也就自然大了许多。

就连外国人对此事也极为关注。美国的一位电视新闻记者韦尔斯·汉根在 1963 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谁是尼赫鲁的继承人》。他在书中给尼赫鲁的可能继承人排了座次，其中名列排行榜前三名的是莫拉尔吉·德赛、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和英迪拉·甘地。这与国内大多数人的看法不谋而合。

印度国内外人们的看法都不无道理。三人中年近七旬的德赛实力最强，地位也最高。他是国大党元老，政府财政部长。作为党内和政界资格最老的人物之一，早在 1957 年后，他就已经在尼赫鲁内阁中位居第三了，仅次于总理尼赫鲁和内政部长戈文德·瓦拉布·潘特。

1961 年潘特病逝后，德赛更成为炙手可热的第二号人物。照常理，由他来接替尼赫鲁应无问题。党内外有许多人都看好德赛。他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暗自得意，似乎总理职位非他莫属。遗憾的是，他没有取得尼赫鲁的信

任。他在党内是以右派面目出现的，反对任何实质性改革，保守得甚至连种牛痘和打预防针也加以拒绝。让这样的人接自己的班，以民主派自居的尼赫鲁又怎能放心呢？为此，尼赫鲁不但不安排德赛接班，相反还有意设置障碍。潘特病逝后，按惯例其内政部长之职本应由德赛接任，但尼赫鲁却把这个重要职位给了夏斯特里。当尼赫鲁发现德赛在极力谋求党的副领袖职务时，他又把党的副领袖贬低成没有实权的闲职，使德赛不值得为此奋斗，而由两名资历浅的党员担任，从而阻挡了德赛通往权力之巅的道路。

无疑地，时年 58 岁、从事党务工作并担任内阁部长已颇有些年头的夏斯特里，也属于国大党内资历较深的阁员之一，但比起德赛来还是稍逊一筹。不过，他为人谦和，谨小慎为，在国大党内和公众面前是一个好好先生的形象。人们对他的口碑不错。他也博得了尼赫鲁的好感。尼赫鲁也有意栽培他，让他在潘特病逝后出任地位重要的内政部长。看来夏斯特里是总理职位颇具竞争力的一名种子选手。

英迪拉·甘地一时也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人们有关她的猜测和议论也最多。当然，这也不足为怪，谁叫她是总理的女儿呢？早在英·甘地出任国大党主席前后，就有人认为尼赫鲁已经在着意栽培她，为的是让她将来接他的班。有人更是说得神乎其神，说尼赫鲁为使英·甘地直接继承他的职位曾有过一个秘密计划，他们的依据是尼赫鲁在 1961 年说过的一句话。当时，针对党内存在争夺党的副领袖职位的倾向，尼赫鲁为了消除有人把此职当作通向总理职位的进身之阶的幻想，指出未来的领袖“大有可能不是来自议会党团，而可能是议会党团外面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领袖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各种政治因素和个人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并且需要经过适当培养才能担此重任。那些人认为尼赫鲁的这句话无意中一语道破了他为女儿前途打算的心思。

在印度那样封建残余和家长制传统都相当浓厚的国度，人们有类似的想法和说法也不足为怪。不过，尼赫鲁本人和英·甘地对那些说法都极力否认。在一个公开场合，尼赫鲁曾这样说过：“王朝更迭的概念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议会民主制的国家来说，是完全不合适的。我本人自然排斥这种想法。”他生病后，曾有 12 个邦的首席部长建议让英·甘地入阁当外交部长，为尼赫鲁所拒绝。他甚至对美国记者韦尔斯·汉根在书中把他的女儿与他的继承人问题扯在一起感到不快。他曾为此恼怒地问英·甘地为什么同意会见他，回答他的提问。英·甘地本人在其《自述》中也说：“说我父亲推荐我上台纯属无稽之谈。”

就算把英·甘地也算作总理职位的竞争者之一，她的实力和资历也都不如德赛和夏斯特里，从政经验也远不如他们丰富；唯一占优势的是，她是总理的女儿。

就在人们私下里谈论谁是尼赫鲁的继承人问题时，一个名为“卡马拉季计划”的计划出笼了。鉴于它出笼的时间和内容，人们自然不久就把它与尼赫鲁的继承人问题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该计划的始作俑者是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在泰米尔纳杜邦任首席部长已达十年之久的库马拉斯瓦米·卡马拉季。计划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要求在中央政府中担任内阁部长和在地方各邦中担任首席部长的国大党的高级领导人辞去政府职务，以便一心致力于党务工作。卡马拉季首先将计划告诉了奥里萨邦首席部长比朱·帕特奈克。1963 年夏，帕特奈克来到克什米尔，将计

划告诉了正在那里度假的尼赫鲁。尼赫鲁同意之后，接着又到海得拉巴同党的其他领导人逐一进行密谈。8月，计划由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和全印委员会讨论通过。尼赫鲁带头执行，向工作委员会提出辞呈。他的辞呈自然遭到了拒绝。但这么一来，中央内阁部长和邦首席部长都纷纷提出辞呈，不管内心是否愿意。接着，尼赫鲁在工作委员会上宣布了部长免职名单，其中有中央内阁部长和邦首席部长各六人。在中央内阁部长中，财政部长德赛首当其中。此外，还有贱民出身的交通运输部长贾格吉凡·拉姆、内政部长夏斯特里等。邦首席部长有卡马拉季、帕特奈克等。尼赫鲁在会上还向未被免职的部长们提出：“可能在稍晚的时候，我还要提出一些其他任免建议。”但后来他没有再作出新的决定，该计划一次性执行完毕。

这就是所谓的“卡马拉季计划”和它的执行过程。计划在当时曾成为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和热门话题，由它引发的争议直到现在都没有完结。

在当时，公众舆论曾对该计划持欢迎态度。这种自愿放弃权力的做法，使许多人想起圣雄甘地的公仆遗风。不明就里的人们甚至把它看作是国大党振兴的一个起点。

国大党内有人认为，卡马拉季计划名义上是为了加强国大党内部的团结和活力，消除党内腐败现象，但其实际目的有二：一是为了缓和党内的权力之争，使尼赫鲁度过政治难关；二是在未来总理人选上为安排进对自己口味的人扫除障碍。这后一点与尼赫鲁的愿望不谋而卡马拉季计划反映的实际上是国大党内的一个派别——辛迪加派的利益和要求。这个派别形成于1963年初，其成员除卡马拉季外，还有西孟加拉邦党魁阿图尔亚·高士、孟买市党魁S.K.帕蒂尔、安得拉邦首席部长桑吉瓦·雷迪和迈索尔邦首席部长尼贾林加帕。他们都是地方实力派人物。相同的政治观点把他们暂时联系在了一起。他们都清楚他们自己因执政的地区都属于非印地语地区，当总理的希望十分渺茫，不如利用他们在地方上的实力地位和和在中央的政治影响，联合起来左右总理继承人的人选，把一个既性情驯服又缺乏经验的人推上总理宝座，以便日后在幕后操纵他。这便是辛迪加派提出“卡马拉季计划”的真正动机。他们对这个计划感到自信，认为在左右他们各自所在邦的国大党议员的基础上，再形成合力，就一定能在尼赫鲁的继承人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

那么，究竟让谁当尼赫鲁的接班人比较对他们的口味呢？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看中了为人敦厚、性情温和的夏斯特里。他们认为如拥立他当总理，一定可以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上。为此，他们在炮制出“卡马拉季计划”后不久，又于同年10月在安得拉邦的提鲁帕蒂镇召开碰头会，决定推出夏斯特里作为尼赫鲁的继承人，并竭力将他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德赛淘汰出局。

对于辛迪加派的计划和动机，老谋深算的尼赫鲁岂能不知。不过，他正苦于无良策搞掉德赛，卡马拉季计划在无意中帮了他的忙，使他得以毫不费力地弄掉他所不喜欢的人，为他心目中理想的接班人夏斯特里扫清障碍。所以他很快便接受了这个计划。也有人倾向于认为，这个计划是在尼赫鲁本人的一手策划和授意下出笼的。

既然尼赫鲁已决意让夏斯特里接他的班，那么为什么他在将德赛等人免职的同时，也免掉了夏斯特里的职务呢？这个看似费解的问题其实并不难理解。有人认为这也体现了尼赫鲁的权谋：如果只将德赛排除出阁而保留夏斯

“辛迪加”一词是借用垄断资本和联合组织的名称，表示国大党内观点相近的实力派领袖的联合。

特里，那事情就做得太明显了，德赛必然不服，也难以服众；而将二人同时罢免，则谁也无话可说，日后再随便找个理由让夏斯特里重新入阁。

卡马拉季因其“忠诚”而得到了报偿。他于1963年11月在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上被选为党主席，并得以连续四年担任此职。两个月后，夏斯特里因尼赫鲁中风病倒，需人协助其工作的堂而皇之的理由而得以重新入阁，出任不管部长。此时德赛已识破所谓的“卡马拉季计划”只不过是“马基雅弗利式的诡计”，并愤怒地进行谴责，但为时已晚。一切都似乎是在按照辛迪加派的计谋顺利地发展着。

尽管恼羞成怒的德赛固执地认为尼赫鲁实行卡马拉季计划实际是在为自己的女儿英·甘地顺利接班铺平道路，但这种看法的证据并不充分。如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按照常理，尼赫鲁就应当设法笼络住辛迪加派，以换取他们将来对其女儿的支持，可实际上尼赫鲁除了对卡马拉季一个人比较赏识外，并没有这样做。这就意味着，英·甘地以后要想在政坛上发迹，基本上得靠自我奋斗。

“老太太内阁中唯一的男子汉”

尼赫鲁逝世两周后，在以卡马拉季为首的辛迪加派的一手策划和操纵下，印度议会两院于6月9日一致推选夏斯特里任第二任总理。至此，有关尼赫鲁的继承人之争暂告一段落。

新政府基本上保留了上届内阁的大多数成员。但为了保持各派政治势力之平衡和政府的相对稳定，弥补夏斯特里作为国家领袖经验不足和威望不高的缺憾，新政府采取了以总理夏斯特里和国大党主席卡马拉季为首的集体领导的方式。这个集体中有不少是辛迪加派人士。卡马拉季曾这样评述夏斯特里政府：“任何人都不能扮演已故伟大领袖（指尼赫鲁）的角色，承担落在我们肩上的责任。唯有我们采取集体负责、集体领导和集体的方式，才能完成摆在我们面前无可推卸的伟大任务。”

然而，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如果没有尼赫鲁家族中人参加，它将是残缺不全的，其稳定性也会大打折扣。夏斯特里对此很清楚，所以他决定邀请英·甘地入阁。

此时的英·甘地尚未完全从丧父的悲痛中摆脱出来，无意参政。她的两个儿子都在英国。拉吉夫正在伦敦帝国学院学习；桑贾伊迷恋汽车，正在罗尔斯-罗伊斯工厂学贸易。她告诉她的老朋友、美国驻印大使切斯特·鲍尔斯，说她真想摆脱眼前的一切，到伦敦去，同儿子住上几个月。她甚至向一位姑母说过，她从伦敦回来后，想在台拉登或喜马拉雅山山麓的某个地方找一处小别墅，过宁静的生活。于是，她以要为父亲服丧为由拒绝了夏斯特里的请求。

熟悉英·甘地的人们都倾向于将此举看作是她耍的一个小小的政治手腕。他们绝不相信这个从小参政意识就非常强烈的女人会轻易退出政治舞台。这些人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英·甘地不急于从政，自有她的打算：可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曾任佛罗伦萨共和国要职。他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结束意大利政治分裂的局面，建立统一的君主国，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此即所谓的马基雅弗利主义。后人把他所施展的谋略叫做“马基雅弗利式的诡计”。

以冷静地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有助于消除公众的习惯看法——她进入政界只是因为她是尼赫鲁的女儿；再说，她知道夏斯特里会再来找她的，因为他需要她。既然如此，她就应该把姿态做足。

果然，不出英·甘地所料，夏斯特里再来找她了。经他再三恳请，英·甘地才“勉强”同意在为父服丧一个月后入阁。至于让她担任任何职，夏斯特里“慷慨”地说，除了内政、国防、财政三个部的部长职位（他的理由是它们已为三个资深的党员所占据，他不好动他们）以外，她可以随意挑；即使她想当外交部长（此职过去一直由尼赫鲁兼任），他夏斯特里也会满足她的要求。出乎夏斯特里的意料，英·甘地只选择了“相对轻松”的新闻广播部长一职，她的公开理由是自己对行政管理工作经验不足，执掌那些重要部门的印把子恐难胜任；实际理由可能是，既然她无望进入上述三个最重要的部，那么进其他哪个部也就无所谓了，不如干脆进一个不太起眼的部，那样别人就更不会说她有政治野心了。夏斯特里见英·甘地情愿如此，自然乐得同意。为了表示对她的重视，他破格将她的部长位次排在第四位，甚至让她进入内阁紧急委员会。

夏斯特里并非像其外表给人们的印象那样老实，相反他相当圆滑。他之所以一再邀请英·甘地入阁，除了认识到这有利于他的政府的稳定外，更多地是做给人看的。他不愿世人把他看作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谁都清楚，他夏斯特里之所以能当上总理，主要应归功于先总理的提拔和栽培。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身边存在任何一位潜在的竞争对手，无论这个对手是德赛、英·甘地，还是其他什么人。因此，他表面上对英·甘地毕恭毕敬，实际上对她处处设防。

1964年7月，由于心脏病发作，夏斯特里不能到伦敦去参加一年一度的英联邦总理会议，便请英·甘地代他去参加，但他又不放心，又派资深位尊的财政部长T.T.克里希纳马查里与她同行，并授意后者尽量由他代表印度在会上发言。英·甘地当然清楚夏斯特里这一番安排的用心，心中颇感不满。在伦敦期间，当她从当地的报纸上看到夏斯特里已任命斯瓦兰·辛格为外交部长时，更是向人们表示了公开的不满。她认为夏斯特里作出决定前本该先同她商量。

夏斯特里执政期间，基本执行了尼赫鲁的政策，但也作了某些调整。夏斯特里比较务实，他对外资的兴趣较大，不反对外资参与根据尼赫鲁的政策应由国家经营的基础工业；他受圣雄甘地的影响较大，主张乡村自给自足，多发展小型工业，反对机械化大工业；在政府投资上，他更侧重农业。

夏斯特里的政策调整，既是为客观形势所逼，也是主观心态使然。当时的客观形势是，尼赫鲁生前制订并执行的“三五计划”和农业发展战略已告失败，致使农业连年减产，粮食严重短缺；1965年爆发的第二次印巴战争加剧了经济危机；与此同时，在印度发生了语言骚乱。他的主观心态是，他尽快摆脱尼赫鲁家族的阴影。虽然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尼赫鲁的支持才飞黄腾达的，但也正是这一点造成了他心理的不安和自卑，使他总感到在人前抬不起头来，觉得出身高贵的尼赫鲁家族中人从心底里并瞧不起他这个寒门出身、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不愿他担任政府最高领导人。因此，他认为作为一个总理，必须有自己的势力，取得独立的地位，而不能依附于尼赫鲁家族。对于夏斯特里的政策调整，尼赫鲁家族中人自然不满意。在一次党的集会上，英·甘地公开指责他背弃了她先父的政策纲领。潘迪特夫人也说夏斯特里政

府的政策不过是拼凑妥协的产物。

英·甘地作为新闻广播部长政绩平平，倒是另外的两件事使她获得了意外的声誉，也招来了夏斯特里的猜忌和敌视。

1965年的1月，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邦就印地语代替英语作为印度官方语言问题，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1950年1月26日生效的印度宪法，规定15年后的同月同日用印度第一大民族印度斯坦族讲的印地语取代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宪法的这一规定引起了南方各族的强烈不满。他们不承认印地语的官方语言地位，把印地语看作仅仅是北方的语言，担心以印地语作官方语言会加强北方各邦在中央政府中的统治地位，而把国内的其他各邦降低到一种相对附属的地位。尼赫鲁鉴于在语言邦划分问题上的教训，担心硬性推广印地语会挑起民族情绪，因此在语言问题上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他指出推广印地语要稳妥灵活，不能靠行政命令和感情用事，不能压制其他任何一种印度语言。他表示同意在1965年印地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同时，英语可继续留用。这样，南方各邦人民的怒火才逐渐平息下来。但事情并没有了结。

尼赫鲁去世后，夏斯特里内阁中有几名部长，尤其是内政部长南达仍然热衷于推广印地语，从而再度引起南印度人民的不满。他们要求政府修订宪法，以确保尼赫鲁的承诺能够得到继续兑现。但他们的要求被夏斯特里总理以担心导致地方印地语各邦的不安定为由拒绝了。于是，一场大规模的骚乱即将爆发。

1965年1月26日不以印地语取代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法定最后期限。就在这一天即将到来的前几天，南印度以马德拉斯为中心的泰米尔地区发生了猛烈的暴力行动。政府机关大楼被焚毁，铁路遭破坏，示威群众与军警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这种反印地语的民族情绪如此强烈，以致两名南方籍的中央部长也受了感染。他们愤而辞职，以示抗议。

面对严峻的局势，无论是总理夏斯特里，还是国大党主席卡马拉季，都在新德里隔岸观火，希望骚乱能自动平息下来。夏斯特里很清楚，作为一个北方人，哪怕他贵为总理，他在此时此刻就此问题发表的任何讲话，正在气头上的南方人都不一定听得进去。

按照职务的分工，治安问题和官方语言问题都是内政部的事，与新闻广播部无关。英·甘地却自告奋勇，乘飞机去马德拉斯帮助解决这场危机。作为一名中央部长，又是北方人，她的到来很可能会再次引起民众的骚动，甚至危及她自身的安全。然而，事情恰恰相反，英·甘地的到来使群众的愤怒开始趋向缓和。她一方面同发起抵制印地语运动的民族领导人谈话，另一方面又同推广印地语的有关当局负责人谈话。两方面都注意听她的话。她在努力安抚南方各邦时，答应的条件并未超出夏斯特里已公开许诺的范围，但她的话却令南方人感到信服。这显然是她父亲的威望和影响使然，而这正是夏斯特里总理所缺乏的。

夏斯特里虽然从内心感激英·甘地帮助他解决了这场语言危机，对她的胆识和能力也不得不暗自佩服，但同时也对她的行为深感疑忌和不满。他曾对他的朋友说，英·甘地的所作所为已超出了她自己的职权范围，属越俎代庖，跳到了他总理的头上。英·甘地闻言，不禁怒火中烧。她认为自己不仅是一名新闻广播部长，而且是一位国家领导人，她那样做纯粹是为了国家利益。她对印度记者因德尔·马尔豪特拉说：“如果我今天辞职，你认为政

府能生存下去吗？告诉你，我不会辞职的。是的，我不会，我已跳到了总理的头上。如果需要，我还会这么做。”除了英·甘地，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把这样的话随便告诉“无冕之王”。

英·甘地做事有自己的原则。她认为凡是应该做的事情都值得她去做，而且应当尽可能地做好，不管此事是否属于她的职责范围，也不管别人会怎么看。正如她在《自述》中所说的那样：“我决不把履行职责和担任领导这两个词混在一起，……每当我看到有些事情该办而未办时，我就热切地想去干。这就是我的态度。”“我离开伦敦途经里斯本时，帮助照料过犹太人的女孩子。这不是我的份内事。我也没有受人之托，只不过是内心驱使我这样做罢了。你看到有些事情应该做，或者有人需要帮助时，你就必须行动起来。”因此，她认为当党和国家需要她时，她就应该挺身而出，决不能袖手旁观。但是，英·甘地的办事原则却为夏斯特里所不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与马德拉斯发生的语言骚乱几乎同时，居住在印度西北部的锡克教徒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也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自从印度独立以来，锡克人就一直在要求建立单独的旁遮普语邦，以结束一邦两语（旁遮普语和印地语）并存的状况，但他们的要求从未得到满足。这次他们忍无可忍了。他们的领袖桑特·法特赫·辛格公开扬言，如果中央政府再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将自焚以示抗议。

其时，第二次印巴战争即将爆发，中央政府正为备战而忙得不可开交。夏斯特里情急之中，不得不允诺一俟战争结束就考虑锡克人的要求，桑特·法特赫·辛格这才同意暂不自焚。

夏斯特里一言既出，不做出点姿态也说不过去。为此，他任命了一个内阁委员会处理此事，可让谁当头呢？他不假思索地想到了英·甘地这只“出头鸟”。他想，你英·甘地不是爱管闲事吗？就让你摸摸这根扎手的刺吧。英·甘地当然明白夏斯特里心中的“小九九”，但为了顾全大局，她二话没说，就走马上任了。

然而，英·甘地万万没料到夏斯特里竟会拿这件事刁难她。当她每次都旁遮普问题找他商量时，他都以公务繁忙为由避而不见。英·甘地为此抱怨不已。

1965年的最后一天，英·甘地再次向夏斯特里提出旁遮普问题已迫在眉睫，必须马上采取对策。夏斯特里仍想拖延，说当晚有一个重要会议，等开完会再说。当时碰巧克里希纳马查里也有事找总理，他们俩便一起等待。好不容易等到夏斯特里开完会，可一见面，克里希纳马查里就与总理因话不投机而争吵起来，英·甘地见此情形，知道同夏斯特里谈只是白费口舌，只得悄悄退出，窝着一肚子火回家。一小时后，克里希纳马查里来告诉她，他因无法忍受总理的轻视，已愤然辞职。

看到先父生前的忠实支持者遭到如此下场，英·甘地不禁悲从中来。尽管她认为“这样一个内阁并不值得留在里面”，但她是不会自动辞职的，就像她曾经说过的那样。这倒不是说她个人特别贪恋权力，而是因为她觉得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留在任上方便一些。

1965年真是印度独立后的一个多事之年。马德拉斯的骚乱刚刚平息，旁遮普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西北边境又战云密布。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为着它们那悬而未决的老问题——克什米尔问题，关系再度紧张起来。

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是英国殖民者在进行印巴分治有意播下的一粒引起

日后两国不和的种子。印巴两国早在建国后不久，就曾为此爆发过一次大规模战争，看样子这次又免不了一战。同发生在 1965 年的前两次事件一样，英·甘地这次又卷了进去。这真是应了一句中国老话：阵阵少不了穆桂英。

与前两次事件不同的是，英·甘地这次是无意中卷入这场战争的。这年 8 月初，英·甘地因椎间盘突出症的旧病复发，决定到克什米尔去度假休养。于是，她带上心爱的小儿子桑贾伊，登上了前往克什米尔的首府斯利那加的班机。在飞机上，他们遇到了克什米尔邦的首席部长萨迪克先生。萨迪克对英·甘地竟然在此时去克什米尔度假感到大吃一惊，他说：“我不能说服你们这些住在德里的人，我认为侵略的威胁比你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不知离事态爆发究竟还有多长时间！”

萨迪克显然是指克什米尔局势。英·甘地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但对详情却不甚了解。她曾向人询问过，但得到的答复是：纯属谣传，不必当真。听了萨迪克的话，她这才觉得问题的严重性。

飞机在斯利那加机场降落后，早有一班地方官员在那里等着迎接，领头的是克什米尔邦的财政部长 D.P. 达尔。他的话证实了萨迪克的话：“打仗是肯定无疑的了，斯利那加郊区已经交火，再不采取行动，就救不了咱们啦！”他请求英·甘地参加他们的邦政府紧急会议。英·甘地心想，这假看来是休不成了，得，且去参加会议，再作计较，便爽快地答应了。

在邦政府会议上，有人告诉她，巴基斯坦非正规军正在对克什米尔地区进行“渗透”，战争随时会爆发；而印方显然准备不足，斯利那加的军队和警察都不够。形势危急，人们劝英·甘地立即飞返新德里。

此时再回新德里就意味着当逃兵，英·甘地可不是这样的人。她面对危急形势，指挥若定，先是赶紧向新德里打电话，汇报克什米尔的最新局势，但她得到的答复是不必惊慌。新德里的那班官僚深居简出，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反而责怪英·甘地是大惊小怪。

英·甘地不再等待新德里方面的指示，这里每一分钟都充满着危险。她当机立断，打电话给邻近的旁遮普邦的首席部长帕塔普·辛格·凯隆，请他派兵增援，至少派些警察来。凯隆得知打电话的是英·甘地，便痛快地答应了。

指挥打仗本来是将军们的事，与她这个新闻广播部长毫无关系。英·甘地的所作所为再一次证明了她的原则：凡是她认为值得做的事情都应尽力去做，即使那件事并不属于她的职责范围。然而，英·甘地此次的“越权”行为并未到此为止，更绝的还在后头呢。

战争正式爆发后，英·甘地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视察。她的到来，使将军们提心吊胆，生怕她有个闪失；却使士兵们深受鼓舞，他们说她是“老太太内阁中唯一的男子汉”。

回到德里后，英·甘地立即就如何与巴基斯坦作战问题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提交给内阁紧急会议。不料，总理夏斯特里根本不予重视。英·甘地回忆说，当时，他“小心翼翼地从我手中接过报告，就像抓着一只死耗子的尾巴一样，然后问道：‘这有什么用？’便随手交给了一位秘书”。此后报告便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英·甘地万万没有想到，在国家处于危急关头，夏斯特里为了一己之私，仍念念不忘猜忌和排挤部下。

22 天的第二次印巴战争最后以印度的胜利而告终。

对于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普通民众的评价往往是简单、朴素而直接。

这种情况在战争的状态下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战争打赢了，荣誉和鲜花会集于他的一身，他甚至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举国崇拜的英雄，并因此而名垂青史；而一旦吃了败仗，各种各样的指责也会扑面而来。而且，在作非此即彼的评价的时候，人们很少会想到造成战争成败的种种其他因素，如战争的性质、规模、交战国的实力对比等，以及其他人物如在战争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们的作用。战争对一个最高领导人带来的评价是如此的大起大落，以致无论古今中外，有许多大人物常常爱打战争牌。

在这方面，同为总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夏斯特里与尼赫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无论从人品、学识、政治家胆略、气魄和政绩以及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前者都不堪与后者相提并论，他的政府甚至被人们戏称为“老太太内阁”。但是，就在他的任内，印度打赢了一场战争，尽管这场战争从实力上说是一边倒的战争。人们把战争的胜利归功于他领导有方（尽管他起的作用并不大），这便使他一夜之间成了全民崇拜的英雄，他那瘦小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也突然变得高大起来，使他成了万众景仰的男子汉。而名副其实的伟人尼赫鲁仅仅因为印度在他晚年发动的那场印中边境战争（撇开战争的性质不论，这场战争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交战双方的实力来看，都不可与印巴战争同日而语）中吃了败仗，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从此便一落千丈，一代英豪的光辉形象因此而蒙尘，他的身体健康也因此而严重受损。此时大概没有多少人会记起印度打赢第一次印巴战争也是在他的任期。以成败论英雄，这似乎是人们在评价人物时易入的误区。

印巴战争的胜利使夏斯特里的声望达到了顶点，也使包括英·甘地在内的任何其他人都相形见绌。一时间，她的前景变得黯淡起来。如果不是此后不久情况发生了重大的戏剧性的变化，英·甘地的政治生命也许就到此为止了。是故人们常爱说这样一句话：命运真会捉弄人。

1966年1月10日，正在苏联的塔什干与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举行停战谈判的夏斯特里，在签署《塔什干协议》几小时后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英·甘地黯淡的政治前景倏忽间出现了一线转机。

如愿以偿

随着夏斯特里的去世，总理继承人问题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夏斯特里死得过于突然，令人措手不及，就连辛迪加派也因无准备而未事先选定一致的继承者。一时间，东海龙王、南海观音、西天王母，都在印度的政治舞台上表演起来，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众多的“表演家”中，有两位尤为出色。他们是老“演员”德赛和内政部长南达。另有一人起初并未参加台前的“表演”，只是到了最后才公开登台亮相，但她一出场便出手不凡，很快将“演出”推向了高潮。看来此人深谙“舞台表演”的奥秘在于压轴戏，只有她才堪称最优秀的“表演家”。她是谁呢？

辛迪加派再次为确定新总理人选而忙碌起来。

作为头号“种子选手”，德赛的实力无疑是最强的。尼赫鲁在世时他就是印度政坛上的第二号人物，在参与尼赫鲁的继承人的竞争中因锋芒太露而被淘汰出局。夏斯特里执政后，他自恃资格老，认为不屑与之为伍而不愿出山。因此，自1963年8月他被“卡马拉季计划”敲掉了乌纱帽后，便一直赋

闲在家。尽管如此，他在国大党议会党团中仍然拥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戴。德赛本人也自信此次总理职位非他莫属。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正是这盲目的、过分的自信使快要煮熟的鸭子又飞了，一场美梦化作了黄粱。

平心而论，德赛此次当选总理的可能性极大，因为反对他的人并不多。遗憾的是，他并未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对曾经拉他下马的以卡马拉季为首的辛迪加派仍然耿耿于怀。他不仅没有与辛迪加派表示和解，而且在提到这些人时总是公开表示鄙视和敌意。他的顽固刻板的形象也丝毫未改。低估辛迪加派的实力和能量，这是德赛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

辛迪加派已经看到，即使像夏斯特里那样表面上温良谦恭的当权者也不时地借机削弱他们的势力。他们担心像德赛那样一个专横跋扈出了名的人一旦大权在握，肯定更不会让他们有好日子过，更不用说左右他了。因此，极善于权衡利弊得失的辛迪加派这次从一开始就不想支持他。

作为一名老资格的政治家，南达也具有一定的实力。他曾在尼赫鲁去世后当过代总理。颇具戏剧性的是，夏斯特里去世后他又再度出任代总理。这次他想竭力去掉那个“代”字。但是，此公也许是想当总理心切，过于投机钻营，在公众面前形象不佳。

既不想支持德赛也不想支持南达的辛迪加派自己也推不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人选。他们尽管擅长幕后策划，但他们各自的影响只限于他们各自的邦。即便是鼎鼎大名的卡马拉季，也不具备全国范围的号召力，因为他既不会讲印地语，也不会讲英语。辛迪加派的优势表现为他们的合力。

辛迪加派终于把目光投向了先总理的女儿英·甘地。他们选择她，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认为她年轻，缺乏从政经验，易于控制；更重要的原因是一年以后，印度将举行独立后的第四次全国大选，也就是尼赫鲁逝世后的第一次大选，届时国大党将同其他党派展开角逐，这对国大党是一个考验。尽管国大党作为全国第一大党实力雄厚，但丢失政权的危险也不是一点儿也没有。因此，为下次大选计，国大党此次内部选举就必须挑选出全党一致公认的领袖。遍观国大党内，无论是德赛、南达，还是其他什么人，都只拥有部分支持者，唯有英·甘地具有最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而这无论是对保持国大党的团结还是国家的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英·甘地显然具有其他人所不具有的优势，这些优势可以保证她赢得尽可能多的支持者。英·甘地出身于高贵的潘迪特婆罗门，容易取得上流社会的认同；她一向以宣扬平等、鼓吹世俗主义而著称，深受贱民和穆斯林的爱戴；她既懂印地语，英语也说得呱呱叫，加上她在官方语言问题上灵活而务实的态度，使她同时取得了印度南北居民的好感；她的性别又容易使她赢得妇女们的倾心；作为夏斯特里内阁的新闻广播部长，她虽然政绩平平，却给了新闻界以言论自由，允许政府控制的电台持不同看法，放松了对电影的审查，因此，她也得到了知识分子的青睐；此外，她作为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女儿的身份，也是任何人所不具备的。

尽管具有这么多的优势，但在角逐最高权力的问题上，英·甘地仍相当谨慎。她深知，心急吃不得热豆腐，急躁冒进是大忌。德赛在两年前就是因此而吃了大亏。他不待时机成熟，就盛气凌人地公开宣布自己为总理候选人，甚至在尼赫鲁的葬礼上也以当然的入选者自居，从而犯了众怒，估计此次德赛也难免重蹈覆辙；还有南达也会如此。因此，她告诫她的朋友和支持者们不要操之过急，不要过早地泄露天机，要静观事态的变化，让德赛和南达等

人尽可能进行充分的表演。与夏斯特里邀请她入阁时一样，她的策略仍然是，尽量装出一副无意追逐官职的样子，让官职来找她。

果然不出英·甘地所料，德赛一开始就咄咄逼人，大有不争到总理职位不罢休之势。在1964年确定总理人选时，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曾提出一项原则，即为了避免影响党的团结，必须在党内意见基本一致的前提下选出新的领导人，竞争者之间不得公开进行较量，而要听从国大党议会党团的大多数成员的裁决。卡马拉季是在私下向各个成员个别征询意见后，宣布大多数赞成夏斯特里的。德赛虽然认为这个裁决有失公平，但因害怕承担分裂党的罪责，也只好服从。但这次他什么也不顾了，不愿再接受按意见一致原则进行的裁决，公开宣称无论如何也要决一雌雄。看来他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南达也当仁不让，大吹大擂，决心角逐到底。

当德赛和南达在擂台上捉对厮杀之时，英·甘地却在一旁观战，不动声色。

看来，英·甘地以退为进、后发制人的策略比起德赛和南达赤裸裸的表演要高明许多。在选举开始的前几天，德里大多数记者都没有注意到她可能是一位问鼎者；即便有人提到她，也总是把她的名字列在一长串候选人名单的末尾。

德赛和南达二人酣战到第五天，都感到声嘶力竭、疲惫不堪了。德赛的政敌中，那些既不愿支持南达，也不愿支持其他人的人，都倾向于支持英·甘地；那些仍然怀念尼赫鲁，对他的忠诚和爱戴之情丝毫未减的人对他的女儿也颇为倾心。一时间，英·甘地前几天颇有些冷落的门庭——萨夫达尔路1号官邸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人们怀着不同的动机，纷纷前来，表示支持英·甘地竞选。辛迪加集团没有看错，英·甘地果然有能力将大多数党员团结在自己周围。经过卡马拉季的进一步疏通，国大党执政的各邦首席部长中，有十名公开表示支持英·甘地。形势已日趋明朗化。

英·甘地认为时机已到，便接受了卡马拉季的劝驾，公开了自己的候选人身份。但直到此时，她依然不露锋芒。她不为了拉选票而自吹自擂，也不与对手展开舌战，或者在私下里贬低对手，就像德赛等人所做的那样。她的形象总是那么温文尔雅，礼让谦恭。她给国大党内的人们这样的印象：她之所以同意接受候选人提名，完全是为了国大党的整体利益。

有趣的是，首先提名英·甘地的并非辛迪加派，而是一群国大党首席部长，领头的是德瓦卡·普拉沙德·米什拉。这位经过几十年的宦海沉浮，已变得极为圆滑、惯于见风使舵的中央邦首席部长，看来并没有忘记英·甘地当年在她父亲面前对他的提携，也知道将赌注押在她身上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政治收益。米什拉率领这群国大党首席部长们发表了一份宣言，表示支持英·甘地作为夏斯特里的继承人。宣言刚发表，辛迪加派就宣布支持英·甘地。

眼看英·甘地上台已成定局，南达还算有点自知之明，马上退出了竞争；德赛却不甘心，还想作最后一搏。他给每个议员写了一封长信，并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挂了电话，劝说他们投自己的票。

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1966年1月19日，国大党议会党团在庄严雄伟的具有罗马式大柱的圆形议会大厦内举行隆重集会，就新总理的人选进行投票。大厅内议员们为此忙个不停，大厅外的人们则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着结果：当会议执行主席萨特亚·纳拉因·辛哈出现在走廊上时，人们不约而同

地大声问道：“怎么样？获胜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辛哈大声公布了选举结果：英·甘地以 353 票对德赛的 169 票的绝对优势获胜，当选为国大党议会党团领袖。按照宪法的规定，议会中的多数党领袖是当然的总理。

人群中立刻欢声雷动，“英·甘地万岁！”“红玫瑰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经久不息。人们之所以欢呼红玫瑰，是因为尼赫鲁终其一生，都爱在胸前的衣扣中插一支红玫瑰。他们把英·甘地的胜利，看作是红玫瑰的复归。

在印度这样一个典型的男权国度，一名妇女当选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这在当时引起了爆炸性的轰动。印度国内外的报刊争相报道这一新闻，其中有一篇报道写得相当精彩：

甘地夫人是历史上第二位担任总理职务的妇女。第一位是锡兰的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选举完毕，甘地夫人离开议会大厅，群众把无数的花瓣撒在她的身上。她吻了许多女议员，包括她的姑姑维贾雅拉克希米·潘迪特夫人。在这之前，一位女议员在她的披肩上别了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这朵花就像她的父亲——印度第一任总理——经常插在胸前衣扣上的一样。

甘地夫人通过欢呼的人群时，保卫人员不得不手挽手地保护着她，以防她被撞倒。许多人被挤到干涸的池子里，这些池子原来是供人观赏的。

当选后，甘地夫人到议会大厦邻近的总统府，拜会了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总统。总统邀请她组织政府。

晚上，在萨夫达尔路 1 号甘地夫人白色官邸的花园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她身穿熠熠闪光的白莎丽，披着一块褐色的羊毛披肩，站在一堆话筒前，回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200 多名记者在她家的花园里挤来挤去，踩乱了她家的花坛和篱笆。

八、在萨夫达尔路 1 号（一）

组阁

一辆“总理”牌高级轿车将新总理英·甘地送到萨夫达尔路 1 号官邸。自出任夏斯特里内阁的新闻广播部长起，直到 1984 年遇刺身亡，其间除下野的两年多时间被迫迁出外，她一直住在那里。因此，萨夫达尔路 1 号可以说是英·甘地总理任期的代名词。

英·甘地这颗耀眼的新星终于升到了九重天。她任总理之时，年仅 48 岁，比她的父亲和夏斯特里开始当总理时还年轻 10 岁。印度国内外的人们都对作为一名妇女当选为政府最高领导人颇感兴趣。

印度真是让人不可思议的国家。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印度一直是一个典型的男权主义社会，嫁妆制度、闺阃制度、寡妇自焚殉夫恶习，是套在广大印度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童婚和溺杀女婴，则是对印度女童的严重摧残。直到现在，诸如此类的事件仍不断见诸报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重男轻女的社会，却比较能容忍妇女参政议政，并对妇女担任官职能以平常之心待之。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不仅成千上万的男人参加了争取独立自由的民族运动，许多妇女也参加了，其中有些人也为之被捕坐过牢。曾经有两位妇女还当选过国大党主席。印度独立后，也先后有好几位妇女在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中任职甚至高居部长职位。早在英·甘地当选为总理以前，已有三名妇女担任过邦长，而且这几个邦都是印度举足轻重的大邦，英·甘地的家乡北方邦便是其中之一。但出任国家总理，英·甘地却是印度妇女中的第一人。

在那些素称经济发达、自诩男女平等的西方社会，人们对待妇女参政问题并不比印度人开明多少。他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像印度人那样受传统束缚的保守民族竟会选择一名妇女治国。甚至两年以后，还有西方人对此感兴趣。有人问英·甘地，女人的身份在政治活动中是不利条件还是有利条件。她答道：“我认为，我是个女人这一点毫无特殊之处。这又是个把人分等分类的问题。如果你认为这项工作只有男人能做，那就是说男人具有女人所没有的某些优点和才能。这些优点究竟是什么呢？是体力吗？不是！你如果想找弱点的话，任何人身上都有。我认为一个国家元首不应该考虑他或她属于哪个集团。不管这种集团是以性别、宗教还是种姓划分的。最重要的是，人民同意你当国家领袖。”

英·甘地当政之初，广大印度人对她作为一名妇女是否有资格当总理倒并不在意，但对她能否能够胜任这一职务而颇感怀疑和担心。

人们的怀疑和担心并非毫无道理。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英·甘地显然资历过浅。她的从政经历只是当了不到一年的国大党主席和不到两年的新闻广播部长。她在人民中如果说还有些声望的话，这声望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她的父亲尼赫鲁。爱屋及乌，这恐怕是当时为数不少的印度人的心态。

英·甘地上台后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不相当严峻的。从国内形势来看，印度首先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印度在第二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的十年间（1956—1966）实行重工（其中特别强调重工业）轻农的经济发展战略，致使经济失调、农业生产严重滑坡。印度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很大。即使在雨季也不能保证一定能丰产，何况印度在 1965 年和

1966年连续两年发生大旱，几乎滴雨未下。这对农业来说，简直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农业生产急剧萎缩，粮食大幅度减产。严重的粮荒使印度不得不依赖美国供应小麦，以维持人民生活最基本的必需。这种状况后来竟发展到美国的运粮船“来一船吃一船”的地步。但美国的援助毕竟是杯水车薪。饥饿像幽灵一样在印度大地上徘徊，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急剧上升。许多人饿死，为数更多的人被抛入了失业大军。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所发生的两次对外战争（即1962年的印中边境战争和1965年的印巴战争）使得军费开支激增，这对已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的印度经济来说，不啻雪上加霜。

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危机。印度公众对经济状况普遍感到不满。长期动荡不安的西孟加拉邦发生了哄抢粮食的骚乱，最后不得不动用军队才得以平息。学生骚乱原只限于几个敏感地区，现在犹如传染性强的皮疹一样，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平素不问政治的教师、医生、工程师等自由职业者为生活所迫，也纷纷来到大街上，要求增加工资和津贴。

因民族、宗教和语言等问题而引发的矛盾既错综复杂又互相交织。在东北，那加人的暴动尚未平定，米佐人又揭竿而起；在南方，语言矛盾一触即发；在西北，由于旁遮普语言邦问题久拖未决，锡克人已忍无可忍，一场新的动乱即将发生……

印度的对外关系也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糟糕时期。印度在1962年印中边境战争中的失败，严重地影响了它的国际声誉和国际地位。虽然印度因粮荒而不得不求助于美国，但由于美国在第二次印巴战争中曾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也由于印度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印美关系日益紧张。印英关系也因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在评论第二次印巴战争的起因时偏袒巴方而跌入了低谷。在不结盟运动中，印度尼西亚和加纳试图动摇印度的领导地位。更令印度不安的是，在第二次印巴战争中曾坚决支持印度的苏联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严重的国内国际形势对初任总理的英·甘地来说实在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她能否经受得住，人们有理由为她捏一把汗。

就是在国大党内，也有人认为英·甘地能否胜任总理一职感到怀疑。党内明显存在着力量强大的反对派。国大党外还有一些势力较强的在野党。英·甘地该怎样处理同他们的关系？第四次全国大选在即，英·甘地又凭什么赢得选民？这些也都是她面临的难题。

在英·甘地所面临的所有考验中，第一个必须经受的考验是组阁。从理论上讲，作为议会的多数党领袖，她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或改组政府，罢免与自己政见不合的阁员而无须取得总统和国大党主席的同意。这是宪法赋予她的权利。但在实际上，她却不得不就组阁问题主要与辛迪加派的首领、国大党主席卡马拉季进行磋商。组阁实际上是权力的一种分配形式，必须大体上反映各种政治派别的利益和要求。辛迪加派肯定会在这个问题上对总理施加影响，这本来就是它当初拥立英·甘地当总理的主要目的之一。

从政治经验不足、羽翼未丰的英·甘地不得不暂且听从辛迪加派的摆布。当然，对于一般性的组阁活动，辛迪加派并不加以干涉。这使英·甘地得以较顺利地决定一些阁员的去留任免。她让前政府的有些阁员继续留任，但也任命了若干名新部长，罢免了一些政绩平平的老部长，其中有的是自尼赫鲁时代以来就一直任部长，但尼赫鲁和夏斯特里因碍于情面而未向其开刀的元老，如司法部长阿·库·森和石油工业部长胡马云·卡比尔等。

但对于重要阁员的任免，辛迪加派决不袖手旁观。内政部长是个极为重要的职务。从传统上说，他在声望和权势方面仅次于总理，真可谓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内政部长还是中央政府和各邦之间的桥梁，负责全国的治安问题，掌管所有的文官和国内情报部门，权力极大。但这个要职却为英·甘地一向所不喜欢的南达所把持。英·甘地觉得南达的政治野心太大，她对不久前此人为竞争总理一职不惜搞小动作的拙劣行径还记忆犹新。此外，南达与占星家和宗教领袖过从甚密，这既有损于他本人和政府的形象，也使英·甘地感到恼怒。因此，英·甘地决定搬掉这块“石头”。为了不把事情做得太绝，她将不管部长一职给了南达，并请他当人民的议长。南达对此感到不满，立即先后跑到卡马拉季和总统拉达克里希南面前，申诉英·甘地待他不公。后二者都出面为他向英·甘地说情，给她造成相当大的压力。英·甘地最终不得不屈服，同意让南达留任。

辛迪加派的影响在另一阁员的人阁问题上也表现出来。1963年，尼赫鲁在以“卡马拉季计划”的名义罢免政府高级领导人时，曾将贱民出身的部长贾格吉凡·拉姆也请出了内阁。这样做的表面理由是让他好集中精力做党务工作，但实际上很多人猜疑贾格吉凡·拉姆是因贪污行为而被逐出政府的。贾格吉凡·拉姆因此对尼赫鲁怀恨在心，并迁怒于他的女儿英·甘地。在争夺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斗争中，他一直支持德赛，只是到了最后，眼看德赛失败已成定局，这才转而支持英·甘地。对于这样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的人，英·甘地怎能让他再入阁呢？但由于卡马拉季的干预，贾格吉凡·拉姆最终得到了一个职位。

在组阁问题上碰到的几个硬钉子，影响了英·甘地的就职情绪。1966年1月24日是她正式宣誓就职的日子，但就在头天晚上，她还为确定阁员人选问题与人争吵过。这一信息是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从她那张苍白而不快的脸上读出来的。

由于受到辛迪加派的掣肘，也由于痛感自己从政经验不足，英·甘地开始疏远辛迪加派，转而依赖一个绰号为“庖厨内阁”的顾问集团。早在夏斯特里时期，这些人就开始陆续聚集在失意的英·甘地周围。“庖厨内阁”的核心是由少数与英·甘地最亲近的人以及尼赫鲁家族的世交老友组成的，其中有迪内希·辛格、北方邦议员乌马·尚卡尔·迪克希特和来自德里的青年政治家英德·古吉拉尔等。英·甘地当总理后，“庖厨内阁”又增加了几名新成员。他们是苏布拉马尼亚姆、阿索卡·梅达、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以及奥里萨年轻的女议员南迪尼·萨特帕蒂和中央邦首席部长德瓦卡·普拉沙德·米什拉。其中前三人已被英·甘地任命为内阁成员。

“庖厨内阁”成员的成分相当复杂，大部分都怀有各种各样的个人动机，真正能被英·甘地视作亲信的并不多。这些人的思想基础也各不相同，彼此间缺乏任何共同联系。迪内希·辛格、迪克希特与法·阿·艾哈迈德的政治信仰同他们所属的党派一样，都是游移不定的；南迪尼·萨特帕蒂和英德·古吉拉尔被公认为左翼分子，前者以前甚至曾是个挂名的共产党员；苏布拉马尼亚姆常常被说成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是当时人们对某些赞成在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保持紧密联系的人的一种委婉的称呼；阿索卡·梅达是一名社会党人，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而德·普·米什拉则完全是一个为了追求个人权力而什么都可以不顾的政客。

“庖厨内阁”无疑对英·甘地是有影响的，但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是值

得怀疑的。说它的影响大到足以支配英·甘地的地步，这只不过是“庖厨内阁”的大多数成员在因受宠而洋洋自得之余所杜撰出来的神话。英·甘地本人并不相信这个神话，相反，她对这种夸大的宣传极为反感。以她的个性而论，她是不会甘心受任何集团或派别控制的。她之所以暂时依赖“庖厨内阁”，是为了摆脱辛迪加派的控制，但她决不会因此而受另一个集团的控制。

相反，“庖厨内阁”在很大程度上倒是受英·甘地控制的，其成员的去留主要取决于她对自己地位稳固与否的感觉以及对这帮人忠诚程度的感觉。她对“庖厨内阁”与其说是依赖，毋宁说是利用。她一旦发现某人对她的“友谊”纯粹是出于个人野心，就会马上疏远他，旋即找机会撸掉他，决不会让他在自己的身边呆得太久；而对那些比较有自知之明，并不以“庖厨内阁”的身份相炫耀的人则加以重用，尽量让他们在自己身边多呆些日子。前一种情况的典型例子是迪内希·辛格，属后一种情况的有迪克希特、法·阿·艾哈迈德等。其中迪克希特从一开始就与英·甘地的私谊甚厚，对她怀有慈父般的感情和心腹般的忠诚，他对个人权力也不过于热衷。因此，他受到了英·甘地的信任和器重，得以平步青云，不断升迁，直至达到内政部长的高位。

迪内希·辛格曾是“庖厨内阁”最重要的成员。他家与英·甘地家是世交，他的父亲是北方邦的柴明达尔，与英·甘地的祖父莫蒂拉尔素来相识。由于这个缘故，英·甘地曾将他视作心腹，对他有近乎亲昵的好感。迪内希·辛格也因此而飞黄腾达，在1969年从一个次要部的副部长一跃而为外交部长。但他的垮台比他的崛起还要快。就在几个月后，他便丢了官。因为英·甘地觉察到他为了达到个人发迹的目的在盗用她的名义，滥用与她的关系，并有意识地试图极力在议员中乃至内阁的高级部长中夸大他对总理的影响。他的手也伸得太长，甚至连1969年的总统继任那样的大事他都想插一杠子。像他这样的人，乌纱帽怎能戴得久呢？英·甘地尽管对他宠爱有加，但还是将他赶出了内阁。不过，这是后

总之，英·甘地上台伊始，还不得不要受到各种力量的牵制，不能自由自在地施展自己的拳脚，只得暂且隐忍，以待时日。

不当辛迪加派驯服的马

“好好先生”夏斯特里撒手西归，将一个乱摊子扔给了英·甘地。全面治理好这个乱摊子看来颇费时日。但人是铁，饭是钢。人们吃不饱肚子，政局便难以稳定，一切也就无从谈起。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铁律。如何处理好粮食问题，是英·甘地走马上任后在内政方面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她自组阁问题后所经受的第二次考验。

粮食问题是长期困扰着印度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英·甘地的父亲尼赫鲁过去也未能将它解决好。由于供给不足，为了防止粮食投机商将本来已经少得可怜的粮食贩运到富庶地区高价牟利，哄抬粮价，印度自独立以来，政府便一直采取这样一项粮食措施：将全国划分为六个粮食特区，每个特区各包括一个富邦、两个穷邦，粮食调配只能在特区内进行，特区之间严格禁止。

近几年来，无论是富邦还是穷邦，首席部长们都对粮食特区政策感到不满。富邦的首席部长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有富裕农民为他们撑腰。他们强烈要求取消粮食特区政策，打破特区界限，使粮食能运至售价最高的地区。其实，早在尼赫鲁时代，他们就有这种要求了，但因慑于尼赫鲁的声威和权势

而不敢公开提出，但他们并不惧怕夏斯特里，更不要说英·甘地了。穷邦的首席部长之所以反对，其理由是老百姓已厌倦了政府的控制。

面对一片反对声，英·甘地不知如何是好。富邦反对是自然的，因为粮食特区政策妨碍了他们的利益。但穷邦为什么也反对呢？粮食特区政策显然对他们有利，因为一旦取消了这项政策，就意味着粮食会大量地流向富邦，而穷邦的粮食供应必然会随之减少。英·甘地对此困惑不解。究竟该怎么办？她真有点举棋不定了。

1966年2月，即英·甘地出任总理后一个月，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斋普尔召开年会。本届年会的中心议题便是粮食问题。国大党左右两翼极为罕见地站在一起，一致要求废除粮食特区政策。尽管也有人表示反对，但声音显得过于单薄乏力。争论相持不下，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投票表决。表决结果是反对修改粮食特区政策，这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于是，数百名代表愤然起身。顿时，整个会议大厅一片混乱，抗议声经久不息。英·甘地以前从未见过这阵势，被弄得不知所措，只好由人像摆弄木偶般地推到麦克风前，说了句无关痛痒的话。她说她保证重新考虑整个粮食政策，希望代表们放弃修改政策的要求。之后，她便匆匆离开了会场。最后还是由卡马拉季出面，会议才草草收场。他宣布：既然总理已作出保证，那么修正案已被取消。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上弄得如此狼狈，这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几天以后，在3月1日召开的议会会议上，英·甘地的处境更为尴尬。站在议会大厅内，在议员们众目睽睽之下，她感到自己比担任新闻广播部长时还要紧张。她的两腿不住地发颤，舌头像被人用绳子捆住了一样，讲话吞吞吐吐、含糊不清，脑子里也形不成独立的思想。议会可不比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国大党内尽管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但至少在表面还是一家人。党的代表们即使再同她为难，也起码会让她在面子上过得去。而议会则是各种党派、各种政治势力集团交汇的场所。有些在野党本来就是存心要跟执政党及其领导人过不去的，现在见英·甘地这副窘态，他们更是携起手来，起劲地挖苦她，折磨她，大有不出尽她的洋相不罢休之势。其中，社会党人拉姆·马诺哈尔·洛希亚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竟然给英·甘地起了个“呆女人”的诨名。此后，这个诨名伴随了她好几年，使她不得开心颜。

就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这样一种情况下，英·甘地以总理身份硬着头皮在议会中发表了首次施政演说，将不久前她在国大党斋普尔年会上所许下的修订粮食政策的诺言重申了一遍，还许诺要解除自1962年印中边境战争期间开始实施的全国紧急状态。可以想见，在那种情况下，她的演说效果该是如何。

这次痛苦的经历使英·甘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她对议会的看法和态度。她不再像她父亲那样把议会看作一个完美的机构，看作在全国进行民主和平等教育的讲坛，而是看作一个没有多大用处的橡皮图章。此后，她开始不断地缺席议会会议，即使是极为重要的会议辩论也常常借故不参加。

然而，尴尬、窘迫、不知所措、讲话语无伦次，这些都只是英·甘地初处权力之巅时的不适反应。对一个刚刚上任的年轻的女总理来说，这些不适应是可以理解的。英·甘地毕竟是英·甘地，她的不适反应很快就过去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讲话伶牙俐齿、言辞犀利的英·甘地，一个决策果断、办事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的英·甘地，一个胆大得有时甚至超过了她的父亲

尼赫鲁的英·甘地。这种全新的形象在她随后处理的一系列问题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面对百年未遇的大旱灾，英·甘地不再踌躇、犹豫。她果断地下令立即把库存的粮食运往灾区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视察奥里萨、中央邦和马哈拉施特拉等邦的灾情，动员邦政府进行广泛的救灾工作和作出分配粮食的安排。她还批准了一项进口谷物和化肥的计划，支持土地精耕计划。结果，粮食交易渐渐活跃，大批平价粮店建立起来了。国家度过了一场巨大的危机。英·甘地曾为此自豪地说：“我认为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以最少的痛苦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面对严重的危机，为了争取外援，英·甘地抛弃了担任国大党主席时所热衷的“社会主义”言辞，换上了新的“实用主义”标签。她捡起了夏斯特里未来得及实施的经济政策，而就在几个月前，她还谴责过该政策，说它背离了她父亲所定的盘子。

卢比贬值问题是在她当政的第一年中引起最大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曾在印度议会中差不多辩论了一年。有人认为卢比贬值问题与美国对印度施加的压力有关。这种看法不无道理。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期间，美国停止了对印度的援助。印度要想重新获得美援，就必须答应美国政府、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附加条件。这些条件既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公开的条件包括优先发展农业，降低国有工业的重要性，扩大本国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范围；秘密的就是要求印度大幅度降低卢比的币值。当然，卢比贬值也有客观原因，即印度出口的许多货物要由国家给予大量津贴，这是国家不堪负荷的。

夏斯特里在世时，曾一度想实施卢比贬值政策，但终因担心受公众舆论谴责，说政府屈服于美国等外界的压力而迟迟不敢作出决定。英·甘地打算结束这种难受的局面。1966年6月6日，她大胆地宣布将卢比贬值36%。她认为有两点理由促使她作出这个决定：她选择的时间是在上台后不久，可给人们造成一个她只不过是解决其前任的遗留问题的印象，而不至于让人感到突然，难以接受；既然已下了决心，那么，一不做，二不休，不如干脆一竿子捅到底，一次性将币值贬足。

英·甘地本人对经济问题所知甚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她曾说出当时全国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是通货膨胀和价格上涨那样的外行话，惹得记者们哄堂大笑。所以，卢比贬值的决定，并不是她个人所能作出的。这其中除了美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外来压力外，还有“庖厨内阁”的那帮顾问们的误导。阿索卡·梅达、苏布拉马尼亚姆和杰哈都是经济学家。他们都竭力主张将卢比贬值。英·甘地的堂兄、当时任印度驻美国大使的B.K.尼赫鲁也极力支持这个主张。这些顾问们整天忙于为她设计一套“冒险实用主义”策略，却完全忽视了按照美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旨意贬值货币将会带来的严重政治后果；而且，他们没有为英·甘地准备好与货币贬值相配套的各项行政措施。

卢比贬值的决定是秘密作出的。几个小时后，英·甘地才想起应与国大党主席卡马拉季商量一下。后者听说后极为恼怒。他认为自己是党内握有拥立“国王”大权的人，英·甘地是由他一手扶上台的，她作出重要的政策决定理应事先同他商量，而不是只在事后才来通报一声。卡马拉季虽然也不懂经济，但作为一名老练的政治家，他深知在下次大选即将到来之前作出这样

极易引起争议的决定是极端愚蠢的。他奉劝英·甘地推迟作出最后的决定。可一切都已太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接到通知。英·甘地此时已是覆水难收，只好硬着头皮宣布贬值。

卢比贬值的消息传开后，全国就像炸了营一样，乱哄哄一片，抗议之声四起。所有党派，无论是极左的，还是极右的，都无不强烈地谴责英·甘地。卡马拉季的愤怒并不亚于他们。他开始责备自己当初不该将英·甘地推上总理的宝座，心里暗自嘀咕：“伟人的女儿，却犯了小人的错误。”在他的要求下，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通过决议谴责政府作出卢比贬值的决定。但他没有就势将英·甘地赶下台，他知道大选前采取这种行动对整个国大党来说不啻一场灾难。

尽管在公开场合，英·甘地极力为卢比贬值辩护，但私下里她也不得不承认这着棋下错了。她在《自述》中说，它“使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为它提高了我们的进口价值——我们当时仍然要进口很多东西——却没有像工业化国家那样因货币贬值而大量增加出口”。她觉得她似乎是受了那帮顾问们的骗。然而，英·甘地是决不会在做过的事情上后悔的，只不过她从这件事情上吸取了教训，学到了许多东西。

比卢比贬值稍早些时候，英·甘地还作出过一个大胆的决定，即按照语言原则重新划分旁遮普邦。

印度独立以来，居住在旁遮普邦里讲旁遮普语的锡克人，一直要求将该邦一分为二，建立一个以锡克人为主体的邦。尼赫鲁害怕这会起分离主义倾向，便以旁遮普地处边境、情况特殊为由加以拒绝。夏斯特里未敢作出这个决定。到了1965年，锡克人的这一要求越来越强烈，中央已无法阻挡。锡克民族主义政党阿卡利党的政治宗教领袖桑特·法特赫·辛格宣称，除非政府同意成立旁遮普语邦，否则他将绝食至死。国大党和中央政府进退两难：如果同意阿卡利党的要求，那就意味着放弃过去所坚持的原则，并将失去居住在拟议中的旁遮普语邦的印度教徒的支持；如果不同意，又会激起锡克人的骚乱，乃至暴乱。

英·甘地认为，只有按语言重新划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旁遮普问题。1966年3月9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同意成立旁遮普语邦。一场锡克人的骚乱因其要求得到满足而避免了。但在拟议中的旁遮普语邦居少数地位的印度教徒却感到不满。他们在印度教教派色彩相当浓厚的政党人民同盟的挑唆下，在旁遮普的一些地区掀起了种族骚乱。这场骚乱后来蔓延到了德里，三名国大党员在德里附近的帕特镇被活活烧死。

英·甘地对此十分气愤。在红堡为欢迎来访的南斯拉夫总理而举行的公众集会上，她说：“我眼睛里没有泪水，但心中却充满了愤怒……难道这一切就是千百万自由战士和烈士们为之奋斗的结果吗？当暴力和纷争污染着整个气氛时，我怎能在会见外国贵宾时高昂着头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呢？……我虽然有很大的忍耐性和宽容心，但不是没有限度的。我们应该动用一切必要的力量来制止互相残杀。那些醉心于暴力行为的政党，正使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害。他们不是真正的印度人。他们之中那些自称了解印度教的人其实对印度教一窍不通。”

旁遮普问题的解决，在当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锡克人因达到了目的而感到高兴；讲印地语的旁遮普人则因建立了新的哈里亚纳邦而感到满意。然而，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还留下了一个隐患，即原旁遮普邦首府昌迪加

尔的归属问题。新成立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都要求将这个当年由著名的法国建筑师勒科比西埃所设计建造的梦幻般的美国的新兴城市作为自己的首府。双方相持不下，英·甘地为避免再起争端，只得宣布该市为两邦的共同首府，管辖权直属中央。此举在当时被看作是英·甘地“精明的一步棋”而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许。但正是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成了 80 年代爆发的新的锡克人骚乱的因素之一，英·甘地本人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尽管英·甘地的决定是明智的，但由于事前的舆论宣传工作做得不充分，很多人感到突然。他们认为英·甘地之所以这么快就对旁遮普问题作出与前两届政府截然不同的决定，完全是因为迫于阿卡利党的压力。这些人似乎已忘却七年前英·甘地出任国大党主席时在劝说她父亲尼赫鲁按照语言原则将孟买邦一分为二时曾经起过的作用。在国大党内部，甚至像卡马拉季那样的高级领导人和像内政部长南达那样的政府领导人也怀疑此举的明智性。他们对总理决定的同意也是相当勉强的。

英·甘地所走的道路似乎注定总是崎岖不平的。1966 年 11 月，印度又发生了要求禁止宰牛的大规模骚乱。

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教徒视牛为圣物。为了尊重他们的宗教感情，印度宪法规定保护牛，但把禁止宰牛的具体法律条文交给各邦的立法机关去制订。

对于禁止宰牛问题，尼赫鲁有自己的看法。他也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主张保护牛；但他同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走极端，应有所变通。因为在印度这样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中，牛肉是穷人以低价获取蛋白质的唯一来源，绝对禁止宰牛是一大错误。因此，他认为那些无用的牛不应属于禁止屠宰之列。

印度不乏宗教狂热分子，在禁止宰牛问题上也是如此。这方面的宗教狂热分子是母牛保护者。他们是印度教苦行僧——沙陀。他们反对屠宰所有的牛，包括病老无用的牛。在国大党内，也有一些领导人同他们遥相呼应，他们在尼赫鲁时代的代表人物是戈文德·达斯；在英·甘地时代的代表人物是内政部长南达，他甚至接受了沙陀同盟主席的职务。当年，尼赫鲁面对戈文德·达斯向他提出的强行禁止宰牛的要求，曾愤怒地宣称，宁可辞职，也决不向这种“愚昧无知而又荒谬绝伦的要求”低头。英·甘地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态度与她的父亲毫无二致。

狂热的印度教沙陀把英·甘地在旁遮普问题上的态度看作是她软弱的表现，以为女总理容易屈服于压力，决定发起一场禁止宰牛运动，向政府示威。这场运动因有广受印度教徒尊敬的普里奥里萨地方的著名寺院的主持桑卡拉查尔雅上师的参与和支持，以及为人民同盟所利用而复杂化了。桑卡拉查尔雅上师甚至以绝食表示支持。这不啻火上浇油，因为他若死亡可能引发全国大乱；而人民同盟的目的并不在于关心牛的命运，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为了攻击国大党和中央政府。这从他们选择的游行示威的地点上即可看出：他们偏偏不在享有宪法赋予的农业立法权的各邦，而是选择首都作为他们游行示威的地点。

1966 年 11 月 7 日，一群沙陀暴徒大喊大叫，赤膊上阵、挥舞着三叉戟、斧头和短刀，冲到议会大厦门前，焚烧汽车和建筑物，还到处打人，把一次所谓的游行示威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骚乱。一名警察在骚乱中丧生。警察不得已向横冲直撞的暴徒开枪，当场打死六人。其时，英·甘地刚从比哈尔邦

的旱灾区视察回来，她在人民院发表讲话说：“这不是对政府的攻击，而是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攻击。”

面对严重的局势，英·甘地也没有退缩。她当即立断，下令以武力制止沙陀的暴动，解除南达的内政部长职务，改由恰范接替。她这样做的表面理由是南达和沙陀之间的关系妨碍他公正地行使内政部长的权力，但实际上，谁都清楚她早就想撸掉南达了，只不过一直未找到适当的机会。

南达被罢免如同给正在闹事的沙陀打了一针清醒剂，使他们狂热的温度一下子降了下来，骚乱由此渐渐平息了。他们这才意识到英·甘地并非他们想象的那么软弱。南达遭罢免也似乎是打了辛迪加派一记耳光，加剧了他们与英·甘地的紧张关系。由于他们的反对，英·甘地拟将财政部长和外贸部长一并撤职的计划遭到了失败。

短短一年的总理任期对英·甘地后来的政治生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她所经历的各种事件和考验，一方面把她锻炼得更加坚强和成熟，另一方面也使她开始对一切抱怀疑的态度。她从卢比贬值事件中得出结论：任何人都不可信赖，在关键时刻谁都有可能出卖她，哪怕是与她很亲近甚至是对她感恩戴德的人也不例外。于是，她找机会将“庖厨内阁”的重要成员、卢比贬值的主要倡导者阿索卡·梅达和苏布拉马尼亚姆清除了出去。日后有更多的人步了他们的后尘。

这一年的从政经历，还使她明白了一件事，即要不受掣肘地执政，必须摧毁实力派集团——辛迪加派。

令人难以捉摸的外交政策

英·甘地的外交政策灵活多变，有时甚至看上去波动很大：几个月前还是极右的，几个月后就变得极左了，令常人难以捉摸。有一位反对党议员挖苦她“既像华盛顿的资本家，又像莫斯科的社会主义者”；还有人认为她政策上的变化是机会主义者的投机取巧。印度人后来才闹明白，英·甘地的所作所为都是由她那自我保护的个性和实用主义哲学所决定的。

1966年3月28日至4月1日，英·甘地应邀访问美国，这是她当总理以后第一次出访。美国方面原计划是邀请夏斯特里访美，夏斯特里未能成行就去世了，邀请继而落在了她的身上。英·甘地此行表面上只是一次“友好访问”，但实际上是想从美国那里寻求粮食和财政援助。此外，当时由于印度对美国侵略越南持批评态度，两国关系比较紧张，因此，英·甘地还想借此机会使紧张趋向缓和。

赴美途中，英·甘地想顺道看看她那两个在英国留学的儿子。她本可以直接去英国见儿子，却宁愿在法国作短暂停留，要儿子们穿过海峡到巴黎与她相见。她之所以要这样做，一来是出于对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在1965年的印巴战争中所表现出的亲巴基斯坦立场的极度不悦；二来也想拜会一下戴高乐将军。她过去陪父亲访问法国时曾见过他一面，但没有同他交谈什么。英·甘地很钦佩戴高乐，认为他是个杰出人物。此次在同戴高乐交谈时，她一直使用标准流利的法语。她说，无论自己面临怎样的环境，她对印度的抱负与将军对法国的抱负毫无二致。戴高乐被她的风采和谈吐迷住了，后来，他在同英·甘地的首席顾问L.K.杰哈的一次谈话中说：“对一个妇女来说，搞政治是很困难的，不过我认为这个妇女能行！”

英·甘地的到来使美国总统约翰逊高兴异常。约翰逊在白宫为她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欢迎宴会。在宴会上，英·甘地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她身穿一件绣满金花的紫色绸衣，显得落落大方，雍容华贵；一头梳理得纹丝不乱的黑发与一绺白发相映生辉，引人注目。也许是遗传基因使然，尼赫鲁家族中人虽然个个气度不凡，但在生理上却有一个缺憾：年纪不大即头发灰白，英·甘地也不例外。父亲尚在世时，她的头发就白了。但从小就具有艺术修养的英·甘地却将这种缺憾巧妙地变成了发型装饰艺术。她将大部分头发染黑，只在鬓角留下一缕银丝。人们说这象征着她性格中的刚毅成分。

当约翰逊总统与英·甘地手挽着手，一齐步入宴会大厅时，数百名记者争相用摄像机或照相机记录下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身材高大的约翰逊向英·甘地频频含笑，英·甘地也回报以微笑。在两位领导人的笑声中，印美关系得到了缓和。

在宴会上，两位领导人显示出来的活跃气氛使出席宴会的来宾感到惊奇。约翰逊称英·甘地是一位善良而文雅的朋友，夸奖她能干，人又长得标致，甚至还当面夸奖她的父亲尼赫鲁，说他也是“我们的亲人”。这位热情得有些过头的得克萨斯牛仔还嫌不够，又破例参加了印度驻美大使 B.K. 尼赫鲁为女总理举办的鸡尾酒招待会（据说他以往从不参加大使举办的招待会，都是由副总统代他出席）。在招待会上，约翰逊忘乎所以地大声地说，他“不会让这个女孩受到任何伤害”。此语一出，全场愕然。令来宾更为惊讶的是，他竟然不顾外交礼仪，在鸡尾酒会结束后仍想留下来参加便宴，此举令主人惊慌失措、颇感为难。因为原来的座位已经排好，重新安排并非易事。好在英·甘地的一名随从主动下席，才使这一难题得以解决。

对美国人的热情，英·甘地报以殷勤和真诚。在对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和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说时，她避免作出任何容易引起摩擦的评论，避免对美国公众讲一些她父亲通常在同样场合下忍不住要讲的话。在同约翰逊总统私下交谈时，她也措辞得体。据说约翰逊曾对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说过，他在这些会谈中对甘地夫人表现出来的政治机智印象极深。尤令约翰逊感到高兴的是，英·甘地公开表示“印度理解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痛苦”。这说明印度在约翰逊非常敏感的这个问题上降低了批评的调子。

英·甘地此次访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总统向她保证他的政府对印度“永恒的友谊和谅解”，并允诺他将向国会递交一份特别咨文，要求国会授权他帮助印度解决粮食危机，调拨 300 多万吨粮食以解燃眉之急。他还答应提供 9 亿美元的财政援助，甚至暗示美国将说服世界银行更加积极地满足印度的需要。最后，约翰逊还将杜鲁门总统个人用过的一艘旧游艇“安东·布伦号”送给了英·甘地。这只游艇经改装后可用于海洋研究。

印度方面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英·甘地同意将卢比大幅度贬值。她还接受美方的建议，同意美国用通过 480 号公法大量运送小麦而获得的大批卢比作为基金，模仿美国福特基金建立一笔印美教育基金。这后一项建议曾遭到过尼赫鲁和夏斯特里的拒绝，他们担心美国会乘机插手印度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部门。但现在英·甘地因急需得到美国的支持，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访美的成功使英·甘地心满意足。带着这份喜悦，她来到英国首都伦敦，对威尔逊首相在印巴战争中所持的亲巴立场公开表示了不满。然后，按照预定计划，她又飞到了莫斯科，对苏联进行短暂访问。她以前陪父亲出访苏联，曾多次到过莫斯科。父亲去世后，她也曾单独来此访问过。1964 年 10 月，

她以部长身份访问苏联。当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东道主向她保证，虽然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换了，但苏联对印度的友好关系不会改变。此次，英·甘地是作为印度总理访苏。她受到了苏联总理柯西金的欢迎。但当她在进行礼节性的问候后，直截了当地问柯西金“美国人尚未找到台阶下，你们怎能希望他们撤出越南”时，柯西金马上回击道：“美国人在琢磨如何保全面子之时，又有多少亚洲人被战火吞噬了？”

然而，英·甘地万万没想到，她自认为成功的华盛顿之行却在印度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越南问题和经济政策上，她被安上了“出卖”的罪名。印美教育基金更是遭到了所有党派和教育家的一致抵制，他们认为这个基金是美国破坏印度教育并达到控制大学的目的的一个阴险手段。英·甘地被这些抨击和指责激怒了，她奋起反击，说给她加上“出卖”的罪名“荒唐透顶”，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她斥责反对者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缺少外国援助，接受外援并不意味着接受外国统治。

但是，英·甘地的雄辩之舌并未能阻止日益高涨的批评浪潮。甚至连国大党的重要领导人也开始指责她偏离了她父亲的政策轨道。对此，她坚决予以否认。她说：“如果有必要背离过去的政策，我绝不会有任何迟疑。我的目标就是制定对全国最为有利的政策。如果你们不喜欢这些政策，你们有权把我换掉，选出新的领袖。……国大党的力量是很大，然而你们要知道，印度的力量是无穷的。”这里，她第一次向人们暴露了自己的战略，即越过国大党，直接号召全国。这也是她第一次公开与国大党对抗。当然，有了第一次，以后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然而，印美关系的戏剧性发展似乎印证了国人的话，使英·甘地的那些辩解变得苍白无力，因为山姆大叔似乎根本就没有把印度人的要求当回事，并不打算兑现承诺。约翰逊虽然向国会递交了前已允诺的特别咨文，装模作样地对国会说：“在涉及饥荒问题的情况下，进行一场苛刻的斤斤计较的买卖，这不符合我们的本性。”但是，一向以办事效益高自诩的美国人在向印度援助粮食这件事上却异乎寻常地拖拉。好不容易等国会“批准”了，粮食运送也是以少量的、断断续续的方式，一点儿也不干脆，一点儿也不济事。印度人恰当地把这称为“一到吃光”的安排；相反，美国政府倒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印度重新修订农业政策。很显然，约翰逊是在玩外交游戏，其目的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以粮食为筹码，强迫印度按他们的要求改变其内外政策。

约翰逊是虚晃一枪，英·甘地却老实地履行了她的诺言，将卢比大幅度贬值。印度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却没有得到它该得到的。约翰逊的做法使英·甘地感到受了骗，这对她来说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教训。事实证明，将摆脱困难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不靠不住的，也是非常危险的。美国政府的行为使她感到极为气愤。她说，约翰逊的策略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强奸行为。印美关系的迅速变化给那些在此问题上抨击她的人提供了口实，把她弄得十分被动。

为了改变被动的局面，英·甘地意识到政治上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改变形象，回复到偏左的政策上去。她以越南问题为突破口，迈出了其对外政策转移的第一步。1966年7月1日，在经历了三个月的沉默和三个星期的卢比贬值风暴后，英·甘地代表印度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对美国轰炸河内和海防“深表遗憾”。此时，正值她访问埃及、南斯拉夫和苏联前夕。当她到

达访问的第一站开罗时，这项声明的精神已被大加渲染，说成是印度“主动”要为深受战争创伤的越南带来和平。随着英·甘地三国访问的继续，声明也变得日益尖刻。访苏结束后，她和苏联总理柯西金发表了联合公报，不仅呼吁立即无条件停止对河内和海防的轰炸，而且“谴责帝国主义侵略越南”。

华盛顿迅速作出反应。约翰逊总统命令每艘发往印度的运粮船只都必须持有他本人签发的特许证，但他又迟迟不发放该许可证，将本来极少的粮食运输几乎完全掐断了。美国公众对印度人的处境寄予同情，总统约翰逊却依然故我。当美国驻印大使切斯特·鲍尔斯提醒总统，说甘地夫人只不过重复了一下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和教皇的话时，他的暴躁的得克萨斯主人却根本听不进去，只是不耐烦地甩出几个字：“教皇和吴丹并不要我们的麦子。”很显然，约翰逊把粮食当成了一种政治武器。

面对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英·甘地没有屈服。她更加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的对越政策。在越南领导人胡志明 77 岁生日那天，她甚至异乎寻常地向他发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电。同年 10 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三国首脑会议上，英·甘地又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埃及总统纳赛尔一起发表声明，再次强烈要求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北越。她还宣布废除与约翰逊签订的关于设立印美教育基金的协议，同时纠正了经济政策中的偏右倾向。国大党左派和左倾的在野党又一次喜欢上了她。

也有人对英·甘地的行为不理解，觉得她忽左忽右，叫人难以捉摸。对此，英·甘地本人怎么看呢？她在《自述》中说：“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一直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从来没有完全偏向这一边或那一边。”这句话是她的个性和行为原则的最好注解。

激烈的斗争环境真能锻炼人，促使人迅速成熟。不知不觉中，人们发现女总理变了。的确，万物都在变，但变化最大的似乎莫过于英·甘地。仅仅一年工夫，简直是判若两人。初当总理之时，她不善辞令，以致在公众场合讲话成了她惧怕的事情之一。她尤其怕参加议会的辩论，那些生有三寸不烂之舌的难缠的反对党议员们常把她弄得下不了台；那些听惯了前两任总理滔滔不绝的雄辩讲演的老资格的报刊专栏作家们，也对她的讷言感到不习惯，报刊编辑也常因约定与她进行半小时的谈话，她却无话可说而不得不草草结束。但到了年底，她已能比较从容自如地应付各种局面了。虽然她的言谈不可能像他父亲那样具有哲学味，也不可能像夏斯特里那样口若悬河，但无疑她已知道该说什么和如何说了。在国大党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她已能大声地对与她意见相同的人表示支持，对她认为可行的事表示赞同，甚至也能勇敢地面对难以对付的挑战，对挫折也无所畏惧。她再也不怕任何外来压力，无论是来自党内辛迪加派的也好，来自反对党的也好，还是来自西方大国的也好。她已经具备了抗压能力。的确，人最大的成熟莫过于心理的成熟。

“英迪拉妈妈”

1966 年 12 月，印度第四次全国大选的战幕拉开了。虽然角逐刚刚开始，火药味已相当浓重。

英·甘地所面临的竞选形势是相当严峻的。执政一年来，她做了好几件有争议的事情，使人们对她的评价毁誉参半。卢比贬值已被证实是个政策上的失误，它不但没有使严重的经济形势得到丝毫的缓解，而且，由于这件事

关系到千家万户，在一定程度上把人们的不快与英·甘地这个名字联系在了一起，给她的竞选活动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党内，英·甘地绝望地发现自己几乎成了孤家寡人。辛迪加派已公开站在她的对立面，并在确定本党候选人的问题上操纵了国大党议会委员会，既不同意确定她为党的候选人，也反对克里希纳·梅农为候选人。她提出推迟候选人选举的要求也为辛迪加派所拒绝。如果在国大党内部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竞选获胜的希望就极为渺茫了。对于辛迪加派的擅权，英·甘地也只得暂时忍受。克里希纳·梅农却受不了这份窝囊气。他愤而退出国大党，来到自己的选区孟买北部孤军奋战。虽然遭到惨败，不过倒也平添了几分“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好在当时国大党内的落魄之士并不在少数，克里希纳·梅农也不致感到过于孤寂。

与国大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内耗严重的情况相反，反对党此时却显得异乎寻常地“团结”。它们显然很清楚，尽管执政的国大党已呈分裂之势，但它毕竟还是全国第一大党，任何一个其他党派要想仅凭其一党之力撼动其地位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打破国大党一统天下的局面，各反对党，无论是极左的还是极右的，它们彼此之间的政见分歧有多大，都暂时求同存异，走到一起来了。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而又极端困难的竞选形势，已经成熟起来的英·甘地没有被吓倒。国大党看来是指望不上了，她决定再一次运用她的战略，越过国大党，直接面向民众，号召全国。她十分自信地对新闻界说：“现在的问题是党究竟需要谁，人民究竟需要谁。我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

直接争取民众，在老百姓中竞选，要会拉选票。英·甘地对此并不陌生。早在1951年印度第一次大选时，他就陪伴父亲进行过竞选活动。但是，帮父亲竞选是一回事，自己直接参加竞选又是一回事。当她直接面对众多的选民代表发表竞选演说时，她才发现拉选票并非易事，意识到了自己的某些不足：她不具有她父亲那样的人格魅力，也缺乏尼赫鲁那样的远见和广博的学识；她演讲时，声音过于尖利刺耳。她对自己的这些不足之处有自知之明，并力图加以克服。她尽量少谈那些哲理性的大道理，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现实问题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问题。她要让人们明白，只有她英·甘地最关心他们，别人甚至连一半也做不到。总之，她尽可能地扬长避短。

在竞选中，英·甘地表现出了天才般的竞选技巧。她善于对不同的人和在不同的场合讲不同的话。如果选民是穷人，她会巧妙地避开诸如贫困、饥饿之类的实际问题，着重表现自己如何超越于政党和政治之上，专心致力于为人民服务。她会这样对他们说：“你们虽然贫穷，但你们的负担相对来说是很轻的。因为你们的家庭成员屈指可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生存下去。但是，我的负担却大得无法计算，因为我的家庭中有千千万万的成员，他们都受着贫穷的煎熬。我必须照看他们。他们又分属不同的种姓，有着不同的信仰，有时相互之间甚至会打起来。我就必须担负起调停的责任，尤其必须照看家庭中的弱者，保护他们，让他们免受强者的侵犯。”在这里，她把印度比作一个大家庭，把自己比作这个大家庭的家长，而把全国人民视作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她的职责就是公平地对待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同时保护弱者不受强者的欺凌。选民们听到这些话，往往会备感亲切和温暖，甚至还会生发出对她的感激之情以及对她操持大家庭之不易的同情，尽管她任何解

决实际问题的诺言都没有许下。她的这些话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如她在北方邦自己的选区赖巴雷利（以前曾属费罗兹）竞选时，演讲完，听众便欢声雷动，有些人甚至高喊“英迪拉妈妈”。这种情景在她长达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还是第一次出现，不能不说是竞选史上的一个奇迹。

碰到强有力的对手的挑战，英·甘地往往是勇敢地接受，并奋起反击。距首都 100 英里的斋普尔以前曾是一个土邦的首府，该市的竞选人是前王公的夫人加亚特里·黛维。有人企图阻止英·甘地与当地公众见面。她便发动攻势，抨击整个王公体制，对围观的听众说：“你们不妨去问问土邦的邦主们，在他们统治期间为本邦的穷人挖过几口井？修过几条路？在英国奴役期间，又是怎样与之斗争的？”

有时候，英·甘地在竞选活动中会遭到歹徒的袭击，但她毫不畏惧。在奥里萨邦首府布巴内斯瓦尔的一次集会演讲中，一群暴徒向讲坛上扔石块，其中有一块石头正好击中了她的鼻子。暴徒的用意是想逼她下台。可英·甘地就是不下台。她忍着剧烈的疼痛用手绢掩住血淋淋的伤口，继续进行演讲。此情此景让参加集会的群众肃然起敬，也令暴徒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在竞选活动中，英·甘地继承了她父亲的顽强斗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整个竞选活动期间，从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的山麓，到惊涛拍岸的印度洋边的科摩林角，从阿拉伯海滨的繁华都市孟买，到茶香四溢的阿萨姆茶园，她几乎跑遍了印度的每一个角落，总行程达 5 万多公里，其中大部分路程都是乘坐敞篷车，体力消耗极大。这对自幼体弱的英·甘地来说，其疲劳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她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饱满的政治热情。

尽管英·甘地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为竞选付出过血的代价，但由于国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整体形象和威信已大不如以前，因此，在大选中遭到了自印度独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与上届大选（1962 年）相比，国大党所得选票从占全部选票的 45% 下降到 41%，在人民院中的席位从 361 席（占总席位数的 68.7%）减少到 280 席（占 53.3%），显然已经丧失了绝大多数。在邦议会选举中，国大党的失败更为惨重。北印度八个大邦的政权全部落到了反对党手中，其中西孟加拉邦建立了印度独立以来的第二个共产党邦政府。人们惊呼：战无不胜的国大党正摇摇欲坠。西方有人则把这次竞选看作是国大党霸权丧失的一个标志。此次大选结果对印度的政治制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一党统治转变为多党制。国大党再也不能自称是公众信赖的唯一组织了，它不过是印度众多政党中的一个最大的政党而已。

在这次大选中，辛迪加派的力量受到了明显的打击，它的中坚分子如 S.K. 帕蒂尔、阿图尔亚·高士等人纷纷落马。摔得最惨、令人难以置信的要数国大党主席卡马拉季了。在新德里，他能左右总理的产生；在自己所在的泰米尔纳杜邦，他简直就是无冕之王，现在却输给了地区性的政党德拉维达进步联盟的候选人。他甚至还失掉了议员资格，可谓一败涂地。不过辛迪加派的失败对英·甘地个人来说并非坏事，相反加强了她的力量。过去一年来，辛迪加派对她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尽管是以微弱多数获胜，国大党仍然取得了执政的资格。于是，围绕着总理职位，国大党内展开了新一轮的角逐。老对手德赛再次跳了出来，向英·甘地发起了挑战。

此次德赛出马并非毫无优势。他下野已近四年，因此，这几年政府在内外政策中的失误因与他无关而对他没有影响；此外，辛迪加派也已改变对他

的敌视态度。

但与德赛相比，英·甘地的优势更加明显。她在竞选时在公众面前树立的良好形象还保留在他们的脑海中；国大党内唯一能影响她当选的辛迪加派已因卡马拉季的惨败而树倒猢猻散。对此，德赛本人心里也是清楚的。明眼人一眼就看出，德赛的竞争不过是讨价还价的策略罢了，为的是能够在即将组成的甘地夫人的新政府里占据一个显要的位置。

国大党已是今非昔比，它所面临的险恶的政治环境使它再也容不得任何激烈的内争，不然它将会自毁长城。反对党正在竭力利用国大党的颓势，企图诱使国大党议员转到他们那边去。他们甚至以总理职位相许，企图拉国大党要员贾格吉凡·拉姆率领他的追随者脱离国大党而加入他们的阵营。国大党的领导层意识到党面临严重的困难，为生存计，必须空前地团结起来。当然，也只有在巨大的外在压力之下，国大党的高级领导人才有可能为了党的生存而放弃个人的目的。他们都很清楚，如果国大党彻底垮了，他们个人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

为了避免出现两败俱伤，渔翁得利的结局，在卡马拉季的调解下，英·甘地和德赛都作了一些让步。作为德赛退出竞争的条件，英·甘地同意让他担任财政部长兼副总理职务。

但是，英·甘地的让步到此为止。她这次组阁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即使是辛迪加派也不能对她施加任何影响。仅仅是出于礼貌，英·甘地才在最后一分钟让卡马拉季看了看阁员名单，远不像一年前组阁那样，几乎事事都要看他的脸色。她将试图再次当选的唯一的一名辛迪加集团成员桑吉瓦·雷迪排除出去，给他一个人民院议长的职位以示安慰。而多年来一直追随她的人大多如愿以偿，恰范被任命为内政部长；贱民领袖贾格吉凡·拉姆由原来的劳工部长转任颇有实权的粮食和农业部长；“庖厨内阁”的重要人物迪内希·辛格因忠诚有加，被升入内阁，出任商业部长。辛迪加派成员遭贬之日，正是英·甘地的追随者飞黄腾达之时。

1967年3月12日，英·甘地再次当选为国大党议会党团领袖，即当然的总理。

九、在萨夫达尔路 1 号（二）

明争暗斗

在国家最高领导人问题上，英·甘地同莫拉尔吉·德赛之间有限度的互相让步实际上是一笔政治交易。不过，这种交易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对保持整个国大党的执政党地位是必需的。然而，既然是一笔交易，也就注定了他们两人之间不可能真正合作。英·甘地不会信任德赛，而德赛也不会支持英·甘地，他甚至常常暗中拆台、捣鬼，以致英·甘地的追随者把他称作“辛迪加派的特洛伊木马”。

有趣的是，在英·甘地执政的头几个月里，她与德赛之间倒也相安无事。不过，他们彼此都明白，这只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短暂的寂静。

这种短暂的合作，出自他们各自对对方的需要。就德赛而言，他已知与几年前相比，他与英·甘地之间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势均力敌变成了英·甘地明显地占上风，自己已处于劣势；现在辛迪加派虽然与他站到了一起，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微妙的，而且辛迪加派已江河日下，大势已去，对他也起不了多大的支持作用；在内阁中，内政部长恰范和粮农部长贾格吉凡·拉姆都是他的死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上台就同英·甘地唱对台戏，说不定就得立即卷铺盖走人。对英·甘地来说，德赛也有一定的利用价值。她要利用他在恰范和贾格吉凡·拉姆之间造成一种权力平衡，后二者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使她不得不警惕；与以往历届议会相比，新议会中的反对党势力要强大得多，他们一定会经常在议会里给执政的国大党找茬儿，这就需要一雄辩之士能对付得了他们，而德赛正好是个合适人选。他具有长期议会工作的经验，练就了一只三寸不烂之舌，常能令反对党的诘问者闭上他们的嘴巴。

他们之间大的合作只有一次，那是在总统候选人问题上。

按照印度宪法的规定，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并无实际的行政权力，他必须按照总理的意见行事。但是，由于宪法对总统的职务和权限所下的定义比较含糊，总统如果善于钻宪法的空子，特别是当执政党力量比较薄弱、地位不稳时，可以威胁总理甚至制造宪政危机。因此，尽管总统无实权，但他如果存心要同总理过不去的话，对总理而言，也是一件麻烦事。

印度总统是由国会两院议员与邦议会议员所组成的选举团，从年满 35 岁且具有人民院议员资格的人中选举产生的。总统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但按惯例一般只任两届。到 1967 年 5 月，现任总统拉达克里希南的五年任期已满，按规定必须进行改选。于是，围绕着总统候选人问题，国大党内以及国大党与反对党之间难免展开一番激烈的较量。

当时，拉达克里希南虽已年近八旬，健康状况明显不佳，眼睛几乎失明，但仍壮心不已，谋求连任。他的要求得到了国大党辛迪加派以及相当一部分反对党议员的支持，却遭到了总理的反对。英·甘地的表面理由是拉达克里希南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再说他已当过十年副总统、五年总统；实际原因是他在总统任期内时常超过宪法的规定干涉政府的行政工作，这使英·甘地感到不快。

英·甘地自己提出的候选人是扎基尔·侯赛因博士。他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个公认的民族主义者，曾担任过大学副校长和一个邦的邦长，

在拉达克里希南的总统任期内，他一直是副总统。英·甘地支持他，有两方面的原因：扎基尔·侯赛因是一个穆斯林，由他担任总统，可以向国人展示国大党的世俗主义形象，也可以争取全国最大的少数教派——伊斯兰教徒对国大党的支持；扎基尔·侯赛因权力欲不太强，对政府事务不会进行过多的干涉。另外，英·甘地还认为，虽然宪法并未说明副总统可以直接继任总统，但实际上已形成了惯例，因为五年前拉达克里希南就是从副总统上升为总统的。如果在侯赛因这个例子上不按惯例行事，敏感的穆斯林会感到他们受到了歧视，作为少数教派不能享受与印度教徒同样的政治权利。然而，英·甘地的主张又遭到了辛迪加派的反对。他们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在秘密投票选举总统时，国大党议员与邦议员有可能不会选举国大党指定的人选，这将导致党内严重的不和。

围绕新总统的人选问题，总理和辛迪加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双方力量旗鼓相当，德赛的态度至关重要。

有趣的是，反对党也凑起了热闹。当然他们现在在议会中已拥有相当大的力量，有资格来凑这个热闹。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科卡·苏巴·拉奥。后者也表示同意，甚至愿意为竞争总理职位而提前辞去现职。

印度的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法官，往往是以超越党派的民主人士的政治面目出现的，退休后也通常只参加一些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因此，法官参与政治是极为罕见的，最高法院法官从事实际政治活动则更没有先例，尽管这在法律上讲是可行的。在英·甘地看来，在职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如此明目张胆地表明他的政治立场，而且急于投入总统职位的角逐，说明此人野心十足。他若当选，无论对国大党，还是对她个人都不是一件好事。因此，英·甘地不厌其烦地在国大党的议会党团中申述反对科卡·苏巴·拉奥当选总统的理由，说如果国大党同意反对党的计划，一来会破坏法官不参政的老传统，二来会使国大党自己受到一定程度的屈辱。尽管承认反对党提名的候选人对国大党来说并不意味着在宪法上作出了任何让步，但心理上肯定难以接受。

尽管国大党内讧不断，但当遇到外来威胁时，党内各派政治力量尚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因此，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明确的、一致的，那就是抵制反对党的候选人。但在国大党内，围绕总统候选人的斗争却激烈如故。

德赛因想在人前极力显示出自己是个不带宗教偏见的世俗主义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站在了英·甘地一边。他的加盟使扎基尔·侯赛因的当选成了必然的结果。

总统选举的全过程及结果给公众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甘地夫人是果断的、大胆的、有能力解决重大问题的；她与德赛和睦相处，关系融洽，尽管他们无论在年龄上还是思想意识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然而，从根本上讲，英·甘地与德赛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们的分歧首先体现在对地方各邦中非国大党邦政府的态度上。德赛认为印度的任何一个党派，只要它在大选中击败了国大党，组成了自己的邦政府，就意味着使自己置身于国大党中央政府的对立面，也就只能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最少的权利。他对喀拉拉邦与西孟加拉邦的各左翼党派尤其是西孟加拉邦的共产党邦政府极为仇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因此，他抱怨总理对待各非国大

党的尤其是左翼党派执政的邦政府不够严厉，他希望她像当年任国大党主席时颠覆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那样，搞垮西孟加拉邦的共产党政府。

在如何对待非国大党邦政府的问题上，从根本上讲，英·甘地与德赛并无分歧，她也极想由自己的党来统治所有的邦。但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她说话行事就既不能像身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德赛那样，也不能像她当国大党主席时那样，她必须全面权衡各方面的得失，不能不顾及一下国大党平日里在公众面前标榜的民主自由形象。她不想同通过合法途径击败国大党而上台执政的反对党邦政府把关系搞得太僵，以免树敌太多。但德赛却把英·甘地的这种策略看作是她的软弱，并以此证明她不适合当首脑。

其次，他们之间的分歧还表现在官方语言问题上。这个问题自它产生之日起，就成了一个似乎永远也得不到彻底解决的问题、一个悬案。由于以印地语作为官方语言一直受到南方各邦的强烈抵制，尼赫鲁在1959年曾允诺，只要印度任何地区需要英语作为一种共同的官方语言，英语就可继续存在。英·甘地一来深知“强扭的瓜不甜”的道理，二来感到必须遵守父亲曾许下的诺言，以维护他老人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因而极力主张修改宪法，以使父亲当年所作出的推迟用印地语取代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时间的承诺具备法律依据，尽管她自己是北方邦人，讲的是印地语。

德赛在这个问题上与总理唱起了对台戏。他虽然是古吉拉特人，但他却极力主张以印地语取代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他在这件事情上容不得任何妥协。他反对制定有关官方语言问题的法律，把这看作是中央政府软弱无能的表现。这件事中有可能掺进了派别斗争的因素。英·甘地怀疑德赛企图通过煽起北方邦人对印地语的狂热，来证明他比她更愿意考虑北方邦人的情绪，以动摇英·甘地在其家乡的地位。德赛则认为她的语言政策的目的是要打击过去一直站在德赛一边的北方邦国大党中的实权人物K.B.古普塔。

1967年即将结束时，官方语言法终获通过。南印度各邦在政治上的猜忌得到了消除，但英·甘地与她的副手的个人矛盾却进一步扩大了。

还有一件事也增长了英·甘地与德赛之间的敌对情绪。德赛入阁后仅几个月就访问了美国，在华盛顿受到了约翰逊总统的热情接待。这次外交活动被美国新闻界大肆渲染了一番。美国方面显然是故意做给英·甘地看的，因为她此时的政策已发生左转，为美国所不悦。故她认为华盛顿意欲扶植德赛以与她为敌，这是向在印度政界中的亲西方分子发出的一个信号，要他们团结在德赛的周围。英·甘地对此十分敏感和愤恨。

在1968年的预算中，德赛对印度比较富裕的农民提出征一种少量的间接税，但这个提议在党内的农业专家中引起了预料中的喧闹，英·甘地便不愿征这种税了。德赛认为她是故意让自己在公众面前失言，把这看作是对他个人的羞辱。

在接下来的一连串事情中，有一件引起了相当大的风波，它就是银行国有化问题。

过去中央政府曾几次打算实行银行国有化，都因遭到党内左翼分子的反对而被迫放弃。英·甘地大选获胜后，这个问题被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身为财政部长的德赛提出了一个折衷建议：政府不要去控制银行和给予银行主相当大的补偿费，而应为银行谋求社会性的控制。他认为，政府通过行政上的权力，如有必要，还可以通过某些立法来影响国家银行的信贷政策，这样就足以利用银行的资源来实现官方经济和发展的规划。由于英·甘地自己有

关银行国有化问题的背景知识有限，所以她尽管在本能上对德赛的办法持怀疑态度，但还是接受了。

然而，当这个问题被提到全党面前要作为政策通过时，却遭到了国大党左翼的反对。左翼中有一部分人最为激进，他们号称“青年土耳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认为是与总理亲近的人。钱德拉·谢卡尔是“青年土耳其”的中坚。他控告德赛之子坎提·德赛仗着有他父亲的包庇纵容，一直在利用他的权势对国家的商行开后门。德赛怀疑钱德拉·谢卡尔之所以敢如此大胆地攻击他，一定是受了英·甘地的默许和支持。当国大党要求作为领袖的英·甘地处分钱德拉·谢卡尔时，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却没有动真格的，而这在德赛看来似乎印证了他的猜测。

围绕着国大党主席的人选问题，党内各派又展开了较量。卡马拉季任职已有4年；再说他在大选中败得太惨，连议员资格都失去了，也不配再坐党主席的交椅。

1967年10月，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中印度的贾巴尔普尔召开会议，决定由英·甘地和卡马拉季共同挑选党的领袖。然而，这谈何容易，因为他们两人现在势同水火，互不相容。经过多次讨价还价之后，他们选择了当时任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的尼贾林加帕。卡马拉季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尼贾林加帕也是辛迪加派成员；英·甘地之所以接受尼贾林加帕，是因为她认为她与他个人之间并无敌意。

由于有两个大人物的共同支持，尼贾林加帕得以如愿以偿，成为国大党的新主席。为了在正副总理之间保持中立，尼贾林加帕尽可能在工作委员会中公平地代表双方利益。但这并不能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

英·甘地再度执政的第一年，基本上是在同德赛的较量中度过。到了1968年，她面临的局面更加困难。她的老对手辛迪加派经过一年的沉寂后再度活跃起来。他们的力量有所恢复。在大选中遭到惨败的卡马拉季和帕蒂在补缺选举中重新当选为议员。他们虽然回到了人民院，但怀疑女总理在补缺选举中一定起过防止他们当选的阻碍作用。因此，他们对英·甘地恨之入骨，极力削弱她的权力，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优势。与英·甘地正闹得不可开交的德赛乘机与他们勾结起来，决意将女总理赶下台。

他们的图谋起初遭到了国大党新主席尼贾林加帕的反对。尼贾林加帕认为，自己上任不久，位子尚未坐稳就马上与总理为敌，未免不智；再说，国大党正面临反对党的强大压力，本应加强团结，一致对外。如果在此时与总理过不去，势必影响党的团结，搞不好还会引起党的分裂，从而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状态。

于是，双方暂时休战。一时间，印度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少有的寂静。然而，就在这表面的寂静下面，双方正积极备战，准备迎接下一轮的搏杀。

分道扬镳

国大党新主席尼贾林加帕不久就摒弃了他最初的反对立场，回到辛迪加派队伍中去了。因为他渐渐发现女总理并没有把他这个党的最高领袖放在眼里，凡事都不与他商量，仿佛世界上就没有他这个人存在似的。他显然被英·甘地对待他的态度大大地激怒了，决心与德赛以及他的辛迪加派同党们一起，扳倒英·甘地。

他们的倒英·甘地活动在 1969 年 4 月的国大党法里达巴德年会上正式拉开了序幕。在会上，尼贾林加帕以党主席的身份公开抨击英·甘地的经济政策，尤其是指责国有企业效率不高，不能盈利。此言一出，四座震惊。因为在此以前，还没有人敢向总理发出公开的挑战。“庖厨内阁”要员 D.P.米什拉和迪克西特以中途退场相抗议；而“青年土耳其”则挺身而出，反击尼贾林加帕。后者则以党主席的讲话不容质疑为由拒绝接受他们的指责。

尼贾林加帕的言行和傲慢态度显然激怒了英·甘地。她全然不理睬他的指责，以辛辣的言词、高亢的语调回敬了对方。她宣称国有企业的最高目的并非为了利润，而是要推动和保护“国家的自立能力”。全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就在此起彼伏的掌声中，英·甘地继续说道，她的经济政策将永远服务于保护印度政治经济利益的最高目的。

当然，尼贾林加帕对英·甘地的言论进行了反驳。然而，他的反驳是那样的无力而微弱，被与会者对英·甘地的欢呼声淹没了。

辛迪加派并不甘心于他们在法里达巴德年会上的失败。他们伺机而动，发誓要在新的争斗中打败英·甘地。

他们的机会终于又来了。1969 年 5 月 3 日，一直超然置身于国大党权力之争之外的总统扎基尔·侯赛因突然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围绕着空缺下来的总统职位，辛迪加派和英·甘地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并最终导致国大党的分裂。

辛迪加派把争夺总统虚缺职位的竞争看成是一次打败英·甘地的天赐良机。他们认为，如果能把他们中意的人推上总统宝座，那么不仅可以使英·甘地公开丢脸，还可以向她 and 国人展示自己的势力，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创造条件将她罢免，真可谓一箭三雕。

按照以往的惯例，副总统 V.V.吉里应自动被提名为国大党的总统候选人，但双方都不喜欢他。与三位前总统相比，V.V.吉里显得过于平庸。他既没有拉金德拉·普拉沙德政治上的名望，又没有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那样的学术上的声誉，也没有扎基尔·侯赛因那样优雅的风度。因此，双方都不想提名他为候选人。

尼贾林加帕先是试探了一下德赛的口气，看他是否有兴趣。德赛认为自己出任总统并不成问题，但他情愿在政府里继续任职。他说他担心如果没有他，那个女人（指英·甘地）“会把国家出卖给共产党人”。

辛迪加派最后决定提名人民院议长桑吉瓦·雷迪为候选人。雷迪是辛迪加派老班底成员，颇有政治手腕。他一旦当选为总统，便会成为英·甘地的掣肘力量，使她至少在行使总理权力时不能放开手脚；弄得好，雷迪还可以利用宪法中某些字句上不明确的地方设法将她赶下台。这便是辛迪加派极力推选雷迪的真正用意。

对于辛迪加派的险恶用心，洞若观火的英·甘地岂能不知。不过她表面上不动声色，让辛迪加派表演个够。在这决战前夕，她出国到日本访问去了。

按照法定程序，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只有在党的全印委员会会议委员会中获得通过才能定下来。该委员会会议预定于 7 月中旬在班加罗尔举行。在此期间，辛迪加派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党内大肆进行宣传活动，制造舆论声势，提高雷迪的知名度，企图造成一种国大党总统候选人非雷迪莫属之势，力争使雷迪的候选人资格在即将举行的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会议委员会会议上获得通过。

其时，英·甘地在日本东京已获悉辛迪加派极力想将雷迪塞进总统府的真正目的是要把她赶下总理宝座，让已与他们穿同一条裤子的德赛取而代之，早在童年时代就深深地根植于她的个性之中的偏执心理一下子达到了顶点。尽管如此，回国后她仍然保持了沉默。她很清楚，自己不可能提出一个有可能获得辛迪加派占多数的议会委员会通过的人选。如果在议会委员会上被打败，那么她将变得不堪一击。她不得不选择沉默与拖延的战略，希望到最后关头能与辛迪加派达成妥协。于是，她向尼贾林加帕建议把党的候选人的选择问题留给她来处理。她的理由是她作为总理要与总统经常接触。

然而，辛迪加派已执意决一雌雄。尼贾林加帕不仅拒绝了她的建议，还提醒她党的候选人从来都是由党的最高负责人而不是总理来决定的。英·甘地别无选择，只得硬着头皮应战。

英·甘地先是对握有本党总统候选人决定权的八人议会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作了一番分析。她得出的结论是这个议会委员会不会是铁板一块，在雷迪的提名问题上肯定会有分歧。以这个分析结论为前提，她终于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贾格吉凡·拉姆。她的理由堂而皇之：贾格吉凡·拉姆是贱民领袖，由他出任总统，可以实现圣雄甘地生前的夙愿。但辛迪加派不改初衷，仍坚决支持雷迪。双方的决战终于拉开了序幕。

为了确证自己究竟有几分胜算的把握，英·甘地又揣度起八人议会委员会各成员的态度来。她自信内政部长恰范和“庖厨内阁”成员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肯定会站在她一边，因为自己一向待他们不薄，这样就会有四票是反对雷迪的。她希望尼贾林加帕不会投关键性的一票来决定像选举国家总统这样的大事。

为确保无虞，英·甘地还接受了她的主要顾问，P.N.哈克萨尔所献的一条计策：战胜辛迪加派的上策就是把个人权力之争转化为意识形态之战。英·甘地觉得此计甚妙，又很及时，正中她的下怀。此时也恰好具备了实施此计有利的政治气候条件。自从经济政策分歧在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法里达巴德年会上曝光以来，那些对辛迪加派和德赛的经济政策感到极为不满的左翼批评者们一直在积蓄力量，渴望与这群“阻挠”人民实行社会经济改革的“反动派”进行面对面的交锋。英·甘地决定立即将其付诸实施。

英·甘地采取了她的初登政治舞台时的典型方式，以“身体不适”为由，没有出席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班加罗尔举行的会议，但通过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向大会递交了一份经济政策的要点报告。她声称她的想法比较“零散”，“不太成熟”，要求委员会考虑“全部或部分接受”。

英·甘地的观点并没有多少新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这是一个国大党内争论过多年的老问题。英·甘地这次是以一种骑墙态度提出来的。她没有同意“青年土耳其”再次提出的立即将商业银行收归国有的要求；但她同时表示这个问题并非不可以重新考虑，虽说进行社会控制的两年期限还没有到。她的这一着棋下得颇为圆滑，但其意图却很明显：她对银行国有化问题本身并没有多大兴趣，只是想利用它在国大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上为自己服务。如果目的达到了，她就会让社会控制银行的状况继续下去；否则，她将立即实行银行国有化。可见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对英·甘地的圆滑策略，辛迪加派焉能不知。他们决定将计就计，操纵工作委员会原封不动地批准了她的经济政策要点报告，宣称不完善的地方留给政府去补充和完善。他们还设法使这个报告得到了国大党全印委员会的一

致赞同。第二天，德赛发表评论，说工作委员会的决议使总理的想法与国大党全印委员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对手居然向她抛出了橄榄枝，这下倒把英·甘地弄糊涂了。她这才意识到，她的对手并不简单。

班加罗尔的与会者都忙着干他们认为该干的事（即确定总统候选人的人选）去了，却把经济政策当作细枝末节的小事弃置一边。

摊牌的时候终于到了。当英·甘地提名贾格吉凡·拉姆并试图进一步申述理由时，她遭到了德赛的反对。后者的理由是，对于一个大家都很熟悉而且同时也是本次会议的一名与会者的人，根本无需加以赞扬。对于德赛的反对，英·甘地并不感到意外，使她极感意外和震惊的是，她自认为会支持她的内政部长恰范竟然会在最后关头，阵前倒戈，将她出卖，投了雷迪一票。这无异于在她的背后捅了一刀。这样一来，整个形势便发生了逆转。八人投票结果是5：3，雷迪的提名获得了绝对多数票。在这种情况下，尼贾林加帕的那一票投不投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然而，既然党已作出了选择，英·甘地无法公开表示反对，只好同意雷迪为候选人，并以提名人的身份在有关文件上签了字，尽管她极不情愿。

没等会开完，英·甘地便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会场。她这样做颇有些失态，不符合她沉着冷静的一贯作风。看来恰范的“背叛”对她的刺激实在太，以致她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理智。

尽管初战已经失利，但英·甘地可不是一个轻易言输的人。她从小就不是那样的人。既然火已经点燃，不如让它烧更旺，烧到对手自己的阵营中去。就在会议结束的当晚，英·甘地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记者们感到她在提到她的对手时说的话含有威胁的成份——以前她很少这样。她宣称辛迪加派必须对他们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她还说，他们把她所不喜欢的总统候选人“强加”给她，实际上是攻击她的观点、态度和政策。她给与会的记者们留下了这么个印象：总理就像一只受了伤的“母老虎”。

辛迪加派见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害怕事态进一步扩大，引起党的公开分裂。尼贾林加帕试图安慰英·甘地，决定暂不将选举结果公之于众。他希望等她冷静下来后，再与她一起公布，这样就至少可以在表面上保持党内的团结。可英·甘地不买他的帐，有一段时间她甚至借故拒绝与他见面；而以后同意接见他时，也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她认为她同对手的冲突已不可避免，没有必要作出妥协和让步。

有人猜测总理一定会惩罚“不忠”的恰范。她的确想这样做，但理智告诉她，此时相反动恰范不得。因为对他采取任何行为都有可能被人们看作是公报私仇。于是，她决定把行动目标转到德赛身上。她以闪电般的速度于7月16日罢免了德赛的财政部长职务，自己兼任财政部长，其借口是德赛过于保守顽固，并与私营大企业有染，他没有资格贯彻执行她的激进的经济政策。此举使德赛感到极为震惊。他觉得自己被当成了一个办公室的小差役。他抑制不住满腔怒火，指责英·甘地粗暴无礼，并愤然辞去形同虚设的副总理一职。

已经掌握了主动权的英·甘地不给对手以任何喘息的机会，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7月19日，她宣布将14家主要的商业银行收归国有。辛迪加派攻击说英·甘地在此时作出这一决定完全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并非为了经济改革。但他们的抗议声被老百姓的狂热的欢呼声淹没了。在宣布实行银行国有化之后的几天里，首都成千上万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人力车

车夫、小商人、小职员，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以及从未进过银行的人欣喜若狂，甚至在大街上跳舞以示欢迎。这还不够，他们还聚集在萨夫达尔路1号总理府官邸周围，欢呼雀跃，有的人甚至跑进总理府向英·甘地敬献用金盏花和晚香玉扎成的花环以示敬意，表达他们对她领导的信任。这种情形以前还从未有过。印度新闻记者拉纳吉·罗伊说：“几乎在一夜之间，政治气候就变得对她有利，她成了人民的女英雄，人民相信她要为他们的利益，限制有产阶级。”

公众的狂热吓倒了辛迪加派。他们不得不放弃原定计划，没有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上谴责英·甘地对德赛不恭；有些成员则投身到右翼反对党组织及其所把持的主要英语报刊的反英·甘地行列，警告她不要把政治玩到大街上。有人甚至公开指责英·甘地是印度共产党组织在政治上的同路人。

英·甘地越过国大党，直接面向民众的策略又一次获得了成功。通过实行银行国有化，驱逐右翼领袖德赛，英·甘地已成功地把党内的个人权力之争转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且在此过程中，她在公众面前为自己树立了这样一种领袖形象：她深深地同情穷人，可她因受到一小撮贪图权势、腐朽老迈的当权者的阻挠而不能顺利地为他们服务。她已经争取到了民心，所以面对辛迪加派的指责，她毫无惧色。她愤怒地责问道，她只不过将党内那些“虚伪”的批评者们“年复一年地投票赞成”的国大党计划付诸实施，怎么可能就成了共产党呢？至于那些在报纸上批评她的人只不过是“报刊阔主人”，只是“富有的报刊拥有者”的喉舌而已，完全不关心穷人的疾苦。最后，她颇为勇敢地加了一句：如果她自己想加入共产党，谁也阻止不了她。

银行国有化政策虽然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但要将它顺利实施也并非易事。银行国有化法令在最高法院受到了挑战，被以“匆忙草率，手段拙劣”为由宣布无效。然而，英·甘地没有被难住。她又颁布了一项法令，不通过银行的股东，便接管了银行的经营业务，从而完成了国有化进程，并且符合最高法院在以前的判决中所提出的目的。她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她的友好普普尔·贾亚卡向她表示祝贺并说她的银行国有化决定作得非常及时之时，她意味深长地说，时间的选择并不是由她本人而是由对手们决定的。“他们把我逼到了墙角，我别无选择。”

就在此时，辛迪加派犯了一个大错误，这个错误不仅损害了辛迪加派自身的形象，也使英·甘地得以从她自己描绘的“墙角”中走了出来，还使双方的僵持战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尼贾林加帕偏偏就犯了这个大忌。他慑于已获得了公众普遍支持的英·甘地的威力，既不知道对方下一步棋会怎么走，又极想让雷迪获胜。情急之中，他竟然在私下里同具有浓厚的印度教教派色彩的右翼政党人民同盟和保守的自由党的领袖进行秘密接触，希望他们在第二轮正式投票中投雷迪的赞成票。在第一轮投票中，他们投的是各反对党一致推举的候选人、资深政治家C.D.德希穆克的票。

此事传开后，在国大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国大党过去一向以政教分离、世俗主义相标榜，宣称它的政策是超越一切党派、宗教团体和组织的，与人民同盟和自由党在思想意识上水火不容，现在党的主席竟然为了一己之私，去和它们暗中勾结。此举严重损害了国大党的形象，无异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英·甘地的支持者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认为尼贾林加帕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与右翼政党“无耻地结盟”已经玷污了雷迪的候选人形象，

以致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总统候选人的人选。他们继而提出了 V.V. 吉里为候选人，与雷迪相抗衡，并劝告党员们在行使表决权时应凭“良心”投票。尼贾林加帕愤然否认他们对自己的指责。他辩解说，他之所以那样做，纯粹是为了确保本党提名的候选人能够当选，以免总统职位落入反对党之手；同时，他还披露了总理本人与共产党及其他左翼“危险”分子的暧昧关系。此后，这场“良心的投票”变成了世人所说的“午夜信件之战”。双方都尽可能在报纸午夜的最后截稿时互发信件，而其内容早在收件人收到之前就已泄露给报界。总理的宣传机器总是确保第二天凌晨由总理本人唱压轴戏。

老实说，支持吉里而反对雷迪，完全是一种政治投机活动或赌博活动。前面已经说过，吉里并非合适的人选，英·甘地及其支持者们也不是不知道，但他们因苦于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而不得如此。他们别无选择，只得背水一战，与辛迪加派一争高下。但究竟有多少胜算，英·甘地本人和她的支持者们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总统选举是一种间接选举，它取决于议会两院和各邦立法会议中大多数议员的态度和立场，而不像普选那样，她可以越过国大党的领袖直接向民众发出呼吁。为了确保吉里获胜，英·甘地与各邦（其中包括非国大党的以及与辛迪加派有密切关系的邦）首席部长进行了接触，也亲自向各邦内的大多数议员呼吁。她的阵营曾指责尼贾林加帕为获得人民同盟和自由党对雷迪的支持而与他们进行秘密接触，现在她自己为了获得对吉里的支持而做着尼贾林加帕刚刚做过的同样的事，只不过她的接触面要宽得多，包括所有的反对党，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也不管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可见政治斗争往往大多是“马基雅弗利式”的。尽管她进行了广泛的活动，但是她只能从共产党、社会党以及阿卡利党、泰米尔纳杜德拉维达进步联盟的议员那里拉来一些选票，人民同盟、自由党等右翼政党是不会买她的帐的。

总统选举揭晓之时，已是 8 月 20 日深夜。整个选举过程从头到尾胜负难定。吉里与雷迪旗鼓相当，得票率交替上升，相差甚微，直到最后一秒钟方见分晓：吉里以极其微弱的多数当选为总统。虽然赢得相当勉强，但这并不重要。成者王侯败者寇，胜利就是一切。很少有人会去考虑这胜利是否来之不易，获之勉强。辛迪加派被击败了。实行银行国有化才一个月，英·甘地便再次受到了民众山洪暴发般的狂热欢呼。

即使置身于胜利的狂呼者当中，英·甘地也未忘乎所以。她很清楚，斗争并未结束，更激烈的斗争还在后头。吉里虽然获胜，但他主要靠的是反对党临时联盟的多数人的支持，在国大党内只得到了少数人的支持。国大党在议会党团中有三分之二的议员、在各邦立法会议中有近四分之三的议员都投了雷迪的票。

形势很明显，英·甘地与辛迪加派的关系已到了决裂的边缘。然而双方都不愿承担分裂党的罪名。这正是国大党统一体奥妙之所在。8 月 25 日，吉里当选为总统后，国大党举行了首次工作委员会会议，试图忘掉过去的所有不和，既往不咎，重新开始。但这是不可能的。国大党的分裂已是不争的事实，只不过那张薄薄的窗户纸尚未被最后捅破罢了。

政界墙头草，风吹两面倒。眼见英·甘地获胜，国大党的议会党团和各邦国大党立法会议中先前在总统选举中站在辛迪加派一边支持雷迪的那帮议员、政客们纷纷以惊人的速度转变态度和立场，向英·甘地表示效忠。内政部长恰范也赶紧向她靠拢。英·甘地当然愿意接纳他，但恰范永远也别想指

望再得到她的信任了。

尼贾林加帕受不了多次打击，一病不起。但英·甘地仍不放过他，在他的伤口上再撒了一把盐。她授意她的支持者们提出一个书面申请，要求召集一次国大党全印委员会特别会议，选举党的新主席。该书面申请本已得到委员会足够成员的签名，但英·甘地的支持者们仍不满足。为了确保扳倒尼贾林加帕，他们不惜模仿某些人的笔迹签字，从而给他们自认为正义的事业上打上了不道德的印记。

尼贾林加帕本来打算在 11 月 1 日考虑该书面申请，但是在此之前事情已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10 月 28 日，他给英·甘地写了一封冗长而言辞激烈的公开信，指责她“忘恩负义”，说她所谴责的所谓“擅权的一小撮人”正是当初扶持她登上总理宝座的关键人物；还指责她正在建立个人崇拜，她的政府也正在利用包括威胁利诱在内的种种手段，来“确保控制权和個人崇拜”，而这将“威胁到国家的民主”。他在这封信的高潮部分写道：“你似乎已将对你的忠诚与否作为对国大党和国家忠诚与否的标准。”这句话在今天看来颇有预见性，可在当时却只是徒招嘲弄。公众支持“进步的”英迪拉，反对“反动的”辛迪加，这种情绪非常强烈，不可逆转，而尼贾林加帕已成了辛迪加派的象征。

愤怒、沮丧而又无可奈何的尼贾林加帕作困兽之斗，将英·甘地的两名心腹法·阿·艾哈迈德和苏布拉马尼亚姆赶出了党的工作委员会。此举立即遭到英·甘地的反击。她宣称尼贾林加帕的行为卑鄙拙劣，令人无法忍受。她罢免了对辛迪加派持同情态度的几名资浅部长，还宣布她将在总理府自行召集党的工作委员会，以与尼贾林加帕的工作委员会相抗衡。

11 月 1 日清晨，战云密布的新德里目睹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总理府官邸和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总部同时举行。委员会的 21 名成员有 10 名分别去参加两个会议。只有 K.C. 亚伯拉罕持中立立场，他两个会议都参加，在两个会场都受到了热烈欢迎。总理的支持者在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总部聚众闹事，对尼贾林加帕的人大打出手，与会者中只有亚伯拉罕一人没有受到伤害。警察袖手旁观。

即使发生了这样的悲剧性事件，双方仍然谁也不愿先迈出正式分裂的最后一步，只是互相指责对方的“非法行为”和“破坏国大党统一”的用心。

最后，还是尼贾林加帕觉得这场虚假的戏再演下去，实在太乏味，该收场了。他以英·甘地对抗工作委员会的决定为由宣布开除她的党籍，命令国大党议会党团重新考虑新领袖，从而打出了第一枪。

英·甘地是在总统府的迎宾招待会上听到这个消息的。对手开头炮，这是她求之不得的。现在她觉得她不用承担分裂国大党的罪责了，反倒落得个一身轻松。因此，她显得异常沉着冷静。在整个宴会上，她满面笑容，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参加宴会的人们觉得女总理的心情似乎出奇的好。

傍晚，英·甘地召集内阁会议。大多数资深部长再次宣誓永远效忠她，决不动摇。几位摇摆不定者被迫辞职，她立即“照批”。

要想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取得国大党议会党团大多数议员的支持。于是，双方各显其能，尽量使出他们所能想得出的各种手段，疏通拉拢议员们。结果英·甘地在人民院中得到 279 名国大党议员中的 204 名议员的支持，其余为辛迪加派的支持者。在 11 月 22 日召开的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上，英·甘地又得到了大多数委员的支持。至此，国大党正式公开分裂。

分裂后的国大党分别与 12 月下旬召开了各自的年会，都自称是真正的国大党。最后，经最高法院裁决，英·甘地派国大党为真正的国大党，称国大党执政派；而辛迪派国大党则称为国大党组织派，因其英文词的第一个字母为“O”，故它常被国大党执政派戏称为“国大党零派”。

国大党分裂后，国大党执政派在议会两院中失去了多数，但由于有共产党、社会党和几个地方性政党的支持，她的政府安然无恙。国大党组织派发起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案遭到了否决。

半年以后，英·甘地感到自己羽翼已丰，开始改组内阁。她罢免了政治立场左右摇摆的恰范的内政部长职务，由自己兼任，让他改任财政部长。接着，她又趁热打铁，对某些机构大动手术。当时中央情报局同时负责国内外情报事务，既握有实权又相对独立，直属内政部。英·甘地将情报局一分为二，原先的情报局管理国内情报及反间谍事务，另成立新的研究分析处，负责国外情报事务，并将这两个机构以及隶属于财政部的税收情报局一并抓到自己手中。

辛迪加派已被扫地出门，国家机构该动手术的也动了手术，现在该清理一下“庖厨内阁”了。拿谁开第一刀呢？英·甘地毫不犹豫就想到了迪内希·辛格。曾几何时，迪内希·辛格是英·甘地的宠臣，内阁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但他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竟然到处炫耀他对总理的影响如何如何大；他的手也伸得过长，未得到英·甘地的允许，居然就想插手她与辛迪加派的总统选举之争，并瞒着他的主子借主子的名义大搞政治交易。这还了得！英·甘地随便找了个借口，就罢了他的外交部长之职，将他调到一个很不起眼的部，不久又将他踢出内阁，最后干脆连他的党籍也撤销了，理由是他有与反对党“关系密切”之嫌。她要让她手下的那帮官僚们都知道，她既可以将一个人捧上天，也可以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庖厨内阁”的其他成员曾一度梦想占有辛迪加败阵后空出的职位，但其下场与迪内希·辛格大同小异，像法·阿·艾哈迈德那样能保住职位并得到升迁的人是不多的。四年后，他升到了他能够升到的最高位，当上了印度共和国总统。

英·甘地，这个曾几何时被人称为“呆女人”的女人，仅仅三四年工夫，已经变成了一位自信、武断而又居高临下的领导人物。此后，她的名字便与“冷酷无情”四个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绿色革命”及其他

鉴于经济形势极端困难，国大党在第四届大选中严重受挫，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修复国大党在人民心中开始腐败的形象，也为了表示国大党实现竞选宣言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决心，英·甘地政府上台后不久，即在 1967 年 5 月召开的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上提出了一个“十点计划”。“计划”继承和发展了尼赫鲁“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基本思想。其主要内容为：对银行实行社会控制；普通保险国有化；由国家机构逐步接管私营的进出口贸易；实行粮食配给政策；组织城乡消费合作社；采取有效措施削弱垄断和经济权力的集中；保证整个社会的最低生活需要；限制个人对城市土地的所有权；进一步实行土地改革；废除王公除年俸外的一切特权（后来更为激进，将王公年俸也取消了）。看得出来，“十点计划”的着重点放在经济方面，这与当时印度极度恶化的经济状况是密切相关的。英·甘地的

这一套比较激进的经济纲领，虽然遭到了国大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对，但却受到了进步势力的支持。

英·甘地以“十点计划”为基本指导思想，进行了一系列激进的、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在1966年3月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后，她果断地下令暂停执行第四个五年计划，而以三个年度计划来过渡。此后的三年中，英·甘地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压缩工业投资，将卢比贬值以刺激出口，放宽工业许可证的限制，宣布取消42种有出口潜力的轻工业和农机的生产许可证，并允许其自动扩大生产能力25%。

在三年经济调整初见成效的前提下，英·甘地政府于1969年4月宣布开始实行第四个五年计划。“四五”计划将社会发展目标由“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改为“通过改革社会经济体制实现社会公正”。英·甘地还对其父尼赫鲁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将经济发展重心从“二五”计划和“三五”计划的重工业和基础工业转移到农业上来，加大了农业投资比重，进一步推行农业发展新战略，以实现粮食自给；同时，为了争取民心，对私人垄断资本实行比尼赫鲁时期更为激进的政策。这一点是尼赫鲁曾经想到但未能实现的。

早在60年代初制订“三五”计划的时候，尼赫鲁就想了解前两个五年计划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是如何分配的。1960年10月，他任命以经济学家P.C.马哈拉诺比斯为首的收入分配和生产水平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该委员会于1964年2月提出报告，说明私人资本集中程度上升了。同年4月，尼赫鲁政府又任命以K.C.达斯古普塔为首的垄断调查委员会进行第二次调查。该委员会于1965年提出报告，认为工业中普遍存在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现象。在1380种工业产品中，有44%是由三家最大的企业控制生产的。1963年资产在5000万卢比以上的75家财团和16家独立公司占私营公司资产的51%，其中资产在3.5亿卢比以上的最大的20家又占75家资产的68%和实收资本的67%。该委员会认为，加速工业化与经济实力的集中是密切相联系的。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是可取的，但重要的是要防止垄断，垄断会妨碍工业化。

1965年，夏斯特里政府任命以R.K.哈查里为首的工业计划与许可证政策委员会又进行了第三次调查。该委员会于1966年向国家计委提出的报告表明，资产在5000万卢比以上的73家财团控制了1125家公司，有20家资产在3.5亿卢比以上。它们在获得工业许可证兴建和扩建企业方面享有很多便利。

在对这三次报告进行详细研究的基础上，英·甘地政府又于1967年派出以杜特为首的工业许可证政策调查委员会进行了第四次调查。该委员会1969年提出的报告表明，工业许可证集中给了少数几个邦，其中仅马哈拉施特拉、西孟加拉、古吉拉特和泰米尔纳杜四个邦就占62%。

这些报告使英·甘地确信，私人资本垄断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仅在生产领域增加国营企业的资产和扶助小企业是不能防止垄断财团实力集中的，因此，有必要对垄断企业实行更加严格的限制和扩大国家对金融领域的控制。

就在杜特委员会提出报告的当年，英·甘地迈出了她的父亲曾想到而未迈出，夏斯特里未来得及迈出的大胆的一步，颁布了《垄断与限制性贸易行为法》。其宗旨是把经济实力的集中限制在“不危害公众利益”的范围内，控制垄断企业的垄断性贸易行为。该法案规定，企业资产连同与该企业有资

本联系的企业资产在 2 亿卢比以上者；企业连同与该企业有资本联系的企业占产品的三分之一以上、资产在 1000 万卢比以上者，均须根据该法案进行登记。这类企业在增加新股本、更新设备、扩大生产能力和经营范围、兼并其他企业或兼任其他企业的董事时须经政府批准。但是，如果这类企业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需要或开辟国外新市场而扩大生产能力和经营范围，或者是向落后地区进行投资，则可放宽对它们的限制。为了保证该法的实施，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垄断和限制性贸易行为委员会”。

另外，前面所提到过的银行国有化法令是与《垄断与限制性贸易行为法》相配套的。该法将占全国贷款 56% 的 14 家私营大商业银行收归国有，从而使国营银行控制了全国银行存款的 83%、贷款的 84% 和分支行总数的 82%。1971 年，英·甘地政府进一步将 64 家本国和外国的一般保险公司收归国有。

1970 年，英·甘地又下令取消了经理行制度。经理行是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和象征之一，肇始于 19 世纪后期，是英国垄断资本控制印度经济的组织形式。经理行通过合同对签订合同的企业进行控制，并从这些企业收取大量佣金和利润。经理行常常作为这些公司的创办人，但在它们投产并建立起信誉后，便将大部分股票在市场上抛售，而只凭经理行合同继续进行控制。当时很多经理行为英国资本所设，后来印度的一些大财团如塔塔、比尔拉等也相继建立了许多经理行。因此，取消经理行制度既是抹去殖民地时代的一个遗迹，也是对印度私人垄断资本的一个限制。

尽管上述措施对私营大企业和大银行、保险公司等的限制是有限的，但毕竟起了一定的作用，故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左翼党派和民众的支持。

有人将农业发展新战略冠以一个漂亮的名词——“绿色革命”。“绿色革命”综合了世界银行、美国福利基金会等专家们的意见，其主要内容是选择若干耕作条件好、雨量充足又有水利设施的地区，在农业生产各阶段集中使用以优良品种为主的各种配套的现代化农业技术。“绿色革命”所走的是一条与尼赫鲁的以土地改革、合作社加乡村发展计划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发展道路根本不同的道路。

实事求是地说，印度农业发展新战略即“绿色革命”并不是英·甘地的发明，而是夏斯特里政府在 1965 年提出的，但它的实施却是从英·甘地时代开始的。印度经济学界一般倾向于把 1966 年引进墨西哥高产小麦品种看作是“绿色革命”的开端。

“绿色革命”虽然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如农业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农作物品种发展不平衡、旱地农业发展缓慢以及农村两极分化等，但它的成就是主要的，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高产粮食种植面积有了大幅度提高。1966/67 年度，小麦、稻谷、玉米、高粱和小米等五类主要粮食作物的高产品种植面积仅 188 万公顷，1970/71 年度便激增至 1538 万公顷；耕地灌溉面积增加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特别是农机工业的发展，农用拖拉机、柴油水泵和电动水泵等农用机械的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农业现代化程度有了提高；最重要的是粮食产量有了增加，从 1965—1966 年度的 7235 万吨增至 1968—1969 年度的近亿吨，大大缓和了国内粮食危机，并因此缓和了政治紧张局势。

英·甘地在政治方面所进行的改革，最打动民心的是取消封建王公的特殊津贴和特权。王公年俸和特权问题是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印度独立初国

大党在归并土邦时为抚慰和拉拢封建王公所实行的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土邦归并的历史进程，促进了印度领土的完整和统一。但它毕竟是一种封建残余，是旧世界的象征，因此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英·甘地认为，现在到了取消王公年俸和其他特权的时候了。她说：“最使人民愤慨的并不是年俸本身，而是与此相关的其他特权，如王公们免交水电费等。穷人要支付水电费，而王公们倒反而可以不付。王公们还享受免费医疗。不同的邦对他们作了不同的迁就。这些名目繁多的小特权激怒了普通老百姓。”

1970年9月1日，英·甘地在议会中提出了要求取消王公年俸的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在人民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获得通过，但在联邦院却仅以一票之差遭到了否决。反对她的人为此幸灾乐祸。英·甘地专门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后，她通过总统发表声明，以不承认王公的办法取消他们的年俸。王公们不服，将这个问题向最高法院起诉。11月27日，最高法院宣布总统声明不合法，无效。这是自一年前否决银行国有化法案以来，最高法院对英·甘地及其支持者们施加的第二次打击。尽管由于最高法院的阻挠，英·甘地要求取消王公年俸等特权的没有达到，但此事极大地争取了民心，为英·甘地在即将到来的第五次大选中获胜增添了一枚重要的法码。

英·甘地上台后所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措施表明：与乃父尼赫鲁相比，她的目的更为实际，手段更为灵活，胆子更大，迈出的步子也更大：有些事情是尼赫鲁在世时想做而未做的，但是她却做了。

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

1970年12月27日，英·甘地发表广播演说，宣布解散人民院，于1971年2月中旬举行新的大选。按照宪法的规定，本届政府本来可以执政到1972年。

英·甘地为什么要提前举行大选呢？

这首先是由她在议会中的处境决定的。自从国大党发生分裂后，以她为首的国大党执政派在议会中的席位减少到了不足一半。一般说来，在这种情况下她应该辞职。她之所以还能继续执政，是因为有共产党、社会党和某些地区性政党如旁遮普的阿卡利党和泰米尔纳杜的德拉维达进步同盟的支持。但是，她同这些党派的关系是微妙的：她的党并未在议会中同它们结成公开的、正式的联盟，从它们那里得到支持是非正式的和私下的；英·甘地要想保住那种支持，就必须既要防止伤害共产党和社会党那样的左翼政党的感情，又要注意不触犯阿卡利党和德拉维达进步同盟那样带有强烈的地方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英·甘地政府即使能够勉强支撑到任期届满，也会因顾虑重重，放不开手脚而无所作为，而无所作为不符合英·甘地的个性。

其次，决定提前大选也与英·甘地想利用已经获得的群众支持有关。通过实施银行国有化法和废除王公特权，英·甘地在人民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她感到必须将这种支持迅速转化为选票，不然，时过境迁，群众的热情就会降温，他们的支持也就会变成开过的昙花。

再次，宪法修正案事件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该修正案在议会联邦院遭到否决和总统声明被最高法院判定为不合法的现实，使英·甘

地切实感到自己政府不稳固，有必要采取措施来使之稳固：另一方面，这件事有助于加强和巩固自 1969 年银行国有化以来她已经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她已成为进步力量的象征，而对宪法修正案的否决却使议会联邦院和最高法院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的代表，这反而激起了民众对英·甘地的广泛同情。所以，宪法修正案事件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对英·甘地来说都是一个天赐良机。

最后一点，执政五年来取得的实绩尤其是“绿色革命”的成功使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也增强了英·甘地提前大选的必胜信心。

作出提前举行大选的决定并非易事。这说明英·甘地具有审时度势的政治家眼光、敏锐的洞察力和当机立断的决策能力，是她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然而，在当时无论是党内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不解，对她持同情和支持态度的人更是替她捏着一把汗。他们劝她不要提前举行大选，其理由是在 1967 年大选中，统一的国大党竭尽全力才得到了微弱的多数，而现在国大党已因分裂力量受到了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想赢得大选的胜利比登天还难；如果一意孤行，硬要提前大选，无异是政治自杀。

某些在野党人士大多怀着“黄鹤楼上看船翻”的心情，想看英·甘地的笑话。独立的观察家们，也预测这次大选胜负难料，其根据之一是国大党组织派掌握了强大的竞选机器。其领导人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揭露英·甘地的“政治丑闻”就会达到预期目的；根据之二是以前曾为英·甘地唱过赞歌的英语报刊现在转而攻击她，有几家甚至相当刻毒。

无论是好心人的劝阻，还是在野党的预测，英·甘地都毫不为之所动。她认为前者的担心是多余的，后者更是瞎操心，她相信自己的眼光和对政治局势的判断能力。

英·甘地的自信和乐观果然不是盲目的！

与 1966 年的中期选举和 1967 年大选不同的是，英·甘地几乎绝对操纵了国大党执政派的竞选，因为她的党内不存在竞选机器，也没有任何像德赛那样的竞争对手。她自然而然地成了唯一的候选人。

这次大选变成了对英·甘地领导水平和人格魅力的一次公民投票。当《新闻周刊》记者问及她这次选举的主题时，她自信地回答：“我。”

仿佛是有心要摧毁英·甘地的自信，国大党组织派在大选中同人民同盟、自由党和统一社会党组成号称“大联合阵线”的竞选联盟，喊出了“驱逐英迪拉”的口号，但这个口号在英·甘地的“驱逐贫困”口号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她说她与任何人都没有个人恩怨，也不反对任何人，她只想全心全意地将人民从贫困的煎熬中解救出来。这个口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举国上下为之激动，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更是欣喜若狂，仿佛已经找到了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

英·甘地以极大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到选举中去，马不停蹄地东西穿插，南北奔走。每到一地，她都要深入到选民中去发表演讲。她讲话很注意听众对象和场合。面对普通群众，她会说，“我不是个热昏了头的革命派，我将时刻牢记人民的利益”；对有产阶级，她则强调自己“绝对无意取消私人拥有的院校”，说明自己“渐变的和平”改革计划绝不意味着以暴力废除“所有等级”。

本次大选结果，英·甘地大获全胜。她所在的国大党执政派赢得了整个人民院 500 多个席位中的 350 席，超过了三分之二多数。国大党组织派及其

盟友人民同盟、自由党均遭惨败，前者只得了 16 席，人民同盟的席位由上届大选时的 36 席减少到 16 席，自由党的席位由上届大选时的 42 席减少到 8 席。1971 年 3 月 18 日，英·甘地第三次蝉联国大党议会党团领袖和政府总理。

对英·甘地来说，1971 年是她在政治上空前称心如意的时期。她领导的党在人民院中获得了绝对多数议席，足以组织一个稳定的政府。一年前那种在作出任何重大决定时必须顾忌其盟友共产党、阿卡利党等的态度的尴尬局面结束了。无论是为获得议会中的多数，抑或是为修改宪法所必需的神奇的三分之二多数，英·甘地都不再需要他们的支持了。诽谤她的人、反对她的人已被完全击败，就连国家元首吉里总统也是承她的情才当选的。她的党内再也没有人胆敢同她作对。她在组阁时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内阁部长的任命全得看她高兴与否。印度人民寄希望于她，就像当年寄希望于圣雄甘地和尼赫鲁一样。总之，英·甘地可以自由自在地行使她作为国大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权力。

印度国内外的新闻媒介对位尊权重的英·甘地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一家印度报纸的主要专栏作家在报道她当上最高领导职位时，形容她的自信心和权力是“强大的，几乎是可怕的”。英国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以醒目的大标题直呼她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其理由是她敢于作出连她的父亲尼赫鲁也不敢作出的决定。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日报》称她为“印度女皇”。她再也不是几年前新闻记者们所说的那个被一群幕后操纵者用绳子牵引着的“哑巴娃娃”了。

英·甘地无疑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作为一个女人，在印度那样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里，她怎么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呢？她靠的是什么呢？人们不禁会这么问。

英·甘地的成功无疑首先是得益于她的家庭和文化背景。她之所以能够引人注目，在印度政坛上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是尼赫鲁的女儿；人们成群结队来参加她的竞选集会，听她发表演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她是尼赫鲁的女儿。他们大多有这样的心态：看到了英·甘地就仿佛看到了她父亲一样。因此，她多少沾了一些她父亲盛名的光，就像月亮沾了太阳的光一样。

然而，英·甘地毕竟也有与乃父不同之处。她的父亲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大，而她从小则主要是在印度教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尽管她也受过西方教育，但她的灵魂深处更是一个印度教徒。尼赫鲁家族中对她的影响最大的是她的母亲卡玛拉，而卡玛拉正好是一位虔诚的印度教徒。印度教的文化影响使她比起她的父亲更容易贴近广大民众，因为印度 85% 以上的居民都是印度教徒。此外，英·甘地讲的基本语言是印度第一大语言印地语，而且讲得相当地道，这比起她父亲所讲的夹杂着印度斯坦语的乌尔都语使老百姓听起来更觉得亲切；她在讲演时还善于引用印度教圣典中大量的典故和比喻，这也使她易于与民众沟通感情，而这是她父亲所做不到的。

英·甘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归因于她善于不择手段地玩弄权术。她常常说自己是“政治的产儿”，而她父亲“是一个误入政界的圣徒”。她丝毫不像她父亲那样以圣徒般的各种清规戒律来束缚自己。她虽然也按一般规则来处理政治事务，但她也有自己的准则，即实用主义和自我保护。在同一件事情上，她可以极为愤慨地攻击他人不道德，但她自己做时却可以心

安理得而且理由十足。例如：在 1969 年的总统竞选中，她明知吉里并不是个合适的人选，但为了击败辛迪加派所支持的雷迪，还是倾全力支持他。还有，在议会正式投票前夕，她刚刚谴责了尼贾林加帕为支持雷迪当选而与右翼政党人民同盟和自由党秘密接触的行为，称之为不可饶恕的罪行；但为了保证吉里当选，她马上做了和尼贾林加帕同样的事情，向几乎所有的人（包括与辛迪加派有密切关系的人）拉选票。她的有些盟友如阿卡利党、德拉维达进步同盟的形象比自由党和人民同盟也好不了多少。它们都带有强烈的地方民族主义色彩，但为了获胜，她却全然不顾。有些人对她的行为的预测常常发生偏差甚至错误，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她在制订和实施策略时，会像她父亲一样严格“按规矩”办事，可她决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至于自我保护，那是她小时候从目睹母亲卡玛拉的受家人欺负而只得默默地忍受的不幸遭遇中得到的相反的教益。她决不允许任何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她。

英·甘地曾对内政部长恰范在确定新总统候选人的关键时刻背叛她感到极为愤慨。按照她的自我保护的个性，她是决不会放过他的。但她没有马上对恰范采取行动，她明白若马上采取行动，会给公众造成一个公报私仇的印象，而是将行动目标转移到德赛身上，罢了德赛的职务。战胜辛迪加派后，政治局势已变得对英·甘地有利，她便开始对恰范下手，先是削弱其权力，将原属内政部长管的任命中央一级的高级官员的大权转归直属于总理的内阁秘书处，又将原属内政部管的中央调查局（相当于美国联邦调查局或伦敦警察厅）中的更重要更机密的部分转归内阁秘书处的一个局来管。1970 年 4 月，英·甘地改组内阁时，更是干脆罢了恰范的内政部长职务，让他改任地位和权力都次于内政部长的财政部长。恰范即使感到不快，也不得不接受。

对待迪内希·辛格和贾格吉凡·拉姆两人的不同态度和处理方式，是她实用主义的行为准则在用人问题上的充分体现。

关于迪内希·辛格，因前已述及，此处不再赘述。贱民出身的贾格吉凡·拉姆早在尼赫鲁时代就是一名内阁部长，也是英·甘地的一员得力干将，因忠诚于她而得到她的器重，长期担任部长职务。但此人是个拜金主义者，他利用大权假公济私，聚敛财富、偷税漏税达 10 余年。事泄后她不但没有让他卷铺盖走人，相反还在高级同僚面前为他辩护，说他显然是因为忙公务而忘了交税。总之，英·甘地玩弄权术的手段相当老辣，说她已能玩权术于股掌之上并不为过。

随着英·甘地权力的增加，印度政治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英·甘地以总理身份兼管内政部、原子能部、计划部等部门，将越来越多的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已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独裁的倾向；内阁部长们争相讨她的欢心，却将自己的工作职责弃置一边，以致溜须拍马之风盛行；总理的秘书处权力急剧增加，大有凌驾于内阁之上，成为内阁中之内阁之势……有识之士担忧印度这个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的权力中心有朝一日会变成封建土邦王公的宫廷。

然而，这一切在当时并未能引起更多人的冷静思考和关注，第三次印巴战争的胜利所带来的狂热更使人们暂时将这些抛至脑后。不过，这些不正常现象从滋生之日起，就暗示着英·甘地后来的失败。

十、在萨夫达尔路 1 号（三）

邻国发生了政治危机

1971 年大选英·甘地上台执政后，继续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政治上先后两次修改宪法，使议会重新获得修改宪法基本权利一章的权利，取消由苏巴·拉奥宣布的最高法院四对三判决；还使议会取代最高法院成为仲裁者，决定对那些因公共事业财产被充公者进行补偿的数额。经济上对普通保险业实行国有化，接管了 106 家印度和国外的保险公司；把 21 个煤矿和 12 家焦炭厂收归国有；在轻工业的某些部门里也开始建立国营企业；农业方面继续推行“绿色革命”。

若在平时，这些改革措施一定会在民众中引起不小的反响，但在 1971 年，整个印度的注意力似乎都被即将爆发的第三次印巴战争吸引住了。

巴基斯坦从其诞生的那天起，就埋藏着纷争与不和的种子。国家被另一个国家分隔成东西两个部分，中间相距 1600 多公里之遥。这在世界各国中是极为罕见的。印巴分治后的巴基斯坦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西巴基斯坦地广人稀，面积约为 80.4 万平方公里，人口 1951 年为 3370 万；东巴基斯坦地少人稠，面积约为 14.4 万平方公里，人口 1951 年为 4190 万。

按照 1956 年的巴基斯坦宪法，巴基斯坦实行联邦制，由西巴基斯坦省和东巴基斯坦省两部分组成。按理说，在一个实行联邦制的国家，要想保证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组成联邦的各部分之间以及中央和各组成部分之间应有必要的协调和节制：尤为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应平等对待联邦的各个组成部分，不论其人口多寡，面积大小，经济发达与否，绝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为维护一部分的利益而损害另一部分的利益。遗憾的是，巴基斯坦自成立之日起，主要是由西巴基斯坦人把持的中央政府就没有把一碗水端平，这种厚此（西巴）薄彼（东巴）的政策体现在政治、经济和语言等各个方面。

在政治上，中央政府常常把主要是反映西巴利益的要求强加在东巴头上，忽视东巴人的正当要求，使东巴人感到他们在这个国家中只不过是二等公民而已。政府机关中的要职基本上都由西巴人（其中主要是旁遮普人）所把持，甚至连东巴首府达卡也为西巴人所控制。在实际处于国家权力中心的军事显贵中，东西巴更是有天壤之别。1956 年，全巴少校以上的军官共有 908 人。其中西巴为 894 人，占总数的 98.45%，而东巴仅 14 人，占总数的 1.55%。而且，中将和少将级高级军官职位完全被西巴人垄断，东巴一个也没有。如果按照 1962 年的巴基斯坦宪法关于低于中将军衔者不得当总统的规定，东巴人绝无当总统之可能。军队的主力也是西巴人，东巴唯一的东孟加拉军团也是在巴基斯坦建国十余年后才建立起来的。

在经济上，中央政府实行的是损东巴肥西巴的政策。这主要包括，（1）挖农业补工业。通过提高工业品价格，降低农产品价格，以及将东巴农产品出口收入转向西巴等办法，把大量农业资金转入工业基础较好的西巴。据估计，从 1947 年到 1969 年间，从东巴流入西巴的财富约为 311 亿卢比。西巴工业为此得到迅速发展。由于东巴经济以农业为主，挖农业补工业等于是挖东巴补西巴。（2）财政金融主要是为西巴服务。金融机构所发放的贷款大部分为西巴工业家所得。政府还尽量压低东巴输入西巴的原料价格，提高西巴

销往东巴的工业品价格。(3) 强占东巴的外汇收入。巴基斯坦出口创汇的收入主要来自东巴。在巴基斯坦立国后 20 年间，东巴进出口收支相抵外，还有 60 亿卢比的外汇出超，而西巴反而有 200 亿卢比的外汇入超。东巴的盈余通过东西巴间的不平等贸易被西巴占去用作购买发展工业所需设备的资金。此外，在分配经济发展费用、外援和行政费用等方面，西巴也占优势。经济上的损东巴肥西巴政策使巴基斯坦立国之初本来不大的东西巴经济差距显著地拉大了，使东巴落后于西巴。

在语言问题上，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力图以乌尔都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其理由是乌尔都语是穆斯林国家的象征。但在实际上讲乌尔都语的人很少，而讲孟加拉语的人在全巴占大多数，在东巴更是占绝大多数。根据 1951 年的人口普查资料，讲乌尔都语的人在全巴只占 3.4%，在西巴也只占 7%；而讲孟加拉语的人占东巴的 98% 和全巴的 54.4%。因此，如果要选择官方语言，第一大语言孟加拉语当应置于首选地位。可中央政府竭力想用在全巴只有 3.4% 的人讲的乌尔都语作为巴基斯坦唯一的官方语言。这自然引起东巴人的强烈不满。

1952 年 2 月 21 日，东巴发生了反对以乌尔都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的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警察向示威者开火，当场打死 19 名学生。这些死难者被东巴人视为烈士，这一天被作为“烈士纪念日”。由于事态闹大，巴中央政府在 1956 年的宪法中被迫承认孟加拉语与乌尔都语同为官方语言。

此外，在其他方面如教育、医疗卫生等的状况上，东巴无一不落后于西巴。

如果稍微追溯一下巴基斯坦的建国史，巴中央政府厚此薄彼的做法也就不足为怪了。最早提出“巴基斯坦”构想的两位设计师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和乔杜里·拉赫马特·阿里在他们的构想中都没有把孟加拉地区设计在内。

中央政府的上述亲西疏东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东巴人的民族感情，使他们逐渐产生了离心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进一步发展，是东巴人要求实现自治，乃至最终脱离中央而独立。使东巴与中央政府和西巴的矛盾变得尖锐化和公开化的，是所谓的“阿加尔塔拉阴谋案”。

1965 年 9 月印巴战争期间，东巴人惊奇地发现，中央政府只顾全力保护西巴的安全，完全无视东巴的防务。他们深感中央政府和西巴是靠不住的。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东巴要求自治的呼声特别高。在此过程中，东巴出了一位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他就是谢赫·穆吉布·拉赫曼。

穆吉布·拉赫曼是主要代表孟加拉人民利益的政党组织人民联盟的领导人，一直致力于争取东巴自治的运动，后来成为孟加拉国的奠基人，被人民尊为孟加拉的国父。1966 年 2 月，他代表人民联盟向巴中央政府提出了以东巴实现除国防、外交等外的高度自治和经济独立为主要内容的“六点纲领”。“六点纲领”在东巴反响强烈，引起了军事管制政府首脑阿尤布·汗的忌恨。阿尤布·汗于同年 4 月将穆吉布·拉赫曼投进了监狱。

1968 年 6 月，阿尤布·汗以在外国（指印度）怂恿下在东巴从事反对巴基斯坦的阴谋活动为由逮捕了 28 名（后增至 35 名）文武官员，并宣称在押

按照他们的构想，“巴基斯坦”（Pakistan）意为“纯洁之国”，由旁遮普（P）、阿富汗尼亚（A，指西北边境省）、克什米尔（K）、信德（S）和俾路支（Baluchistan，“斯坦”取自该词词尾—stan）组成，根本没有孟加拉一席之地。

的穆吉布·拉赫曼也同这一阴谋有牵连。据说这一阴谋是在靠近东巴边境的印度小城阿加尔塔拉（现为特里普拉邦首府）策划的，故称为“阿加尔塔拉阴谋案”。特别法庭对穆吉布·拉赫曼等人进行审讯。由于当时巴基斯坦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倒阿尤布·汗运动，阿尤布·汗不得不于1969年2月将此案匆匆了结，释放所有被捕人员。3月，阿尤布·汗政权被推翻。但民主的阳光并没照耀在巴基斯坦的大地上，空气中仍然弥漫着军事戒严的硝烟

使东西巴最终走向分治的导火线，是1970年的大选。

取代阿尤布·汗军管政府的是又一个军管政府。但与其前任有所不同的是，新上台的总统兼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叶海亚·汗许诺要在适当的时候举行以成人公民权为基础的直接选举，还政于民。这在巴基斯坦独立23年以来还是第一次。

选举本来是确定于1970年10月5日举行，因东巴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而推迟到12月7日。大选结果表现出严重的一边倒局面：穆吉布·拉赫曼领导的人民联盟囊括了分配给东巴的162个国民议会席位中的160个，占国民议会300个总席位的53.3%，却没有得到西巴的一个席位；而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领导的巴基斯坦人民党获得了分配给西巴的138个国民议会席位中的81席，占西巴席位的58.7%和总席位的27%，在东巴也是一席未得。其他席位被一些无足轻重的小党所瓜分。

如果按照大选结果，理应由在国民议会中居多数的人民联盟领导人穆吉布·拉赫曼出任巴基斯坦总理并出面组阁。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佐·阿·布托领导的人民党虽然在国民议会中所占的议席只有四分之一强，但他因在西巴最重要的省份旁遮普和信德获得了绝对多数，并取得了军方的支持而具有与穆吉布·拉赫曼分庭抗礼的实力。

叶海亚·汗本已宣布将于1971年3月3日在东巴首府达卡召开国民议会，制定新宪法，但因中央政府的权力结构问题未协调好，受到佐·阿·布托的抵制而不得不推迟。此举引起轩然大波。大多数政党都反对总统推迟召开议会的决定，东巴的反对更加强烈。成千上万的东巴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叶海亚·汗的决定，并第一次打出了独立的“孟加拉国”的旗号。3月3日，东巴人实行总罢工。叶海亚·汗以东巴法律和秩序失控为由，宣布人民联盟为非法组织，逮捕其领导人穆吉布·拉赫曼，派兵进入东巴镇压。大批东巴人被杀。当政府军的镇压升级为大规模屠杀时，人民联盟的另一位领导人塔杰丁·艾哈迈德宣告：“巴基斯坦已经完蛋了。在堆积如山的死难者被焚化的同时，它也化成了灰烬。”一时间，东巴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发展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东西巴分治势在必行。塔杰丁·艾哈迈德率领人民联盟的一些成员逃到印度加尔各答，于4月10日组成了孟加拉国临时政府。

巴基斯坦内部的政治危机，为印度的军事干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抓住难民问题做文章

此时，刚刚在新一轮的大选角逐中大获全胜的英·甘地，来不及好好地庆祝一下，就面临着这场来自东北部边境的严峻挑战。能否应付得了这场挑战，对英·甘地来说，这又是一次重大的考验。

印度公众舆论普遍对东巴人抱同情态度，希望政府予以干预。这是因为

印度的西孟加拉邦与东巴基斯坦在印分治前本来就属于同一个政治地理单位——孟加拉省，印度的孟加拉人与东巴人也属于同一个民族。他们在语言、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都有共同点，更何况他们与东巴孟加拉人中的一部分甚至有着共同的印度教信仰（大部分东巴人信仰伊斯兰教）。此外，印度人对东巴人的同情，还多少带有一种报复和出口气的心态。多少年来，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南亚次大陆之所以形成印巴分治的格局，与一部分穆斯林领导人坚决要求“分家”有关。现在，眼看巴基斯坦内部又要发生分裂，他们当然是高兴的，在心理上也有了一种“报了一箭之仇”的感觉。

印度政府的态度与公众的态度实际上是相迎合的。英·甘地说：“我们怎能忽视一场就发生在我们边境上并波及我国领土以内的冲突呢？”然而，英·甘地所考虑的比她的同胞们要多得多。她不仅想通过干预乘机狠狠地再教训一下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报一箭之仇；而且，她更想利用打战争牌在印度公众面前树立自己的新形象，以争取他们对自己更大的支持，同时提高她本人和印度在国际上的影响和知名度。因此，对于眼前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她是绝不会轻易错过的。

在整个东巴危机期间，英·甘地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她巧妙地说服军界、政界和外交界在该问题上与她保持一致，为此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她得心应手地操纵着局势，而不是被局势牵着鼻子走。在采取大的行动前，她努力在全国大造舆论，并与各反对党加强对话。她选择时间的技巧更加高超，远远超过了她与辛迪加派交锋时的水平。起先她一直引而不发，即使在受到一些不理解的公众和政府议员的抱怨时也是如此。因为她觉得时机未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草率行事，不要说走错一着棋，哪怕是说错一个字，都会导致“与愿望相反的结果”。

在正式行动以前，英·甘地所采取的唯一的一次行动，是对巴基斯坦空军的报复。不过，这是一次就事论事的行动，如果不细究，人们很难把它与后来的武装干涉联系起来。事情是这样的：在东孟加拉危机爆发两个月前，印度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在从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飞往巴基斯坦拉合尔的途中遭到劫持，在拉合尔被一群狂热的巴基斯坦仇印分子炸毁。英·甘地认为这一事件得到了巴基斯坦当局的默许，随即作出反应，禁止巴基斯坦飞机飞越印度领空。此举在客观上对巴基斯坦军队不久以后镇压和屠杀东巴人的行动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致使巴基斯坦空军不得不绕过次大陆，到斯里兰卡去加油。

尽管英·甘地比谁都清楚印度免不了又要与巴基斯坦打一仗，但她不动声色，只是集中精力处理难民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难民问题本身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非认真对待不可；另一方面她是在打“难民牌”，想借此在国际上大造舆论，为随后的武装干涉制造借口。当然，在处理难民问题的同时，英·甘地并未放松战争准备。

在巴基斯坦对东巴人采取镇压行动后不到一个月，大批东巴难民便开始源源不断地逃往印度，其中大多数是印度教徒。短短的半年时间内，进入印度的东巴难民总数便达到了 900 万。尽管印度公众对于难民大逃亡并不陌生，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依然记得印巴分治时的那场巨大的难民浪潮，但那毕竟是 24 年前的事了。现在他们面对扑面而来的新的难民大潮，还是感到惊恐和不安。他们没有理由不如此，因为印度还是个相当贫穷的国家，连粮食都尚未做到完全自给，大量的难民无论是对于他们的政府和他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单单为这些难民提供饮食、临时住处和基本医疗条件，印度每天就得花费五六百万美元。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开支，印度政府不得不临时向纳税人开征几种特别税以增加收入。所以，尽管广大印度人对那些与他们同族甚至同信仰的惊恐万状的东巴难民抱有深深的同情，但还是希望他们在印度呆的日子不要太久。

面对呼啸而来的难民大潮，英·甘地和她的政府除了有与印度公众同样的担忧外，还多了一层忧虑和不安，即难民有可能对他们所流入的那个地区产生意想不到的对中央政府不利的影晌。与东巴接壤的西孟加拉邦自独立以来一直是令印度政府感到头疼的一个地区。共产党组织——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那里拥有相当大的势力；那里的人民因受印共（马）的影响常常表现出对中央政府的“不忠顺”倾向。自1967年大选以来，印共（马）曾先后两度联合其他小党在该邦执政，均被中央政府找借口解散，致使该邦局势经常处于动荡之中。英·甘地担心大量的东巴难民涌入该邦会加剧那里的动荡局势，同时对当地有限的经济资源构成压力；说不定有些难民还会乘乱与西孟加拉人混杂在一起，以图最终在印度定居下来。因此，英·甘地从一开始就拿定主意：尽管东巴难民大多是操孟加拉语的印度教徒，但他们最终必须回到他们的老家去。她曾对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们这样说：“无论如何，我们印度无意吸收这些人。对于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为此，英·甘地不惜花巨资建立难民营，将所有东巴难民与印度人隔离开来，向他们单独提供衣食和医疗条件。这一来可以尽量避免霍乱等传染病的滋生和传播；二来一俟局势平稳，就可以让难民即刻打点行装，上路回家。

在给东巴难民以人道主义对待的同时，英·甘地开始按照既定方针，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

她首先与巴基斯坦政府打起了“嘴巴官司”。

巴基斯坦军管政府领导人叶海亚·汗宣称他的军队在东巴的行动是他的国家的内政。国外有许多人也同意他的说法。这话显然是针对印度的。对此，英·甘地通过印度的和国际的新闻机构作出强烈反应。她说，东巴问题并不是印度造成的，“我们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干涉过巴基斯坦的政治，但是巴基斯坦现在再也不能诡称这是它的内政问题了”。随着数百万无依无靠的巴基斯坦难民涌入印度，“这已成为我们的内政问题”。

随着舌战的升级，双方也就不择辞令了。1971年8月，叶海亚·汗曾对法国《费加罗报》的一位记者说，英·甘地“既想做女人，又想当国家首脑，弄得既非女人，又非国家首脑”。如果他见到了英·甘地，他会对她：“住嘴，女人，别插手我的事，让我的难民回来。”

在叶海亚·汗看来，印度是在存心阻止巴基斯坦难民重返家园。有些外国人也似乎相信他的看法。他们天真地问，既然叶海亚·汗总统已经发出邀请，让他的难民回到巴基斯坦，印度为什么要加以阻止呢？

对于这样的提问，英·甘地有点哭笑不得。不过，她还是耐心地向那些提出如此书呆子式的问题的人们指出，重返家园的“邀请”是非常荒唐可笑的。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同胞逃过来，讲述刚刚发生的恐怖事件，并以呆滞的目光和累累的伤痕来证实他们所侥幸逃脱的恐怖仍在继续，你怎么能说服他们回去呢？

英·甘地并不满足于同巴基斯坦军政府领导人打舌仗，她还要进一步在国际上大造舆论。为此，她频频展开外交攻势，先是于1971年夏天派她的外

交部长斯瓦兰·辛格出访英国、美国、苏联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解释难民流入的有关问题。与此同时，她邀请联合国观察员、美英等国的议员来印度视察难民营，向他们以及前来参加救济工作的一些国际救济组织的志愿人员和数十名来自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讲述了难民的悲惨处境以及印度为了安置他们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付出的巨大代价，呼吁国际社会对印度所做的一切表示理解和支持，“制止巴基斯坦残酷的镇压行为”，促使东孟加拉问题早日得到“公正合理”的政治解决，使难民们能够安全体面地回到自己的祖国。

此外，英·甘地还亲自出马，在9、10月份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国事访问。她先后到过苏联、比利时、澳大利亚、联邦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国。每到一地，她都不厌其烦地向所在国政府和人民讲述东孟加拉危机的“真相”、严重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难民问题，说这些都正在威胁着印度的安全，事实上已经威胁到印度的“生存”。她的“难民牌”也的确达到了她预料的目的。除美国以外，她所访问过的所有国家几乎都对印度表示了同情，并对东孟加拉人所处的困境以及印度所面临的难处表示理解。但同时他们又建议印度尽量忍耐、克制，与巴基斯坦进行协商谈判，不要以武力解决问题。对此，英·甘地委婉地拒绝了。她说，这并不是印巴之间的争端。如果要举行谈判，那应该在叶海亚·汗政府与在巴大选中获胜的孟加拉人民联盟的领导人之间进行。在“无端”的挑衅和严重影响印度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的“威胁”面前，她的政府已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耐与克制，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有一次，当一名外国记者再次提到“忍耐”一词时，英·甘地立即回击道：“当年希特勒在欧洲横冲直撞时，你们为什么不说‘让我们保持沉默，与德国和平相处’，听任犹太人惨遭屠杀呢？”这话实际上是她向世人发出的印度将向巴基斯坦动武的信号。

加紧备战与争取外援

与公开的外交活动同时，英·甘地又在进行另一手准备即战争准备。不过这手准备是隐蔽的，悄悄地进行的。

俗话说：“三军易得，一将难求。”进行战争准备首先要确立军事统帅。英·甘地在组成内阁后不久，就开始进行这项工作了。她把印度三军高级将领的资料都调来，详细地研究了一遍，最后相中了陆军总司令萨姆·马内克肖将军。

在任现职以前，马内克肖曾担任过东部军区司令官，负责从西孟加拉和锡金到阿萨姆一线整个东部地区的安全以及印度与中国西藏、缅甸交界地区的防务。考虑到印度与巴基斯坦作战的可能性，他对自己的防区及东巴的地图进行过详细而周密的研究。他曾对一位来访的编辑说：“我有时候常常闭上眼睛，甚至在黑暗中回忆东巴的地图——它那些平原、河流和城市。这些形象在我脑海中一直是历历如绘和详尽无遗的。”可以看出，马内克肖将军对东巴的情况了如指掌，在这方面其他将帅恐无出其右者。此外，“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一项基本的军事战略原则。而马内克肖将军“知彼”的程度有如“知己”。他的对手叶海亚·汗在印巴分治前曾是他的部下。他很清楚这位老部下是“一个不能控制自己神经的非常愚蠢的人”。马内克肖对巴基斯坦的权力结构也很有研究。他确信巴上层的“政治和军事见解是混乱的”，而这会导致他们的政治领导和军事控制软弱无力，军队对领导层信

心发生动摇。马内克肖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往往有惊人的预见性，他预料这次战争是“短促而残酷的、速战速决的”。后来战争的发展果如他所料。更难能可贵的是，马内克肖在军事和作战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一旦经过深思熟虑定下了作战计划，就果断地执行；而且他能够很好地领略国家首脑的战略意图和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并及时加以贯彻，而不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些素质对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后来的战争进程证实了马内克肖所具备的这些素质。譬如，他曾向总理建议，考虑到占领大城市会加重军队的物资负担，一旦战斗打响，军队开进东巴后，应避免占领大城市，尽管占领大城市会在政治上和心理上造成有利的影响。这个建议为英·甘地所采纳。而当马内克肖与其他将领作出决定，要部署空军同时袭击东、西部目标，并让海军炮击卡拉奇港时，英·甘地出于国际形势的考虑，指示他们不要进行“恐怖轰炸”，不袭击和平居民。他们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看来，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马内克肖都是最佳人选，最高军事统帅一职非他莫属。顺便说一句，马内克肖因指挥这次战争有功，后来被提升为印度第一个陆军元帅。不过，这是后话。

最高军事统帅人选确定以后，英·甘地早在4月初便将马内克肖将军召来，向他吹了吹风，以使他有个思想准备。她说，巴基斯坦已发生内乱，大量的东巴难民正源源不断地涌入印度。这将给印度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的麻烦和问题，而印度对此至多只能承受十个月到一年。在此期间政府将努力致力于和平解决问题。如果和平努力失败，政府不排除以战争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届时将命令武装部队采取行动，为难民重返家园打开通道。她还告诉他，她已决定请他担任对巴作战军事总指挥；同时告诫他，考虑到国际舆论以及一旦开战印度可能为自己招来的政治压力，军队必须速战速决，尽可能在三四周的时间内解决问题。这个战略思想与马内克肖所主张的速决战思想不谋而合。马内克肖后来曾对一个记者说，“我的政治统帅向我发出的训令极为明确”，给人以极深的印象。

英·甘地真可谓慧眼识珠，马内克肖的确是个难得的将才。他在接受总理的指示和任命后即着手调兵遣将，积极备战；与此同时，他还提醒总理，一旦确定开战，印度应争取主动，不要让对手掌握了选择时间和战争的主动权。他预料巴基斯坦很可能会从其军事力量雄厚的西翼发动进攻，占领部分印度领土，然后才响应联合国安理会十之八九会发出的停火呼吁。如果事态的发展果真如此，那么印度将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到那时它只有从东巴撤军才能使巴军放弃印度的西部领土；而且，到那时东孟加拉问题已经国际化了，巴基斯坦已有时间来扑灭东巴人的起义。马内克肖认为，印度必须以足够的力量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既能够在东面进行迅速而有效的打击，同时能够保卫自己的西部边界。将军的这些建议和意见，得到了英·甘地的首肯。

关于开战时间，马内克肖建议定在冬季。其理由有二：每年的6月至9月是印度的雨季。从军事角度讲，雨季不宜采取军事行动，否则连绵不断的雨将会对部队形成严重阻碍；战端一旦开启，喜马拉雅山那一边的中国人说不定会进行干涉。如果是在冬季开战，通过喜马拉雅的山间通道会被皑皑白雪所封锁，中国军队即使要干涉，也无法翻山越岭。英·甘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这次马内克肖的话充其量只说对了一半。干燥寒冷的冬季的确比阴雨绵绵的雨季更宜于采取军事行动，但以担心中国会干涉作为确定军事行动时间

的理由却委实有些荒诞不经。因为中国一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根本不会对两个邻国之间的冲突进行武装干涉。看来，这位将军对九年前的那次由印度自己挑起的印中边境战争印度的失败仍心有余悸，而接受其建议的甘地夫人也多少怀有与他相同的心态。

当逃到印度的东巴基斯坦人民联盟领袖塔杰丁·艾哈迈德于 1971 年 4 月 10 日在加尔各答组成孟加拉国临时政府时，英·甘地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暂时没有予以公开承认，但她私下里却不遗余力地帮助它训练和装备所谓的“孟加拉自由战士”，到战争正式爆发时，她已为“孟加拉国”训练和装备了 10 万名游击队战士。一俟战斗打响，这些人将与印军并肩作战。

印度还搜集了大量有关巴基斯坦军队部署和动向的情报。印军秘密快速而大规模地向东西两翼集结兵力。为了使士兵适应实战的要求，印军还多次举行以巴基斯坦为假想敌的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与国内的备战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的问时，英·甘地并没有忘记争取大国的支持。她对是否一定能争取到这种支持并没有多大把握，不过，她认为，即使没有争取到大国的实际支持，哪怕能够让他们在战时保持中立态度，不进行干预，她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那么，争取哪些大国的支持呢？英·甘地不假思索，首先把眼光瞄向了当今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然而，她与它们实际交涉的结果却是一悲一喜。

她在山姆大叔那里吃了闭门羹。本来，这个结局她并非没有预料，只不过她仍想碰碰运气罢了。

美国之所以在东孟加拉危机问题上不支持印度，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印美关系本来就不睦。整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印美关系尚比较密切，但由于美国自 1964 年开始深陷越南战争，无暇顾及南亚事务，对印度的经济援助迅速减少；加之美国在 1965 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中支持巴基斯坦，停止了对印度的军事援助。印美关系迅速冷却。英·甘地第一次上台不久，因急于得到美国的粮食，极力想同它改善关系，曾按它和世界银行的意旨将卢比贬值，但美国并未信守诺言，运来粮食，这使英·甘地感到受了美国的耍弄，大为光火。随后印度在越南问题上谴责美国，要求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越南，致使印美关系再度紧张。

其次是美巴关系基本上一直都挺热乎。美国笼络巴基斯坦的基本出发点，是想把它作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对付与巴邻近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和中国的桥头堡。1954 年美巴缔结共同安全条约，开始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之后，尼克松以失败的总统候选人、平民百姓以及美国总统的不同身份分别于 1960 年、1967 年和 1969 年三次访问巴基斯坦，都受到了巴方的隆重欢迎和热情接待。同是一个尼克松，在 1961 年和 1967 年两度访问印度时，却没有受到这样的礼遇。1971 年，尼克松想改变过去 20 多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视态度，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巴基斯坦曾在其中起过牵线搭桥的作用。叶海亚·汗愿意向他提供与北京联系的渠道，并让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从一个军用机场起飞，前往北京执行历史性的秘密使命。两国关系如果不是相当密切，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第三，此时美国急欲同中国改善关系，而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一直相当密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更不愿支持印度而反对巴基斯坦。1971 年 7 月，基辛格访问巴基斯坦后，接着密访中国，为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打前站。印

度对此一无所知。几天后基辛格又访问了印度。他明白无误地告诉英·甘地，如果印度对东巴基斯坦的军事介入引起中国的干涉，印度不可能指望从美国那里得到任何支持。这使英·甘地吃惊不小，她本来就担心中国会干涉，基辛格的话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其实，天才的外交家基辛格什么也没有证实，他用的语句是假设。

有了上述三点，印度从美国那里得不到支持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不仅如此，在 1971 年 11 月初英·甘地访美时和 12 月联合国安理会辩论期间，她与尼克松之间甚至连说话都不投机，用基辛格的话说，“简直就是典型的聋哑人之间的对话”。

有个印度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印度注定要接受一个教化的政治领导，独立前后都是如此。”更何况现在又多了一层担心——来自中国的威胁。既然美国指望不上，那么这个“教化的政治领导”看来就只能由苏联担当了，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有资格与美国相抗衡的大国只有苏联。印度在正式卷入东巴危机事件以前急于想找一个大国作靠山，即使这样做会影响它在世界上所竭力树立的不结盟形象，它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不过，对于不结盟政策，英·甘地有她自己的见解，她只不过是把它看作一个外交策略罢了。

印度主动投入“北极熊”的怀抱，“北极熊”当然是求之不得。与印度搞好关系，本来就符合苏联与美国争霸的全球战略。

印度和苏联虽然早在 1947 年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直到 1954 年，两国关系尚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1955 年是印苏关系史上的里程碑。这一年两国领导人实现了互访。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苏联开始在经济上给予印度以援助，在政治上在克什米尔问题和印中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从 1960 年起，苏联开始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1965 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结束后，苏联总理柯西金于 1966 年 1 月邀请印巴两国政府首脑到苏联塔什干会晤，从中斡旋，促使双方和解，签订了《塔什干宣言》。此后，苏联和印度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相互配合与支持。

按理说，印苏关系有较好的基础，且未出现大的反复，印度寻求苏联的支持，应是顺理成章之事。不过，话虽这么说，具体到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双方还是走了一些弯路。

其实，早在两年前，苏联就向印度发出了签订条约的倡议，但印度方面犹豫不决，态度不积极。几年前，两国关系出现了一些虽无碍大局但毕竟有伤感情的波折。事情的起因是 1966 年英·甘地将卢比贬值的行动。苏联领导人认为此举是在美国和世界银行的影响下作出的，表明印度有在英·甘地的领导下靠拢美国的迹象，自然感到有些不快；而英·甘地也对苏联于此时开始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感到有些不满，认为这威胁到了印度的安全，尽管苏联提供给巴的武器数量并不多。不过，虽然双方都有些不愉快，但都不想把关系搞僵。到了 1969 年，情况出现了转机，因为印美关系并未像苏联想象的那样出现好转，这自然令苏联高兴；而且，英·甘地在国大党分裂后为维持统治而不得不同印度共产党改善关系的作法，也使苏联领导人改变了对她的看法。令英·甘地感到满意的是，苏联已决定不再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主动伸出了橄榄枝，表示愿与印度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对于苏方的友好表示，英·甘地虽然从心底里愿意接受，但仍然觉得时机尚不成熟，再说她还想听听顾问们的意见，便没有马上答应。

英·甘地的顾问们对是否与苏联签订条约意见不一。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反对，其理由是熊会拥抱人，也会咬人。条约如同绳索，有可能把印度与苏联过紧地束缚在一起，从而损害印度的不结盟形象，使印度不能独立自主地行事，也会引起西方朋友的反感。第二种意见是赞成，认为前一种担忧是杞人忧天，是不必要的，因为印度已经具有足够的自信心和政治稳定性，即使同一个超级大国结成伙伴关系，也不会对自己的行动自由构成限制；条约导致西方国家对印度的误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那只是暂时的，并且同条约本身所带来的巨大的政治、军事利益和心理上的安全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第三种意见是折中，是由印度新任驻苏大使杜尔加·普拉沙德·达尔提出来的。他认为印度可以讨论甚至拟订条约，至于签订时间，要视双方都认为合适而定。

英·甘地经过权衡，觉得第三种意见可行。她决定让达尔等人作为代表与苏联谈判，同时提醒他们注意如下几点：条约不得包含任何会使印度显得是“苏联的保护国”的内容；措辞不得使关于签约国的安全一旦受到威胁，就相互支援的条款过于引人注目；要让苏联人明白，如果他们恢复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那么印苏之间的友好条约将变得毫无意义。达尔等人领命而去。

条约的草案早在1970年初即已拟就，但双方都没有正式签订的意思，尚在等待观望。也许他们都认为那个“适当时间”还未到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1971年7月的印度之行促成了条约的签订。其时，东巴危机不断加深，涌入印度的东巴难民已达600万人，印度已明显感到压力沉重，而一向以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崇高的政治准则和道德标准的奉行者自诩的西方各大国却还在一旁观望。基辛格带来的重要信息——如果中国干预由东巴危机而引起的印巴冲突，美国不会给印度以任何支持，使英·甘地在对美国失望之余，加重了对中国介入的疑惧心理，促使她作出从速签约的决定。而此时苏联正好也有了这种需要。它本来早已同中国闹翻，此时又介怀于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密切关系。双方一拍即合。是故当年8月7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造访新德里，已调任总理特别顾问的达尔向他提出签约之时，葛罗米柯满口答应。两天后，为期20年的《印苏和平友好条约》便应运而生。尽管此事过去已经25年，但人们透过当时有关它的大量报道的字里行间，似乎仍然依稀可以想见当时双方当事人签约心情之迫切、行事之匆忙。

不管英·甘地在措辞上怎样做文章，竭力想冲淡条约的结盟色彩，《印苏和平友好条约》的军事同盟性质依然是明显的，因为它的第九条规定：“缔约双方每一方保证不向参与另一方发生的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在任何一方遭到进攻或受到进攻的威胁时，缔约双方应立即共同协商，以便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来保证两国的和平与安全。”

“熊大哥”果然是“一诺千金”。印度在条约签订后得到了它期望得到的一切：包括250辆坦克、40门120毫米火箭、高级导弹等大量先进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在内的军援，以及苏联在联合国三次对安理会关于印巴停火决议案提出否决的声援。苏联的援助，无疑壮大了印度出兵的胆量，增强了它战胜巴基斯坦的信心。对于这一点，就连印度国防部长贾格吉凡·拉姆也供认不讳。他在1972年8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印度能够解放孟加拉国及其人民，部分是由于签订印苏条约后产生的信心。”

国内的作战准备已经就绪，攻击时间已经确定，国际上的外交姿态已经做足，并且已经得到了超级大国苏联的强有力的支持，真可谓“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这“东风”就是出兵的借口。

绝妙的战争牌

究竟该以什么理由、以何种方式出兵介入东巴危机，英·甘地和她的核心内阁的几位阁员们为此伤透了脑筋。尽管时机已经成熟，但英·甘地仍不愿迈出战争的第一步，她不想让印度背上发动战争的责任，如果能想方设法让巴基斯坦打响战争第一枪，那是再好不过了。马内克肖将军可不像他们那样为此事绞尽脑汁，他对他那昔日的老部下非常了解。他对他们说：“别担心！叶海亚·汗会不知不觉地为我们准备好我们所需要的条件。他随时都会做出一件明显的蠢事，这样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果然不出马内克肖将军所料，叶海亚·汗于11月23日公开宣布，他将在十天内向印度开战。12月3日傍晚，他准时向印度打响了第一枪。将宣战日期如此重大的军事机密公诸世人，并且如期开战，这在兵不厌诈的军事史上即使不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叶海亚·汗的蠢举，为印度进行军事干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借口。如果他再多一分耐心，只要再等24小时，那么发动战争的责任就会落在印度头上。印度军方已决定在12月4日发动攻击，无论巴方行动与否。因为根据天象观测的结果，“从3日晚上开始，将有14个明月高悬的夜晚，不能轻易错过”。

尽管巴基斯坦空军对印度的斯利那加、阿姆利则、亚格拉、安巴拉空军基地进行了轰炸，炮兵对印度西部边境的几处战略要津也进行了轰击，但由于印度事先已经采取了良好的防范措施，故它所受的损失甚微。

巴基斯坦空军发动空袭的当晚，英·甘地正在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发表演讲。得到消息后，她赶紧草草结束进行到一半的演讲，冒着遭巴空军袭击的危险乘飞机回到了新德里。晚10时左右，她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对巴宣战，并宣布全国处于战时紧急状态。她向国民简短地说明了一下宣战的理由：“自从今年3月以来，我们承担了最沉重的负担，经受了最巨大的压力，竭尽全力促使世界帮助实现和平的解决，防止毁灭掉一个民族。然而，世界却无视事实的基本起因，只关心某些反响。……如今，在孟加拉发生的战争已成为对印度的战争。……我们别无他法，只得使我们的国家进入战时体制。”

讲完这番话后，英·甘地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一直干了一个通宵，向军事指挥官发布命令，检查落实几周前已同意的计划的执行情况。次日清晨，当不放心的医生来看望她时，发现她一身轻松，心情愉快，正忙于挑选书斋内的沙发罩。她惊人的镇定从容，使人觉得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

战斗打响后，按照预定的东攻西守、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在陆军总司令马克内肖将军、海军元帅南达和空军元帅P.C.拉尔等的指挥下，印度海陆空三军一齐行动，在防守西线的同时，全力猛攻东巴基斯坦。在印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巴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将无战心，兵无斗志。12月16日，9.3万巴军在孟加拉投降。很明显，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巴方失败的结局也许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因为这是两个力量悬殊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但人们也许没有想到，巴基斯坦竟然败得如此之快，简直是不堪一击。然而，如果稍微探究一下它的失败原因，人们也许就不会感到惊讶了。

巴基斯坦的速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上，巴国内矛盾重重，民族矛盾尤为严重，东西巴之间已闹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分裂之势已成：举国上下都对军法管制统治感到不满，要求取消军管、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外交上，叶海亚·汗也打错了算盘。他原以为一旦战争全面爆发，中美两国至少有一国会出兵干涉，那么印度将会受到沉重打击。联合国安理会也会向着巴基斯坦，作出与己有利的决议，东巴独立的局面将不会出现。叶海亚·汗的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和幼稚，同时也说明他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不真正了解。中国虽然与巴基斯坦有着传统的友谊，但绝不会为了维持这种友谊而同另一个国家交战，因为这不合中国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至于美国，它也不会陷入一场战争（越南战争）而不能自拔的情况下，再贸然卷入另一场战争。在军事上，巴基斯坦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都明显弱于印度；军事力量配备也不均衡，西巴强而东巴弱；由于印度早就不准巴基斯坦飞机飞越印度领空，致使巴基斯坦飞机和军舰不得不绕航3000英里，才能将军需和补给从西巴运往东巴，其结果是在东巴危机期间对巴军镇压东巴人的行动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在战时则造成了巴军军需补给困难。另外，涣散的军心也大大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

当捷报传来之时，英·甘地正在接见瑞典电视台记者。她接到马内克肖将军打来的报捷电话，内心的激动使她不知说什么好。她只说了四个字，其间还有两次短暂的停歇：“是……是……谢谢。”随即她来到议会，面对翘首期盼、心急如焚的议员们，她再也无法掩饰那份兴奋与激动了，对他们说：“现在，达卡已是一个自由国家的自由首都了……”她的话刚刚开了个头，议会大厦里便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经久不息的欢呼声。

英·甘地看样子比她的父亲更会打战争牌。她善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也知道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她认为作战目的已经达到，战胜并肢解了巴基斯坦，引起了老百姓对她个人狂热性的崇拜，现在该是收手的时候了。就在巴军投降的当晚8时半，她果断地下令在西线实行单方面停火。她的这个决定做得非常之快，几乎可以说是在转瞬之间。这充分说明她对局势的控制能力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就在从议会大厅到办公室的短短几步路中，她对随行的新闻顾问谢拉达·普拉沙德说：“我现在必须命令西线战场停火。如果今天不发出命令，明天就迟了。”

当时，印度朝野上下许多人都对总理的这个决定感到不解。他们认为既然初战已经告捷，该进一步乘胜扩大战果才是。如果按照常理来推理，这种看法也没有什么不对。

然而，英·甘地似乎总要超出常人一筹。在胜利到来之际，她显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因狂热而丧失理智。她很清楚战争继续打下去，对印度有百害而无一利：军队的伤亡会增大，财政将无法承受，最终会弄得国库空虚，民穷财尽。到时候，老百姓因战争初期的胜利而引发的狂热将消散殆尽，而且会怨声载道，以致局势动荡而危及自己的统治；印度是打着解决难民问题、解放孟加拉人民的旗号对巴作战的，如果在孟加拉赖着不走，战争的性质就会发生相反的变化。到时候，不仅本来对印度心存感激的孟加拉人不会答应，印度在国际上也会逐渐陷入孤立。国际舆论会因印度的侵略行为而谴责它；陷入持久战是危险的，到时想脱身都很困难，美国发动的侵朝和侵越战争已说明了这一点；战争迁延时日，有可能引起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干涉……

英·甘地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就在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尼克松总统

下令美国第七舰队的部分军舰驶往孟加拉湾。消息传来，印度举国上下一片哗然，愤怒者有之，恐惧者有之。不过，英·甘地对此倒是一点儿也不担忧，反而觉得好笑。她认为尼克松此举纯粹是虚张声势，对印度来说，至多只是进行一番战争恫吓；对巴基斯坦来说，充其量是作出一种支持的姿态，给它以些许安慰罢了；对世人来说，也只不过是展示一下其大国的形象，证明美国的军事存在。因此，尼克松根本不会动真格的。再说，他也不敢。印度有苏联作坚强后盾，美国决不会为了一个小小的巴基斯坦而去冒同强大的苏联交火的危险的。事实上，苏联舰队就远远地跟在美国舰队的后面，密切监视着它的一举一动。所以，英·甘地对战争爆发初期美国的介入根本不担心。不出她的所料，美国舰队很快就灰溜溜地回去了。然而，战争时间长了，可就不准了。那时美国要干涉，就有了十足的理由，谁也阻止不了它。不过，善打时间差的英·甘地以其迅速的西线停火决定使美国没有来得及找到干涉的借口。

战争恫吓没有奏效，美国转而在其他方面对印度施加压力：在联合国指责印度为侵略者；停止对印度的一切经济援助，冻结已经答应提供并已正式签订合同的 8800 万美元的援助；通过基辛格命令政府各部门全面抨击印度。基辛格指示他的下属：“今后我们要对印度人表示一定程度的冷淡，印度大使不能受到级别太高的待遇。”谈到英·甘地，基辛格在一次白宫秘密会议上说：“这位夫人真是心狠手辣。”这话当然是一句攻击性的评价，但也隐含着不得不佩服的成分。

对于美国政府的压力，英·甘地毫不屈服。她在一封信中不无讥讽地责问尼克松，他作为伟大的美国人民的总统，应该告诉她印度错在何处。她还告诉尼克松，如果要追究战争责任的话，美国政府也有份儿。这次印巴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美国本来可以运用它的影响和权威，至少是可以促使巴基斯坦释放孟加拉人民联盟领导人穆吉布·拉赫曼；而后者若能获释，孟加拉问题的政治解决并非没有希望。

第三次印巴战争的结果，是巴基斯坦的被肢解，孟加拉国的诞生。战争结束后，900 万孟加拉难民怀着对印度的感激之情重返家园，印度也因此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如释重负的英·甘地也可以长长地松口气了。

印巴战争的胜利以及英·甘地敢于嘲笑超级大国总统尼克松的胆量，使她的威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狂热的印度人将各种象征权力和荣誉的头衔朝她身上堆。有人称她为印度教中以长有八只胳膊、骑一只猛虎形象出现的战无不胜的杜尔加女神。《经济学家》杂志称她为“印度女王”。“呆女人”的绰号早已被人们抛到了九霄云外。妇女们对她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把她看作阴性力量的化身。在一片欢呼声中，吉里总统将印度人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巴拉特·拉特纳奖授予了她。

印巴战争的胜利使英·甘地一夜之间成了全球瞩目的风云人物。西方记者奥布里·梅南在《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上称她为“印度的戴高乐”。

一时间，英·甘地从她的人民那里得到的尊敬、爱戴和崇拜，甚至连她的父亲尼赫鲁当年都望尘莫及。有人认为，如果尼赫鲁在世，面对 1971 年的严重局势，他也许会被自己所设置的不结盟绳索束缚住而不敢与苏联签订条约，因慑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而不敢与尼克松交锋，因顾虑重重，过于谨慎而在是否开战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以致贻误战机。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印度也许要永远背上 900 万无家可归的东巴难民的沉重包袱。

1972年的国庆节也许是印度独立25年来最隆重的国庆节。随着1月26日的来临，印度公众对他们的总理甘地夫人的崇拜也达到了顶点。

印度独立之初那司空见惯但在尼赫鲁时代后期已不多见的盛大、排场的庆祝场面得以重现。在那宽阔的皇家大道两旁，沿着绿色的林荫、如茵的草坪、喷泉和掩映如画的水池，伴随着军乐队演奏的富有浓厚的印度色彩的进行曲，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威武雄壮、步伐整齐地行进着；坦克、卡车和装饰得富丽堂皇的机动彩车隆隆驶过；衣着鲜艳的民间舞蹈家们载歌载舞，数以万计的普通市民、学生紧跟其后。人人脸上洋溢着节日的微笑，就连那经过化装的披着古装的骆驼和大象也都不无得意地、大摇大摆地朝前迈着大步。这一切汇成了一股巨大的游行队伍的洪流，从英·甘地和她的文武百官们所站立的检阅台前涌过，英·甘地面露得意之色，向游行队伍频频挥手致意。

庆祝活动持续了一周，最后以演奏节日结束曲《鸣金收兵》而告结束。

带着印巴战争胜利的余热，1972年3月，印度各邦议会举行了中期选举，英·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执政派大获全胜，赢得了总共2722个席位中的1926席（选举前只有1382席），占总数的71%；国大党执政派的邦政府得以在绝大多数的邦里建立起来。与崇高的威望相辉映，英·甘地的权势也达到了巅峰。

从顶峰到谷底

否极泰来，盛极而衰，这也许是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的一个铁律。很快，英·甘地的鼎盛便成了明日黄花。人们不可能总是沉浸在战争胜利的喜悦之中，能引起他们长久关注的是他们的肚皮能否填饱，身上能否穿暖。我们的女英雄业已证明在政坛上能够纵横驰骋，游刃有余，在战争中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在经济问题上却往往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对于任何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业大国来说，人祸天灾的影响都是极为严重的。为了养活900万孟加拉难民，政府的粮食几乎被掏空了；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了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外汇的短缺；1972年开始的特大旱灾，使本来已经恶化了的经济又雪上加霜。灾情既重且受灾面广，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近1.8亿人的生活，其中有几百万人完全陷于饥饿状态。在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有些地区甚至连饮水供应都成了问题，千百万人每天只能靠向私人慈善机构举办的免费施粥所乞食度日。旱灾还引起水力发电不足，使钢铁、肥料、水泥和棉纱等工业品产量急剧减少。与1972年相比，1973年的物价上涨了22%，并且仍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继续上涨。到1973年8月，财政赤字、贸易逆差和外汇储备的短缺都到达了警戒线。

粮食极度短缺的状况，迫使英·甘地不得不作出对粮食批发贸易实行国家垄断的决定。然而，在此时作出这一决定是危险的，这意味着政府将成为粮食的唯一买卖者，而实际情况是政府根本买不到粮食，也无粮可卖。老百姓从政府那里买不到粮食，更加怨声载道。结果在那格浦尔、孟买和迈索尔等地发生了连1966年旱灾期间都未出现的米骚动。在喀拉拉邦，空着肚皮的学生无心上课，纷纷去哄抢运粮车。

饥饿和贫困像毒蛇一样吞噬着人们，也撕咬着英·甘地的神经。曾经狂热地崇拜过英·甘地的人们觉得女总理当初为了竞选获胜而提出的“消灭贫

困”的口号实在有点滑稽可笑，因为她连饥饿都消灭不了。英·甘地自己现在也领教了贫困的强大与厉害，要战胜它远不是喊喊口号那么轻松。她不得不以“贫困不能在一夜之间被消除”之类的话来为自己辩解，但这种辩解显得苍白无力，缺乏自信和底气。

人民对英·甘地政府感到不满的，除了经济状况恶化以外，还有腐败。

平心而论，腐败现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也许就更加严重。贫穷和腐败之间到底有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这是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值得研究的课题。如果需要什么例证，印度倒是可以提供。

若在风调雨顺、人民生活相对比较好过的年景，腐败现象也许不会那么引人注目；而当千百万人处于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惨境时，腐败就如同一根从胀鼓鼓的麻袋里伸出来的锥子那样显眼，那么叫人怒不可遏。

自从1971年美国尼克松一手制造的水门事件曝光以来，“水门”已成为“丑闻”的代名词。关注水门事件的印度人惊愕地发现，本国的有些丑闻，就其性质和程度而言，一点儿也不亚于水门事件。

第一件丑闻与英·甘地的政府有直接关系，与她本人有间接关系。这就是所谓的选举捐款问题。

自有议会制度以来，政党组织为开展竞选活动而募集资金，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印度也不例外。早在印度独立前，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国大党就开始受到一些印度民族私营企业的捐助。印度独立以后，这种捐助更是源源不断。捐资者的动机大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希望国大党执政后在政策上给予一些优惠或倾斜。它既为管理商业公司的法律所允许，也为普通国民所默认。但同样一件事情，一向谨慎的尼赫鲁做得是滴水不漏，让人抓不到任何把柄；他的女儿英·甘地却是破绽百出。尼赫鲁的做法主要有两点：一是奉行自愿的原则，捐助者是捐助国大党，还是其他党派，悉听尊便；二是捐款以支票形式分别记在国大党和国家税务机关的帐上，以免某些贪欲重的人中饱私囊。此外，精明过人的尼赫鲁还为自己立了一条规矩：绝对防止在为自己的党募集资金时，污染了自己的手指头，以免授人以柄。他把这项工作交给自己的部下去做。因此，尼赫鲁能够做到常在河边走，却不打湿脚。

英·甘地的精明比她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她的心胸却远不如尼赫鲁坦荡豁达。也许是因为在1967年的大选中吃过无钱的苦头，英·甘地看出了金钱在竞选中的魔力。在1971年的大选中，为防止私营大企业将资金捐助给反对党组成的联合阵线，她采取了一个自以为得计的“妙法”——由联合股票公司对政治性捐助予以限制。这种做法所造成的结果不言而喻：表面上，人们再也看不到公开的、合法的捐赠，大量交易却在幕后非法地进行着。而且，惟其是幕后交易，才更加肮脏。捐资的支付方式也由支票改为现金，使得相当一部分款项流入了募集者私人的腰包。

捐助的性质也由自愿变成了变相勒索。比如：有时候，某个部长会故意放出风来，说政府要将某个工商企业收归国有或对其进行整顿，制造紧张空气。感到惊恐的有关企业家便会奉上大把的钞票，以求过关。随着钞票的付出，对他的威胁也戛然而止。勒索比自愿捐赠聚敛起钱财自然要容易得多，在1971年的大选和1972年的邦议会中期选举中，英·甘地的僚属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募集到了高达几千万卢比的资金。由于资助者逃避了各种课税，

大量的捐款便成了非法资金，而执政的国大党本身则成了非法资金的最大窝主。

人们惊奇地发现，曾因腐化而被迫辞职的辛迪加派领导人，相对于总理的那班疯狂地聚敛钱财的亲信们来说，只不过是女巫见大巫，这自然使曾经对国大党执政派寄予厚望的人们深感失望和愤怒。英·甘地个人的行为也使她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与绝不亲手接触捐款的乃父不同，英·甘地公然将“装满现金的提包”直接带回萨夫达尔路1号总理府，这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辛迪加派的老干将S.K.帕蒂尔曾经作证说，英·甘地甚至“连提包都没有归还”。

权钱交易做得最出格的要数总理的主要资金募集人、外贸部长拉利特·纳拉扬·米什拉。他在做这种肮脏交易时来者不拒，甚至还以各种经济法为依据，控告并威胁那些不积极向国大党捐款的人。他的名字不久以后变成了阴谋诡计和政治诈骗的代名词。在权钱交易、贪赃枉法极为猖獗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一家企业能经得起严格的法律和财务检查。为了获得经营许可证或其他政策上的优惠，许多企业家尤其是冒险家还是愿意像米什拉那样的国大党当权人物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付出的比起他们将要得到的，毕竟少得多。

另一件丑闻与英·甘地本人有直接关系，这便是“纳加瓦拉事件”。

1971年5月24日，印度国家银行的主要出纳员韦德·普拉卡什·马尔豪特拉接到总理打来的电话，指示他提出一笔数额为600万卢比的款子给一位等在路边的孟加拉绅士。马尔豪特拉领命来到指定地点，发现一个自称是前陆军上尉，曾在情报部门工作过的人正等在那里。此人自称鲁斯塔姆·索哈兰博·纳加瓦拉。马尔豪特拉将这笔巨款交给他。可是，当他快速来到总理办公室，报告自己已完成特殊使命并要索取收据时，他才发现这原来是一起精心策划的骗局。

骗子纳加瓦拉很快于当天被捕。他在审讯中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说他在电话中模仿了总理的声音。三天后，纳加瓦拉被判处四年监禁。罪犯固然是罪有应得，但此案所留下的疑团也许永远都难以解开。人们不禁要问：总理在此以前给马尔豪特拉打过电话吗？如果没有，他为何那样熟悉她的声音？一个出纳员为什么单凭一个听起来是总理打来的电话就能轻易从银行中提走一笔600万卢比的巨款？这种工作疏忽无论如何是解释不通的，只能说明这种交易有先例。

令人们猜测和议论得更厉害的是，就在纳加瓦拉想翻供之时，却突然于1972年3月死在狱中，官方说他死于心脏病；六个月后，负责调查纳加瓦拉案件的警官又突然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这两人究竟是死于自然原因，还是人为因素，谁也说不清楚。由于死无对证，此案也许会成为永远难解的谜。

此后十多年，不断有人对此案感兴趣，试图解开这个谜。1977年人民党上台执政后曾派专人调查此案，但劳而无功。直到英·甘地死后两年，《印度斯坦时报》还在旧事重提，说纳加瓦拉是暗藏在印度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尼克松因不满于英·甘地在东孟加拉问题上与他作对，指示中央情报局利用他“玷污诽谤”英·甘地，目的是使她难堪。

事情越说越离奇，但无论哪种说法，都对英·甘地不利：即使是为她辩护的说法，也因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而难以令人信服。

如果说人们对英·甘地总理是否与纳加瓦拉丑闻有染还只是流于猜疑的

话，那么，另一件更大的丑闻她是有口莫辩、难辞其咎的，因为丑闻的当事人正是她的爱子、人称“小王子”的桑贾伊。

桑贾伊与比他大两岁的哥哥拉吉夫虽是一奶同胞，但性格却迥然不同。拉吉夫性格比较内向，喜静，不爱抛头露面；与人相处不拿架子，通情达理，从不以总理的儿子自居，因此，他的人缘和口碑都不错。他的职业是印度航空公司的一名普通驾驶员，他的妻子是一个意大利人，名叫索尼娅。不知内情的人，谁也难以仅从他的言谈举止判断出他是总理的儿子。桑贾伊则截然相反。他性格外向，不学无术，胆大妄为，喜欢冒险，寻欢作乐，放荡不羁，是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纨绔子弟。他虽贵为总理之子，但高贵的出身并没有给他带来高的智商。他在名为杜恩学校的贵族学校学不下去而不得不中途退学，后来在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工厂学习也未完成学业。就是这样一个桑贾伊，居然也想当印度的亨利·福特（美国汽车大王）。不用说，他之所以能有这样的“雄心”，全仗着他母亲的那块金字招牌。

1969年，年方22岁的桑贾伊申请生产一种名为“人民车”的小汽车。他自谓这种车特别适合印度的国情和需要。他宣称他要使这种车全部国产化，没有一个进口元件。这话如果是从别的小伙子口中说出的，人们即使不怀疑他神经是否有毛病，至少也会认为他是口出狂言，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谁也不会相信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会有那么大的本事。

在通常的情况下，生产汽车这种行当并不是谁都能搞的，也不是随随便便能上马的。在正式作决定以前，需要有关部门会同有关专家反复进行可行性分析和论证。在一个贫穷落后、经济实力并不雄厚的国家里更应该如此。事实上，早在桑贾伊提出他的计划之前15年，生产国产小型汽车的问题便提上了印度政府的议事日程。政府曾任命专门的专家委员会反复进行研究和论证，但最终因种种原因而不得不搁置起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印度这样的一个连自行车的需要都尚未得到充分满足的穷国，生产小轿车不太现实。尽管有许多企业家都想涉足这个行业，但没有一个成功的。

现在是桑贾伊在申请，情况就完全两样了。持续了十多年的论证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成为多余的了，生产小汽车的疑虑被很快打消，这项产业一下子成了前景极为可观的产业。桑贾伊不费吹灰之力就战胜了众多的竞争者，得到了别人垂涎已久的开办马鲁蒂（风神之子）工厂的营业执照，又在德里附近以低得叫人难以置信的价格得到了大片良田作为厂房用地，还得了大量的资金。而且，这些事情办得极快，这在以公文旅行，办事拖拉著称的印度政府机构中是极为少见的。

这一切都成了人们指责英·甘地的口实。反对党在议会里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只握有最低技术水平证书的年轻人，要不是总理的儿子，政府会允许他从事汽车制造业吗？一个几乎没有什么资金的生手，没有官方机构的默许和资助，又怎么能在寸土万金的首都附近搞到大片土地并建立起一座价值数百万卢比的工厂？这分明是在指责总理搞裙带风。

面对反对党议员的责问，英·甘地不作正面回答，只是反问道：一个年轻人，难道仅仅因为他是总理的儿子，就不应该干他想干的事吗？这分明是在为自己的儿子辩解，不过，这种辩解在反对党的质问面前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

很显然，桑贾伊给他的母亲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这仅仅只是开始，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呢。

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丑闻以外，政府官员中的贪污现象也层出不穷。

大多数印度人认为，英·甘地总理本人也许没有贪污行为，但她并不反对同贪污分子妥协，有时甚至包庇他们，如果她认为这样做符合她的政治目的的话。前尼赫鲁内阁成员，奥里萨邦历届首席部长哈雷克里希纳·马哈塔布接受某一企业的贿赂多达 60 万卢比。此事为一个以高级法官为首的委员会所发现。但是，英·甘地因为需要他合作，把她提名为邦首席部长的南迪尼·萨特帕蒂选进立法机关而没有对马哈塔布采取任何行动。后来，马哈塔布终被开除出党，但并不是因为贪污罪，而是因为他反对萨特帕蒂夫人。

在国大党和政府机构内部，英·甘地还大搞一言堂，容不得不同意见；用人标准不是用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人们惊呼，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民主成分正在日益减少，而专制的成分则日益增多。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记起 1969 年 10 月 28 日（国大党第一次公开分裂前三天）国大党主席尼贾林加帕给英·甘地写的那封言辞激烈的公开信。他在信中指責英·甘地正在建立“个人崇拜”，这“威胁到国家的民主”，“你似乎已将对你的忠诚与否作为对国大党和国家忠诚与否的标准”。如果抛开尼贾林加帕与英·甘地之间的个人恩怨，这些话在几年以后看来是颇有见地的，具有惊人的预见性。但在当时，无论在国大党内还是党外，尼贾林加帕都成了辛迪加派的象征，而辛迪加派又是守旧的顽固势力的象征，是站在“进步的”英·甘地的对立面的。所以，尼贾林加帕的话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反而徒招嘲弄。

尼赫鲁和英·甘地既是父女，又都是国家的首脑，他们执政的时间都很长，各自开创了一个时代。因此，人们很容易将他们两人相比较，发现他们虽亲为父女，但彼此的思想和建党治国方略却不大一样。

英·甘地在 1972 年所达到的权力巅峰，尼赫鲁早在 50 年代初就达到了，并且终其一生都保持了下来。他在党和人民中的崇高威望，使他在长达 17 年的执政生涯中的大部分时期都处于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一般地说，他如果想怎么样，谁也奈何不了他。然而，尼赫鲁并不滥用权力，比较具有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他并不反对与不同政见者共事。他组阁时甚至有意识地让一些不同政见者进入内阁。例如 1956 年时，由于内阁的一些重要成员相继去世，需要对内阁进行补充，尼赫鲁便让阿扎德·潘特和德赛主管国内事务，让梅农主管外交事务。在这几个人中，前二者都是国大党保守派元老，与尼赫鲁的政见并不相同，只有梅农与他政见相近。在内阁会议上，他也从来不搞一言堂，提倡群言堂。遇有问题，他一般都是先提交阁员们讨论；在讨论中他也从来不用压眼的办法，而是用说服的办法使持反对意见的阁员接受自己的观点。当然，内阁就重大问题作出决定，要取决于尼赫鲁的最后态度。如果他执意坚持，同僚们就会作出让步。尼赫鲁也只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对次要问题他多半是听从同僚即使是持不同政见者的意见。又如，他把为党的竞选活动募集资金的事交给党内与他政见相左的人如帕特尔、德赛或 S.K. 帕蒂尔而不是自己的心腹或亲信去办理。尼赫鲁曾经说过：“我不想让印度成为一个千百万人对一个人唯命是从的国家，我想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尼赫鲁极力推崇议会民主，他把能让不同政见者统一在一个人旗帜之下，能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当作一种领导艺术。

不知是因为没有尼赫鲁那样博大的胸怀，还是由于缺乏他那样的崇高威望，英·甘地缺乏她父亲那样的宽容精神。她的权力欲相当强，容不得不同

政见。有时候她即使暂时隐忍一下，也是因为对方力量还相当强大，自己一时还奈何不了他，才不得不如此：但一俟羽翼渐丰，她的力量增强以后，她便会毫不手软地将对手搞掉。她对待辛迪加派和南达、德赛的态度和做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用人标准上，英·甘地不是看某人的地位、资历和实际工作能力，而是出于自己的喜好，搞任人唯亲。经过接连的领导班子调整，她撤掉了几乎所有的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能大胆发表意见或由于某种原因使她不高兴的人，换上自己所喜欢的人。随着她的权力达到巅峰，她的这种做法也变本加厉起来。如内政部长一职，她在将恰范罢免后，曾一度由自己兼任，1972年她又转让给乌马·尚卡尔·迪克希特。其实此人政绩并不突出，在政界也并不引人注目，但他是尼赫鲁家族的老朋友，英·甘地“庖厨内阁”的主要成员。对邦政府她也常以自己的用人原则随意进行改组。她利用1972年邦议会选举之机，撸掉了拉贾斯坦、安得拉、阿萨姆、中央邦和比哈尔邦的首席部长，换上自己的亲信。但她在这样做时，很少考虑这些人是否真正有能力，是否能在他们将要执政的邦受欢迎。她曾任命穆斯林巴尔卡塔拉·汗和阿卜杜尔·加富尔分别担任印度教徒占绝大多数的拉贾斯坦邦和比哈尔邦的首席部长。她自己曾为这种标新立意的做法自鸣得意过。她对人说，让穆斯林当印度教徒占绝大多数的邦的首席部长，这是连她的父亲也不可能做到的。然而，她的做法并不成功。她所任命的那两个穆斯林皆属无能之辈，不久就干不下去了，只得下台。但从此以后，在国大党执政派控制的邦，由她亲自挑选首席部长却渐成惯例。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按照议会民主制的基本原则，邦首席部长应由邦立法议会提名，由所在邦人民普选产生。

更有甚者，英·甘地甚至将邦立法议会中的国大党议员召到德里，在总理官邸的花园里召开会议，选举新的领导人。很显然，英·甘地已把政府立法机关变成了她的政治工具。议会民主的基本原则正在遭到破坏，尼贾林加帕三年前的那个说她以对她本人忠诚与否作为衡量一个人对国大党和国家忠诚与否的尺度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国大党的党员们发现，当官和升职的唯一途径是争取得到领袖的好感。于是，阿谀逢迎、谄媚等歪风邪气大行其道，使得小人得志，正直之士寒心。在老百姓眼里，现在的国大党执政派同三年前与之决裂的辛迪加派已没有什么区别了，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形象已经一落千丈。

不仅国大党和政府的官员们必须唯英·甘地马首是瞻，就是国大党议会党团的普通议员和新闻界也得看她的脸色行事。定期的国大党会议几乎变成了英·甘地发表独家演说的场所，与会者大多只是静静地听着，即使间或有胆子稍大者讲上几句，也只是就极次要的问题发表点看法。虽然也有激进的反对党大胆地揭露政府的腐败和其他方面的弊端，但老百姓听不到这样的声音，因为报纸根本不敢刊登这方面的文章。

国大党执政派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很激烈，矛盾错综复杂。从大的方面看分为两派，即左派和右派。左派又分为三个派别：一派不传统的国大党人，对穷人有一定的同情心；第二个派别包括60年代脱离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国大党的前社会党人和“青年土耳其”；第三个派别是加入国大党的前共产党人。1971年大选后，该派的穆罕·库马拉曼加拉姆被英·甘地任命为钢铁煤炭部长。他上任后的第一个行动是使煤炭工业国有化。这使前两派感到惊恐。他们倾向于认为库马拉曼加拉姆是带着不良的动机加入国大党的，这个动机便

是：既然共产党依靠本身的力量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尽可能多地加入国大党，通过在其中进行活动，力图改变其性质，迫使其领导人实施它无法实施的社会主义政策。这些前共产党人接下来的做法似乎“证实”了他们的猜忌，他们组织了“国大党社会主义论坛”。这使前两派更为震惊，他们急忙组织了“尼赫鲁论坛”，与之对抗。英·甘地只得在两个论坛之间保持平衡，后来又各打五十大板，将两个论坛都解散，但这并不能削弱他们的政治基础，减弱他们之间日益加深的敌对程度。

右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瓦卡·普拉沙德·米什拉和乌马·尚卡尔·迪克希特。他们的基本观点相同，但在对待是否与共产党联合的问题上有分歧。前者主张干脆与共产党分道扬镳；而后者则认为不应与共产党彻底决裂。英·甘地权衡再三，最后采纳了迪克希特的意见。

实践证明，英·甘地更适合当政治家。她玩弄起权术来手法相当高明，甚至可以说能够轻而易举地玩弄权术于股掌之上；在对付外来危机哪怕是战争危机时更具有高超的运筹帷幄的才能和坚决果断的气魄。然而，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党内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她却显得六神无主、方寸大乱，以致朝令夕改，相互矛盾，令人无所适从。当物价急剧上涨，赤字增大，人民面临着饥饿死亡的威胁时，英·甘地不得不放下架子，将她过去所唱的自力更生的高调抛在脑后，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援助。为此，她不得不按后者的条件，放弃激进政策，恢复经济自由化，并对外国投资者开放。但当激进派抗议这是“社会主义的倒退”时，她又感到有必要采取激进政策。如她对城市土地规定上限，这在理论上还说得过去，但在实践上却行不通。它影响到城市建筑业，引起房租急剧上涨。又如，1973年初，她为了兑现她竞选时许下的实行“社会主义”的诺言，宣布粮食贸易国有化，压低小麦收购价格，但她并不强迫农场主以无利可图的价格出售农产品，而实际上只有他们才有余粮可售。

正当英·甘地被经济问题弄得进退两难之时，两桩法律公案又弄得她应接不暇、疲惫不堪。

1971年，英·甘地修改宪法，使议会重新获得修订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的权利。围绕着是否批准该法的问题，最高法院分成了两派，双方势均力敌。以首席法官S.M.西克里为首的六名法官，反对修订宪法；以A.N.拉伊为首的另六名法官则持支持态度；剩下的最后一名法官的表态极为圆滑，他在一些观点上同前六人一致，在另一些观点上同后六人一致。显然，双方他都不想得罪。

这颇具戏剧性的7:6表决结果也同样富有戏剧性：允许议会修订宪法的所有内容，但不得改变宪法的“基本特征”。然而，究竟什么是宪法的基本特征，判决书并没有载明。

对于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英·甘地的支持者们极为不满，指责这是“对议会和总理的攻击”。沉寂了几年的国大党组织派又跳了出来，为反对党打头阵。他们为判决结果叫好，称它阻止了英·甘地的“反复无常”。双方的论战再度升温，气氛变得与国大党分裂前一样紧张。有趣的是，判决书恰好在S.M.西克里退休的前一天被公布。这也许纯粹是个巧合，但英·甘地把它看作是早有预谋。她决定抓住首席法官继任者的人选问题大做文章，进行报复。

顾名思义，首席法官就是排在第一位的法官。可别小看这一排序，首席

法官实际上在对法院进行指导和任命处理特殊案件的法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在任命首席法官的问题上，历年来形成了这么一个传统，即任命资历最深者为首席法官。在论资排辈盛行的印度，这也许不失为一个“公平”的做法。如果按这个老传统办事，西克里的继任者依次应是 J.M. 谢拉特等三名资深法官：但他们所持的观点与西克里毫无二致，都是主张更多地限制议会的权力。很显然，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如当了首席法官，对英·甘地都是不利的。

英·甘地决定绕过这三位资深法官，任命支持修订宪法的另六人中的资历最高但低于上述三位法官的 A.N. 拉伊为继任首席法官。此举使全国都感到震惊。反对党和司法界抨击她这是变相“贿赂法官”，违背了三权分立原则，有碍司法公正。J.M. 谢拉特等三名法官为此愤而辞职。

另一桩法律公案是拉杰·纳拉因对英·甘地的控告。

拉杰·纳拉因是个社会党人，生性不安分，爱出风头，人称“丑角王子”。在 1971 年的大选中，他作为反对党“大联合阵线”的候选人，在英·甘地的传统选区赖巴雷利被击败，便向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提起诉讼，控告英·甘地在选举中有舞弊行为。很显然，拉杰·纳拉因是想把她搞下台。

政府的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人民生活极为困苦而政府却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措施。人民对英·甘地政府起先是失望，然后是失去信任，最后终于走上街头，开展各种各样的斗争，在 1972 年至 1973 年间，仅在孟买市就发生了一万多次罢工和示威游行。在德里、加尔各答、马德拉斯等其他大城市也都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斗争越来越激烈，以至人们不断地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冲突。在北方邦首府勒克瑙，连警察也发动了暴乱，并与军队发生冲突，致使数十人丧生、百余人受伤。1973 年 8 月又发生了火车司机大罢工。

混乱的政治经济局势说明英·甘地的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就在此时，古吉拉特的血案和“新生运动”几乎导致了英·甘地的垮台。

古吉拉特邦位于西印度，是圣雄甘地和英·甘地的老对手德赛的故乡。前面说过，自 1972 年起，英·甘地已开始直接插手邦首席部长的任命。她在古吉拉特也如法炮制，任命了一个自称对她绝对忠诚的党徒为该邦首席部长。但此人能力实在欠佳，他还没有坐稳这一位置，便被阴险狡诈的奇曼汉·佩特尔所取代。若在平时，佩特尔一定会吃不了兜着走，但现在英·甘地也只好听之任之，还转而求他帮忙，为定于 1974 年 2 月在北方邦和奥里萨邦的邦议会选举筹集资金。对这种自己可以乘机从中捞一把的买卖，佩特尔自然求之不得。他做政治交易倒是很在行，但失之掘劣。古吉拉特邦是食用油的生产基地。他对该邦生产食用油的工业巨头许诺，只要他交纳必要的捐款，他便可以在食用油严重供应不足的情况下，随意提高食用油的价格。

这桩典型的丑闻于 1974 年 1 月初被曝光后，古吉拉特邦人的怒火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大规模骚乱随之爆发了，致使该邦处于无政府状态达十周之久。抢劫商店、燃烧汽车和政府财产、攻击警察局一类的事随处可见。首府艾哈迈达巴德和 105 座大大小小的城镇曾一度被迫实行宵禁。政府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这场骚乱平息下去，可是已经有 300 人受伤，8000 多人被捕，103 人永远闭上了眼睛。

古吉拉特骚乱无疑是严重的，但它所产生的影响还要超过骚乱本身好多倍。影响之一在于它的扩大效应。从此时起，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情绪已发展成为对英·甘地所代表的整个政治体制的合理性的怀疑和挑战，

英·甘地在第二次印巴战争后建立起来的崇高威信已跌到了低谷。在古吉拉特，始于反对高物价和执政党腐败行为的运动已转变成为一场如火如荼的改革运动——“新生运动”。“新生运动”的声势是如此浩大，以致它在迫使奇曼汉·佩特尔辞职后，又促使了国大党占多数议席的古吉拉特邦议会的解散。面对“新生运动”的强大攻势，无力招架的英·甘地转而宣称古吉拉特骚乱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动和挑唆有关，他们企图与该邦政府中的某些人串通一气，在政治上挫败她。然而，这种为缓解公众敌对情绪而转移他们的视线的做法并未奏效。

古吉拉特骚乱的另一种影响则更加深远，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后来印度的历史发展起了后遗症似的负面效应。独立后的印度虽然骚乱不断，也不乏警察与示威群众发生冲突的情况，但一般来说都有一个“度”而不至于把事情闹得过大、过火；虽然也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都少和小得多。而这次骚乱规模之大，伤亡人数之多，造成后果之严重，在印度独立 26 年来是没有先例的。这说明群众同英·甘地的国大党及其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已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用全国已堆满干柴来形容当时英·甘地政府所面临的危机形势并不为过。

正在这时，一个名叫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其简称 J.P. 纳拉扬或 J.P. 更为著名）的人在干柴上点了一把火。这把火一烧起来很快便成燎原之势，谁也遏止不了。

J.P. 运动

年逾七旬的 J.P. 纳拉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过人之处，他留下的履历只是年轻时是个社会主义者，参加过自由运动，后来成了圣雄甘地的崇拜者；他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崇高的威望，振臂一呼，能够将几乎所有的反对英·甘地的人集中于他的麾下，向她那令人生畏的权力发出挑战，全在于他的人格魅力。他一生光明磊落，没有染上一点污泥浊水。这在当时的印度政界是难能可贵的。

J.P. 纳拉扬并非从一开始就站在英·甘地的对立面。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他曾全力支持过她，但他所给予她的大力支持，也就这么一次。

1973 年，当最高法院的三名法官被迫辞职时，J.P. 曾致信英·甘地，直言不讳地批评她的做法，并对印度民主的基础可能会因此而受到摧毁表示担心。遗憾的是，此时已唯我独尊的甘地夫人根本听不进这样的逆耳忠言。这封信激怒了英·甘地，也使 J.P. 纳拉扬对她感到失望。他不再用写信的方式同她交换意见，他觉得这个女人也许是在台上呆得太久了，该下台了。于是，他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倒英·甘地为目的的“J.P. 运动”。

J.P. 运动起自北印度的比哈尔邦。起初的目的类似于西印度古吉拉特邦的新生运动，是争取本邦的国大党执政派政府辞职和议会解散。但不同的是，新生运动的发起者是学生，起初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反对党后来才参加；而 J.P. 运动是有组织的，反对党从一开始就站在运动的前列。

英·甘地这次吸取了古吉拉特事件的教训，她拒绝对 J.P. 纳拉扬让步，调集大批军警到比哈尔邦进行镇压。

当 J.P. 运动愈演愈烈之时，一场全国规模的铁路工人大罢工又在社会党人乔治·费尔南德斯的策划和组织下发生了。面对罢工，英·甘地已别无他

法，唯有进行更加残酷的镇压，结果两万多名铁路工人被捕，更多的人则遭到毒打，他们的家属也被逐出铁路区。英·甘地的暴行引起了除大垄断资产阶级以外的大多数印度人的愤怒和谴责。

在此过程中，英·甘地做了几件比较得人心的事，使紧张的局势多多少少有所缓解。

第一件事是惩治走私、黑市外汇交易以及其他经济犯罪。1974年9月，英·甘地通过新总统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签署命令，发动突然袭击，一举逮捕了全国134名大走私犯。

第二件事是核试验取得成功。1974年5月18日对印度人来说是个不平常的日子。那天凌晨，在西印度拉贾斯坦邦的大漠中一个叫做波卡拉的地方，印度原子能委员会的科学家成功地起爆了一个地下核装置。这是印度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另两件事发生在外交领域。英·甘地戏剧性地改善了印度与一向支持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国家伊朗的关系。1974年10月，伊朗领导人沙阿访问印度，与印度签订了几项合作协议。1975年，英·甘地吞并了一向被印度当作保护国的喜马拉雅山区的小王国锡金。

由于有这些成就，老百姓又一次喜欢上了英·甘地。然而，他们的这种热情没能持续多久，因为英·甘地仍未能给他们以充足的面包。反对党倾向于把这些成就看作是甘地夫人为转移群众视线所耍的政治手腕，其中有的兼有对付反对党的目的。如她既用《国内维持治安法》打击走私等经济犯罪，也用它来打击群众性的游行示威活动。

J.P.运动呈燎原之势，已突破比哈尔邦的范围。其实，J.P.纳拉扬也不能给老百姓提供多少实实在在的东西。他给予老百姓的承诺无非是掀起“一场彻底的革命”，要在即将于1976年举行的大选中取代英·甘地，从而建立“非党民主”。这些口号按说也是流于空泛和模糊，但因为它提出了要将已成众矢之的的英·甘地赶下台，所以对公众有强大的号召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一时之间，公众把他当成了救世主。J.P.纳拉扬在全国各地穿梭般往返，而英·甘地却只好被动地呆在德里。过去英·甘地掌握着的政治上的主动权，现在则转到了J.P.纳拉扬的手中。

J.P.运动开展半年以后，国大党的许多议员的观点也开始发生变化。这些人对J.P.纳拉扬个人很尊敬，认为总理应努力赢得他的支持而不是与他作对。迫于他们的压力，英·甘地勉强同意会见J.P.纳拉扬。这次会见于1974年11月在萨夫达尔路1号总理府举行。但两人话不投机，最后不欢而散。此后直到1977年英·甘地大选失利，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两人的矛盾迅速激化。J.P.纳拉扬开始直接号召军队和警察违抗她的“非法命令”，呼吁国大党要员贾格吉凡·拉姆和恰范起来反对她，加入推翻她的斗争行列。J.P.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英·甘地来说，较之1974年，1975年麻烦更大，政治局势更糟，更难控制。新年伊始，那个在1971年的大选中曾为英·甘地募集竞选资金效过犬马之劳的拉利特·纳拉扬·米什拉在萨马斯提普尔火车站向公众发表演说时，被埋在讲台下的定时炸弹炸死。他是印度独立后第一位被暗杀的内阁部长。这种事情在尼赫鲁时代还从未发生过。

这不一桩典型的谋杀案。围绕着这一案件，英·甘地及其支持者与J.P.纳拉扬及其支持者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舌战：前者把谋杀案归咎于后者所

宣传的“暴力和复仇的狂热”；后者则断言谋杀案正是前者所为。因为前者认为米什拉已成为累赘，失去了利用价值，所以要除掉他。米什拉的家属也怀疑政府机构与此案有涉。他们抱怨政府在萨马斯提普尔会议上防范措施不力，在为被炸后尚未马上断气的米什拉治疗时“明显故意地耽误”。于是，怀疑政府机构就是谋杀案的幕后策划者的说法不胫而走。

英·甘地公开否认此事与她有关，说这种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她进而宣称米什拉事件仅仅是即将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前奏，她才是真正的目标。她激动地说：“当我被谋杀时，他们会说这是我自己安排的。”

正当米什拉谋杀案闹得沸沸扬扬之时，英·甘地的老对手、79岁高龄的莫拉尔吉·德赛又在印度这口已烧得翻滚的大油锅中加了一桶油。4月2日，为了抗议英·甘地在他的家乡古吉拉特邦推迟选举（该邦议会已于1974年1月骚乱发生后被解散），德赛扬言除非立即允诺举行选举，否则他将绝食至死。这使英·甘地感到非常棘手。答应德赛的要求吧，她的国大党在选举中取胜的希望很小；拒绝德赛的要求吧，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以德赛那样的身份、威望和年纪，如果真地听任他绝食至死，后果将不堪设想，弄得不好，甚至会发生全国性的大动乱。英·甘地权衡再三，终于被迫在德赛绝食后的第七天答应了他的要求，宣布古吉拉特邦议会选举将于6月初举行。反对党为她的屈服而欣喜若狂。

6月12日是选举结束后统计选票的日子。在英·甘地的家乡的北方邦，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法官贾格穆罕·拉尔·辛哈有意选择这一天公布了关于拉杰；纳拉因对英·甘地1971年选举诉讼的判决结果。他宣布那年在赖巴雷利选区的选举中，英·甘地犯有竞选舞弊罪，故那次选举结果无效，暂时取消她的竞选资格，此后六年内不得参加竞选。辛哈法官的惊人判决震惊了全国。

辛哈法官的判决作出后仅仅几个小时，古吉拉特邦议会的选举结果揭晓：国大党执政派一败涂地，在仓促间组织起来的由J.P.纳拉扬领头的反对党联盟“人民阵线”获得了胜利。

在一天之内接连受到两次沉重的打击，这在英·甘地从政以来是从未有过的。

现在，整个印度已处于鼎沸状态，“英·甘地必须下台！”的呼声响彻云霄，J.P.纳拉扬乘势宣称英·甘地继续担任总理有违民主的基本原则。

按照法律程序，如果对辛哈法官的判决不服，英·甘地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并有胜诉的可能。然而，印度法院案件的审理过程有如马拉松长跑般漫长，最高法院从受理上诉到作出最后判决通常要花四至六个月的时间。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难以预料。作为印度第一个在任内吃官司的总理，英·甘地不可能无条件地继续留任，因为无任何先例可循。以前倒是部长或议员被起诉的，但他们在上诉悬而未决时如果继续任职，往往带有附加条件，即可以参加议会的活动，但没有投票权。对于英·甘地来说，当有职无权的总理不她无法忍受的，何况在一个不算短的时间里被动地等待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令她感到难堪和屈辱了，因为这多少有点任人宰割的味道。

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的判决使英·甘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她的威信和声望因此而急剧下降自不待言，单是J.P.纳拉扬及其反对者们借机大做文章，欲逼她下台就已经叫她够受了，她的后院也极不稳定。

J.P. 纳拉扬等人以为，他们目前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倒英·甘地的良机，千万不能错过；一旦错过，将追悔莫及。在喜出望外之余，他们赶紧开始行动：召集群众举行大型集会，声讨英·甘地；举行示威游行；组织反对党议员在总理府门前静坐示威，大有一种非把英·甘地赶下总理宝座不可之势。

6月25日晚，J.P. 纳拉扬在德里的拉姆利拉广场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将倒英·甘地运动推向了高潮。拉姆利拉广场是举行重要的政治集会的最佳场所，也是举行一年一度的印度教十日节（节日期间往往要焚烧象征邪恶的魔鬼塑像）的极好地点。J.P. 纳拉扬号召白天在德里和各邦首府举行大规模游行，在全国356座县城同时进行示威。他还号召军队、警察及公务员们“拒绝服从英迪拉”而“遵守宪法”。莫拉尔吉·德赛直言不讳地对一位外国记者说：“我们一定要迫使她辞职，彻底推翻她，以便一劳永逸。这个女人不可能逃过这场运动，我们的人会成千上万地包围她的住宅，日夜把守，不让她出来……”其气焰之嚣张，溢于言表。

在巨大的危机面前，一个阵营内部各种派别和力量之间往往会发生急剧的分化组合。就在辛哈法官的判决结果公布后的当天，英·甘地便将她的内阁同僚们召集到总理府进行紧急磋商，一来是商讨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二来她想借此机会检验一下部下对她忠诚与否。

结果表明，她的阵营在迅速分化。一些人可谓她的“铁杆保镖”。他们认为总理不必理睬辞职问题，因为那是国家的“敌人们”所希望的。这些人占阵营的大多数，包括大多数内阁部长、几乎所有的邦首席部长以及为数不少的议员。他们如此表态与其说他们是急于要对英·甘地表示忠诚，倒不如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怀有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他们的心态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的主子一旦下野，他们现有的权势也将随之化为乌有。另一些人倾向于认为在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书下达以前，总理宜于暂时辞职。这些人就动机来说又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真心为英·甘地着想，向她表示忠诚，他们认为暂时辞职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总理个人都有好处；另一部分人如国防部长贾格吉凡·拉姆等则是为了趁机夺权。

英·甘地曾假意表示愿意暂时离职，让能干而又无多少野心的外交部长斯瓦兰·辛格任代总理，等捱过那段等候终审判决的时间，胜诉后再收回权力。贾格吉凡·拉姆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表示如果英·甘地继续留任，他会对她忠诚不二；但如果她想让斯瓦兰·辛格任总理，哪怕只是暂时的，那么他认为他本人比斯瓦兰·辛格更合适。

大约就在此时，英·甘地接到情报局送来的一份报告，称财政部长恰范也意欲担任临时总理，某些部门正在为他张罗。英·甘地明白，她目前所处的环境极为险恶，不但外部敌人正在想方设法想搞垮她，自己的阵营中处心积虑地从背后捅刀子的也大有人在。一时间，英·甘地真有点四面楚歌的味道。

然而，无论是J.P. 纳拉扬等反对党人的断言，还是贾格吉凡·拉姆、恰范等人的如意算盘，都错了；即使是带着几分真心劝英·甘地暂时辞职的那些人看来也并不了解他们的主子。英·甘地是绝不会主动放弃权力的，哪怕是一分钟也不行。面对严峻、险恶而又复杂的形势，她暗自作出了一个将所有的想置她于死地或想看她的好戏的人都震得目瞪口呆的决定。

就在J.P. 纳拉扬等人在拉姆利拉广场举行大型群众集会的当晚11时

许，英·甘地在她家的世交、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西达尔塔·尚卡尔·拉伊的陪同下，来到总统府，通知艾哈迈德总统，说她的政府决定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行使压倒一切的权力。其时，印度国家对外紧急状态尚未解除，它是1971年印巴战争爆发后开始实施的。

总统二话没说，就在英·甘地即将向全国发表的声明上签了字。这位总统原本就是英·甘地的一位亲信，无论何时何地，处于何种位置，说话行事总是与她保持高度的一致。

于是，全国立刻被置于紧急状态法令之下，各地同时开始大逮捕，包括反对党领袖J.P.纳拉扬、德赛、执政党中的“青年土耳其”派中坚钱德拉·谢卡尔、莫汉·达里亚等人在内的许多人被捕。这些人当时正在熟睡之中，便被戴上了冰冷的手铐，从被窝里拉出来投入监狱。从其行动的一致性和快捷来看，这次行动显然是有预谋的，事先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充分的准备。

这一切都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的，真可谓神不知，鬼不觉，就连一向以嗅觉灵敏著称的新闻编辑和记者都被蒙在鼓里。那天午夜时分，新德里的巴哈杜尔沙·扎法大街（印度首都的大多数报刊机构所在地，相当于英国的舰队街）的路灯同时熄灭了。编辑们起初并未在意，因为在印度因发生故障而停电的事实在是太常见了，不足以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直到熄灯时间长得超过了往常，他们才警觉起来，但已经来不及了，早晨就得印刷出版的报纸已经无法印出了。后来，他们才意识到电路是被人故意切断的。显然，新闻管制也开始了。

6月26日晨7时30分，从酣睡中醒来的印度人才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国际新闻中得知夜间所发生的一切。仿佛为了给人们释疑，半小时后，英·甘地在全印广播电台上发表讲话。她说：“总统已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大家不要惊慌。”为了“防患于未然”，政府已经逮捕了一些人。但她没有公布被捕者的名单。报纸受到的审查甚至比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任何被捕者的情况哪怕是其姓名也不许报道。

虽然印度以前也实行过紧急状态，但从来没有这次严厉，因为以前从来没有逮捕过议员，也从未对新闻进行全面审查。

英·甘地此举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各种批评纷至沓来，许多人认为英·甘地之所以实施紧急状态，是因为她“天生就是个独裁主义者”，容不得任何批评意见和反对行为；也有人认为英·甘地已将她自己与国家等同起来了，在她看来，对她个人的威胁就是对国家的威胁。西方传记作家玛丽·卡拉斯分析说，英·甘地并不是一个民主的爱好者，但是，她把对民主的信奉与对掌握权力的爱好矛盾地糅杂在了一起；同时她又深信“个人价值与为国家大干一番的渴望密不可分”，从而使这种矛盾心理更加复杂化了。

至于实施全国紧急状态的理由，英·甘地在6月27日晚向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作了她自己的申述：

全国出现了一种暴力和仇恨的气氛，一名内阁部长被暗杀了，首席法官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反对党已拟定计划，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在产业工人、警察和军队中，搞围困、骚乱、分裂和煽动等等活动，企图使整个中央政府瘫痪。有一个反对党甚至号召武装部队不要执行他们认为是错误的命令。该项计划预定于本月29日付诸实行。我们毫不怀疑，这样的计划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并给经济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必须加以制止。某些反对党制订的这个计划是与民主相抵触的。不管怎么说，它都是违反国家利益

的，是不能容许的。自从紧急状态法宣布以来，除了在部分地区有过罢市和在古吉拉特邦发生了几起小的冲突外，全国已恢复正常。这种正常状态必须保持。应当看到，就是在民主国家里，也有个不能逾越的界限。暴力行动和无意义的消极抵抗运动会把多年来艰苦地、满怀信心地盖起来的整座大厦摧毁。我相信不久就可以撤销紧急状态。

众所周知，我一向相信新闻自由，现在也仍然相信。但是新闻自由和其他方面的自由一样，实行起来要认真负责并且有所节制。当前国内形势由于语言问题或教派骚乱而动荡不定。在这一形势下，那些不负责任的报道已给国家造成严重危害。一段时期以来，有些报纸蓄意歪曲消息并撰写恶意中伤和蛊惑人心的评论，我们必须加以制止。宣布紧急状态法完全是为了创造一个平静和稳定的局面。对新闻进行检查也是为了恢复信任气氛。全印广播电台和报纸消息总是发表得太慢。在法律上和行政上进行一切必要的整顿需要花些时间。

从后来的印度历史发展看来，无论如何，英·甘地当时实施紧急状态法都是一个错误。她后来之被刺杀，虽然是宗教狂热的直接结果，但与这件事也不无关系。然而，就英·甘地个人而言，在当时的情势之下，要想保全自己，她也别无选择，只好如此。

十一、下野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紧急状态法实施之初，英·甘地的确取得了她本人足以自鸣得意的“成功”：她先斩后奏地在内阁会议上所提交的紧急状态声明和在议会上公布的紧急状态法令，几乎都是以全票获得了通过；一年多来一直在谴责英·甘地“摧毁民主”、宣称要与她斗争到最后一口气的人们仿佛就在一夜之间闭上了他们喧嚣的嘴巴；貌似强大的 J.P. 运动好像已化作一团蘑菇云，消散到了九天之外；新闻界温顺地服从了极为严格的新闻审查；经常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的一些大城市出奇地平静；政府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开始按时上下班，很少有人像过去那样一张报纸、一杯清茶地打发时间；有人惊奇地发现，连火车也比以前准点了……

然而，这诸多的“成功”都是在高压之下取得的。当像斯瓦兰·辛格那样曾为英·甘地所器重的内阁部长仅仅只是因为说了一句“这种办法（指实施紧急状态法）依赖残忍的警察，不会发挥任何作用”，便丢了乌纱帽时，当议会中的多数反对党领袖被投入牢狱时，英·甘地的紧急状态声明和紧急状态法能不在内阁会议和议会中顺利通过吗？当军警挥舞着警棍在大街小巷横冲直撞，到处抓人，被捕者人数达数以十万计，甚至超过了英国殖民者在捕人高峰的“撤出印度”运动期间的所捕人数时，被弄得人人自危的老百姓谁还敢随便开口说话？当包括号召力极强的 J.P. 纳拉扬本人在内的大批领导人身陷囹圄的时候，J.P. 运动如果不烟消云散那才叫怪事！如果连圣雄甘地、诗圣泰戈尔以及英·甘地本人的父亲尼赫鲁论述言论自由的引文都不许登载，报刊除了温顺地服从严格的新闻审查外，它还能有别的招儿吗？……

既然这些“成功”是在高压之下取得的，换句话说，是在人们的恐惧状态下取得的，那么，就注定了不会长久。因为人们不可能长期生活在恐惧状

态下，正如同一个失去双亲的孝子不可能永远沉浸在悲痛之中一样。当紧急状态超出了“紧急”二字所包含的时间范围而变得似乎遥遥无期之时，紧急状态法及其实施者的命运也就决定了。

紧急状态法及其实施者英·甘地首先遇到了来自知识界的强劲挑战。

对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和文明的民族来说，知识分子都是精英，是脊梁。“士为知己者死”、“不自由，毋宁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他们古往今来都崇尚的信条。他们具有不惧刀枪剑戟、直面人生的勇气。他们是时代脉搏的敏锐把握者，是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的希望之所在。他们的人数在总人口中并不多，但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却至大，正如原子核虽小，释放的能量却惊人一样。他们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正因为如此，任何人、任何一种势力都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轻视他们的作用，不敢轻易放弃他们的支持。

本身也曾是知识分子的一员的英·甘地和她的父亲尼赫鲁自然是深深懂得这一点的。他们一向也都很注意争取取得他们的支持。他们自身也具备吸引知识分子的条件，如高贵的出身、优雅的气质和彬彬有礼的风度，以及印西合璧的教育与开明的思想。这一切都使知识分子倾心于他们，给他们以尽可能多的支持与合作。

英·甘地这次也像往常一样，极希望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至少是谅解。她甚至派密使私下活动，试图说服杰出科学家、大教授、名作家、电影导演等大知识分子同意签署一份声明，表示赞成实施紧急状态法。然而，除了失望以外，她什么也未得到。

一旦意识到英·甘地只是以意识形态作幌子，追求极端的个人权力，而将民主弃置一边，愤怒的知识分子不能原谅她，更不会支持她。他们很难把这个外表雍容华贵、一向以左倾面目出现的女总理同眼前的这个“大独裁者”联系起来。他们以沉默表示抗议，没有一个人在那个声明上签字。

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已经是英·甘地的一个莫大的遗憾了，但失去民心则更意味着危险。

如果说，英·甘地本来就不看重民心，那是冤枉她。实际上，为了争取民心，她在紧急状态期间还公布了一个“二十点计划”。虽然该计划大部分内容是八年前“十点计划”旧话的重提，但也有两点新东西：全部免除农村中的赤贫者所欠高利贷者的小额债务，让那些因为不能偿付本人或祖先对“主人”所欠债务而受“奴役”的劳动者获得自由。

若是在平时，这个带有左倾色彩的“二十点计划”一定会在平民百姓中引起强烈的反响。然而，生活在紧急状态法下的人们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个“大独裁者”所耍的阴谋诡计，其目的在于转移他们对紧急状态的注意力。

由于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二十点计划”就像一颗流星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很快便销声匿迹、湮没无闻了。这自然令它的提出者英·甘地感到尴尬和难堪。然而，超过这尴尬和难堪许多倍的，却是她的那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的宝贝儿子桑贾伊所搞的“五点纲领”给她招惹来的麻烦。这“五点纲领”的内容是成人扫盲、计划生育、清除贫民窟、植树造林和反对嫁妆。

平心而论，“五点纲领”都是符合印度国情，切中印度社会弊端的。作为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印度实有扫盲之必要；印度人口增长过快，已成为世界第二大人□国，实行计划生育理所当然；清除贫民窟有利于改变国家的形象；植树造林有利于改善国家的自然面貌，美化自然环境；嫁妆制度是“吃

人”的制度，是印度社会的陋习之一。如果能够铲除掉，广大贫民尤其是妇女们定会拍手称快，妇女地位也会因此而提高一大截。

然而，再好的计划或纲领也要看是由谁来主持实施和怎样实施。人们很难相信，像桑贾伊那样的花花公子能够把这些事情办好。

在通常的情况下，在印度那样宗教色彩浓厚、种姓制度盛行、各种情况错综复杂的国度，“五点纲领”即使理由十足，很有必要，实行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旬日之内所能解决问题的，更不是靠强制和行政命令所能奏效的；它需要人们观念的转化，需要社会各界、方方面面的理解、支持与合作，而这些都需要时间。

“五点纲领”从它一出笼似乎就已经注定了它的失败，因为它的提出者和实施者桑贾伊的出发点并不是想真正为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办点实事，而仅仅是为了向世人表白他是有所作为的，是为了沽名钓誉、青史留名。一句话，是出自好大喜功。这样的出发点也就决定了桑贾伊的行动方式：蛮干、行政命令和强制，以求急功近利、立竿见影。如此行事，不失败的话，才是怪事！

桑贾伊的强制行为在两件事情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一件事是与清除贫民窟有关的“土库曼门事件”。

土库曼门是德里的一处名胜古迹，该古迹与不远处的贾玛清真寺一样宏伟壮丽。两者之间有无数狭窄而又黑暗的走廊和过道相通。这些走廊和过道连同居民的棚屋因过于简陋且年深日久，的确有伤首都的大雅，毁之也未尝不可。不过，应事先同居民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取得他们的同意后再行动，更何况这里是穆斯林聚居区，行动更宜慎之又慎。然而，桑贾伊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于1976年4月，命人强行将它们拆除，将居民迁至位于朱木拿河岸边的一个距他们的工作单位20多英里的小镇居住。这自然引起了当地穆斯林的极大愤慨和抵制。但丧心病狂的警察却用子弹来回答他们，当即有六人饮弹身亡。桑贾伊一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土库曼门血案”，仍不罢休，又用一把火将土库曼门烧成了一片废墟。

血案发生后，正好因公出差到德里的克什米尔国民会议党领袖、穆斯林谢赫·阿卜杜拉闻讯赶来，看到土库曼门正在被熊熊大火所吞噬，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初曾顺从地在紧急状态声明上签字、同样出身于穆斯林的艾哈迈德总统的震惊程度丝毫不亚于谢赫·阿卜杜拉。他们都向英·甘地提出了抗议，但后者对批评她的小儿子的任何话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第二件事是强制推行绝育。

桑贾伊命令包括警察、市政监察员、医生、护士、教师等在内的所有的“吃皇粮”的国家职工，都必须“劝说”一定数量的人进行绝育手术，否则扣工资。在印度大多数文化水平极低、有许多甚至完全是文盲的男子看来，绝育即是阉割：紧急状态的实质就是剥夺他们的男根和自尊。这自然引起了广大群众尤其是深受其害的包括贱民在内的广大印度教下层人民和穆斯林的强烈反对。他们由反对桑贾伊开始到迁怒于他的母亲甘地夫人。这些人构成了英·甘地选民的绝大部分，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将意味着什么，英·甘地应当十分清楚。然而，已被母爱迷住了双眼，认为桑贾伊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英·甘地，似乎并未意识到儿子给她带来的危险。

桑贾伊何以能在感情上牢牢抓住她的母亲，这在印度曾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人们围绕着这个问题所得出的答案可谓千奇百怪，其中有些甚至是荒

诞不经的。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是：英·甘地多年来一直为自己“忽视家庭，造成丈夫早逝”而深感内疚，故她以溺爱小儿子的方式对亡夫作些心理和情感上的补偿。费罗兹·甘地的挚友、曾在尼赫鲁和英·甘地内阁中担任石油部长的克夏瓦·德瓦·马拉维亚也许看得更透彻。他认为，英·甘地溺爱桑贾伊，源于她的一个近乎偏执的信念，即在关键时刻，除了桑贾伊以外，谁都靠不住。英·甘地自己也认为，在她“最不走运的时候”（她指的是1975年6月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判决公布之时和1977年的下野期间），唯独桑贾伊救了她，她才没有在政治上和身体上彻底垮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桑贾伊简直成了她生命的支柱。

使老百姓感到不满的，还有英·甘地政府对政治犯非人道的摧残和虐待。

尽管有人对英·甘地的指控（说她对“被监禁的对手投放慢性毒药”）没有任何明显的证据能够证实，但是，J.P.纳拉扬仅仅在狱中呆了五个月，他的健康状况就恶化到了不能下床的地步，以致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他的余生的事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J.P.纳拉扬的待遇还算是好一点的。另一个政治犯乔治·费尔南德斯的命运比他还要糟。不过，这也许与他对抗英·甘地政府的激烈程度有一定关系。这位社会党人、工会领袖在1974年5月曾领导了大规模的铁路罢工，在紧急状态期间曾组织过地下抵抗运动，甚至有过炸桥梁、捣铁路、烧财产一类的过激行动。他处处同英·甘地对峙着，英·甘地自然不会放过他了。不过，不知是因为他机敏过人，还是因为那帮警察愚蠢透顶，每次逮捕都让他逃脱了。恼羞成怒的警察只好拿他弟弟劳伦斯·费尔南德斯出气，在精神上折磨他，在肉体上摧残他。后来，乔治·费尔南德斯被抓住，对他弟弟的那些酷刑便转而落在了他的身上。

不过，比起美丽的女演员斯内拉塔·雷迪，费尔南德斯兄弟的境况还不算是最糟的。这位女演员之所以被捕，仅仅是因为她涉嫌为乔治·费尔南德斯做过事。她本来生得娇弱，又患有慢性气喘病，在狱中被与妓女等刑事犯人关在一起，受尽了非人的折磨，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以致她在出狱后不久就离开了人间。

生活跨独立前后两个时代并曾因参加自由运动而饱尝过英国殖民者的铁窗滋味的J.P.纳拉扬和德赛等人，不由得将英·甘地的监牢与昔日英国殖民者的监牢进行对比。他们惊奇地发现，二者对待政治犯或政敌的手段几乎没有有什么区别。对比的结果自然加深了他们对英·甘地的不满和愤恨。

对英·甘地来说，更糟的是，在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民心后，她又失去了印度共产党这个盟友。

英·甘地骨子里并不喜欢印度共产党。她在1959年第一次出任国大党主席期间曾一手策划搞垮了喀拉拉邦的共产党邦政府，便是明证。然而，十年后，这两个冤家竟然戏剧性地走到一起来了。当时英·甘地在国大党分裂后处境艰难，出于保住政权的考虑，她不得不寻求印共的支持；而英·甘地的左倾面目也为她得到印共的支持提供了前提。是故自1969年以来，印共都是不遗余力地支持英·甘地，哪怕是在英·甘地实施不得人心的紧急状态法之初，也是如此。但从1975年11月起，印共也开始对英·甘地感到不满了，因为他们感到她已开始向右转，如对私人企业让步，停止对工人支付按规定应付的红利，以及限制工会活动等等。

按照印度宪法的规定，人民院选举每五年举行一次，但在国家宣布紧急

状态的情况下、国会可通过法律自行延长任期，但一次不得超过一年。第六届大选本应于 1976 年 3 月举行。英·甘地当然比谁都清楚如期举行大选对她来说将意味着什么。于是，她决定延长本届人民院的任期，推迟大选。她先后于 1976 年 3 月和 11 月两次推迟大选。

1977 年 1 月 18 日，英·甘地宣布：第六届全国大选将于 3 月份举行；释放所有被捕的反对党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几乎所有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猜测起英·甘地的动机来。

英·甘地自己认为举行大选“纯粹是一种维护民主的行动”。这句听起来冠冕堂皇的话，既含有政治家向来说话半真半假、虚虚实实的成分，也隐含有她难言的苦衷。

在当代没有哪一个政权靠实行强权政治（形式有多种，如个人独裁、军法管制等，印度的紧急状态亦属这种情况）能够维持长期统治的。对于这一点，英·甘地恐怕比谁都清楚。别的不说，就说印度的邻国巴基斯坦。这个在印巴分治后建立起来的年轻的伊斯兰国家在建国后的大部分时期，都是处于军法管制之下。然而，无论是阿尤布·汗，还是叶海亚·汗，都没能将他的统治维护下去。前者被迫将权力交给后者，而后者后来不得不将权力交给民选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这种靠刺刀进行的统治之所以最终维持不下去，学者们当然可以列举出种种原因予以说明，但最重要的是人民不喜欢这种统治方式。在专制、独裁与自由、民主之间，谁都会选择后者，除非他神经不正常。因此，英·甘地所实行的紧急状态统治最终也不可能维持下去（“紧急”二字本来就含有期限的含义）。与其到时被人赶下台来，落个不体面的结局，还不如自己主动还政于民。可见，英·甘地宣布举行大选有其客观的必然性。

从主观上来讲，英·甘地也不希望由她父亲精心培育起来的民主制度之花毁在自己手中，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英·甘地不仅仅是最终丢掉权力的问题，说不定还会留下一个千古罪人的骂名，真要被人们看作暴君、大独裁者了。英·甘地可不希望落到这种结局。

实行大选看来是势所必然，但英·甘地宣布把大选时间定在实施紧急状态法后第 19 个月，又是出自什么考虑呢？

简而言之，这是出自她对大选形势的分析和估计。她认为此时举行大选于己有利：经济形势已有所好转，粮食紧张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在紧急状态下，政治秩序井然，各种社会犯罪现象明显减少，全党上下，大小官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恭顺、听话；各反对党经过打击，力量一定大为削弱，尤其是在铁窗中吃过苦头的领袖们的棱角也许被磨平了，对她也也许已构不成什么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对紧急状态的看法也许不会像起初那样反感和不理解。总之是国内形势一派大好，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这么说，英·甘地也信以为真。

后来的事实证明，英·甘地对大选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受到严格的新闻审查的报纸报道又有多少真实性可言呢？政治局势的好转完全是强力维持的结果；经济状况的好转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老天帮忙；反对党领袖中虽不乏因铁窗生涯而棱角被磨平者，但意志相反更加坚定者也大有人在；至于平民百姓，他们对英·甘地的不满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缓解，但对于她实施紧急状态法的行为，他们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原谅。他们甚至倾向于

把英·甘地举行大选的宣告，看作是这个“独裁者”玩弄权术的一个新花招。——对于这一切，一向以政治敏感著称的英·甘地究竟是真没想到呢？还是有所预感，而不愿相信，宁愿自欺欺人地相信被自己控制起来的报刊那虚假的新闻报道呢？谁也说不清。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她最终还是举行大选，还政于民，因为她别无选择。她已骑在了虎背上，即使再难，还是得下。

英·甘地一旦宣布实行大选，就等于把自己置于与各反对党平起平坐、平等竞争的地位了，也就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任何人都得听她发号施令的那个英·甘地了。局势怎样发展，也就由不得她了。

各反对党领袖被释放后，立即以快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聚集在一起。他们是怀着把英·甘地从总理宝座上拉下来的共同目的走到一起来的。这些党派包括人民同盟、国大党组织派、印度人民党和社会党。它们组成了一个新党——人民党，以德高望重的前国大党领袖莫拉尔吉·德赛为首领。

还是在那个两年前实施紧急状态法前几个小时 J.P. 纳拉扬召集群众集会的拉姆利拉广场，J.P. 纳拉扬、德赛等反对党领袖举行了英·甘地宣布举行大选后的第一次隆重集会。这是对民心向背的一次测验。集会的结果表明，民心已倒向了人民党一边。竞选形势已明显不利于英·甘地。

对反对党的表演，英·甘地不能说没有思想准备，但有些事情却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的。首先是 2 月 1 日法·阿·艾哈迈德总统的去世。艾哈迈德总统一直是英·甘地的坚定支持者。在这个紧要关头，他的去世对英·甘地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失去共和国总统的支持，英·甘地的竞选前途更加渺茫。

紧接着，英·甘地阵营内部，又有人向她的背后捅刀子。2 月 2 日，贱民领袖、粮农部长贾格吉凡·拉姆宣布辞职并退出国大党。与拉姆同时退出国大党的，还有三个月前被解职的北方邦前首席部长 H.N. 巴胡古纳以及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奥里萨邦前首席部长南迪尼·萨特帕蒂夫人。他们一起组织了一个名叫民主大会党的新党，旋即加入了人民党阵营。

竞选形势对英·甘地来说十分不利，但她已别无选择，只好背水一战。她又像往常一样，以旺盛的精力投入了竞选活动中去。由于动用了飞机，她行动起来比她的对手们快得多。每到一处，她照例是召集选民，发表演说。她讥讽人民党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大杂烩或者是吃了容易使人消化不良的米豆混煮的汤饭，没有一位能获得该党所有选区所公认的领袖，要求人民作出明智的抉择，选择她所能提供的“安定与进步”，不要选择人民党所代表的“混乱与无序”。然而，她沮丧地发现，前来听她发表演讲的选民远没有前几次大选时那么多，他们对演讲的反应也很冷淡。自 50 年代初登政治舞台以来，这样的情形她还是第一次遇到。

可在人民党那边，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尽管它的领袖们没有军用直升机那样的先进交通工具，不可能像英·甘地那样能够极为快捷、方便地从一处到另一处举行集会，但由于民心在他们这一边，所以他们不论在哪里发表演讲，总是人山人海，听众群情激昂，反应热烈。针对英·甘地空泛的“安定与进步”，人民党提出了既实惠又实在的“面包和自由”的口号，一下子抓住了选民的心。对英·甘地的攻击，人民党也当仁不让地进行反击。他们说，英·甘地“成功”仅在于实施了独裁统治，在贫困和饥饿面前却一败涂地。他们问道，印度人民难道还愿意让政权再落到“极度滥用职权”的那两双手

(指英·甘地和桑贾伊·甘地母子)中吗?每到这时,台下的听众中就发出一阵雷鸣般的应答声:“不!决不!”此外,人民党还乘机抓住桑贾伊强制实行输精管结扎术问题大做文章,将广大选民的心牢牢地抓在手中。

3月20日下午,大选结果揭晓。国大党执政派遭到惨败,在人民院542个席位中只获得153席,英·甘地母子及其许多亲信都在各自的选区被对手击败而落选。其中,英·甘地是败在其老对手拉杰·纳拉因手下的。在地方上,国大党执政党更是一败涂地,除在南方几个邦占据少数席位外,在其传统的根据地北方各邦几乎是一席未得。人民党获得较大胜利,在议会人民院中独得299席。其他反对党,主要是印共、印共(马)和全印德拉维达进步同盟,共获48席。J.P.纳拉扬发动的以倒英·甘地为目的的J.P.运动终于有了结果。大多数选民的愿望也得到了满足,他们全都皆大欢喜。

虽然英·甘地料想到要赢得这次大选相当困难,她曾这样说道:“我们肯定不会取得绝大多数,我想我们或许会勉强取胜。”可她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失败,而且竟败得这样惨。

过去八年来,萨夫达尔路1号一直是权力的象征。20日晚,与人民党的神经中枢——贾格吉凡·拉姆的寓所那欢庆胜利的喧闹形成对照,这幢住宅四周却是一片寂静,静得连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见。两条爱尔兰狼狗也仿佛懂得主人的心,不像往日那样爱叫唤。当英·甘地的朋友普普尔·贾亚卡来看望她时,她只淡淡地对她说了几个字:“普普尔,我失败了。”她的神态使普普尔·贾亚卡感到吃惊。仿佛就在一夜之间,那个敢作敢为、大胆泼辣的英·甘地消失了。

普普尔·贾亚卡走后,英·甘地的内阁部长们陆续来到。他们是应召前来的,就是否取消紧急状态进行讨论并当场作出决定。因为英·甘地总理职位已经不保,紧急状态如不尽快取消,有可能被反对党利用来反过来对付她。部长们很快达成共识,立即建议代总统B.D.贾蒂正式取消了紧急状态。

3月22日,英·甘地被迫宣布辞职。人民党共举德赛为总理。23日,德赛宣誓就职。过去十多年来,德赛曾数次争夺总理职位,如今终于圆了这个梦。

失去权势之后

英·甘地下台后,处境一度非常糟糕。

作为一介布衣,她再也不能住在萨夫达尔路1号总理府了,现在连住处都成了问题。好在她有一个朋友、前大使穆罕默德·尤努斯同情她,将她位于威灵顿新月街12号的住宅腾出给她住。然而,她住在这里也并非自由自在,时常处于中央情报局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中。

英·甘地还将面临人民党政府对她的“秋后算帐”。她很清楚这个原本就是为了对付她、打倒她而由几个反对党临时拼凑起来的党上台后会干些什么。果然不出她所料。4月18日,人民党上台还不到一个月,内政部长查兰·辛格便宣布成立三个委员会调查她的“罪行”:一个委员会是直接针对她本人的,其成员只有前最高法院首席法官J.C.沙阿一人,旨在调查她在紧急状态期间的过火行为;第二个委员会是针对其次子桑贾伊的,叫H.R.坎纳委员会,意在调查桑贾伊所经营的马鲁蒂汽车公司舞弊案;第三个委员会是针对英·甘地的亲信、前国防部长班西·拉尔的,叫J.雷迪委员会,负责调查他

的贪污行为。

同年7月25日，印度议会和各邦立法会议举行总统选举。在人民党的操纵下，桑吉瓦·雷迪当选。这一点显然也是冲着英·甘地来的。在1969年的总统选举中，桑吉瓦·雷迪是英·甘地竭力想要阻止当选的人物。

10月3日，在内政部长查兰·辛格的策划下，中央情报局出动警察，以在大选中滥用权力罪到威灵顿新月街12号逮捕了英·甘地。这次逮捕对她来说还只是一场虚惊。审讯她的德里地方法院以指控理由不充分，不能成立为由，于次日将她释放了。

然而，人民党并不甘心。1978年3月和4月，沙阿委员会又先后向人民党政府递交了两份调查报告，指控英·甘地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是一种“欺诈行为”，是为了竭力摆脱最高法院将依法对她实行终审判决这一窘境；实行紧急状态法的结果是发生了一系列完全违反法律和未经授权的行为，给人们造成了极度的痛苦。最高法院数次传唤英·甘地出庭，都因“证据不充分”而未能对她采取法律措施。

1978年11月7日，英·甘地在由她的党执政的南方卡纳塔克邦的一个名叫吉克马加洛的乡村选区的补缺选举中重新当选为议员。不久，她应英国几个印侨组织的邀请前往英国访问，受到英国首相卡拉汉和反对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接见。在此期间，人民党政府曾想对他们的接见进行干预，要求英国领导人将英·甘地当作贱民对待，遭到拒绝。随后议会特权委员会指责英·甘地犯有藐视议会罪，理由是她阻挠四位官员在议会提问，收集有关桑贾伊的马鲁蒂汽车公司的情况，该委员会表示：如果她能表示道歉，案子就算了结了；如果她拒绝，议会就将对她作出处罚的决定。但英·甘地是决不会向人民党所把持的议会表示道歉的。12月19日，议会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通过了取消英·甘地的议员资格，并将她逮捕归案的决议。于是，英·甘地被关进了蒂哈尔监狱。此举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招致英·甘地的支持者的一致反对。议会两院被迫于12月26日分别签署命令，将英·甘地释放出狱。但人民党仍设立了两个特别法庭对她进行审讯，企图彻底搞臭她。

面对人民党政府施加的接二连三的打击，意志坚强的英·甘地尚能以泰然处之的态度来对待。但当人民党以对待她的手段对付她的小儿子时，她却感到难以忍受，感情的闸门也有些失控了。她一向把桑贾伊看得比她自己还要重要。桑贾伊已成了她的生命，她的一切。为了桑贾伊，她什么都愿意做。

德赛当总理才一天，英·甘地就跑去见他，恳求他宽恕她儿子。她可怜巴巴地说：“怎么办都行，只求救他一命。”如此低三下四地求人，尤其是求一位老对手，这在甘地夫人的政治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她的词典中根本就没有“求人”这个词，但是为了她的宝贝儿子，她什么都顾不了，她甚至没有想想这样做是否失态。

然而，无论英·甘地怎样努力，她还是没能保护住她的儿子。在当时的情况下，她连自己也保护不了，又能保护谁呢？

1978年5月5日，最高法院下令逮捕桑贾伊，理由是他曾滥用特许权，企图唆使原告证人作伪证。此后，桑贾伊将在蒂哈尔监狱呆上一个月。其时，他的母亲英·甘地正在卡纳塔克邦旅行。她闻讯后赶紧乘飞机飞回德里，到机场后又直接乘车去监狱。在记者睽睽的目光下和频频闪烁的摄像机镜头前，她拥抱了儿子，并且高声说道：“不要灰心，这将是你的政治上的再生。”这话使在场的记者感到吃惊。因为过去14个月来，她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制造

舆论，说桑贾伊从未涉足政治，现在又这样说，无异于不打自招，向世人表明她原先说的话全是假话。一向说话谨慎的甘地夫人出现如此出人意料的失言，显然又是她因儿子被捕而感情用事以致失去理智的结果。

除了要面对人民党政府似乎是无休止的指控、攻击乃至逮捕外，英·甘地还不得不为巩固其在党内的地位，与她过去的部下作斗争。

桑贾伊给人的印象似乎是除了会给他母亲添麻烦以外，什么正经事也不会做。然而，他对人的本质的观察却并不比她那经验老到的母亲差。他曾用一句形象的话来形容世态炎凉。他说，当海上掀起大浪时，“那批耗子会从沉船上逃走”。英·甘地下野时的情况正是如此。

英·甘地在她的选区竞选失利的当天，她就凭直觉感到国大党主席德夫·坎特；巴鲁阿似乎对她就不如以前那么恭敬了。接着，Y.B.恰范在人民院公开宣称，国大党已从选举中吸取教训，“同紧急状态永远告别了”。这话听起来与其说是同紧急状态告别，倒不如说是同甘地夫人告别。这些迹象表明，在英·甘地自己的党内，已经有人向她无可争辩的地位发出了挑战。而仅仅还在前几天，同是这些人，对她甘地夫人还是那般恭顺，简直是俯首帖耳。虎落平阳遭犬欺。英·甘地此时的情形正是如此。

巴鲁阿、恰范等人很快在党内结成了一股对付英·甘地与她的儿子桑贾伊的势力。他们向她发出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追究母子俩对大选失败所应承担的责任。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甚至作出决定，从1977年4月12日起就大选失败的问题辩论三天。

然而，要想直接同甘地夫人展开面对面的交锋，这帮人还没有底气和胆量。他们决定先拿她的亲信、前国防部长班西·拉尔和她的儿子桑贾伊开刀。巴鲁阿已公开宣称，要班西·拉尔离开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至于桑贾伊，他希望他能知趣点，自己退出全印国大党委员会。英·甘地也想以这件事检测一下自己在党内说话究竟还有多大的分量。于是，3月31日，就在她的寓所里，国大党领导层展开了大选失败后的第一次公开较量。甘地夫人以退党相威胁，试图保住班西·拉尔。她的强大压力把巴鲁阿等人压得几乎顶不住了。就在这时，一个甘地夫人平时正眼不瞧的人物、国大党喀拉拉邦地方首脑瓦雅拉尔·拉维的一句话却给巴鲁阿平添了一股勇气。他说：“党的工作委员会已作出的正式决定，不能随意更改。”巴鲁阿立即表示赞许：“现在是国大党寻求真理的时候了。我们必须进行一次自由和坦率的辩论。”这下，甘地夫人没招儿了。

屈尊同自己的部下讲和，这在以前恐怕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此时的英·甘地已经不是昔日那个一呼百应、她的“臣子”们只能“三呼万岁”的“印度女皇”了。她先是派一名私人特使作代表去同巴鲁阿讲和，可这位傲慢的国大党主席连理都不理。她只好再派一名特别私人秘书去将他请到自己的家中，由她亲自与他面谈。巴鲁阿这才答应前往。但巴鲁阿仍然坚持原来的决定，毫不松口，哪怕甘地夫人以不参加4月12日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相要挟。英·甘地不得不自己主动上巴鲁阿的门，为班西·拉尔和桑贾伊求情，求他放他们一马。巴鲁阿答复说可以“不使费罗兹·甘地的儿子受到伤害”，但决不能饶过班西·拉尔。甘地夫人这才感到时代不仅变了，而且变得太大，也太快。她开始担心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党。

不过，英·甘地的机会不久也来了。国大党大选失利，责任固然主要应由甘地夫人母子来负，但作为国大党主席，巴鲁阿也难辞其咎。巴鲁阿不得

不引咎辞职。英·甘地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将自己信赖的人安排到国大党主席的位置上，便提名紧急状态时期的内政部长布拉马南德·雷迪为候选人。这场争斗的结果最后以英·甘地的胜利而告终，她所提名的候选人布·雷迪在5月6日当选为国大党新主席。

然而，英·甘地这回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她所扶植的并不是一个听从她摆布的人；相反，他很快站到了她的对立面，与她为敌。布·雷迪当上国大党主席后不久，便公开宣称他这个主席不会只是个“橡皮图章”，言下之意他不会听从任何人的摆布。果然，在随后的一系列问题上，他都与甘地夫人唱对台戏。

不仅如此，英·甘地的党还面临着第二次分裂。鉴于她的那些部下越来越不“听话”，英·甘地感到自己对党的控制权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她想通过自任国大党主席，把权力再抓到自己手中。然而，现任国大党主席布·雷迪似乎没有任何引退的意思。甘地夫人手下的那班人便发起了一个在一份请求书上签名的运动，要求召开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会议，选举新主席。然而，他们的行动却遭到了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抵制。甘地夫人又一次受挫。为了挽回面子，她又授意手下人向布·雷迪抛出了所谓的“九点要求”，内容主要是要求布·雷迪在做出一切重要决定前，必须事先征得甘地夫人同意。这实际上要把布·雷迪降到“橡皮图章”的地位。布·雷迪自然不会同意。英·甘地只得使出最后的“杀手锏”，企图迫使布·雷迪等人就范。12月18日，她派人向布·雷迪送交了一封退出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信。但布·雷迪等人还是不为所动。

能想的招儿都想了，但英·甘地仍未能把党的权力收回来，控制在自己手中。大权旁落的局面是她难以忍受的。为了控制党，她只得迈出她本不愿迈出的一步——再次分裂国大党。1978年1月2日，英·甘地和她的支持者召开所谓的“国大党全国会议”，宣布成立“真正的国大党”，取名为国大党英迪拉派，简称国大党（英），英·甘地自任党主席。1月8日，以国大党主席布·雷迪为首的另一派也举行会议，谴责英·甘地的“分裂行为”，宣布将她开除出党。这一派国大党的名称，起初叫国大党正统派，后几经更改，最后定名为国大党社会主义派。国大党第三次正式分裂。

分裂后，英迪拉派国大党力量大为削弱，它只拥有原工作委员会21名委员中的7名、全印委员会中三分之一的委员和国大党议会党团中六分之一的议员。原国大党仅有的4名邦首席部长中只有卡纳塔克邦的乌尔斯一人属于她的党。不久，乌尔斯也离开了她。

人民党的压力，国大党内部的纷争，使英·甘地跌入了她从政以来的谷底。她还有重新崛起的希望吗？许多印度人都倾向于认为，昔日叱咤风云的甘地夫人也许从此会从政坛上消失。

东山再起

然而，他们的看法完全错了。英·甘地下台后不到几个月，她便又找到了重新崛起的机会：这机会有一半可以说是她的对手人民党送给她的。

英·甘地在竞选时所说的指责人民党的那句话并没有错。人民党的确是个不同政治势力的大杂烩；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想把英·甘地赶下台。现在这个共同愿望已经实现了，它们的窝里斗也就开始了。

各派势力首先围绕着总理人选发生了争执。代表国大党组织派的莫拉尔吉·德赛，代表民众党的查兰·辛格和代表民主大会党的贾格吉凡·拉姆各不相让。三人势均力敌，任何两者的联合都会挫败第三者。最后由于德高望重的 J.P. 纳拉扬和 J.B. 克里帕兰尼出面调解，他们才同意让德赛任总理。然后，人民党议员们一起来到圣雄甘地安息的地方，发誓永远团结一致，永无二心。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甘地陵前的誓言言犹在耳，新的纷争又开始了。查兰·辛格和贾格吉凡·拉姆的眼睛一个劲儿地盯着总理宝座，梦想有朝一日以自己取代德赛。

人民党上台才三个月，就明显地分成两大派，一派是原印度民众党和人民同盟，以查兰·辛格为首；另一派由原几派国大党人会同社会党人组成，德赛和贾格吉凡·拉姆都属于这一派。在 1977 年 6 月 13 个邦和中央直辖区的议会选举中，两大派互相拆台，大批未当上候选人的党员“反叛”，人民党的得票率从大选时的 68% 降至 48%。在这场邦议会选举中，人民党在七个邦获胜。原印度民众党和人民同盟达成默契，瓜分了全部七个邦的首席部长职位。之后，查兰·辛格凭借自己的实力，压德赛改组党中央，并抓住德赛之子坎提·德赛的贪污受贿问题大做文章。德赛反咬一口，说查兰·辛格的夫人也有违法行为。查兰·辛格自视其妻清白，建议对德赛之子和他自己的夫人同时进行审查，为德赛所拒绝。国防部长贾格吉凡·拉姆因儿子放荡不羁，也处于尴尬的境地。

1978 年 6 月，德赛访英美归来，政治本钱又有增加，遂借口查兰·辛格未经内阁讨论就擅自发表立即逮捕英·甘地的声明，破坏了内阁集体负责制，迫使查兰·辛格辞去内政部长职务。经过幕后交易，查兰·辛格于 1979 年 1 月重返内阁。但他这回得到的是财政部长职务，而不是原来的内政部长职务，实权有所减弱。为了给他以安慰，德赛又将副总理的虚衔赏给他。同时得到副总理职务的还有贾格吉凡·拉姆。2 月底，查兰·辛格提交了他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预算方案。在预算中，他把好处给了农民，对城市居民课以种种惩罚性税收。而城市居民是德赛的支持者，德赛这才意识到让查兰·辛格担任财政部长是个错误。

这样一个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政府，必然在政治上不稳定，在经济上也无所作为。人民党政府为了尽早实行自己制订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将执行得比较顺利的“五五”计划提前一年结束。人民党的“六五”计划接受了计划委员会关于“滚动计划”的建议，把以往以中央集权为主的计划改为以地方分散为主。但这个计划草案尚未修订完毕就因人民党下台而胎死腹中。故人民党执政期间实际上没有执行计划经济。经济结构比例失调，工农业生产衰退，通货膨胀加剧。在人民党执政的头四个月中，主要食品价格就上涨了 5%，到年底物价指数已达到两位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德赛政府就耗尽了英·甘地执政时期贮备的 1800 万吨粮食和 30 亿美元的外汇积累。看来，人民党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不仅不比英·甘地强，甚至还不如她。英·甘地无法给人民以足够的“面包”，人民党也照样给不出，从而渐渐失去人民的支持。因此，可以说，人民党内部不和在客观上为英·甘地复出创造了条件。

此时，英·甘地采取两手抓的策略：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削弱国大党正统派，另一方面利用人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内部不和对它进行攻击和分化瓦

解。

国大党英迪拉派在分裂时力量虽然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但由于纯洁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团结，故战斗力相反有所增强。在 1978 年 2 月举行的五个邦的议会选举中，国大党（英）获得很大胜利，在两个邦（卡纳塔克和安得拉）组织起自己的邦政府，在一个邦（马哈拉施特拉）同国大党正统派联合执政，初步扭转了同国大党正统派力量对比上的劣势。

国大党正统派在分裂之初，不论在工作委员会、全国委员会还是在议会两院中的议员中，都拥有原国大党成员中的多数。它还得到了许多国大党邦委员会和知名人士的支持，力量本来强于国大党（英）。然而，它的两大致命的弱点不仅限制了它的发展，而且为英·甘地所利用。这两大弱点一是缺乏一个像甘地夫人那样无可争议的领袖，二不提不出一个与原国大党明显不同的纲领；而且，它在分裂后不是去进行积极发动群众和加强党组织的工作，以壮大自己的力量，而是一味沉溺于是否同国大党（英）联合问题的讨论。在此过程中，它又分为两派：一派以党主席斯瓦兰·辛格为首，主张与国大党（英）联合；另一派以议会党团领袖恰范为首，反对联合。两派争论不休，牵制与削弱了该党的力量。

英·甘地乘机对国大党正统派进行瓦解，一方面接连提出联合建议，争取对方的党员群众；另一方面又向其领导人发动攻势，攻击他们对人民党手软，同人民党相勾结等等，迫使他们不得不再向党内群众作解释，陷入被动状态。国大党正统派的无所作为和英·甘地的灵活策略使它的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倒向英·甘地，它的许多议员也纷纷向她靠拢。六个月后，国大党两派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78 年 11 月，英·甘地发出“一切国大党人联合起来”，反对人民党的号召，在国大党正统派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进一步引起他们思想的波动。最后，工作委员会通过决议，就甘地夫人的号召进行讨论，并充分探索两党联合的可能性。经过四个月的探索，到 1979 年初英·甘地与斯瓦兰·辛格宣布同意两党统一，但不久英·甘地又推翻了这个决定。足见她提出“联合”纯粹是一个策略和手段，是想达到削弱对手的目的，并非真正想联合。

英·甘地以其老辣的政治手腕，再次把国大党牢牢地抓在手中，重新建立了其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

对待人民党政府，英·甘地也充分施展其政治手腕。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人民党内根本就无法弥合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英·甘地信奉政治上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信条。

1978 年 8 月，英·甘地到比哈尔邦访问。她听说领头反对她的人民党的精神领袖、大名鼎鼎的 J.P. 纳拉扬生病了，并已经心灰意冷，便上他那位于卡达姆昆的住宅去探望他。两人进行了长达 50 分钟的密谈。J.P. 纳拉扬深受感动。告别时，他向英·甘地祝福，祝她“前途光明，比她过去更加光明”。J.P. 纳拉扬的话曾引起广泛的议论。有人认为英·甘地已经把他争取过来了。当然，这只不过是人们的猜测。一个宦海沉浮几十年的老政治家是不可能在对对手访问过一次就倒向她一边的。不过，这也可看出英·甘地笼络人心的手腕。

在人民党政府中，要求惩办英·甘地，叫得最响的，莫过于查兰·辛格了。为了达到瓦解人民党的目的，即使是这样的人，英·甘地也不惜以一切手段去加以争取。1978 年 12 月 23 日是查兰·辛格的生日。那天他举行了一

次大规模的集会，一来表示隆重庆祝，二来也是为了显示他的力量。参加者主要是富裕农民，他们是他的势力的基础。当时，英·甘地仍在蒂哈尔狱中。她设法通过中间人向查兰·辛格送去了一束鲜花，以示祝贺。

后来，当英·甘地听说查兰·辛格因同德赛的矛盾日益加深而闷闷不乐地住进了医院时，她立即派一名使者前往医院探望，以她的名义再次送给他一束鲜花，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当使者告诉他，说甘地夫人只是怕在政治上引起种种猜测，才没有亲自来医院看他时，这位老人动了感情。他说：“她是我的女儿，我随时都欢迎她来。”

英·甘地只用了两束鲜花就把这个政敌争取过来了。当她宣布要支持查兰·辛格当总理时，后者更是感激涕零。

瓦解对手的策略看来施展得相当成功，英·甘地赢得民心的努力也颇有成效。

英·甘地下台四个月后的有一天，她获悉德里附近国大党的一位下级官员要举行婚礼，便想去参加，顺便看看老百姓见到她后的反应。尽管事先采取了保密措施，但当她一到那里，消息还是传开了。数以千计的人们从附近地区赶来，想看她一眼。看来，老百姓对她并无恶感，英·甘地暗想。她对重新赢得民心有了一点底了。

接着，英·甘地又去国大党控制下的西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保纳尔去访问。她从那格普尔向保纳尔进发，沿途不断有人高喊：“英迪拉·甘地，向前进，我们支持你。”她经常停车与集合在路旁的群众见面。每次见面她都是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几个月来因忧郁而导致的眼睛黑圈不见了。当听到有人说：“人们都渴望听到你的声音”时，她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她在保纳尔一共呆了三天，这三天大大增强了她复出的信心。

如果说英·甘地在保纳尔的访问成功算不上稀奇的话（那里仍处在国大党的控制之下），那么，她对位于人民党的根据地比哈尔邦的一个偏僻小村贝尔奇的成功访问，则充分说明民心又回到了她这一边。

1977年8月，贝尔奇村发生了一件针对哈里真（贱民）的暴行：一个以种菜为业的吉尔米种姓的首领带着一帮人枪杀并焚烧了11名哈里真，还强奸了一些哈里真妇女。这只是人民党上台后发生的许多起针对哈里真暴行中的一起。此类暴行在英·甘地当政时期并非没有，但在人民党统治时期却更加司空见惯和骇人听闻。其中的缘由在于人民党（尤其是查兰·辛格领导的民众党）的权力基础是几个中间种姓，如查特、雅达夫、阿希尔和拉杰普特。他们对哈里真恶劣的程度比起在传统上支持国大党的几个高级种姓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政权已落到人民党手中；在乡村，天下也似乎成了他们的天下，他们也就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哈里真。

贝尔奇血案对于任何一位想把自己打扮成穷人救星的政治家来说都是天赐良机。甘地夫人决不会错过。

8月13日晨，英·甘地从新德里乘飞机飞往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当时天下着雨。可仍有约1000人闻讯赶到巴特那机场，想一睹甘地夫人的风采，当然其中不乏想看看这位前国家首脑失败后的情形的人。飞机着陆后，英·甘地最后一个下飞机。当她走下舷梯时，她看到了这样一种情景：由于人群太密集，走在她前面的乘客不得不费劲地挤出去。这情景使她感到振奋。她原来料想此行是到人民党的老窝去，定会受到人们的冷遇，不料却受到了如此盛大的欢迎。

下飞机后，甘地夫人改乘汽车向贝尔奇村驶去。有些人不约而同地开着车跟在后面，形成了一个长长的车队。车队途经一个名叫比哈尔谢里夫的县城，英·甘地打算在此略作停留。消息传开后，不一会儿就来了一大群人，争着要看看甘地夫人。喧闹声此起彼伏。人们似乎都不愿失去这一十分难得的亲眼目睹昔日领袖的风采的机会——他们过去只能在电视上一睹她的芳容，或者是在收音机里听到她的声音。当好心的人们得知甘地夫人是要去贝尔奇村时，都劝她不要去，因为下雨，道路泥泞，汽车开不过去。但甘地夫人坚定地说：“汽车不能开，我们就走着去。即使走一个通宵，我们也要去。”人们见她执意要去，不好再加阻拦，只好在心里为她祈祷，祝愿她一路平安。

果然，出县城几英里后，道路渐渐变得泥泞起来。甘地夫人的吉普车陷进了烂泥。为把吉普车拉出来，有人开来了一辆拖拉机，但拖拉机也陷住了。“到贝尔奇村的旅行到此结束。”一位电视摄影记者以现场报道的口吻说道。

然而，倔强的甘地夫人爬出了吉普车，双手把莎丽提到脚踝以上，在烂泥中步行起来。见此情景，同行者和围观者无不为之动容。要知道，冒雨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走，有的地方还得趟过齐腰深的水，即使对年轻人来说已属不易，何况当时的甘地夫人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

越往前，路越难走。后来一位老大爷听到这个消息，把自己的大象牵来了，让她骑着前行。在人们的一片惊叹声中，英·甘地动作麻利地骑了上去。就这样，从吉普车上下来，一直又花了三个半小时她才到达贝尔奇村。

甘地夫人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来看望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人们，此举令贝尔奇村的哈里真激动万分。“英迪拉万岁！”“英迪拉是哈里真的救星！”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她再次亲自感受到她并未失去一切，只要她努力，她就能够重新赢得人民的爱戴和支持。

这几次旅行访问给了她充分的勇气和信心，使她进一步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到她曾经被选民们抛弃了的赖巴雷利选区去，看看那里的人们对她的态度。

从贝尔奇村一回到德里，她就马不停蹄地赶往赖巴雷利。在穿越选区的整个旅行过程中，她受到了选民们热情的欢迎和接待。与她同行的西方记者西蒙·温切斯特报道说，此行表明英·甘地的选民们已“在瞬间原谅了她”。

如果说，英·甘地的一连串旅行访问已经从正面表明她在人民中的形象已大有改观，那么，人民党对她实施的两次逮捕则从另一个角度检验了人民对她的爱戴程度。

1977年10月3日，英·甘地第一次被捕。消息传开后，她的支持者从四面八方涌来，不让警察带走她。后来，警车后跟随的支持英·甘地的车流又迫使警方不得不临时改变行车路线，不敢将英·甘地押往原定的哈里亚纳邦而只得折回德里。第二天上午10时，她被押往法庭受审。通往法庭的所有街道都被沸腾的人群阻塞了。这其中不乏手持黑旗，高喊“处死英迪拉！”的人们，但更多的人同情她，谴责人民党政府的“报复”行为；而且，他们的声浪显然盖过了前者的喧嚣。当法官宣布因缺乏证据而无条件地释放英·甘地时，法庭的旁听席上再次响起了支持她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1978年12月，人民党再次逮捕了已成为议员的英·甘地。但这不仅没有降低她的威信，反而使她成为受难的女英雄，赢得了人民的广泛同情，并增添了她的政治资本。在她短短一周的监禁期间，全国各地抗议之声不绝，为此而遭拘捕的人就达上万之多。

这种情形令人民党领导人感到十分吃惊，同时又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原以为英·甘地已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远失去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他们没有料到仅仅过了一年半载，这个昔日的“大独裁者”又成了人民的宠儿，而把人民从紧急状态下解救出来的人民党又将遭到他们的抛弃。

其实，这并非人民忘恩负义，而是人民党自作多情。他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刚刚发生的历史，就会发现，同是一个英·甘地，在短短三年半时间里也经历了从因第三次印巴战争的胜利而被人民奉若神明到被迫实行紧急状态乃至在大选中被人民所抛弃的巨大变化。

人民对某一个政治家或某个政治集团支持与否，并不取决于对他（她）或他们的偏爱程度，而是取决于这个政治家或政治集团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当英·甘地开展绿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印度的粮食危机时，当印度在她当政时期打败了巴基斯坦，提高了国际地位时，人民自然要支持她；而当英·甘地后来在政治上实行紧急状态统治，人民缺乏安全感和自由感，经济上她的一系列失误使人民的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时，当她纵容她的儿子桑贾伊胡作非为之时，人民自然要抛弃她。同样地，当人民党以“面包和自由”相号召来反对“独裁者”英·甘地时，渴望得到“面包和自由”的人民自然会支持它；而当人民看到人民党政府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只是一个多种政治势力的大拼盘时，当人民感到人民党除了会窝里斗外，根本不可能给他们带来足够的“面包”，“自由”也只不过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漂亮名词时，他们自然会对它感到失望，自然会想起英·甘地当政时期他们从她那里得到的种种好处，对眼前已成为一介布衣的英·甘地受人民党迫害的不幸遭遇持同情态度，转而支持她复出而抛弃人民党。其实，“百姓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党所未能悟彻的这个既浅显又深刻的哲理，早在1300多年前，中国唐朝的太宗皇帝就已经一语道破了。无独有偶，一个半世纪以前，在大西洋岸边的法国，有一个世纪伟人也深谙此理。他曾面对欢迎他凯旋归来的人海，对下属说，当历史把他送上断头台时，欢呼的也将是他们。这个人就是名垂青史的拿破仑。

已经成功地瓦解了人民党，并再度赢得了民心的英·甘地已经没有必要摆开架势同人民党一决雌雄了，因为矛盾不可调和的人民党已经在自取灭亡。

1979年，印度经济状况显著恶化。财政赤字增大，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农业生产因遭受特大旱灾而下降，工业生产停滞，物价如脱缰的野马，“是独立以来任何一个可比时期中上涨幅度最大的”。经济危机引起政局动荡。工人罢工此起彼伏，甚至连警察也开始闹事，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党开始失去民心。

人民党也失去了大垄断财团的支持。人民党所代表的主要是新兴农场主、富农和中小企业者的利益，因此，它所实行的经济政策限制了大企业的发展。对财团的最大打击是国家金融机构不给他们贷款扩大生产。工业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甚至发誓“要打断大工业家族的脊梁骨”。他提出凡是私营企业中国家金融机构贷款占其资金25%以上的由国家任命该企业的董事，大工业家族成员不得出任企业经理。他和钢铁部长帕特奈克甚至还提出要印度第一大财团塔塔财团的塔塔钢厂、塔塔机车工程公司和第二大财团比尔拉财团的印度斯坦铝公司收归国有，后因总理德赛的反对而未能实现。这使得大财团与人民党政府的矛盾激化起来。比尔拉财团祖孙三代攻击人民

党的经济政策违反了尼赫鲁所确定的“混合经济”原则。他们认为不发展技术先进的大企业而鼓励技术落后的小企业是“开倒车”，“将使印度经济倒退500年”。塔塔财团也攻击人民党的经济政策“含糊”，政府的声明“矛盾重重”。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党的内部矛盾再度尖锐起来。1979年6月23日，前社会党领袖拉杰·纳拉因退出人民党，掀起了一股强大的“退党倒阁浪潮”。在他的煽动和带动下，人民党议员纷纷退党，致使人民党政府在议会中失去了多数，成为少数派政府。接着，国大党正统派领袖恰范乘机对德赛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在这种情况下，德赛被迫于7月15日辞职。此后，争夺总理职位的斗争随之升级。在一片混乱中，总统雷迪在旬日之内先后要求恰范、看守政府总理德赛和查兰·辛格出面组织新政府。但恰范在议会里没有得到可以组阁的票数，德赛组阁的种种努力又告失败。英·甘地有条件地支持查兰·辛格出面组阁。这个条件就是要求新政府不再审理她母子二人与紧急状态有关的案件，但遭到查兰·辛格的反对。8月20日，在议会举行的对新政府的信任表决中，英·甘地提出撤销对查兰·辛格的支持。于是查兰·辛格仅仅只过了24天的总理瘾，便不得不提出辞职。

8月23日，总统雷迪宣布解散议会，于1980年1月的第一周进行人民院中期选举，要求查兰·辛格继续担任看守政府总理，直至选举结束为止。

在第七届大选前夕，印度国内形成了以英·甘地为首的国大党（英）、以贾格吉凡·拉姆为首的人民党和以查兰·辛格为首的民众党与以恰范为首的国大党正统派联盟三股政治力量竞争的局面。由于广大印度人民对人民党两年零四个月的混乱而无序的执政感到失望，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政治上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残局；大垄断资产阶级也需要安定的政治环境以利于自身的发展。人们不约而同地再次把眼光投向了英·甘地。

英·甘地以饱满的激情，旺盛的精力，再次投入竞选之中，她抓住人心思稳的心态，提出了“建立稳定和有效率的政府”的口号。与她过去提出的“消灭贫穷”相比，这一口号显得空洞无物，但这正是当时特定的情况下人们所需要的。

1980年1月6日，统计选票的工作刚开始才一个小时，形势就已明朗化。那个被认为已被“抛进历史垃圾箱”的女人又一次成为国家首脑。《印度时报》在头版刊出大幅标题：“英迪拉一路领先”。1月14日，英·甘地再次成为萨夫达尔路1号的主人。

英·甘地之所以能再度获胜，除了上述客观原因外，还有一些主观原因，这其中又有印度民众的某些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印度作家贾纳丹·塔库尔在其《英迪拉·甘地和她的权术》一书中曾对此作过独到而精辟的分析：

甘地夫人对付她的对手最有效的武器之一是意识形态的词藻。她总是能够揭露她的对手是“反动派”，而把自己打扮成保护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战士。自从1969年她首次分裂国大党以来，就一直使用这种手法。所有想当独裁者的人都跟希特勒一样，为了攫取权力，信誓旦旦地要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布拉马南德·雷迪曾说过：“只要甘地夫人遇到了困难，她就谈论起社会主义来。”

但是，连批评她最厉害的人们也承认，甘地夫人有很多长处。她是全国最有魅力、最老练的领导人。在她要显得和蔼可亲时，那谁都比不上她。人们常说，她可不是市井俗人，“她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女儿”。不断重

复这明显的事实意味着你不能把她和别人同等看待。事实上，她不是个单纯的政治家，她有点像女王。印度有着王公、王后的长期传统，连儿童故事也很少不以某个王公或王后或他们的子女作为开头的。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甘地夫人的有利条件当然要比其他人多得多。“未经开战，甘地夫人就胜利在先。”萨斯西·布拉塔写道。其实，如果甘地夫人、桑贾伊乃至尼赫鲁家族认为他们是天生的统治者，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有成千上万的人真诚地相信尼赫鲁王朝有某种超人的力量。1977年国大党倒台，尽管人们兴高采烈，但还是有许多人对甘地夫人的失败深感悲伤，似乎是一个女神败给了一名小鬼。

很多心理学家和民意测验专家们忽略了甘地夫人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这就是甘地夫人遇到不幸时会赢得人们的广泛同情，犹如同情一个遭流放的女王，一个受到本国臣民骚扰和折磨的女王。这种同情会使她在全国争取到很多选票，因为全国政治家中唯有她一个人在各地多少都有支持者。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一个领导人像甘地夫人那样拥有那么多的支持者，这是可悲的事实。她的优势还远不止这些。仅在竞选中，这个女人就是无与伦比的。比她年轻一倍的人都累垮了，而她还能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人们曾认为甘地夫人太脆弱了，经受不住政治生活的颠簸，连她的姑妈维贾雅拉克希米·潘迪特都这么认为，但是她已经使政界中最能吃苦耐劳的堂堂须眉都相形见绌。在同样长的时间里，查兰·辛格、耶·巴·恰范、贾格吉凡·拉姆，甚至更年轻的钱德拉·谢卡尔只能旅行5英里，在12次会上发表演说，而甘地夫人可以旅行50英里，至少在25次会上发表演说。跟随她在1978年酷暑季节去阿扎姆加尔竞选的人都会懂得我的意思。她在这种事情上是不可战胜的。一名记者回忆说，差不多在48小时内，她睡眠时间不到三四个小时。那正是五月，北方邦最炎热的季节，但她却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不停地开展工作。此外，她能吸引的群众也最多。为了一睹她的容貌，1.5万至2万名群众走出家门乃是家常便饭，而大多数其他领导人都需要经过好几天的准备才能动员这么多的群众。并非所有去看她的人都投她的票，但是这些人确实帮她创造了气氛。

大选中气氛是很重要的。人民院解散、宣布中期选举的那一天，她的支持者们都到处宣扬说她将稳操胜券，连算命先生和占星家都作这样的预言。算命先生和占星家当然有他们的星术为依据，但你如果问那些政客他们预言的根据是什么，他们往往会告诉你，是他们“本能的感觉”。关于她东山再起的说法不仅造成了一种气氛，而且也涣散了反对她的人的士气。甘地夫人的政敌表面上气壮如牛，但透过这层表面，就可以看出，他们大都胆小如鼠。

十二、在萨夫达尔路 1 号（四）

培养接班人

虽然在 1980 年的大选中，英·甘地派国大党以占人民院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选票获胜成为执政党，她本人也第四次荣登总理宝座，但她上台之初的执政地位远非巩固。执政党在议会联邦院中的力量还很弱小。在大选之前，在全国 22 个邦中，只有安得拉邦是国大党（英）唯一的执政邦。因此，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便成为英·甘地复出后的当务之急。

英·甘地和她的国大党首先通过对各反对党进行分化瓦解、策划倒戈等手段，先后推翻了国大党乌尔斯派执政的卡纳塔克邦与人民党执政的喜马拉雅邦和哈里亚纳邦的邦政府，将这几个邦的政权抓到自己手中。

1977 年国大党执政派大选失败后，执政的人民党将国大党执政派在大选中已被击败，但其邦政府任期尚未满的九个邦政府强行解散，在随后举行的新一轮选举中，人民党及其支持者在这九个邦中获得了胜利。这九个邦是人民党直接执政的比哈尔、拉贾斯坦、古吉拉特和中央邦、民众党执政的奥里萨和北方邦以及各地方性政党执政的马哈拉施特拉、旁遮普和泰米尔纳杜邦。这次英·甘地决定如法炮制，重演人民党故伎，于 1980 年 2 月 17 日宣布将上述九个邦的邦政府和邦议会解散，重新举行邦议会选举。同年 6 月初，选举正式举行，结果国大党（英）获胜，在总共 2200 多个席位中得到了 60% 的席位。除泰米尔纳杜邦以外，国大党（英）在其余八个邦上台执政。这样，国大党（英）控制了全国 22 个邦中的 14 个，并将这个优势一直保持到英·甘地去世时止。

同年 7 月 4 日，议会联邦院改选 50 个席位，国大党（英）获得 34 席。这样该党在联邦院的席位增至 123 席，由原来的少数变成超过半数（联邦院供选举的席位为 238 席）。1981 年 7 月，中央选举委员会裁决国大党（英）为正统派国大党。1984 年 3 月，联邦院举行两年一度的三分之一议员的改选，国大党（英）更是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修订宪法所需的三分之二绝对多数席位。当然，这是后话。

上述措施大大巩固了国大党（英）在中央和地方的统治地位。接着，英·甘地加紧进行培养接班人的工作。

早在紧急状态时期，英·甘地已决意要把小儿子桑贾伊培养成自己将来的接班人。她之所以作出如此决定，一来是出于血浓于水的亲情观念，二来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关键时刻，除了自己的儿子以外，谁都靠不住。这种认识是她经过多次亲身体会得来的。1975 年，北方邦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判决英·甘地在 1971 年大选中犯有选举舞弊罪，取消其议员资格。反对党抓住这件事穷追不放，欲逼其下台。英·甘地进退维谷，在辞职还是硬顶上拿不定主意。其时，唯有桑贾伊表现出超常的果断和魄力，说服母亲采取强硬手段，实施紧急状态法，从而保住了职位，硬是闯过了这一关。而党内的那些同僚，甚至连她一直视作心腹的贾格吉凡·拉姆之流不但不帮她排忧解难，渡过难关，相反乘机落井下石，争权夺利，等着她下台后取而代之。1977 年英·甘地下野后，也只有桑贾伊坚定地站在她一边，给她以力量和支持。桑贾伊还入木三分地向她母亲指出：“那批耗子（指英·甘地的同僚和部下）会从沉船上逃走。”果不其然，先是贾格吉凡·拉姆在大选前夕的关缝时刻

阵前倒戈，脱离国大党，另立山头；接着国大党的两任主席巴鲁阿和布·雷迪以及斯瓦兰·辛格、恰范等人在党内处处同她过不去，而这些人都是她的亲信。有的甚至刚被她扶上去马上就过河拆桥，如布·雷迪。这些惨痛的经历使得她认为只有自己的儿子可以信赖。至于说为什么她更看好小儿子而不是长子，唯一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是，桑贾伊对从政兴趣极为浓厚，可以说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而拉吉夫则几乎毫无兴趣。

老实说，作为未来的国家领导人，桑贾伊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人选。此君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他不学无术，仗势欺人，横行无忌；在党内搞唯我独尊，天王老子他第二，活脱脱一个“恶少”、“衙内”的形象。英·甘地偏要指定他为接班人，这不能不说是她的一个失误。

如果说，从整体上看英·甘地是伟大的，那么，她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的失误给这种“伟大”大打了折扣，她本人的形象也因此而蒙尘。是母性的溺爱使她执拗地走入了误区。

英·甘地在紧急状态期间曾将桑贾伊的“五点纲领”附在她的“二十点计划”后，以此向世人显示桑贾伊的重要性；同时开动电台、电视台、报刊等宣传机器大肆宣传桑贾伊，使其在国人面前频频亮相，以迅速提高他的知名度。英·甘地还让他负责组织青年国大党，以锻炼他的能力。很快，一帮指望靠他平步青云的同样是不学无术、胸无点墨的鸡鸣狗盗之徒聚集在他的周围。在桑贾伊看来，这些人有无本领无关紧要，只要对自己忠诚就行。这便是桑贾伊的用人标准。这帮人也的确合乎他的这个标准。他们几乎一无是处，除了对他死心塌地地忠诚以外。有个追随者曾这样说过：“如果桑贾伊让我把头伸进榨油机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照办。”即使在他母亲下野，他们母子双双落难的时候，这帮人也未曾离他们而去。令桑贾伊感到欣慰的是，就这一点而言，他们要比她母亲身边的那帮老奸巨滑、见风使舵的政客们强百倍。

1980年，英·甘地重新执政后，为给桑贾伊将来顺利接班铺平道路，扫清障碍，她置当时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于不顾，将主要精力放在排除异己、培植亲信上。此时，英·甘地的用人标准已明显地表现为任人唯亲，表现为对她母子二人是否忠诚。一些有真才实学但在他们看来不够忠诚的官员轻则受到冷遇，重则被摘掉乌纱帽；而另一些既无能又无德，只有一颗对他们“走狗般”的忠心的人却位居要职。

桑贾伊自己也很注意加强其权力基础。在他的母亲英·甘地筛选代表国大党（英）参加大选的候选人时，他将自己的150名铁杆支持者塞了进去，而且这些人居然几乎无一例外地“具备”了候选人资格。

如果英·甘地让桑贾伊进入内阁，那是易如反掌的事，没有任何人会表示惊讶或反对。但英·甘地不想这样做，她要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是别人而不是她在推动桑贾伊就任高位。这种以退为进、让官职来找她而不是她去求官职的策略她本人过去曾尝试过多次，而且每次都获得了成功。

然而，名不正则言不顺。总得给桑贾伊一个正式职位才行，以便让他那无边的、不明确的权力有所归属，同时也好让党内外的人们见了他有个称谓，叫“先生”或“少爷”总有点不伦不类。大概是出于这一考虑，英·甘地给了他一个亦虚亦实的头衔——国大党全印委员会秘书长。

1980年6月13日，重新执政已达半年的英·甘地带着她的爱子桑贾伊，在一群亲信的前呼后拥之下，乘车来到位于阿克巴大街的国大党（英）总部。

在那里，她正式任命桑贾伊为党的总书记，从而亲手将他送入了通往权力之巅的快车道。

早在紧急状态时期，桑贾伊在他母亲的扶植下，就已经成了一名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尽管什么头衔都没有，却是名副其实的“无冕之王”。上自内阁部长，下至各邦首席部长，无不争相讨他的欢心，无不以受到他的垂青为荣。他们对他就像对他母亲那样唯命是从。现在，桑贾伊更是权倾朝野，成了地地道道的“王储”。只要是他发出的命令，不管多么武断和愚蠢，文武百官们都得不折不扣地执行。

乐极生悲，这话一点儿也不假。1980年6月23日，也就是桑贾伊刚刚当上国大党（英）总书记后十天，这位“王储”突然心血来潮，想上蓝天过过开飞机的瘾。本来，桑贾伊以前也曾开过飞机，但由于他只是好玩而已，因此他的驾驶技术实在平平，开开普通飞机还凑和，可这次他想试试需要具备专门飞行技能才能驾驶的特殊型号的飞机，甚至还别出心裁地做翻跟斗的表演。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随着飞机一声怪叫坠入丛林，时年不到34岁的桑贾伊的身体顿时化作了尘埃。

噩耗传来的一刹那，英·甘地的精神几乎崩溃了。她青年丧母，中年丧夫，到了晚年，又痛失爱子，其悲痛的程度确非言语所能形容。这位一向以克制力极强著称的女强人这一次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竟然当众失声痛哭。当然，英·甘地毕竟是英·甘地，她控制情感的能力的确非同寻常，速度之快令人惊异。第二天上午，当她出现在办公室时，她已经是“腰板挺得直直的，眼睛中不含一滴泪水，显得镇定自若和要干事的样子”。

然而，这种镇定和自控只是一种假象，有刻意装扮的痕迹。这次失子对她的打击比以往哪一次打击都要沉重。她的内心深处如同被深深地刺了一刀，从此再也无法痊愈。她独自一人在家时，常常半夜里醒来寻找桑贾伊，或者为他而流泪。她显得疲惫不堪。她的老朋友普普尔·贾亚卡曾这样描述她：“脸上显出了老态，眼睛凹陷着，头发随意地拢向后面，走路时脚步沉重。”整整过了一年以后，就在普普尔·贾亚卡确信她已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时，英·甘地在给她的信中还出乎她的意料地这样写道：

你说我已经战胜了悲痛。一个人可以战胜仇恨、妒忌、贪婪及其他类似消极和自我毁灭的情感。然而，悲痛却是另外一回事。悲痛是不能忘却的，也是不可战胜的。一个人必须与之共存，接受它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对于桑贾伊的死，印度大多数公众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对老年丧子的英·甘地表示同情，这是一种合乎常理常情的同情；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桑贾伊死不足惜，反对党更为他从印度政治舞台上消失而松了一口气。桑贾伊是这个时代印度的一个“最危险和最邪恶的人物”，并非只有反对党才有这种看法。当有人从报上看到桑贾伊罹难的消息后，竟然禁不住大声说：“神拯救了国家。”

无论人们怎么看待桑贾伊，他的葬礼仍然极尽奢华和隆重，而且丧葬地点竟然被选在已被千百万印度人视作圣地的尼赫鲁的焚化处附近。然而，没有人敢出来阻止，因为桑贾伊的那帮铁杆追随者们执意要这样做。

呼啦啦，仿佛蒸馒头似地，全国一下子掀起了一股桑贾伊热。桑贾伊的塑像随处可见；以桑贾伊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学校、医院和体育馆星罗棋布于这个国家的几乎每一块土地；新德里办起了有关桑贾伊生平事迹的大型图片展览；国营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增加了宣传报道桑贾伊的播放时间，以期

使这位“印度王子”“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然而，这场人为地掀起的对死后的桑贾伊的个人崇拜有如一陣旋風，來得快，消退得也快，旋即便蕩然無存了。有人對這種現象感到迷惑不解。

其實，這場個人崇拜之火是死者的母親英·甘地自己掐滅的。因為她已決定起用長子拉吉夫。作為一名政治家，英·甘地更懂得人死不能復生的道理，對死者異乎尋常的崇拜既不可能讓次子復活，更不利於長子崛起。英·甘地要让公眾的注意力儘快從桑賈伊身上轉移到拉吉夫身上去。相對於桑賈伊的家喻戶曉，拉吉夫可謂鮮為人知。

與性格外向、咄咄逼人、酷愛政治、喜歡拋頭露面、出風頭的弟弟不同，拉吉夫性格內向，為人謙和，彬彬有禮，不喜歡拋頭露面，對政治也不大感興趣。從英國留學歸國以後，他既滿足於航空公司飛行員的工作，也滿足於與妻子兒女一起過平民般閑適平靜的生活。所以，當英·甘地起初要他棄職從政時，他頗有些猶豫不決。但至仁至孝的拉吉夫因不忍看到母親過於悲傷和失望，在1981年新年到來之際，終於下決心聽從母親的召喚。他放棄了他的工作，同時也脫下了他的夾克衫和領帶，換上了傳統的國大黨人的裝束：寬鬆的無領襯衫、長袍和一頂白色甘地帽。

對於英·甘地在次子死後起用長子的決定，敏感的知识分子頗有微詞。他們認為英·甘地此舉用意十分明顯，就是要讓與她有血緣關係的人掌權，印度正在演變成爲一個“王朝式的民主國家”。反對黨的批評更爲直接，他們譴責英·甘地正在把王朝式的統治制度強加給印度。然而，普通國民對此並不以爲然。因爲悠久的印度歷史所展示的、大量的神話傳說所敘述的，有許多是關於君主世襲統治的事情，這些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構成印度社會特征之一的種姓制度，使印度人從小就對職業世襲現象耳濡目染、司空見慣。馳名印度國內外的電影《流浪者》中的公式化的名言“法官的兒子總歸是法官，賊的兒子總歸是賊”，在他們看來就是那麼回事。儘管經過多少世紀的滄桑變遷，種姓制度已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但這個制度給人們造成的傳統觀念却是相當地根深蒂固。因此，無論上流社會怎樣評頭論足，在平民百姓看來，英·甘地要讓自己的兒子當她的繼承人是天經地義、無可厚非的，不值得大驚小怪。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公眾並不反對英·甘地起用長子，那爲什麼當70年代中期她決定讓次子作爲自己未來的接班人時，公眾輿論卻表示反對呢？這個答案要在桑賈伊和拉吉夫兩人的身上去尋找。平民百姓的認識是朴素的，也許甚至是表淺的，但往往包含着真理。他們要的是一个明君，而不是暴君。

在印度，任何一個人要想在政壇上出人頭地，都必須從當選人民院議員起步。根據憲法規定，部長必須爲國會議員。只有先成爲議員，才具備了當選部長乃至總理的資格。拉吉夫也不例外。

1981年5月，國大黨宣布拉吉夫爲該黨北方邦阿梅提選區的候選人。這個選區以前屬他的弟弟桑賈伊。爲了保證長子能順利當選，英·甘地頗費了一番心思。她先是帶着他到各地視察，讓他結識地方上的一些頭面人物和社會賢達，並儘快爲人民所熟悉。6月，補缺選舉正式開始，她又打破總理歷來不介入的慣例，親自到阿梅提選區爲兒子撐腰打氣拉選票。儘管她向選民們解釋說，她是以母親而不是總理的身份來的，但人們還是明白她此行的真正目的。她還爲兒子配備了一些干練的競選顧問。結果拉吉夫以84%的壓倒

多数选票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当选为人民院议员。在历时一个月的竞选期间，国大党为确保拉吉夫获胜花费了 2000 万卢比的经费，动用了 300 辆汽车，投入了 4 万名工作人员。真可谓不惜血本。

当选为人民院议员，标志着拉吉夫开始登上权力金字塔的基座。英·甘地既感到欣喜，同时认为这还远远不够。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儿子能够最终登上权力金字塔的塔尖。

如果说，英·甘地带着儿子到各地视察，让他多抛头露面是为他上台作舆论准备；利用尼赫鲁家族的声望和自己手中的权力帮儿子拉选票，是为他接班作组织上的安排，那么，她给他的肩上压担子则是为了在实践中对他进行培养，使他尽快地具备一个未来的国家首脑所应当具备的才干。

1981 年 2 月，英·甘地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集会，以支持政府的农业政策，反击反对党在一些邦里组织农民搞反政府的活动。她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刚刚决定从政的拉吉夫。拉吉夫在其顾问们的帮助下，调用了 130 列火车，从全国各地把 200 万农民运到首都新德里，安顿在市内外 27 个巨大的宿营地的帐篷里，免费供应食宿。这次集会因耗资巨大受到了反对党的责难，但从政治角度看，集会组织得相当成功。当甘地夫人走上临时搭起的高台时，人群中欢声雷动，“英·甘地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在主席台的背后和两侧，由于事先架设了闭路电视，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人们都能看到总理的形象。几百个高音喇叭把英·甘地的声音传送到首都的四面八方。反对党的活动完全被这次印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会之一所压倒。当人们通过新闻媒介知道这次活动都是由拉吉夫主持组织的以后，拉吉夫一下子成了妇孺皆知的人物。

1982 年 11 月 19 日对印度人来说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既是他们的女总理 65 周岁华诞，也是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亚运会开幕的那一天。亚运会的成功与否对英·甘地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印度的国际声望。英·甘地觉得这也是锻炼儿子的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便将亚运会从筹备、建造场馆到赛事结束的全部事宜交给拉吉夫去办。这次印度历史上盛况空前的体育盛会开得很成功。当一家杂志的主编向英·甘地表示祝贺时，女总理却乘机为儿子扬名。她说：“为什么要向我祝贺呢？应该向拉吉夫祝贺，这一切都是由于他的缘故。”

英·甘地还将自己的一部分日常工作直接分给拉吉夫去做，甚至还让他参与党政方面的重大决策。拉吉夫当上议员后，英·甘地经常让他代表她到各地视察，接见群众；而且告诉党政要员们遇事向她请示汇报或要求见她，应事先通过拉吉夫。

1983 年 2 月 2 日，38 岁的拉吉夫被任命为国大党（英）总书记、主持国大党（英）的日常工作。至此，拉吉夫在印度已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号人物，英·甘地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基本完成。

经济政策调整初见成效

1980 年英·甘地重新上台后所面临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世界石油价格暴涨，通货膨胀加剧，电力、煤炭、钢铁严重短缺，运输紧张，干旱严重。1979—1980 年度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 4.8%；农业萎缩，粮食减产 17.1%；工业生产下降了 1.4%；通货膨胀率达 22%，贸易逆差逾 65 亿美元。在这政

府更迭之际，大财团希望政府对以往的工业政策进行调整，实行更加现实的工业政策，取消对私人资本的限制。

在这种形势和背景下，英·甘地果断地停止了人民党政府制订的自1978年开始实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决定重新制订“六五”计划（1980—1985）。1981年2月计划由议会批准实施。新的“六五”计划对经济作了带方向性的调整，强调农业在各项政策和计划中的优先地位，并围绕能源转换和节约能源进行工业结构的调整。计划总投资为17221亿卢比，其中公营部分投资为9750亿卢比。能源、农业的投资分别从“五五”计划的26.2%和21.7%上升到27.2%和25.4%，而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则分别从“五五”计划的18.7%和17.6%下降到15.4%和12.7%。私营部门的投资比重由“三五”计划的36%、“五五”计划的45%上升到“六五”计划的47%，几乎占计划总投资的二分之一。这表明印度经济发展战略从“六五”计划开始，已从片面地发展重工业转向工农业并重，从强化国家垄断资本转向鼓励私人垄断资本，放宽了对私人垄断资本的限制，扩大了私营经济成分在计划投资中的比重。“六五”计划强调要把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作为今后若干年的战略任务来抓，同时提出要特别注意电力、煤炭和运输部门的需要，使经济发展不致因这些方面的不足而受阻。为此，英·甘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这些措施主要是：第一，投资430亿卢比，用于大力开采和发展国内石油资源，使石油产量从1979—1980年度的1177万吨增至1984—1985年度的2160万吨。重点放在孟买浅海石油的开采上。第二，投资2870亿卢比，用于扩大煤炭生产，并逐步将能源消费结构由石油转向煤炭。煤产量计划到1984—1985年度达到1.65亿吨。第三，投资1926.5亿卢比，用于加速发展电力。充分利用水力资源，把它作为仅次于煤的替代能源；热电站向大型发展，设在煤矿附近；同时进一步发展核电。

其他优先发展的工业还有钢铁、水泥、化肥及电子等。“六五”计划特别强调印度适合发展电子工业，因为它劳动密集程度高。1983年英·甘地政府实行促进电子工业发展一揽子措施，旨在降低投入费用，鼓励企业扩大生产和达到合理规模。1984年，政府又颁布计算机政策，促进计算机的生产和推广应用，以提高各部门的生产和工作效率。

英·甘地政府的经济政策调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放松对私人垄断资本和外资的控制。除在“六五”计划中提高私人资本投资比重外，1980年的工业政策“悄悄地”放松了1956年工业政策决议对私营企业的限制，允许大垄断财团向铝、机床、药品、化学、电子和重型电力设备等工业投资，允许私营企业在5年内自动扩大生产能力50%。无需政府批准的工业由15种增加到34种。以后又陆续向私营企业开放了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对外国私人投资限制的放松主要表现为扩大了其投资的领域。第二，促进小工业、乡村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人民党政府也曾实行过这项政策，但与其不同的是，英·甘地的目的是要加强大中小型工业之间的联系。第三，改善国营企业管理。措施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强对国营企业的监督；对长期亏损的企业进行整顿等。

“六五”计划执行的结果，经济增长率达5.2%，工业增长率为5.5%，低于8%的指标。中国学者孙培钧认为工业方面的具体成就及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能源形势有所改善，特别是原油产量大幅度增加。原油产量由1980—1981年度的1050万吨增至1984—1985年度的2960万吨，超

额完成“六五”计划规定的指标。煤炭产量为1.474亿吨，虽未完成指标，但已打破长期在1亿吨左右徘徊的局面。由于煤质差和设备利用率低，电力仍落后于需要。此外，改变能源消费结构的目标未能实现，计划应予降低的石油比重不仅未降下来，反而有较大幅度上升。第二，电子、化肥、水泥等工业生产大幅度上升。电子产品的产值由1981—1982年度的92.5亿卢比增至1983—1984年度的148亿卢比。1984—1985年度的266亿卢比，年平均增长率达40%。化肥产量由1979—1980年度的298.3万吨增至1984—1985年度的518万吨，增长了85%。由于煤质差和电力供应不足，钢铁工业发展缓慢。纺织工业停滞不前。第三，从整体上看，中央直属国营企业已经扭亏为盈，但病态企业也不少。

农业方面，英·甘地政府一方面继续推广绿色革命，另一方面大力推行农村综合发展计划。

由于种种原因，印度绿色革命在经过了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后，到80年代发展势头有所减弱，农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减慢。英·甘地第二次执政时期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是粮食产量在1983—1984年度达到了1.524亿吨的高峰，此后四年都未达到这个水平。

严格说来，农村综合发展计划的“发明权”应属人民党，它开始实施是在1978年。这项计划的目的是减轻农村地区的失业问题，对农村贫困户提供资产（生产手段）和农业投入，帮助他们脱贫。1978—1979年度有2300个发展区实行这项计划，规定此后每年扩大300个发展区，到1988年推广到全国。1980年初英·甘地重新执政后，为了履行竞选诺言，加强农村扶贫工作，在“六五”计划中规定尽可能把一些农村发展计划并入农村综合发展计划，使之成为最主要的扶贫措施，并决定提前八年在全国推广这项计划。

调整后的农村综合发展计划于1980年10月初在全国5011个发展区同时实施。一般情况下，印度每个发展区大约有2万户，其中1万—1.2万户处于贫困线以下。这项计划规定，在“六五”计划期间，每个发展区每年扶助600家最底层的贫困户，其中400户通过农副业，100户通过农村工业，100户通过服务业加以扶助。这样，按计划规定，5年内全国5011个发展区可扶助1500万个贫困户或7500万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农村居民。国家在5年内将拨专款150亿卢比，用于这项计划。每个发展区均可分得350万卢比，用以对选定的贫困户进行补贴。“六五”计划还规定在5年内由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联合对农村综合发展计划提供300亿卢比的信贷。实际执行结果，“六五”期间用于农村综合发展计划的总开支和金融系统所提供的信贷总额都略超过了计划原定指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有所下降。

农村综合发展计划的执行结果并不很理想。计划扶助的对象往往大多并不是农村中最贫困的穷人；而扶贫机构的腐败常常使大部分资金落入了农村官吏和富人的腰包。

在高科技领域，在英·甘地重新执政时期，印度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印度的高级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人数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早在1974年5月，印度便成功地爆炸了一个地下核装置。1975年4月，印度用苏联的发射装置成功地发射了自行设计制造的名为“圣使号”的重达360公斤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80年7月18日，印度用自制的运载火箭SLV-3号把自行设计并制造的一颗代号为RS-1的重量为35公斤的人造卫星成功地射入轨

道。印度在取得这一重大的科技成就时，距桑贾伊去世仅三周时间。尽管英·甘地本人尚未从丧子的悲痛中恢复过来，但当她在得知这一喜讯时，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她在议会中宣布，这是“印度和印度科学史上的一个伟大日子”。

此后，印度科学家在英·甘地政府的领导下，与一些发达国家的科学家进行合作，在高科技领域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1981年，印度同法国合作，成功地将一颗命名为“阿里亚娜旅行者号”的有效负荷试验通讯卫星送到预定位置。同年11月，印度又与苏联合作，发射了一颗重达436公斤的“巴斯卡拉2号”通讯卫星。1983年2月，印度又用自制的推进装置发射了一颗重量为41公斤的RS-D-2号卫星。1984年4月，雷克希·沙马空军少校与苏联宇航员一起登上苏联宇宙空间站“礼炮7号”，成为印度第一位宇航员。英·甘地认为这开辟了印苏友谊的新领域。总之，进入80年代以来，印度的高科技领域可谓捷报频传。

英·甘地还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她重新上台后破例兼任国防部长。这种做法非同寻常，既说明她对国防建设的高度重视，同时说明她对印度周边地区特别是印度洋的安全状况趋于恶化表示关切。出于对美国决定用尖端武器重新武装巴基斯坦的担忧，她认为印度应购置必要的武器，在数量上要超过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的武器。为此，印度从苏联买来了米格-29战斗机、T-27坦克、装甲车等先进武器装备，还进口了法国的幻影战斗机、英国的海上猎人飞机和联邦德国的HDW潜艇。在向西方发达国家购买和引进先进武器装备的同时，英·甘地还强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科学技术。为此，她增加了国防开支，以加强先进武器装备的研制。她特别重视发展核动力军舰和潜艇。

“我们的政策是不结盟”

印度独立后，一直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不结盟思想最初是由尼赫鲁提出来的。1946年9月7日，尼赫鲁作为印度临时政府首脑，在发表广播讲话时指出，要“尽可能地避开互相敌视的大国政治集团”。这里，尼赫鲁虽然未直接使用“不结盟”这个词，但却为这项政策定了基调。50年代初，当时的印度外交部长梅农开始在联合国第一次使用“不结盟”一词。这一概念开始使用时仅指不参加大国军事集团，后来则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还包括与一切国家和平友好相处，反对帝国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国际合作等。不结盟已成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

英·甘地上台后，继承和发展了尼赫鲁的不结盟思想和政策。她本人对这项政策也曾多次作过精辟的阐述。在70年代初，她曾这样说：

印度的外交政策是我们当前利害关系的反映，也是多少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抱有的社会准则的反映。我们不受一种为保护海外领地和投资，划分势力范围和建立封锁线而制订的外交政策的传统概念所束缚。我们对输出意识形态不感兴趣。我们首先关心的是使我们的独立不受任何侵害。因此，我们不能依附任何强国，不管它是多么富有，多么强大。……在紧接着战后年代出现的两极世界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拒绝参加任何集团。他决定保持不结盟政策，作为维护我们的独立和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一种手段。不结盟的含义既不是不卷入，也不是中立。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自由判断和自

由行动的一种主张。对于任何一件重大的论争，或者为了支持正义事业，我们决不含糊地表示我们的观点。

在《甘地夫人自述》中，她说：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不能同它的对内政策脱离开来。……什么是我们的外交政策呢？有的人用“不结盟”一词来表达我们整个的外交政策。我们有点不那么拘泥于“不结盟”这个词的含义，也就是说，我们主张独立地判断一切问题。我们不希望同任何集团或任何国家拴在一起。

1983年3月，第七届不结盟首脑会议在新德里举行，英·甘地当选为本届不结盟运动主席。在开幕词中，她全面地论述了印度的外交政策和不结盟运动的方针。她说：

仅仅在35年前，印度人民还处于外国的奴役之下，他们对自己的事务没有发言权。印度打碎殖民主义的桎梏而取得独立以后，立即实行不结盟原则。反对帝国主义仍然是我们看待世界事务的一项重要准则。我们不能允许我们自由判断和行动的权利受到丝毫的侵犯。我们和任何国家集团都没有冲突。但是我们仗义抨击非正义。

我的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1946年执掌印度政府时，宣布印度决心“远离彼此对立而结盟的集团。此类集团过去已经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今后可能会触发引起更大灾难的战争”。后来他又进一步阐明：“一旦失去对外关系的控制权由他人来支配，就会在相应的程度上和范围内丧失国家的独立性，……所以我们的政策不仅要继续远离各结盟集团，而且要尽量为友好合作开辟道路。我们在友好的基础上和全世界交往。”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取得自由，相信和平共处和希望摆脱军事同盟的国家也不断增多。这些不结盟的国家很自然地会集合拢来，目的不是要成立另一个集团，而是为了通过一个道义和政治运动来为千百万受剥削的人民大声疾呼。

我们运动的参加者，已经以贝尔格莱德会议时的25国扩大到了目前的100个国家，证明不结盟运动是符合各大洲人民深切体会到的需要的。

它的深远意义不是我们所拥有的师团数目或以兆来计的破坏力量度的，而是表现在我们渴望和平和自由、发展和国际正义的强烈愿望……

渴望和平是普天下的共同要求，即使是在制造核武器的国家和部署核武器的国家中，广大人民也是渴望和平的。不结盟运动是历史上最大的和平运动。不结盟运动欢迎人民群众高涨的自发运动，但是一些国家的政府还在坚持宣扬、实施和寻求相同

的战略利益、势力范围、实力平衡和保护关系，而这正是人们记忆犹新的过去的圣权利理论的翻版。

不结盟就是国家独立和自由。它主张和平及避免对抗。它的目的是摆脱军事同盟。它的含义是国家之间的平等以及国防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民主化。

它要求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世界性合作以促进发展。它是承认及保存世界上各种差异的策略。

让我们再次宣布：我们相信独立、发展、裁军及和平是不可分割的，重申我们继续忠于作为不结盟基础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以及和平共处。……

毋庸置疑，英·甘地关于印度不结盟外交政策的阐述的确精彩，但她执行起来却并不死板，正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不那么拘泥于‘不结盟’这

个词的含义”。其外交风格是灵活而果断、强硬而务实，一切以维护印度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尽管不结盟政策的基本点是不加入任何军事集团，但如果国家利益需要，英·甘地是不惜同某个大国套近乎的。因此，英·甘地的外交政策落脚到一点上，就是利用一切外交机会尽可能多地为印度谋取实惠。

细心的读者也许还记得，早在 1955 年英·甘地陪同她的父亲尼赫鲁访问苏联时，她那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就已初显端倪。尼赫鲁那次访苏的目的是希望苏联能够对印度的重工业和基础工业提供经济援助，但由于他生

性高傲，求人之事终难启齿。英·甘地却不管那么多。

她在父亲与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会谈时，找个机会提出了这个令尼赫鲁感到尴尬的问题。后来这个问题被列入了议事日程，并最终得到了解决。

英·甘地上台执政后，她的灵活而果断、强硬而务实的外交风格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于当时印度的粮食危机十分严重，为了得到美国的小麦，她不惜屈服于美国的压力，降低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批评调子，将卢比大幅度贬值。但当她发现在作了这些“友好的表示”

后，“约翰逊总统还是没有签字批准把小麦运来印度”

时，她便马上把对美政策来了一个 180°的大转弯，加大力度谴责美国对越南的轰炸行径。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英·甘地在谋求美国的支持而不得的情况下，转而寻求苏联的支持，并与之签订了为期 20 年的《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按说这个条约带有军事结盟性质，有损于印度的不结盟形象，但为了印度的国家利益，英·甘地全然不顾。

1980 年英·甘地重新上台后，在外交方面基本上保持了她过去的风格，同时又对整个外交格局作了某些调整。具体说来，就是一方面将对苏关系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力图改善和加强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还注意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1979 年 12 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全世界为之震惊。许多国家都对苏联这一恃强凌弱的侵略行径表示谴责。英·甘地政府一方面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另一方面又为苏联辩解和开脱。1980 年 7 月，为了在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上与苏联的立场保持一致，英·甘地政府又宣布承认由越南一手扶植起来的韩桑林傀儡政权。在这两个问题上，英·甘地明显背离了她一再标榜的不结盟政策。

英·甘地为什么宁愿冒受国际社会舆论谴责的风险也要竭力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呢？这是因为英·甘地政府在同苏联打交道的过程中实实在在地得到了实惠。英·甘地尤其对 1971 年《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给印度带来的好处记忆犹新。过去十余年中，苏联一直是印度最大的军事援助国。70 年代末，印度购买的军事装备有 70% 来自苏联。此后印度虽因实行军事装备来源多边化政策，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的比重有所下降，但直到 80 年代中期，这个比重仍占 60%。据有关材料，1978—1982 年间印度进口的军事装备达 36 亿美元，其中仅来自苏联的军事装备价值就达 28 亿美元。苏联还是印度最大的经济援助国和贸易伙伴国之一。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主要集中于重工业。80 年代初，由苏联援建的工厂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占印度重型机床产品的 80%、电机的 60%、钢的 40%、石油的 30% 和发电量的 20%。印苏贸易发展也很迅速，到 80 年代初，双方已签订了五个长期贸易协定。贸易总额从 1954 年的 1730 万卢比上升到 1982 年的 317 亿卢比。

自从英·甘地在1966年在寻求美国对印度粮食援助的问题上受了约翰逊总统的耍弄后，在她执政的前期，印美关系一直处于冷淡状态，在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更是降到了冰点。1972年尼克松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印美双方都显露出改善关系的意向。1974年10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印，勾销了印度欠美国的116.4亿卢比(约合20亿美元)的债务，两国关系开始解冻。但好景不长。由于美国恢复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英·甘地政府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两国关系出现反复。

1980年英·甘地复出后，表示愿意改善两国关系。1981年10月，英·甘地在坎昆会议期间同美国总统里根会晤，双方表达了改善关系的愿望。1982年7、8月间，英·甘地访问美国，取得了一些具体成果。例如：美国答应向由其援建的西印度塔拉普尔核电站供应核燃料；恢复印度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年度会晤制度；在科技领域扩大合作；美国还同意支持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不减少对印度的援助；答应向印度出售武器装备。英·甘地此次访美是近年来调整外交格局的重要一环。1984年5月，美国副总统布什访问印度。同年7月，印度陆军参谋长瓦迪亚上将访问美国。两国高级领导人的频频互访，表明印美关系已有了明显的改善。美国已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在继续同苏联保持传统友好关系，注意改善同美国的关系的同时，印度还积极同其他发达国家如英、法、德、日等发展关系，加强合作，尤其是高科技领域内的合作，以谋求援助来源多边化。

这一时期的印中关系有所松动。本来，印中关系在历史上一直都是不错的。古代中国人曾把印度看作是西天极乐世界、净土，法显、玄奘、义净等中国高僧到西天取经的故事至今还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在近代，印中两国人民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外国侵略者，曾相互支持。抗日战争时期，柯棣华大夫所在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曾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作出过不朽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的壮丽诗篇。印中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

1959年，中国发生了西藏上层集团的叛乱事件，印中边境也开始发生纠纷，两国关系开始恶化。1962年的边境战争使两国关系降到了冰点，两国关系仅维持在代办级而未断交。然而，两国人民不愿相互隔绝。1969年，英·甘地曾表示要改善印中关系。1970年5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各国驻华使节时，对印度驻华临时代办希拉米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向印度发出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明确信号。十天以后，印度很快由希拉米向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转达印度政府对毛泽东“五·一”讲话的反应，说如果中国同意，“印度准备开始对话”，“着手共同讨论使我们两国之间的全部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步骤”。但是，由于印中两国还未从根本上做到相互信任，加上随后发生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访华和1971年的印巴战争等一系列事件，两国为改善关系所作的尝试胎死腹中，印中两国关系继续处于僵持和冷淡状态。直到1976年才出现新的转机。这一年，两国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英·甘地重新上台后，开始积极谋求同中国改善关系。1980年2月，英·甘地赴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参加铁托总统的葬礼，见到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双方同意恢复中断了的印中对话。此后，印中两国开始就边

界问题这个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进行谈判，但因双方分歧较大，经过若干轮谈判，都未获得实质性进展。中国方面提议，在边界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可以把它挂起来，先处理较易处理的问题，发展两国经贸和技术合作，增进感情，待时机成熟时再解决边界问题，印方则坚持，不解决边界问题。印中关系便难以获得实质性发展。1981年，中国外交部长黄华访问印度，曾代表中国政府邀请英·甘地总理访华，以便寻求双边关系获得突破的途径，但印方提出要待边界谈判获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出访，致使两国最高领导人会晤未能实现。1982年，英·甘地的口气有所松动。她曾对印度首席谈判代表说，关于印中边界线，她打算最终由她本人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一起来划定。

但到了1983年，由于印度国内形势急剧恶化，英·甘地已无精力处理外交事务，她不得不倾全力应付国内问题，以致印中边界谈判变得流于形式。也许她是打算待国内局势稳定下来，赢得了下次大选后再来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一起来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然而，她最终未能见到邓小平，便死于乱枪之中。没有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使印度同它最大的邻居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也许是英·甘地最大的遗憾之一。不过，她的遗憾已多少为她的儿子和继承人拉吉夫·甘地所弥补。她去世四年后，拉·甘地访华，就包括印中边界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同中国领导人交换了意见，使印中关系迈出了一大步。英·甘地若九泉有知，也该感到欣慰了。

英·甘地还注意同邻国改善关系，但步子迈得不大。主要有两点原因。

首先，印度同南亚各邻国之间存在着一些影响关系发展的障碍。影响印度同巴基斯坦关系的主要障碍是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印巴分治后两国曾为此爆发过三次战争。这个问题至今都未得到解决，致使两国在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困难重重。

影响印度与斯里兰卡关系的主要障碍是泰米尔人问题。斯里兰卡最大的民族是僧伽罗人，最大的少数民族是泰米尔人。这些泰米尔人是历史上来自南印度的移民。为争取民族自治，泰米尔人一直在同僧伽罗人进行斗争。由于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与南印度的泰米尔人属于同一种族，所以后者对前者有一种天然的同情。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一旦牵涉到政治就变得复杂化了。在印度的内部政治斗争中，民族问题或跨界民族问题往往起着巨大的作用，因为许多政党为了在竞选中争取选票，常常有意煽动民族情绪或者利用民族间的矛盾和斗争。1983年7月，斯里兰卡爆发了大规模的僧泰民族冲突。其时，在与斯里兰卡隔海相望的南印度泰米尔纳杜邦，执政的是从德拉维达进步联盟中分裂出来的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该党在政治上与国大党（英）结盟。其反对党德拉维达进步联盟本来就对它不满，便利用斯里兰卡的僧泰民族冲突“将”它的军，并呼吁中央政府对斯进行干预，弄得前者十分被动。英·甘地当时正在筹划如何赢得即将到来的1985年大选。她刚在半年前失去了国大党（英）在南印度的两个基地——安得拉邦和卡纳塔克邦，经不起再失去泰米尔纳杜邦。所以，她虽然拒绝对斯里兰卡的民族冲突进行干预，一再保证尊重其领土完整，却对斯里兰卡泰米尔武装分子在印度建立训练营地等反政府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任他们在印度收集武器运往其国内基地贾夫纳半岛。这引起了斯里兰卡政府的强烈不满。

影响印度与尼泊尔关系的主要障碍是移民问题。根据1950年签订的《印尼和平友好条约》，尼印边界是开放的。但实际上它对印度人比对尼泊尔人

更为开放，据说在大吉岭一带有好几个检查站不允许尼泊尔人通过。尽管两国移民数量大体上差不多，各有数百万人，但由于两国的幅员、人口和经济实力等差别过于悬殊，同样数量的移民对印度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尼泊尔这样一个小国来说却难以承受。尼泊尔的经济本来就很难，大量印度移民的涌入，更加重了尼泊尔的经济负担。另外，来印的尼泊尔移民多是苦力和仆役，而去尼的印度移民则多是商人、企业家和有一技之长者。这些人竞争力强，自然会与尼泊尔人争饭碗，使尼泊尔本来就严重的失业问题更加严重。这自然引起尼泊尔人的不满。此外，两国在贸易过境、边界标定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

影响印度与孟加拉国关系的主要障碍是移民问题和恒河河水分配问题。由于历史原因以及 1971 年东巴危机的影响，有数十万孟加拉移民流入印度阿萨姆邦。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阿萨姆邦曾发生驱逐外来移民（主要是孟加拉移民）的运动。到 1983 年初，这场运动演变成了导致数千人丧生的种族大屠杀。为了阻止孟加拉移民继续流入印度，印度决定在印孟边界修筑铁丝网，并于 1984 年正式动工。此举伤害了孟加拉国人的自尊心，而移民问题也并未因此而得到解决。关于恒河河水分配问题，虽然两国进行过多次讨论，并曾达成一项协议，但也未得到根本解决。

其次，南亚各小国都对印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疑惧心理。这与印度的区域外交政策有关。长期以来印度总是以南亚地区的龙头老大自居，动辄对各邻国进行武装的或非武装的干涉，如印度曾要求尼泊尔与它保持“特殊关系”，要求不丹“在对外事务方面接受印度政府的指导”。尤其是英·甘地政府出兵肢解巴基斯坦和 1975 年公然吞并锡金，更是把南亚各小国震得目瞪口呆。如果说民族间的猜忌和不信任在过去主要存在于印巴之间，那么从 70 年代开始已扩展到除马尔代夫外的印度所有的南亚邻国。除巴基斯坦外，尼泊尔和不丹的疑惧心理最甚，因为它们的处境与锡金相似。看来，英·甘地政府要想真正同南亚各邻国改善关系，必须作出切实的努力来消除它们的疑惧心理。

不过，在英·甘地的第二执政期，印度同其各邻国的关系毕竟有所改善。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在南南合作浪潮的推动下，南亚各国已开始酝酿开展区域合作。关于南亚区域合作的设想最初是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提出来的。在与南亚各国政府进行初步磋商后，齐亚·拉赫曼于 1980 年底正式提出了《孟加拉国关于地区合作的倡议书》。1981 年 4 月，南亚七国外事秘书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集会，研究本地区合作问题，迈出了南亚区域合作运动的第一步。会议确定了农业、农村开发、电讯、气象、卫生与人口控制等五个可能进行合作的领域，并成立了相应的研究小组。此后两年内，七国外事秘书又先后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和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举行了三次会议，研究和制订地区合作的统一行动计划，为七国外长会议创造条件。1983 年 8 月，南亚七国外长在新德里召开首次会议，通过了《南亚地区合作宣言》和《南亚地区合作统一行动纲领》。《宣言》规定南亚区域合作的目的，是“加速经济发展，促进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领域中的积极合作，在国际论坛中加强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合作以及同其他国际的和区域的组织进行合作”。此后，七国外长为召开七国首脑会议和进一步完善地区合作组织于 1984 年 7 月和 1985 年 5 月分别在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和不丹首都廷布举行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1985 年 12 月，南亚七国首脑会议在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举行。会议通过了《达卡宣言》和《南亚地区合作联盟宪章》，宣告了南亚地区合作联盟（简称南盟）的正式成立。这件盛事虽然不是发生在英·甘地执政时期，但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七国所进行的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大多是在她的任期内完成的。因此可以说，英·甘地对南盟的成立功不可没。

十二、最后的岁月

错综复杂的印度社会

如果将政治家进行一番归类的话，英·甘地也许与美国总统肯尼迪、埃及总统纳赛尔、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等人属同一类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领域往往是光彩照人，相形之下，在内政方面却显得有些黯然失色。

英·甘地复出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使印度国内的政治局势一度趋于稳定，社会经济状况也略有好转。然而好景不长，不出一年工夫，形势便开始发生逆转，最终失去控制，致使一代女杰命丧黄泉。

有人说，这场悲剧与英·甘地的政策失误有关。这话不无道理。然而，这仅仅是她个人的过错吗？

治国安邦确非易事，治理印度这样一个国家则更难。有人说，在印度，如果一个政治家能够执政 10 年，就已经相当不简单；若超过 10 年，则可称得上奇迹了。倘若此言不谬，英·甘地和她的父亲尼赫鲁堪称奇迹的创造者。她本人执政已达 15 年之久，尼赫鲁执政时间更长达 17 年。而印度独立后的其他领导人执政很少有超过 5 年的，最短的只有十几天。

印度难以治理，难就难在印度社会委实太复杂，这主要表现在人种驳杂、民族众多、语言复杂、宗教教派繁多、种姓制度盛行、妇女问题突出、黑钱活动猖獗以及犯罪现象严重等方面。

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来形容印度，一点儿也不嫌夸张。无论就国土面积，还是就人口数量而言，印度无疑都可列入世界大国的排行榜。到 1981 年时，印度人口已近 7 亿。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还找不出第二个国家在人口数量上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印度不仅人多，人种也极为驳杂，素有“人种博物馆”之称。同为印度人，外貌却是那般不同。有的身材高大，皮肤白皙，若混入欧洲人中，足可以假乱真。英·甘地年轻时就曾被误作欧洲人；有的身材五短，皮肤黝黑，与非洲人没有多少区别，如南印度沿海的某些居民。印度人种如此驳杂，有其历史原因。从公元前 2000 年代开始，一拨又一拨的外族人如雅利安人、希腊人、大夏人、塞种人、大月氏人、匈奴人、阿拉伯人、突厥人、阿富汗人、蒙古人及欧洲人等，便追波逐浪似地相继涌到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的来了后不久又回去了，有的却住了下来，与当地土著人融合、同化，形成了各种血统混杂的人种类型。印度人种驳杂到了这种程度，以致极专业化的人类学家要想从肤色、身材、脸色、头、鼻指数、毛发形态乃至血液类型等角度对印度居民进行人种学分类，都成了一件极为困难和复杂的工作。

人种的驳杂造成民族众多。印度人口在 1000 万以上的大民族有印度斯坦族、比哈尔族、泰卢固族、孟加拉族、马拉塔族、泰米尔族、古吉拉特族、马拉雅拉姆族、卡纳塔族、奥里雅族、旁遮普族、拉贾斯坦族和阿萨姆族等 13 个。他们占印度总人口的 94% 左右。余下的 6% 为部落民，他们分属 300 多个部落，人口从几百万人到几百人不等。其中人口最多的比尔人超过 500 万人，最少的安达曼人只有几百人。印度各民族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宗教信仰各异。有的享受着现代社会文明所能提供给他们的一切，信奉印度各主要宗教；而大部分部落民才刚刚踏进文明的门槛；有一小部分部落民

如梅加拉亚邦的卡西人和加罗人甚至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公社阶段，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盛行自然崇拜、精灵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没有一个像中国的汉族那样人口占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最大的民族印度斯坦族的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弱。是故印度民族的整体凝聚力不强，地方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相当强大。

与人种驳杂、民族众多相并行的是语言复杂。印度仅使用人数在 1000 万以上的语言就有印地语、孟加拉语、泰卢固语、马拉提语、泰米尔语、乌尔都语、比哈尔语、古吉拉特语、马拉雅拉姆语、卡纳塔语、奥里雅语、旁遮普语和阿萨姆语等 13 种语言；另有一些使用人数不足 1000 万的小语种以及数以千计的方言。它们分属印欧语系、达罗毗荼语系、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等四大语系。与民族状况相同，在众多的语言中，没有一种像中国的汉语那样占绝对优势的语言。即使是排名第一的印地语，使用人数也不及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余各大语言的使用人数均不足 10%。所以，像统一语言文字那种在中国看来轻而易举之事（早在 2000 多年前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便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在印度却显得极为艰难。独立后几十年来，印度政府一直想用印地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但由于讲其他各大语言的民族的抵制，至今未能如愿。

印度堪称宗教信仰最为普遍的国家。教徒人数占总人口的 99.36%，差不多是全民皆教徒。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一个国家像印度这样如此长期地、普遍地笼罩在浓重的宗教气氛中。印度人认为，信仰宗教是天经地义的，否则是不可思议的。在印度，几乎处处有神庙，村村有神池，家家有神龛。不了解印度宗教，也就无从深入了解印度的社会与政治。

印度也是宗教种类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仅土生土长的宗教就有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四大宗教；此外，还有伊斯兰教、基督教、祆教和犹太教等外来宗教。从教徒人数多寡来看，印度教为第一大宗教，教徒人数占总人口的 83%；其次为伊斯兰教，占 11%；另有锡克教，占 2% 左右，教徒人数虽不多，影响却不小。

印度教系从古印度的吠陀教与婆罗门教演变而来，在此过程中还吸收了佛教等其他教派及民间信仰的成分。印度教内部相当复杂，包含着教义理论、仪轨制度、风俗习惯等各种成分，每种成分本身又都五花八门，杂乱纷繁，甚至互相矛盾。所以，马克思说：“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加崇拜的宗教，又是扎格纳特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

无论印度教多么复杂，派别如何林立，其主要教义不外乎这样几点：保存并严格维护种姓制度，宣称每个人的种姓是神决定的，永恒不变，人们应安于自己的种姓，各守其职；坚持认为善恶有因果、灵魂有轮回的因果业报说和人生轮回论，认为在现世行为良善者，死后灵魂可升入天国，得到解脱，反之则会堕入地狱，来世转生为贱民或畜类，遭受更深重的苦难，即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崇尚非暴力，认为精神、真理和道德的力量是不可抵抗的，终将战胜一切邪恶与暴力；提倡禁欲与苦行，鼓励人们摆脱世俗的各种欲念，主张用各种方法自觉地进行自我折磨，以达到灵魂的净化；遵守各种教律，如人死后火葬以升入天堂，寡妇殉夫以尽妇道，童婚是印度教女子的义务，高级种姓应佩戴标志身份的“圣带”，佩带指环可延年益寿，佩戴手镯可福寿双全，以及母牛即圣牛，不得虐待更不得宰杀，等等。

关于伊斯兰教，它的基本教义及其与印度教的相忤之处，在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赘述。值得重申的不同点有两点：一是伊斯兰教主张在安拉面前人人平等，而印度教则强调种姓分立；二是伊斯兰教有宰牛的习俗，而印度教则奉牛为圣物，视杀牛如同杀人。两教的普通群众都不一定懂得各自深奥的教义，但对这两点差异却能够切身体会。只要有人抓住这两点进行别有用心挑唆和煽动，说不定就会造成两教群众的冲突乃至仇

锡克教是以印度教改革派的面目出现的，其教义糅合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宗教中自认为合理的成分，摒除了其中自认为不合理的成分，可归纳为两点：主张在神的面前人人（包括男女）平等，反对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反对歧视妇女、寡妇殉夫和溺杀女婴等恶习。但这种平等只限于锡克教徒之间，其他教派不在此列；提倡自我修行，认为人的理性来自精神的泉源“神”，然后，从理性流出“灵魂”，再由“灵魂”流出物质世界，宣称人通过直觉的作用可与神合而为一。显而易见，锡克教与印度教也有不相容的一面。

宗教与几乎每一个印度人都息息相关。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无不受着宗教的制约。就连像圣雄甘地那样的民族运动领袖和英·甘地那样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也难以摆脱宗教的影响。圣雄临终前的最后的声音，是呼唤印度教大神“罗摩”的名字。英·甘地在其父死后为了遵守印度教教仪，不惜违背尼赫鲁的遗愿，而按印度教方式为他举行葬礼。晚年的英·甘地除了笃信宗教，甚至变得迷信起来。1977年下野以后，她对占星家、占卜者和神职人员的依赖感明显增强了。本来，第七次大选结果已于1980年1月6日揭晓，次日即可组成新政府，但她偏不在这天宣誓就职，而要等到1月14日，因为占星家认为根据印度教历那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英·甘地居然相信了占星家的胡诌。更荒唐的是，当她再次搬进阔别近三年之久的萨夫达尔路1号总理府时，还特意从圣城瓦拉纳西请来僧侣诵经念佛达八天之久，她说这是为了避邪。

宗教对印度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推动了印度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在近现代，宗教曾被印度民族主义者用来作为唤醒民众起来反抗英国殖民者的强大思想武器。圣雄甘地认为，政治一旦失去宗教，也就失去了灵魂。他的非暴力、苦行、仁爱、自制等思想全都是直接从印度各种宗教中汲取而来的。所以，他在印度广大人民中具有极强的号召力，以致他的斗争号召如同符咒一般，一经发出，便会获得举国上下一致的响应，人民即使面对殖民者的棍棒和屠刀也毫不退缩。另一方面，宗教对印度社会历史发展的阻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教派冲突和仇杀便是其中之一，最为常见的是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冲突和仇杀，其次是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之间的冲突和仇杀。每一次教派冲突和仇杀所造成的结果是众多的教徒惨遭杀害，无法估量的财产被毁，就连圣雄甘地和英·甘地最终也惨死在宗教狂热分子的枪下。

与宗教密不可分，同样对印度社会生活影响既深且广的是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是人类等级制度的一种形式，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在实质上是一种维护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社会制度。列宁说过：“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差别的一种形式。”

种姓制度并非印度所独有，在世界其他地区如古代埃及也存在过，但就其规定的严格性、存在时间的长期性而言，当数印度最为典型。

印度的种姓制度产生于公元前1000年代，最初由高到低只有婆罗门、刹

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种姓，分属祭司、武士、商人、农夫以及其他从事各种繁重劳动的人等阶层。后来又产生出了一个贱民等级。再后来，这些种姓不断演变，又衍生出若干亚种姓。当今印度社会的亚种姓已多到数以千计。

在印度农村，生活在同一村子里的不同种姓的住处是分开的，各种姓有各自的居住区域。婆罗门也不会经过贱民居住的地段，否则，可能遭到牛粪的袭击。按种姓制度规定，不同种姓之间不能通婚。每个种姓内部往往分为几个外婚制的小集团，称戈特拉。属同一戈特拉的人被认为是出于同一祖先，不能通婚。因此，通婚仅限于同种姓不同的戈特拉之间。不仅如此，种姓制度对不同种姓之间一般的社会交往也是严格禁止的。种姓身份不同，即使住在同一个村子，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种姓制度以纯洁污浊观念为依据。按照这一观念，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血统有纯洁、污浊之分。婆罗门生来就血统纯洁高贵，贱民则生来污浊低贱。而且，低种姓的污浊可能通过食物、相互接触传给高级种姓，使高级种姓受到污染也成为污浊之人。高级种姓如不慎吃了贱民的食物，接触了贱民的身体，都被认为受了污染，因为贱民本是不可接触者。受了污染的高级种姓必须举行某种仪式来清除这种污染。佛经中谈到，一个婆罗门吃了旃荼罗的食品，非常悔恨，认为这件事与自己的身份很不相称，悲痛至极，走入森林孤独而死。在印度一些地区，认为甚至连贱民的影子、足迹也可能给其他种姓造成污染。如印度西部的普纳城规定贱民在上午九时以前，下午三时以后不准进城门，因为那时太阳投射在人身上的影子太长，易触及婆罗门。贱民见了婆罗门，必须老远地匍匐在路旁，让婆罗门先过。贱民还必须随身携带瓦罐与扫帚，瓦罐吊在脖子上，用以吐痰；扫帚用来扫地，以免玷污自己走过的路面。纯洁、污浊的观念不仅存在于婆罗门和贱民之间，而且存在于婆罗门与非婆罗门之间、非婆罗门与贱民之间，甚至贱民内部也存在这种观念。这种观念还被用作划分等级高低的标准，各种姓都视比自己种姓身份低的人为污浊之人。

低级种姓并不能指望通过改变职业、食物和生活习俗来使自己净化，从而提高自己的种姓地位。因为事实很清楚，低级种姓并非因自己从事的职业、所吃食物及遵守的习俗而成为低级种姓，而是由于受人奴役的结果。遗憾的是，低级种姓自己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是前生注定的，只能哀叹自己命不好。

在殖民地时期，英国殖民者出于加强对印度统治的需要，颁布了许多法令，实行过一系列改革，如否定婆罗门对举办宗教祭祀仪式的垄断权，允许包括贱民在内的低级种姓子女入学，提倡跨种姓联姻、允许寡妇再嫁和妇女改嫁等。这些改革以及英国人带来的西方生活方式，对种姓制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使其逐渐变得不那么严格。

尽管如此，作为一股千百年来形成的强大的传统习惯势力，印度人的种姓观念依然很强，对人们的言谈举止起着支配作用。占印度80%以上人口的广大农村居民的种姓观念自然是根深蒂固的，就连居住在大城市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种姓观念也相当顽固。他们在公众场合，可以按现代新观念办事，可在私下或家里，一切仍按种姓老观念行事。在一般情况下，高种姓出身的知识分子不会邀请低种姓知识分子到家中做客。即使是改宗的原印度教徒，他们虽然同信主张教徒平等的伊斯兰教或基督教，但种姓观念仍妨碍他们互相接近。

每年到恒河沐浴的活动中发生的事很能说明种姓观念对印度人的影响。印度教徒每年都要到恒河沐浴，这是一项宗教活动。由于不愿与不同种姓一道沐浴，在哪一种姓先下，哪一种姓后下的问题上经常争吵不休，以致进行这一活动时秩序十分混乱，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不得不对此进行干预，按种姓身份高低排定各种姓下河的时间顺序。虽然印度宪法明文规定种姓歧视是违法行为，但作为司法者的法院却不得不自己干出违法的事，传统习惯势力的强大由此可见一斑。

马克思说过：“种姓制度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的确，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严重的。纯洁污浊观念毒害人的心灵，使印度人形成了相互之间严重的排斥心理。这种排斥心理是极其有害的，它使印度人缺乏对自己同胞的同情心，妨碍了印度人共同民族意识的形成。种姓制度和观念还影响到印度现代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局势的稳定。

种姓制度和种姓观念对政治局势稳定起破坏作用的因素有多种，其中最重要的是高级种姓对低级种姓尤其是贱民的歧视和迫害。

深受万民爱戴和景仰的圣雄甘地，出于对贱民的同情和爱护，为了改善贱民的处境和地位，曾将贱民冠以“哈里真（意为“神之子”）的尊称。尽管如此，在固守种姓纯洁污浊观念的普通印度人看来，贱民依然是贱民，是不可接触者。

贱民是这么一种人：自命血统纯洁的婆罗门不愿为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社会上的理发师、裁缝等手艺人不愿为他们服务；高级种姓如不慎与他们相接触会被认为受了污渎，得举行某种仪式来消除这种污渎；这种人不能使用公共设施，如道路、水井、渡口等；不能进入印度教神庙；不能与其他种姓的子女一道受教育；不能与其他种姓交往，更不能与其他种姓通婚；他们只能从事被其他人看作是极其低贱的职业。因此，贱民不仅像社会中其他劳动人民一样遭受剥削和压迫，处于贫困状况，而且，他还被社会上其他人当作污浊的人，被高级种姓野蛮地摈弃在社会之外，被剥夺了做人的一些基本权利，从而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因此，贱民是印度社会中最受压迫和歧视的社会阶层。

历史发展到今天，印度贱民人数已达1亿之多，其中90%以上居住在农村。贱民在经济上遭受沉重的剥削，在政治上受到非人的待遇和迫害，甚至连起码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时常遭受种种暴行乃至残杀。据印度报刊统计，印度全国迫害贱民的案件逐年增加。1973年为6186起，1974年增到8860起。1977年达10871起。1978年和1979年均超过15000起。1977—1981年竟达65511起。这五年是前20年总和的2.5倍。在这些统计数字的背后呈现的是血淋淋的令人发指的各种暴行。在印度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迫害贱民的消息。如1979年9月，中央邦皮扎拉德普尔县皮哈拉村贱民集会要求废除债务奴隶制，会后就有一群暴徒袭击贱民区，烧毁26间棚屋，杀死1人，重伤7人。1981年8月，在泰米尔纳杜邦南阿科特县的一个贱民村，因为抗议邻村瓦尼亚种姓的青年侮辱该村的姑娘，周围11个村的印度教徒3000余人洗劫了这个村庄，135所贱民草屋被焚，35所贱民住房被捣毁，财产损失达60万卢比。

印度独立后，国大党政府为改善贱民的处境和地位，曾作出过种种努力，如在宪法中明确宣布废除贱民制，实行保留法，包括在议会以及政府各级机关中为贱民保留一定比例的席位，在政府所属的企事业单位中为贱民保留一

定比例的工作职位，在大学中为贱民学生保留一定名额，其录取分数线可稍低于其他种姓学生，等等。然而，这一切都收效甚微。对此，英·甘地无可奈何地感叹说：“迄今为止，我们还一切不能平等地对待贱民，这主要是政府的失败，也是全体印度人民的失败。”

印度的妇女问题也很严重。印度妇女的社会地位在世界各国中当属最低之列。也许有人会问，印度不是也有妇女当政府部长，甚至当总理吗？这话不假。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印度妇女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地位低下的事实。因为当部长的印度妇女毕竟是凤毛麟角；印度独立以来已有不下十人当总理，可女总理只有英·甘地一人。而英·甘地之所以能当上总理，与她的家庭背景多少有点关系，以后能否产生女总理，是很难说的。

印度妇女社会地位低下有历史的原因。古老的印度教经典像枷锁一样紧紧地束缚住她们。著名的《摩奴法典》中记载着同中国儒家束缚妇女的三从四德相类似的封建礼教：“女子必须幼年从父，成年从夫，夫死从子，无子从丈夫的近亲族，如无近亲族，则从国王，妇女始终不应该随意自主。”《罗摩功行录》堂而皇之地载有这样的语句：“丈夫就是妻子的天神，服侍丈夫是妇女最崇高的天职。没有丈夫的妇女等于没有生命的躯壳和无水的江河。”就是这些印度教经典奠定了印度社会男尊女卑的两性地位格局。进入中世纪封建社会后，印度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更是达到了极其残酷的程度。多少世纪以来，印度妇女就是在各种宗教法规和社会陋习下生活的。她们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侍奉公婆，照料丈夫，默默地忍受着降临在她们头上的种种不幸。

19世纪西方思想传入以后，由于印度进步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的不懈努力，印度妇女的状况开始发生些许改变，这主要表现为妇女开始有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由于一些社会陋习如童婚、为亡夫殉葬和溺杀女婴等受到冲击，妇女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摆脱枷锁；一些妇女开始走出家庭，步入政治舞台；等等。

尽管印度妇女地位有一定变化，但尚未从根本上摆脱受歧视的地位，她们仍面临着不少急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学者苏印环认为这些问题包括：（1）重男轻女的现象相当普遍。在印度，人们普遍喜欢生男孩。1986年，某社会机构曾对孟买8000名孕妇进行婴孩性别偏好调查。结果是7999人喜欢生男孩，仅有1名妇女喜欢生女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名妇女并不是印度人而是个外国人。人们重男轻女观念之强，由此可见一斑。这种观念致使印度溺杀女婴的现象相当严重。与马哈拉施特拉邦至今还流行着把刚刚出世的女婴放在牛奶中溺死的残忍习俗；（2）妇女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远低于男子。拿国会人民院议员来说，人民院1952年第一次选举，议员总数是489人，女议员仅有14人，占议员总数的2.86%；以后，女议员比例有所上升，但极为缓慢。时隔25年，1977年人民院选举，女议员比例也仅占议员总数的3.56%，比1952年只高出0.7%。妇女当部长更是罕见；（3）失业率高，男女同工不同酬；（4）文盲人数上升。受教育的妇女毕竟只是少数，70%的妇女是文盲；（5）不安全感增加。妇女时常面临遭袭击、侮辱、性骚扰、强奸乃至杀害的危险。山区部族和贱民妇女遭到暴行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据印度报纸报道，1971年印度全国发生迫害妇女的案件为1.63万起，1979年增至2.86万起。强奸案1982年比1962年增加了20倍，受害者大多是12—16岁的少女。

除上述问题外，印度社会还残存着一些虐待妇女的陈规陋习，包括重婚、嫁妆、为亡夫殉葬以及上面提到的溺杀女婴等。

尽管印度法律禁止童婚，但在很多地区，特别是在山区部族中，童婚习俗仍然盛行，甚至在上流社会中，为儿女实行童婚者也不乏其人。

童婚陋习在印度之所以难以根除，原因之一是印度教法典主张童婚，而虔诚的印度教徒都把经典中的说教看作不容置疑的真理。宗教经典对他们的约束力比法律的约束力要大得多。《摩奴法典》教导父母要在儿女8—12岁时为其完婚。另有一些经典认为，女孩子在月经初潮前她的父母就应把她的婚事确定下来，否则就有罪。因此，信仰印度教的父母们都把早婚看作是对儿女应尽的义务。一般情况下，只要有人前来求婚，作父母的往往立即允诺。因为在印度普遍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女儿长到11岁若还不嫁人，便很难嫁出去，她的父母也因此被认为是犯了宗教忌讳而影响他们的宗教地位。原因之二是出自经济上的考虑。这与印度的另一个陋习——嫁妆有关。如果女儿成人后出嫁，父母得付出一大笔嫁妆费。几个女儿的嫁妆费足以让一个收入比较可观的中产家庭破产。童婚则廉价得多。泰米尔纳社邦的一位妇女说：“童婚不受嫁妆拖累，只要花五千卢比就行了，错过这个机会，等以后再结婚就得花上两万卢比。”

童婚之弊是显而易见的，它损害了儿童的身心健康，加快了人口的增长速度，阻碍社会进步。

与童婚相并行的另一种陋习是嫁妆。这种陋习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吠陀时代。最初大多具有自愿性质。女方家庭为女儿新婚陪送嫁妆，目的是想使女儿到婆家后能生活得幸福、快乐。既是自愿，嫁妆的数量也就比较随意。嫁妆习俗起初盛行于印度教高级种姓之间，后来传到低级种姓中，再后来在非印度教徒中也流行起来。

在当代印度，嫁妆习俗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印度学者斯里尼瓦斯认为这些变化主要体现为以下五点：一是嫁妆的“自愿”和“礼物”性质已经丧失。男方直截了当地开列出嫁妆清单；二是嫁妆习俗已遍及所有的种姓社团、宗教教派和地区；三是嫁妆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改变，嫁妆的数量已远远超出新娘在娘家应得财产的比例，给女家造成极大的压力；四是嫁妆已不局限于结婚时的陪嫁。从订婚开始一直到结婚以后的任何时候，男家都可以以嫁妆不够为由不断地向女家索取，而女方则为了“保全”女儿的家庭不得不尽量满足；五是新娘对嫁妆完全没有支配权。在现实生活中，嫁妆既不是给新娘的，也不是给新郎的，而是给新郎的家庭的。

由于这五点变化，嫁妆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吃人”的嫁妆，成为摧残和迫害广大印度妇女的“元凶”。与其他陋习多少受到一些冲击的状况形成对照，嫁妆之风却愈刮愈烈，以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年轻媳妇因嫁妆不足而被迫害致死的案件时有发生，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报载，仅首都新德里一市，1980年至1981年就有421个新娘被烧死，1981年至198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68人，1982年至1983年更增至610人。而这正好是英·甘地重新执政时期。1986年12月，印度政府公布：在过去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又有1666名妇女因无足够的嫁妆而被丈夫和公婆害死，而1987年一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1912人，1989年更增至4006人。

印度妇女的命运是不幸的，但最不幸的要数其中的寡妇。寡妇的命运早在古代就已被印度教经典规定好了。《摩奴法典》中说，男子丧妻后可以再

娶，而妇女“在丧偶后，其他男子的名字提都不要提”；“对一个有德的妇女，本法典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规定有嫁二夫的权利”。妇女一旦沦为寡妇，便失却了做人的起码权利和尊严，形同“活死人”。寡妇不能继承丈夫留下的遗产，更无再嫁的权利，只能终生呆在婆家，做繁重的家务。她们被婆家人看作累赘，不得不忍受他们的各种冷遇和虐待。她们在生活中没有享受快乐的权利，不能穿色彩鲜艳的衣服，不能戴首饰，头发必须剪短，甚至剃光。在某些地方，寡妇还被视作凶兆，谁碰上她们就是倒霉。是故有不少寡妇因不堪忍受婆家人的虐待而走上绝路；也有的则移居到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孤零零的低矮茅屋里，直至了此残生。

对寡妇最为残忍、最为野蛮的习俗莫过于为亡夫殉葬，即寡妇在丈夫死后，在焚烧其尸体时，自己也跳入火中，把自己活活烧死。古代把这叫做“殉节”，殉夫的寡妇被视作贞女烈妇，受人称道，人们往往还要为她竖碑立传。时至今日，这一世界罕见的恶习在印度仍时有发生。

印度妇女打从娘胎时起，就交了厄运。溺杀女婴、童婚、嫁妆、寡妇殉夫，这种种迫害环环相扣，贯穿于妇女人生道路上的每一座驿站，简直配合得天衣无缝。在这些残酷的迫害面前，广大的印度妇女还有活路吗？所以，从古到今，不断有妇女起来，为改善处境、提高地位甚至是为争取生存权而斗争。她们强烈地反对这些残害她们的陈规陋习，喊出了“废除嫁妆”、“妇女不是拿来烧的”等口号；有的甚至铤而走险，揭竿而起，演出了一幕幕“弱女作强梁”的悲壮而又辛酸的人间活剧。

印度的黑钱问题也相当突出。猖獗的黑钱活动严重影响国计民生，已成为印度社会生活中难以治愈的痼疾。

黑钱是指通过非法途径、采取不正当手段所获得的钱财，颇有点像人们平常所说的不义之财。一类为非法收入，如通过非法涨价、高价私售住宅、套购外汇、投机倒把、黑市交易、贩卖人口、贿赂、赌博等活动获取的收入，这部分黑钱在印度占多数。另一类为隐瞒的收入，如公司企业、律师、医生、艺人等专门职业者逃税的那部分收入。这类黑钱在印度也不在少数。

印度产生黑钱的部门或行业十分广泛，主要有房地产业、大型制造业、建筑业、批发业、电影业、专门职业和走私等。其他遍布现实生活中的不计其数的不法行为也时刻产生着黑钱，其中尤以贿赂为最。由贿赂或变相贿赂而产生的黑钱被人们谑以各种名称，如“办事钱”、“快办钱”、“铺路钱”、“秘密佣金”、“润滑钱”、“装聋作哑钱”等。印度的黑钱来源广泛，途径众多，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黑钱究竟有多少？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多大的比重？独立 30 多年来，印度经济学家以及政府任命的专门调查委员会，在不同时期对这些问题进行过调查研究。由于黑钱属非法的地下资财，不可能作出精确的统计，故学者们得出的数值只能是估计值，而且彼此出入较大。尽管如此，他们的研究结果仍可反映出 30 多年来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印度黑钱的数额相当庞大，每年达数百亿卢比，且呈不断增加之势；黑钱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在同步增长。1978—1979 年度曾达到 4686.7 亿卢比，占该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近二分之一。与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印度的黑钱问题属严重之列。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瑞典、英国和日本等国的黑钱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都小于印度。

中国学者张敏秋认为，巨额的黑钱严重影响了印度经济的正常发展。这

主要表现为黑钱活动的猖獗破坏了国家正常的投资安排和商品管制；形成黑钱的因素之一的严重的逃税减少了国库收入；黑钱活动对物价恶性上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黑钱持有者的奢侈消费打乱了国家计划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在国家实施压缩信贷、紧缩货币等政策时，黑钱活动破坏了政策的实施；形成了一个新的富有的黑钱持有者阶层，加剧了贫富悬殊；等等。印度总统桑吉瓦·雷迪曾经说过：“黑钱已成为国家经济的一个严重威胁，它使整个经济进程落空，使若干经济政策宣告失败。”政府专门任命的调查黑钱问题的王丘委员会指出：“黑钱在国家经济中就像正在扩散中的癌，如果不及时制止，肯定会导致经济崩溃。”

黑钱对印度政治的危害主要表现为对执政党（主要是国大党）的严重腐蚀。选举大量地靠黑钱，议员大多靠黑钱买得选票，使真正的贤明之士难以当选。执政党内能为党捞到大量黑钱者得以成为实权人物。靠黑钱当选的人一旦掌权，也就变本加厉地捞钱。而且，由于执政党的经费（大部分为黑钱）主要来源于实业界特别是大垄断财团，在黑钱的诱惑和压力下，政府的政策往往只得向实业界倾斜，从而使得它为捞取广大选民的选票所提出的反对大垄断财团、保护小工业的激进纲领只能流于做做表面文章。政府各级权力部门的官员们因其切身利益与黑钱经济休戚相关，在查处逃税、走私等经济违法行为时势必软弱无力，甚至包庇纵容，反过来违法者也会变得有恃无恐。其结果是诚实守法者享受不到法律所给予他们的权利，而不诚实的人也不会因违法而受惩处。腐败现象与黑钱互为因果，前者滋生了后者，后者反过来又大大助长了前者的蔓延。

此外，印度的犯罪问题也很突出。犯罪现象主要包括盗窃、抢劫、酗酒、吸毒、赌博、凶杀、强奸、贪污腐化以及偷税漏税、掺杂使假、坑蒙拐骗、敲诈勒索、买卖执照、黑市交易、投机走私等刑事和经济犯罪。

语言龃龉、民族矛盾、教派冲突、种姓纠纷、黑钱猖獗、腐败盛行、妇女问题突出、犯罪现象严重，这诸多问题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印度社会，也都是挡在印度每一位国家首脑面前的对手。这些对手一个一个地出现时力量已很强大，如果一齐上阵则更是威力无穷。在它们面前，政府首脑的力量往往显得相对弱小，力不从心。所以说印度的国家首脑难当。不要说尼赫鲁父女，换了其他任何人，要想把印度这样一个国家治理好，都绝非易事。

对印度社会有过亲身接触和体验的人能够认识到印度的国家首脑难当。V.S.奈保尔——一个并不崇拜英·甘地的作家，在英·甘地逝世后曾写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他写道，有一次，他在拉贾斯坦的沙漠中访问，发现当地政治家对英·甘地用管道向缺水地区引水表示“强烈的反对”，便询问原由。他得到的答复是，按照传统习俗，人们只能饮用井水。从那天起，这位作家开始同情起英·甘地来。然而，奈保尔所体验到的还只是五光十色的印度社会的一个侧面——传统习惯势力对现代观念和科学的巨大的阻抗作用。

对印度情况比较了解的外国人也能理解印度的国家首脑难当。早在1963年，美国记者、《谁是尼赫鲁的继承人》一书的作者韦尔斯·汉根就曾写道，印度总理肩负的重任“使喜马拉雅山都显得渺小”。并非巧合的是，20年后，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英·甘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愿意当你这个总理。”

纷至沓来的麻烦

英·甘地重新上台后，总理宝座大概只平平安安地坐稳了一年多，国内形势就开始发生动荡，各种麻烦纷至沓来。这些麻烦可概括为经济困难、政治腐败、丑闻不断、家庭危机、警察施暴、种姓冲突和地方骚乱。

经济上困难重重。印度每年对外贸易逆差很大，约达 500 多亿卢比之巨，国际收支不平衡。印度每年接受数十亿美元的外援，到 1984 年底大约共接受外援 4000 亿卢比左右。1983—1984 年度，印度共欠外债 1531 亿卢比，每年外债还本付息是一大笔开支；印度的内债也很大，1983—1984 年度达 5004 亿卢比，每年的财政赤字达四五百亿卢比。工业设备能力长期使用不足，病态企业不断增加，投资效果差，劳动生产率下降，国营企业尤为严重。失业不断增加，80 年代初，仅城市失业人口就超过 2000 万。贫富分化现象极为严重。在广大农村，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无地少地的农民则长期陷于贫困和失业。据统计，占农村人口 5% 的地主富农占有农村耕地的 41%；而占农村人口 61% 的农民只占有 8% 的耕地。在城市，大垄断资本家的财产呈几何级数激增，如印度最大的两大财团塔塔和比尔拉的资产分别从 1951 年的 15.2 亿卢比和 6.5 亿卢比增加到 1981 年的 184 亿卢比和 169.2 亿卢比，30 年中增长了 11 倍和 25 倍；而广大城市贫民常常要为一日三餐发愁。据印度议会人民院 1983 年 4 月的答辩披露，印度仍有 48%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某些落后地区这个比例更大。如在西孟加拉邦农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该邦总人口的 75%。

自从 1975 年实施紧急状态法以来，英·甘地便失去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她重新上台后仍然未能赢回这种信任和支持。其时，印度的知识分子营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人是英·甘地的坚决反对者。他们是一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包括记者、律师、学者专家等。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部分人是英·甘地的坚决拥护者。不过，这些人大多是二三流人物，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中说话没有多少分量。第三部分人持中间立场。他们占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他们希望英·甘地能认真吸取教训，医治过去的创伤，从而弥补自己的过失；同时给他们以更多的关注。然而，不久他们就感到失望了。因为他们发现英·甘地既没有给予他们多少关注，也没有在政治上吸取过去的教训，仍旧我行我素，在某些方面如在对待议会中的反对党以及高级官员的任免问题上甚至变本加厉。

仍未能赢得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当然是英·甘地的一大遗憾和失策。

英·甘地复出后，印度国内的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已不是各反对党针对执政党的联合行动，而是纷纷崛起的各地区性政党，如旁遮普的阿卡利党、安得拉邦的泰卢因之乡党等。全国性的各反对党自 1977 年联合组成人民党的尝试失败后，再也没有哪个反对党领导人热衷于搞联合，他们转而致力于在地方上经营各自力量占优势的邦，如人民党经营卡纳塔克邦，国大党（社会主义者）经营马哈拉施特拉邦；另有一些党派在一些邦里长期执政，如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和全印安纳德拉达进步联盟在泰米尔纳杜邦等。这样，即使英·甘地在上台伊始通过解散原邦政府、重新举行大选的办法，夺回了一些邦的统治权，但仍有三分之一的邦落到了各反对党的手中。

这种情况表明，国大党（英）的实力在邦一级有所削弱。印度是一个联

邦制的国家，由于各邦是以语言为基础或者说是以民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具有相当强的排他性。如果国大党（英）的实力在邦一级受到削弱，那么它在联邦议会中的地位也将受到影响。因此，英·甘地急于想把其余三分之一的邦的权力夺过来，将其置于国大党（英）的控制之下。

作为执政党的领袖和政府首脑，英·甘地的这种想法本无可厚非，问题是该如何做。英·甘地显然对已经变化了的政治局势缺乏深刻的认识，仍想用老办法对付新挑战，企图不择手段地推翻由反对党执政的邦政府。这就注定了她的失败。

陷入克什米尔危机，是英·甘地在地方上遭到的第一次失败。

克什米尔的情况相当复杂。这里地处印巴边境，独立以来一直是两国之间的一个争议而敏感的地区。印巴两国为其归属问题先后打过三次仗。整个克什米尔印占区由查谟和克什米尔两部分组成。该邦居民中穆斯林占大多数。这个地区的主要政党是谢赫·阿卜杜拉领导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国民会议党。国大党几乎从一开始就与该党不和。1953年，尼赫鲁出于某种政治原因解除了谢赫·阿卜杜拉的邦首席部长职务，将他投进了监狱。但这并未影响他们两人间的私交。尼赫鲁担负起了照顾谢赫·阿卜杜拉家庭的责任。他的儿子法罗克·阿卜杜拉甚至也像拉吉夫一样管英·甘地叫“妈”。此后22年中，谢赫·阿卜杜拉在狱中度过了整整14个春秋。1975年2月，他在同英·甘地达成协议后重新出山。直到此时，国大党和国民会议党都还保持着合作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并不稳固。

然而，谢赫·阿卜杜拉复出之后，借口英·甘地实施紧急状态法破坏了他想提前在克什米尔举行邦议会选举的计划，开始对她心怀不满。在姗姗来迟于1978年6月举行的邦议会选举中，国民会议党第一次公开站在了已经失去中央政府的国大党（英）的对立面，击败了后者，获得了胜利。谢赫·阿卜杜拉出任首席部长。

对于谢赫·阿卜杜拉的所作所为，英·甘地当然不高兴。不过，她这次并未发作，反而在1982年9月谢赫·阿卜杜拉死后将国家最高荣誉追授予他，还让他的儿子法罗克接了他的班。英·甘地的大度曾赢得了一片赞扬声。然而，英·甘地不久就后悔了，想搞掉法罗克。其表面理由是法罗克过于贪图享乐，疏于过问邦务；实际上是因为她听说法罗克经常与安得拉邦首席部长拉马拉奥等反对党首席部长在一起举行秘密集会，密谋在下届大选中将她赶下台。

由于担心自己会落得个像过去其他许多邦的首席部长那样被推翻的下场，法罗克决定先发制人，宣布提前一年在1983年6月举行邦议会选举。选举结果，国民会议党大败国大党（英），法罗克再次就任首席部长。这使英·甘地更加怀恨在心，她决计搞掉法罗克。她计划先是策动法罗克的姐夫G.M.沙阿率领他的支持者脱离国民会议党，使之沦为邦议会中的少数党，然后由邦长出面解除法罗克的职务，让G.M.沙阿取而代之。

但这个计划遭到了查谟和克什米尔邦邦长的反对。他认为，即使法罗克失去了邦议会多数而不能再任职，也应依法按照法律程序，由他自己向邦议会提出辞呈，即不应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将其撤职。

英·甘地一意孤行，将这位不听话的邦长调离克什米尔，由一位忠实执行其意图的人接任其职。1984年7月2日，英·甘地终于如愿以偿。因G.M.沙阿背叛而在议会中失去多数的法罗克被新邦长解除职务，他那野心勃勃，

一直想夺取他的权力的姐夫 G.M. 沙阿在国大党（英）的默许下当上了首席部长。

严格地说，英·甘地此举属违法行为。如果她以这种方式扶上台的人还是个人才的话，公众舆论也许会原谅她；糟糕的是，G.M. 沙阿无论从人品到能力都不值一提，与他的小舅子相距甚远。他上台后不久，便把一个好端端的克什米尔折腾得乌七八糟。

法罗克被解职和 G.M. 沙阿上台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抗议的浪潮席卷而来。此事实是在英·甘地晚年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

然而，英·甘地没有从克什米尔危机中吸取教训，一个月后，她又解除了安得拉邦首席部长拉马拉奥的职务，一手制造了安得拉危机。这位电影明星出身的首席部长之所以遭到与法罗克同样的厄运，唯一的原因就是他老是与甘地夫人过不去。

拉马拉奥从一开始，就是以与女总理唱反调的形象出现在印度政治舞台上的。1982 年他创建了一个新的政党——泰卢固之乡党。该党的唯一宗旨就是要洗刷英·甘地母子对安得拉邦的侮辱，“恢复安得拉的尊严”。事情最好还是从头说起。

英·甘地自复出以来，一直在插手安得拉邦的邦政权，她先是把她认为不听话的该邦首席部长切那·雷迪赶下台，让安吉阿取而代之。可安吉阿是个庸才，他唯一的拿手好戏就是溜须拍马，但他不知道这并非在任何人身上都灵验。新“王储”拉吉夫·甘地就不吃他这一套。有一次，拉·甘地到该邦首府海得拉巴视察，安吉阿为了讨好他，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不料拉·甘地不但不领他的情，反而当着几百人的面将他数落了一通。此举引起安得拉人的不满，认为这是对安得拉的侮辱。拉马拉奥的泰卢固之乡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英·甘地见事情闹大了，不得不将安吉阿罢免，让文卡塔拉姆·雷迪接任。此人也是草包一个，不久又被解职。维·巴·雷迪取而代之。这样，安得拉邦创下了一年之中连换四任首席部长的纪录。有人把安得拉比作政府更迭频繁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拉马拉奥则认为英·甘地母子把安得拉当成了自己的“封地”，他发誓要将这块“封地”从他们手中夺过来。当 1983 年刚刚到来之际，拉马拉奥终于如愿以偿。他领导的泰卢固之乡党以绝对优势大胜国大党（英）。与此同时，国大党（英）在卡纳塔克邦议会选举中又败给了人民党。一下子丢掉这两个南方邦，如同有人在英·甘地的心尖上剜了一刀，令她痛心疾首。因为这两个邦过去一直是国大党（英）的堡垒，即使在她处于政治生涯最低点的 1977 年也投了她的票。英·甘地自然对拉马拉奥恨之入骨，她认为后者是存心要与她作对。从此时起，她便决意要将这个桀骜不驯的电影明星搞掉。

拉马拉奥走马上任后，也的确是处处在与英·甘地唱对台戏。他也与法罗克一样曾参与一些反对党首席部长为在下次大选中击败英·甘地而举行的秘密集会。法罗克被解职后没几天，国家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计划委员会委员和各邦首席部长组成，对印度所有经济计划问题拥有最后的决定权）会议在新德里召开。会议由英·甘地主持。拉马拉奥在会上代表所有的反对党首席部长发表声明，对法罗克被解职一事表示愤慨。一个邦的首席部长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向英·甘地公开发出挑战，这在英·甘地重新执政以来还是第一次。她对此极为恼怒，粗暴地打断了拉马拉奥的话，不准他再说下去。拉马拉奥的牛劲儿也上来了，他坚持要说。于是，英·甘地下令不准把

他的发言写进会议记录。拉马拉奥便以离开会场相抗议。见此情形，其他非国大党（英）首席部长也随后退出了会场。两人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英·甘地显然是被拉马拉奥的言行气昏了头，以致丧失了理智，竟然下令所有来自非国大党（英）执政邦的官员离开会场。这些官员并没有介入任何政治纠纷，而且在他们的上司离开会场后并未跟着离开。

1984年8月16日，印度各大报纸都在显眼位置刊登了一则快讯：安得拉邦首席部长拉马拉奥被邦长拉姆·拉尔解除职务，巴斯卡拉·拉奥出任该邦新首席部长。

整个印度都为之震惊。在前后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先后发生了两名非国大党（英）的邦首席部长被无端解职的事件，人们没有理由不感到震惊。他们纷纷表示抗议，要求中央政府和安得拉邦邦长给个说法。面对人们的责难，英·甘地发表了一篇声明，说她事先并不知道安得拉邦首府海得拉巴所发生的事。她的话没有任何人相信。邦长拉姆·拉尔慑于公众舆论的压力，供出他的行动事先得到了新德里的许可。人们相信他的话，这一来是因为如果没有总理的授意和撑腰，与首席部长平级的邦长是不敢轻易地解除首席部长职务的；二来是因为就在一个月前，拉马拉奥曾在国家发展委员会会议上公开顶撞过总理。按照英·甘地的个性，她绝不会放过公开与之作对的人。

邦长拉姆·拉尔抖出内幕，公众舆论大哗，知识界更是怒不可遏，包括学者、退休法官、律师、记者在内的著名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们纷纷来到海得拉巴，谴责安得拉事件是“对民主的践踏”。安得拉事件已发展成比克什米尔事件更加严重的危机。为了平息众怒，英·甘地只得将邦长拉姆·拉尔免职。很显然，安得拉事件是英·甘地的又一失策。这个事件与克什米尔事件一样，说明用老办法对付反对党执政的邦政府已经不灵了，已不能适应80年代印度政治的新形势。

英·甘地对非国大党（英）邦政府尚且如此，对待自己的党所执掌的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就更不在话下了。鉴于她从小经历和后来的从政经历，她已不相信任何人，除了儿子以外。出于对自己地位安全感的担忧，她不想让任何一个部下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她要让每个人对她都怀有诚惶诚恐之感，不要妄想心存哪怕一丁点儿对她不忠的念头。为此，她每隔三个月就要对内阁进行一次改组，随意撤换国大党（英）执政各邦的首席部长。同时，她还人为地在党内制造一些矛盾，使各个部下之间互相牵制甚至互相倾轧，以便于自己实施控制。

英·甘地对上述做法自鸣得意，因为国大党内再也形不成强大的个人势力，再也没有人敢向她发出挑战，部下们都争先恐后向她表示忠诚，并为此而争风吃醋。党内似乎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平静。然而，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这表面的平静下面实际上潜伏着巨大的危险：随意改组内阁和邦政府，人为地造成政局不稳；官员们任职时间太短，难以有所作为；官员们把主要精力用于讨好她，势必影响政务；官员们的忠诚、恭顺是表面的，口服不一定心服。

另有一些事情虽然不是英·甘地本人一手造成的，但却与她有间接关系，这主要是指两大丑闻。

第一大丑闻是安图莱丑闻。

该丑闻的主角名叫阿卜杜勒·拉赫曼·安图莱，系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是由桑贾伊一手提拔的。此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客，他从政只为一

个“钱”字。老实说，持这一信条的政客并不只他一人，但像他那样捞钱捞到厚颜无耻、毫无顾忌的地步的人恐怕还不多见。在钱、权关系上，他有自己的辩证法。他认为钱权互为因果，有钱才能保住权，有权才能捞到钱。

为了捞钱，安图莱建立了一个托拉斯；为了让自己捞钱的行为合理合法、名正言顺，他以总理的姓氏将托拉斯命名为“甘地托拉斯”。做完这些后，他马上开始了他的交易：向工商巨头索取对甘地托拉斯的捐款；作为报偿，这些工商巨头们从他那儿得到水泥和工业酒精等紧俏物资的配额、建筑许可证或制糖所需的优惠贷款等，不受“限制个人在城市拥有土地面积”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约束，还可以免交所得税。

1981年8月，安图莱丑闻首先被新闻界曝光，随后又在人民院和马哈拉施特拉邦议会公开，证据确凿，材料齐全，事实无可辩驳。愤怒的议员们纷纷要求将安图莱撤职查办。

如果英·甘地答应议员们的要求，安图莱丑闻完全可能大事化小，甚至小事化无。然而，英·甘地却固执地认为：“作为领导人，要想赢得和保持支持者对你的忠诚，你就得站在他们一边。”她除了否认安图莱为他的托拉斯取名为“甘地托拉斯”是得到了她的许可外，拒绝解除他的职务。

对英·甘地的决心心怀不满的人们虽然不敢公开表示他们的不满，私下里却议论纷纷。他们倾向于认为总理之所以竭力包庇安图莱，一定是她或者她的儿子桑贾伊有什么把柄捏在他的手中。

反对者们借助舆论和议会的力量扳不倒安图莱，转而诉诸法律。1982年1月，孟买高等法院判定安图莱滥用职权，拿水泥配额和几种官方许可证与人作交易。安图莱只得辞职。此后，英·甘地曾试图让安图莱逃过刑事审讯，但终未能如愿。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同司法机关较量的结果，是英·甘地的失败。然而，安图莱丑闻给英·甘地所造成的另一后果远比这一后果严重不知多少倍，那就是她的声誉和威望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第二大丑闻是石油丑闻。这件丑闻被披露的时间（1982年2月）正好与安图莱受审判的时间前后相继，同样与英·甘地及其次子桑贾伊有关。丑闻的当事人中有好几位是桑贾伊的狐朋狗友，其中有一位还是甘地本人的心腹。

事情还得从1980年1月开始说起。当时，英·甘地再登大位才几天，桑贾伊的几个狐朋狗友便狐假虎威，强迫石油部从新加坡郭氏石油公司进口大量石化产品。这笔买卖的结果，是郭氏石油公司和印度的中间商赚饱了，印度政府却亏损达500万英镑之巨。

议会公共事业委员会多次要求对这笔交易进行调查，均被石油部以有关文件已失落，无从查找为由拒绝了。几经该委员会抗议，文件后来终于戏剧性地从总理府被找了出来。该委员会依据文件起草并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被国大党（英）所控制的议会对报告进行了大量的删改。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实在太拙劣，以致被曝光后成为笑柄。

由于丑闻直接涉及到英·甘地母子，英·甘地难辞其咎，处境尴尬，只得自我解嘲地说，贪污腐败是个全球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

尽管丑闻不断，腐败现象严重，但是英·甘地的主要精力显然没放在反腐败上面，因为让她烦心的事实在太多。有些事情比腐败还要严重得多，弄得不好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人员伤亡，如警察施暴、种姓冲突以及阿萨姆邦和

旁遮普邦的骚乱等等。再说，由她的二媳妇玛尼卡所引发的萧墙之祸已成为她的一块心病。这种种事端把她弄得焦头烂额，疲于奔命，她不得不拿出大部分精力来对付。

印度人至今还保存着古代传下来的大家庭传统。大家庭的突出特点是三代同堂，所有成员都在一起同住、同吃、同劳动，共享家庭的财富，共奉最年长者家长。

尼赫鲁-甘地家族也不例外。英·甘地便是这个家族的女家长。她让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和三个孙子全部住在萨夫达尔路1号总理府，她要用她那巨大的羽翼，来保护她的后人们，尽量让他们生活得好些。

英·甘地就像当年她的祖父莫蒂拉尔宠爱她一样，对三个小孙子宠爱有加。这三个孩子有两个是拉吉夫的，男孩叫拉胡尔，女孩叫普里雅卡；一个是桑贾伊的，名叫费罗兹·瓦伦。显然，英·甘地对桑贾伊的儿子爱得更甚，她用先夫之名为他取名这件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世人常说婆媳关系难处。印度尤其如此。其原因主要在于母亲对儿子垄断式的爱，与大家庭共住的生活方式也不无关系。不过，也不尽然，英·甘地与她的长媳索尼娅之间的关系却极为融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堪称婆媳关系的典范。然而，她与她的二媳妇玛尼卡之间却连哪怕是表面上过得去的关系也未能建立起来。个中原因除了一般家庭常见的外，更多的还是在政治方面。

玛尼卡出生于旁遮普的一个锡克族中级军官家庭，显然与显赫的尼赫鲁-甘地家族门不当，户不对。英·甘地起初对此也颇为不悦，认为她配不上自己的宝贝儿子桑贾伊，但她还是怀着爱屋及乌的心态接纳了她，于1974年为他们完了婚。婚后头几年，婆媳关系尚可，彼此相安无事。

1980年桑贾伊之死成了她们婆媳关系的转折点。按理说，英·甘地丧子，玛尼卡失夫，本应同病相怜，互相同情和爱护才是。遗憾的是，她们二人却并非如此。

玛尼卡与她的婆婆英·甘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政治近乎狂热的爱好；也正是这个共同点，使她们的关系由婆媳变成了对手。玛尼卡认为自己是桑贾伊政治地位的当然继承人。英·甘地则认为她的班只能由尼赫鲁-甘地家族的人来接，次子亡故后，顺理成章的接班人应是长子拉吉夫；而玛尼卡是嫁来人，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她。

婆媳俩就这样刀对刀、枪对枪地干起来了。英·甘地渐渐发现，从她的家庭内部杀出来的这个对手并不那么容易对付。她曾从容不迫地击败过最狡猾的政敌，却时常在这个黄毛丫头面前乱了阵脚。玛尼卡搅得她不得安宁。

玛尼卡把桑贾伊生前豢养的那帮走卒纠集在一起，打着桑贾伊的旗号，另立门户，专门同她的婆婆英·甘地和大伯子拉吉夫唱对台戏。她先是把桑贾伊生前为她创办的杂志《太阳》月刊卖给了英·甘地的政敌。1982年3月29日，桑贾伊的支持者在勒克瑙集会。玛尼卡不顾婆婆的极力反对，参加集会并发表了演讲。大会决定成立“桑贾伊思想论坛”。后来，这个论坛发展为政党，由玛尼卡任主席。

对玛尼卡的行为，英·甘地怒不可遏。就在玛尼卡参加集会的第二天，她把玛尼卡赶出了总理府。临行时，英·甘地要玛尼卡把费罗兹·瓦伦留下。玛尼卡死活不依，英·甘地只得让她带走。玛尼卡被逐，在当时曾成为印度轰动一时的新闻，有损于英·甘地的形象。

从此以后，婆媳俩公开反目，互相攻击。玛尼卡把英·甘地比作“吸血的”迦梨女神：英·甘地则说，玛尼卡嫁给桑贾伊是个阴谋，“是为了打入核心集团内部”。玛尼卡对此反唇相讥，说英·甘地的脑子已受到了年龄的影响，她祝她尽早退下来。1984年初，在距拉吉夫当选为议员的阿梅提选区不远的马利亚哈巴特选区举行的北方邦议会补缺选举中，玛尼卡的“桑贾伊思想论坛”的候选人击败了国大党（英）的候选人。玛尼卡为此兴奋不已。她扬言要在即将到来的下届大选中，与她的大伯子拉吉夫一决雌雄。

英·甘地直到死时，始终未能驯服她这个桀骜不驯的儿媳。

前面已经说过，宗教的、民族的、语言的、种姓的等等冲突在印度都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到英·甘地重新执政的80年代，这些冲突的表现形式已发生了一些变化，表现出与过去不尽相同的特征。过去，冲突多是偶发性的，且主要局限于某个地区，现在则变成经常性的了，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涉及的地域更广。许多地区开始在同一时间出现混乱，随之引发的暴力事件在不断增加，暴力手段更加恶劣，程度不断加剧。

警察施暴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使那些相信英·甘地在大选时许下的建立一个有效运转的有秩序的政府的诺言的人们感到震惊。就在她宣誓的当天，就有200名警察在北方邦的纳雷普尔村施暴，当场打死村民2人，打伤几十人，还强奸了一些妇女。起因只是该村的村民曾抱怨过当地警察的不端行为。在西孟加拉邦的伊斯兰普尔地区，有些村民对没有防止土匪劫掠他们的财产的警察感到愤怒，打死了2名警察。此举招致警察的报复，该地区的9个村庄遭到了他们的袭击，许多房屋被付之一炬。在比哈尔邦的帕格尔普尔，警察在审问嫌疑犯时，把硫酸倒入他们的眼睛，致使这些嫌疑犯成了瞎子。更有甚者，警察竟然胆敢就在总理官邸外，殴打前来向英·甘地请愿的盲人。

警察如此胆大妄为，真可谓无法无天了，其原因除了治警不严以外，与政治干预也不无关系。在紧急状态期间，曾有一些警察干出了一些出格的事，不过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难免的，也没有人去追究他们。但人民党上台后，对警察队伍进行清洗，于是这帮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们被当作实施紧急状态法的“帮凶”，成了他们昔日的同事的刑侦对象。人民党此举严重破坏了警察的团结，到1978年，大多数地区的警察因政治原因而分裂成严重对立的两派，那部分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警察开始自暴自弃，转而铤而走险，知法犯法。

下野期间，英·甘地为了重新争取因实施紧急状态法而失去了的贱民阶层对她的支持，曾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她冒雨访问受其他种姓残酷迫害的比哈尔邦贝尔奇村的哈里真的壮举，曾在当时引起轰动效应，并成功地赢得了贱民的再度支持，为她大选获胜奠定了基础。然而，贱民受迫害问题是印度可恶的种姓制度造成的。如果不消除种姓制度，无论是人民党，还是英·甘地，谁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贱民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是英·甘地访问过的那个贝尔奇村，在她重新执政后不久，就被一分为二，分别并入另外两个村。原贝尔奇村的哈里真遭到这两个村高级种姓的枪杀或烧毙，他们的棚屋或茅屋也被付之一炬。

1981年初，就在曾为改善贱民的处境而进行过不懈努力的圣雄甘地的故乡古吉拉特邦，又因贱民问题发生了纠纷。纠纷引起了一连串动乱，致使全邦19个地区中有18个受影响达4个月之久，并有约400人丧生。

事情起初发生在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邦立第一医学院，与种姓保留法有关。直接起因是一位高级种姓学生被剥夺了攻读一门极专业化的医学科目的权力。他的考分本来很高，但该学科那年只招收一个名额，而这一名额按保留法给了考分比他低的哈里真学生，致使他落选。医学院学生开始罢课反对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就在此事发生前两周，在医学院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一位哈里真青年因偷了一个小物品被高级种姓活活烧死。艾哈迈达巴德的哈里真袭击那个村子以示报复，并打败了村里的上层种姓。类似的事情以前在古吉拉特邦还从未发生过。被贱民打败，使高级种姓感到受了奇耻大辱。医学院的学生学习资格纠纷发生后，他们觉得出气的机会来了，乘机不断地对哈里真进行大肆屠杀。哈里真在城市斗不过他们，便在农村进行反击。

应该说，英·甘地政府处理贱民受迫害案件并不手软，参与迫害和屠杀哈里真的凶手大多被绳之以法，有的甚至还被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然而，这些重刑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微乎其微，杀害哈里真的事件仍有增无减。1982年2月，英·甘地政府无可奈何地向议会报告，在过去的两年中全国共有960名哈里真被杀。在以后几年中，情况也并未好转。

种姓冲突往往与教派冲突相交织。

1981年4月，在南印度泰米尔纳杜邦密那克希普拉姆村，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事件：约1300名哈里真集体改信伊斯兰教。贱民如此大规模的改宗，这在此前还从未有过，说明印度教徒中高级种姓对贱民的迫害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印度教高级种姓却决不这样认为，而是认为贱民大规模改宗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用金钱诱惑的结果。他们转而对贱民进行更加疯狂的迫害和屠杀。于是，贱民改宗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迫害哈里真的事件每发生一次，就会有更多的哈里真改变宗教信仰；而每发生一次贱民改宗事件，就会引起印度教高级种姓对贱民新一轮的残酷迫害。

更大的骚乱来自东北部的阿萨姆邦。

阿萨姆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阿萨姆邦的少数民族和山区部落民要求脱离阿萨姆邦建立单独的自治邦；二是阿萨姆族为维护 and 加强本民族的实体而开展的驱逐外籍移民运动。

阿萨姆邦的主体民族为阿萨姆族。此外，还有那加、米佐等少数民族和卡西、加罗等部落民。印度独立时，阿萨姆邦的行政区划包括除曼尼普尔和特里普拉这两个由土邦改成的中央直辖区以外的整个东北地区。印度独立以来，各地要求建立语言邦的呼声日高。为此，印度政府于1956年根据邦重建委员会的建议，按语言原则对全国大部分邦的区划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重划；60年代又按此原则对孟买邦和旁遮普邦进行了重划。但这项原则唯独在阿萨姆邦没有得到贯彻。这引起了该邦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他们不断地为争取民族自治权而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以那加加入为主体民族的那加兰于1963年率先脱离阿萨姆而成为一个单独的邦。1971年12月21日，议会通过《东北地区（重组）法》，以卡西、加罗和贾因提亚等部落民为主的梅加拉亚又从阿萨姆邦分出成为单独的邦，阿萨姆南部的米佐拉姆被划为中央直辖区，而曼尼普尔和特里普拉两个中央直辖区则被升格为邦。至此，除米佐拉姆（该地区在英·甘地遇害两年后即1986年8月已由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的问题尚未得到完全解决外，阿萨姆邦的第一个大问题即该邦少数民族和山区部落民要求建立单独的语言邦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值得一提的是，

问题的解决是在英·甘地执政的前期，而且是在对巴作战胜利后的第五天。这说明英·甘地善于借战争牌解决平时难以解决的国内问题。

阿萨姆邦的第二大问题与 1971 年的东巴危机有关。东巴危机发生后，大量的东巴基斯坦难民涌入印度。其中大部分涌入了西孟加拉邦，但也有 100 多万涌入了阿萨姆邦。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束后，这 100 万难民中的大部分回到了新成立的孟加拉国，但也有一部分留了下来。于是，一个新的问题——阿萨姆邦外国移民问题便出现了。

早在 1972 年底，阿萨姆邦议会选举前夕，该邦就因选民登记中的大量外国人问题而爆发了一场大规模骚乱，致使选举在 16 个选区中的 14 个选区无法进行。“全阿萨姆学生联合会”和“全阿萨姆人民斗争委员会”这两个群众性组织在骚乱中相继成立。其领导人提出了如下要求：中央政府必须查明在阿萨姆的外国人并立即取消他们的选举资格，然后要么将他们遣返孟加拉国，要么把他们疏散到其他邦去。他们扬言如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将使邦内的所有活动都无法正常进行。

阿萨姆邦的外来移民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阿萨姆人之所以强烈地要求将这些移民赶走，这里面包含着经济、政治和宗教文化的多重原因。阿萨姆人担心外来移民的不断涌入，会使他们在全邦人口中的比例失去优势，这些移民将在经济上同他们争夺就业机会，挤占他们的土地和财富；在政治上同他们瓜分选票，从而争夺对邦政府的控制权。此外，阿萨姆人讲阿萨姆语，大多信印度教；而外来移民操孟加拉语，大多信伊斯兰教。历史上，印回两教本来就长期不睦。阿萨姆人担心他们的文化将会被孟加拉文化所淹没。

阿萨姆邦外来移民问题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有些人并不反对甚至鼓励移民。他们是该邦的地主和种植园主。由于阿萨姆邦缺乏劳动力，移民正好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国大党的政客们也并不反对移民，因为移民是他们争取选票的一个来源。

1979 年底，阿萨姆驱逐外来移民的骚乱发展到了更大的规模，大罢工此起彼伏，社会生活无法照常进行；更要命的是，阿萨姆通往其他地方的石油运输线也被暴乱分子所切断。石油是工业的血液。而阿萨姆是印度最重要的石油产地，所产石油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不言而喻，石油运输线被切断将会给印度工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在严重的危机面前，英·甘地乱了章法。她在与骚乱领导人进行短期谈判未达成协议后，于 1980 年 4 月匆匆宣布除一个没有受到骚乱影响的孟加拉人占多数的地区外，整个阿萨姆为动乱地区，派大批武装部队到该邦维持秩序，授权部队在必要的情况下动用武力；同时宣布禁止举行罢工和四人以上的集会。对此，阿萨姆人不予理会。军事管制的唯一效果是保障了石油运输线的畅通，但骚乱不仅未平息，相反更加严重。

在地理上，阿萨姆邦只有一小块地方通过西孟加拉邦同印度其他地区相通；换句话说，阿萨姆邦如要同印度其他地区发生联系，西孟加拉邦是必经之路。为了教训教训阿萨姆骚乱分子，国大党（英）的青年派利用孟加拉人的不满情绪，在西孟加拉邦发动了一场针对阿萨姆邦的经济封锁运动。而全阿萨姆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则扬言如果经济封锁不解除，他们将使阿萨姆邦的每个孟加拉家庭都受到封锁而无法上街购买生活必需品。国大党（英）青年派见经济封锁不断未吓倒阿萨姆人，反而招来了反封锁，只得自行解除封

锁。

围绕着新一轮的邦议会选举，阿萨姆邦的骚乱达到了最高潮。

1983年2月，英·甘地宣布阿萨姆邦选举将于本月中旬举行。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因为此时阿萨姆邦根本不具备举行选举的条件，外来移民及其选民资格问题依然悬而未决。阿萨姆运动领导人已公开表示抵制选举。英·甘地对此置若罔闻。她天真地认为，有大批武装部队维持秩序，选举想必能顺利进行。

阿萨姆运动领导人的声明不仅仅是一个口头威胁。随着选举序幕拉开，阿萨姆人针对孟加拉穆斯林移民的空前规模的大屠杀也开始了，并且在投票时达到了顶点。据印度官方统计，整个选举期间，有1482人丧生，2000人失踪，几十万人无家可归。实际死亡人数比官方统计数要多得多，有16个村庄甚至被斩尽杀绝。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平均投票率只有2%，有些投票站连一张选票也未收到的情况下，国大党（英）在血流成河的阿萨姆取得了选举的“胜利”，组成了邦政府。英·甘地居然还把这次选举看作自己的一项功绩。她说，选举“恢复了政治进程”，她也因此完成了一次宪法赋予她的使命。她断言新当选的国大党（英）邦政府将更有效地控制阿萨姆邦的局势。没有多少人相信她的话，因为这个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当选”的邦政府并未得到大多数阿萨姆人的承认。

然而，比起旁遮普邦的大骚乱，阿萨姆邦的骚乱还只是小巫见大巫。旁遮普的骚乱不仅造成了大批无辜平民惨遭杀害的严重后果，而且最终酿成英·甘地遇刺身亡的悲剧。

致命的枪声

一提起锡克教徒，人们往往会立刻浮现出一个尚武好斗的民族的形象——蓄着大胡子、长发，头缠大围巾，腕上戴钢手镯，腰间佩短剑。的确，这便是锡克教徒。

然而，锡克教徒并非从一开始就那么尚武好斗。说来也许有人不信，锡克教徒原本是极崇尚和平的。

锡克教创立于五个世纪前，是在印度两大主要宗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教派矛盾和冲突相当激烈的情况下，在印度教内部宗教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出现的。它的创立者那纳克从立志创立一个新宗教之日起，就抱定了这样一个宗旨，即力图调和两大宗教的矛盾与冲突，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创造一种和谐的气氛。为此，他为教徒们所规定的教义便吸收了两大教派他认为合理的成分，如伊斯兰教的一神论和不拜偶像，印度教的因果业报轮回；又摒弃了其中他认为不合理的成分，如伊斯兰教的一夫多妻制，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以及溺杀女婴、寡妇殉葬等歧视和虐待妇女的种种陋习。那纳克时常教导他的门徒对人要有宽容之心和爱心。他有这样一段名言：

以克制为熔炉，以顺从为金匠，
以理解为铁砧，以神学为工具，
以畏神为风箱，以苦行为炉火，
以爱神为炼炉，将神名化于其中。
经文将在这真正的作坊中铸成文字，

这就是神以爱宠的目光注视的信徒必行之功。

因此，锡克教在其创立之后的最初百余年间，完全是一个和平的宗教，并曾得到过莫卧儿王朝的一代明君阿克巴大帝的扶持。然而，锡克教的发展壮大，加之有些穆斯林也逐渐抛弃了伊斯兰教而改宗锡克教，逐渐引起了阿克巴大帝的那些不那么宽容的子孙们的忌恨。他们进而迫害起锡克教徒来。他们向锡克教徒课征在阿克巴大帝时代曾一度被取消了的香客税和人头税，不尊重锡克教徒的宗教习惯和生活方式，随意伤害他们的宗教感情，甚至强迫他们改宗伊斯兰教。更有甚者，莫卧儿统治者竟然在 1606 年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锡克教第五代祖师阿尔琼抓捕下狱，并严刑拷打致死。这个祖师生前所做的两件大事——建金庙、编纂圣典——奠定了他在锡克教徒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祖师阿尔琼之死打断了锡克教的和平发展进程，成了锡克教历史的转折点。此后，锡克教逐渐由崇尚和平向尚武演变。这样，又过了将近 100 年，到 17 世纪末第十代祖师戈宾德·辛格执政时期，锡克教的演变终于完成。

戈宾德·辛格建立了准军事化的新教团组织“卡尔萨”（意为“纯洁”）。为此，他作了种种规定：凡加入卡尔萨者都必须举行剑洗仪式；必须更名，男教徒名字加“辛格”（意为狮子），女教徒加“考尔”（意为公主），承认戈宾德·辛格夫妇为父母；必须放弃原来的信仰，放弃种姓偏见，坚持吟诵本教经典《阿迪·格兰特》，不再崇拜其他神祇，只崇拜唯一的神真名并服从祖师，随时准备以身殉教；必须着“五 K”标志（皆以字母 K 开头，故名），即蓄长发、加发梳、佩剑、戴钢手镯、穿短裤；教徒在互相见面和告别时必须以“卡尔萨是神意的体现，胜利归于神”作为招呼语。戈宾德·辛格的这些规定，奠定了锡克教和锡克教徒当代形象的基本轮廓和政治、宗教、民族三者合一的基本特点。

此后，锡克教徒不断与莫卧儿王朝的军队发生冲突。在此过程中，锡克教的力量时消时长，总的趋势是不断壮大。又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到 18 世纪末，兰吉特·辛格大王在印度西北部以旁遮普为中心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强大的锡克教王国，锡克人的势力达到了辉煌的顶点。锡克军队之强大、士兵作战之勇敢，就连英国人也不得不为之叹服。

兰吉特·辛格死后，由于内讧不断，王位更迭频繁，锡克教王国由盛转衰。英国殖民者乘机入侵。经过两个回合的激战，锡克军最终为英军所击败，锡克教王国灭亡，其领土被并入英属印度的版图。

狡猾的英国人很快发现锡克人具有与广大的印度教徒明显不同的特征，可以利用来服务于自己分而治之的一贯目的。此后，他们便有意扶持锡克人，大量征召锡克人入伍，鼓励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独特的民族”。于是，锡克人与英国之间逐渐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由于受到英国人的怂恿，锡克人的民族意识得到了超常发展，以致到印度独立前夕，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因分治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也提出了建立自己的独立的“卡利斯坦国”的要求。然而，他们的力量比起印回两大教派毕竟过于弱小，他们的总人口不到印度总人口的 2%，在旁遮普也仅占三分之一，没有人把他们的要求当回事。

锡克教卡尔萨的入门式。具体做法是施礼者用一只大铁碗盛满水，加糖，然后用一柄双刃剑搅拌，再让新入教者诵圣诗，唱圣歌，最后让他们每人喝一口碗中水，仪式便告结束。

1947年，随着印巴分治，原英属印度的旁遮普也被一分为二。锡克人发现他们在分治后的旁遮普邦仍处少数地位，邦政权完全把持在国大党和印度教徒手中。他们对此极为不满。1949年，他们在其政党阿卡利党的领导下首次提出了建立旁遮普语邦的要求。此后阿卡利党又多次发动建立旁遮普语邦运动。1960年5月，阿卡利党再次要求中央政府立即组建旁遮普语邦。党主席塔拉·辛格率领锡克教徒从阿姆利则出发，步行到德里举行集会和游行，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引起锡克教徒的更大不满。然而，不管锡克人怎么闹腾，对于他们的要求，尼赫鲁直到逝世都没有答应。他的表面理由是旁遮普地处敏感的印巴边境，位置特殊，宜慎重对待，但实际上他是担心锡克人以建立语言邦为铺垫，进一步闹独立。

1966年3月，尼赫鲁务实的女儿英·甘地终于答应了锡克人的要求。于是，旁遮普邦继印巴分治之后再次被一分为二——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只有原邦首府昌迪加尔的归属问题因双方发生争执而遗留下来。

锡克人在高兴之余，很快便发现新成立的旁遮普邦仍然不尽人意。因为他们的人口在邦内仍只占到56%的相对多数，不足以使他们的政党阿卡利党单独掌权。他们转而开展要求扩大邦自治权和建立大旁遮普的运动，将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1973年，阿卡利党在阿南德普尔召开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提出了旨在扩大锡克教徒在旁遮普的自治权的涉及宗教、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制定全印锡克教寺庙法，宣布阿姆利则为锡克教圣城；把昌迪加尔以及与旁遮普毗邻各邦的旁遮普语区划归旁遮普，建立一个更大的旁遮普邦；除国防、外交、交通和货币由中央政府管辖外，其余各项事务均由本邦自治，不受联邦宪法的限制；重新合理分配拉维-比阿斯水系。阿南德普尔决议成为后来锡克教自治运动的总纲领。

为迫使中央政府接受他们的自治要求，自1981年8月起，锡克教徒在阿卡利党领导下，不断发动种种攻势，包括组织大批锡克教徒示威游行，封锁铁路、公路，阻断交通，故意招致警察逮捕等。锡克教极端派则竭力主张脱离印度，建立独立的“卡利斯坦”国。他们在国外组织了流亡政府，制作了国旗，还发行货币和邮票、护照等，从而在印度国内外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卡利斯坦”运动。与此同时，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的冲突也不断增加，纵火、暗杀、爆炸、抢劫等骚乱事件时有发生。

就在此时，一颗“扫帚星”直上云天。锡克教徒中出现了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魔鬼，他便是年轻的锡克教原教旨主义者贾奈尔·辛格·宾德兰瓦勒。他的宗教狂热使他很快获得了“锡克人的霍梅尼”的称号。一时之间，他取代了阿卡利党，成了锡克人的精神领袖。

这个魔鬼的制造者不是别人，正是英·甘地的次子桑贾伊。他之所以需要这样一个魔鬼，是想利用他去达到分裂阿卡利党，颠覆在他母亲下野后上台执政的阿卡利党邦政府的目的。桑贾伊也许做梦都未想到由他一手制造的这个魔鬼，在他死后会成为他母亲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

1981年9月，旁遮普反对建立“卡利斯坦”的报纸主编、印度教徒贾加特·纳雷遭到暗杀。警方怀疑宾德兰瓦勒是主谋，向他发出了逮捕令。宾德兰瓦勒在向他的追随者们密授机宜后投案自首。于是，他刚被带走，他的追随者们便全副武装，高举着“纯净之师”的大旗，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有17人饮弹身亡。他们甚至将印度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劫持到巴基斯坦以示抗

议。阿卡利党领导人也要求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宾德兰瓦勒。

也许是迫于锡克人的压力，英·甘地释放了宾德兰瓦勒。对英·甘地来说，这是个喜马拉雅山般的巨大错误。放走这个魔鬼，不啻放虎归山。对宾德兰瓦勒来说，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捉一放，极大地抬高了他的身价，确定了他在锡克族宗教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他一下子成了锡克教徒心目中的英雄。此后，他便带着一帮全副武装的杀手，公然盘踞在锡克教最重要的圣地阿姆利则市的金庙里，把它变成了策划和进行各种恐怖活动的大本营。

从1981年10月开始，英·甘地多次与阿卡利党领导人进行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此过程中，宾德兰瓦勒手下的锡克教恐怖分子仍在肆无忌惮地杀人，如同在狩猎季节射猎鹌鹑和鹧鸪一样。政府对此束手无策。人们对此极为不满，有的责备英·甘地没有向阿卡利党作出足够的让步，要不然，阿卡利党可以使大多数锡克人摆脱宾德兰瓦勒及其恐怖分子的影响；有的则抨击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打击恐怖活动，听任宾德兰瓦勒和他的杀手把金庙作为庇护所。对此，英·甘地有苦难言。人们的指责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关锡克教徒宗教感情的惯例，即除非万不得已，警察不得进入锡克教徒视作最神圣的金庙。

1982年11月初，英·甘地政府与阿卡利党的谈判最终破裂。此时离新德里亚运会开幕仅十余天。阿卡利党前进派领袖龙格瓦尔觉得可以利用这件事给政府点颜色看看，扬言他将率阿卡利党每天在亚运会的举办地点举行示威游行。这使国大党（英）极为恐慌。因为一旦阿卡利党举行示威，后果将不堪设想，不仅将干扰亚运会的正常进行，还会使负责筹办亚运会的拉吉夫·甘地威信扫地。他们急忙派警察在首都周围筑起一道严密的保护圈，还派警察在哈里亚纳邦严密把守从旁遮普通往首都的每条道路，对所有来自旁遮普的人员进行盘查。然而，由于警察在行动时没有把握分寸，对过往的锡克人态度横蛮无礼，并随意扩大盘查面，甚至连锡克族前高级将领、法院法官也未能幸免。锡克人对此极为不满，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宾德兰瓦勒乘机在锡克人中进行煽动、挑唆，火上加油。

1983年，宾德兰瓦勒控制下的锡克恐怖分子的活动更加猖獗，就连与自己同信仰的锡克族同胞，他们也加以杀戮。4月23日，阿姆利则市最高警官、锡克教徒A.S.阿特瓦尔在做完祷告后被公然射杀在金庙门口。他的遗体在那里整整躺了两个小时，最后经市最高行政当局反复交涉，恐怖分子才交出。他们气焰之嚣张，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惨案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阿卡利党。阿卡利党也对心狠手辣的杀人不眨眼的宾德兰瓦勒感到不寒而栗。这种情况显然对政府有利，可以用来全力对付恐怖分子。然而，不知为什么，一向以善于把握时机、坚决果断著称的英·甘地却放弃了这个良机。

见政府方面没有采取行动，锡克恐怖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更加肆无忌惮地杀人。1983年10月，他们拦住一辆公共汽车，枪杀了六名印度教乘客，其目的显然在于想迫使印度教徒出于恐怖而逃离旁遮普邦。事情已发展到人人自危的程度，英·甘地感到再难妥协，遂下令解散旁遮普邦阿卡利党邦政府，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英·甘地与宾德兰瓦勒之间的较量由此正式拉开序幕。

双方都意识到一场恶战不可避免，各自开始备战。政府方面开始制订代

号为“蓝星”的军事行动计划；而宾德兰瓦勒则命人在金庙周围构筑工事、并请来退役的锡克族将军当参谋。

1984年6月，英·甘地下令军方实施“蓝星行动”计划，向盘踞在金庙内的锡克恐怖分子发动攻击。然而，这场一边倒的战争，也并非轻而易举可以打胜的。军方不得不动用坦克和大炮等重型武器。结果在包括宾德兰瓦勒在内的恐怖分子被歼灭的同时，锡克人心目中最神圣的金庙也遭到了破坏，其中宾德兰瓦勒所盘踞的阿迦尔·德哈达宫甚至被夷成了平地。英·甘地缺乏理智的行为使她自己在一时之间成了全体锡克人的公敌。

对英·甘地来说，下令实施“蓝星行动”计划，无异于给自己签署了死亡证书。她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生前就曾写下遗书。她写道：“正如有人所担心的，一小撮人在策划使我意外死去。如果那样，我将坦然而去，但那些谋害我的人将备受煎熬。”“对待死亡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泰然自若。平静似水的心境促使我写下这份实际上的遗书。”她甚至对死后的安魂之地也作了安排，要求把她的骨灰撒在喜马拉雅山上，而不是按印度教的习俗撒进恒河里。

英·甘地虽然已经意识到死亡的阴影正笼罩着她，但她并不畏惧。“蓝星行动”过后，国防部长文卡塔拉曼为总理的安全着想，想把她身边的锡克族警卫调走，但为英·甘地所拒绝。

就在英·甘地被刺的前两天，她在奥里萨邦举行的大型群众集会上，在谈到有人要想谋杀她时，她说道，“我并不担心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今天死，我也死而无憾，因为当我死时，我的每一滴血都会滋润国家，增强一个统一的印度的力量”；“人的肉体可以消灭，血液可以干涸，但人的灵魂是不会泯灭的。一个人致力于国家进步，民族团结的精神和信仰是永生的。犹如圣雄甘地，他人虽死，但他的精神不死”。她已完全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1984年10月31日，一个阴冷的早晨。英·甘地用完早餐后，走出了萨夫达尔路1号官邸的边门，穿过一条走廊，向阿克巴路1号她的办公室走去。她的官邸与办公室相毗连，中间只隔着一道篱笆，有一个小门供进出。

同往常一样，她今天也有许多事情要做，先是要去参加一个电视招待会。招待会是应英国剧作家、演员彼得·乌斯季诺夫之请举行的，地点就选在阿克巴路1号办公室外的草坪上。彼得·乌斯季诺夫要为她拍一部电视纪录片。为了便于上镜头，她脱下了防弹背心，还特意挑选了一件橘黄色的莎丽。她也许没有意识到，在印度教和锡克教中，这种颜色也是殉道的颜色。

不一会儿，英·甘地来到了小门。她对锡克族警卫本特·辛格微笑着问好。可她没想到，回答她的微笑的竟是一连串子弹。这些子弹正是从这位担任她的贴身侍卫已达9年之久、深得她的信任的本特·辛格的左轮手枪中发出的。几乎就在同时，另一名锡克族警卫萨特万特·辛格又扣动了机枪扳机，对着英·甘地一阵狂扫。

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快，那么突然。就在大儿媳索尼娅听到枪声后一边高喊“妈妈！妈妈！”一边冲出来时，英·甘地已倒在血泊之中，不省人事。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橘黄色的莎丽。

总理府内乱作一团，只有担任外围警戒任务的警卫们反应敏捷。他们迅速赶来，当场将本特·辛格击毙，将受了重伤的萨特万特·辛格捕获。

英·甘地被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印度最高医学学府——全印医学科学院。12名著名医生全力以赴进行抢救。然而，这已无济于事。英·甘地受伤

过重，她身中 10 余发子弹，其中有 7 发打穿了腹部，3 发击穿了胸膛，1 发打中了心脏。从医学上讲，在到达医学院时，她就已经死去。但医生们直到下午 2 时 20 分才正式发布死亡消息。

36 年前，印度国父圣雄甘地，因致力于调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惨遭印度教狂热分子的谋杀；现在英·甘地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遭到了锡克教狂热分子的暗算，为国捐躯了。她终年 67 岁。

英国广播公司以最快的速度将英·甘地遇害的消息公之于众，全世界都为之震惊。惨案发生之时，拉吉夫·甘地正在潮湿的加尔各答郊区，为国大党（英）的下次大选作准备。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噩耗时，他悲痛欲绝。他知道他总有一天会接母亲的班，因为她的母亲已为他作好了一切准备，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那一天竟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这么悲哀，这么叫人猝不及防。

国不可一日无君。就在英·甘地逝世的当天下午 6 时 55 分，拉·甘地含着眼泪，宣誓就任印度总理。然而，他根本没有时间沉浸在丧母的悲痛之中。

局势极为严峻。英·甘地的遇害引发了新一轮的教派大仇杀。不过这次不是发生在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而是发生在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之间。丧失了理智的印度教徒对锡克教徒进行疯狂的报复。短短几天时间内，就有近 2500 人丧生，其中绝大部分是锡克教徒；无数的财产被焚毁；约 3 万人无家可归。印度《政治家》报说：“这是自 1947 年以来最严重的事件。”拉·甘地以异乎寻常的宽容和果断制止了这场大规模的教派仇杀。

1984 年 11 月 3 日，天气晴朗。英·甘地的葬礼在位于朱木拿河边，尼赫鲁墓与圣雄甘地墓之间的沙卡提举行。当灵车经过道路两旁时，数百万人夹道致哀，许多外国元首也闻讯赶来参加她的葬礼。他们当中有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

葬礼完全按照印度教的传统仪式进行。英·甘地的遗体被放在一个用砖头搭成的平台上，四周摆满了鲜花以及用作燃料的檀香木奶油和各种香料。

当拉·甘地手持火把绕遗体七周后点燃火葬柴堆时，在场的人们都失声痛哭起来。印度教祭司、伊斯兰教阿訇、佛教和尚、耆那教僧侣、锡克教长老、基督教牧师、拜火教徒分别在现场举行各自的宗教仪式致哀，象征英·甘地是印度各民族和各宗教的共同领袖。

1984 年 11 月 11 日，拉·甘地总理乘专机飞临喜马拉雅山上空，从 2.6 万英尺的高空将英·甘地的骨灰徐徐撒下，完成了其母亲的遗愿。在恒河的源头甘戈特里这个令人敬畏的冰川山口，英·甘地结束了她曲折而辉煌的人生旅程。

英迪拉·甘地生平大事年表

1917年（诞生）

11月19日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妮·尼赫鲁（小名英杜）出生于印度北方邦阿拉哈巴德市欢喜宫。其家族系名门望族，祖籍克什米尔。祖父莫蒂拉尔·尼赫鲁系著名律师。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系印度民族运动领导人、国大党领导人和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母亲卡玛拉为一传统的印度妇女，笃信印度教。

1919年（2岁）

4月13日英国殖民者在旁遮普的阿姆利则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杰利安瓦拉-培大屠杀，此事成为印度现代史的转折点。

12月国大党在阿姆利则召开年会，选举莫蒂拉尔为国大党主席。

1920年（3岁）

12月国大党在那格浦尔召开年会。本届年会确立了圣雄甘地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健全了党的组织，成为国大党历史的转折点。

1921年（4岁）

在德里的外婆家上幼儿园，因想念家人，几个月后又回到欢喜宫。年底，祖父和父亲被捕入狱，英迪拉第一次经历了与亲人离别的痛苦。

1922年（5岁）

观看家人为响应圣雄甘地的号召而焚烧英国纺织品的场面；拒绝接受亲戚从巴黎买来送给她作礼物的法国上衣，并亲手烧掉了心爱的洋娃娃，经受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最初洗礼。

1923年（6岁）

入阿拉哈巴德现代学校读书。几个月后转入英国人开办的圣塞西莉亚学校读书，不久退学，改由家庭教师授课。

1924年（7岁）

参加圣雄甘地发起的自纺运动，并组织儿童手纺协会。

1926年（9岁）

3月随父母到瑞士，先后就读于日内瓦国际学校和贝克斯新闻学校。

1927年（10岁）

12月随父母回到印度，入阿拉哈巴德圣玛丽亚教会学校读书，同时家里聘请家庭教师教印地语。

1929年（12岁）

12月国大党在拉合尔召开年会，选举尼赫鲁为党主席。

1930年（13岁）

组织“猴子队”。在一次政治活动中初次结识费罗兹·甘地。

1931年（14岁）

1月母亲卡玛拉被捕入狱。

2月6日祖父莫蒂拉尔去世。

3月随父母去锡兰游历，随后又在南印度旅行，对种姓制度有了亲身体会。

5月到浦那入瓦基尔夫妇开办的学生自立学校读书。

1932年（15岁）

9月带领三个表妹到浦那耶拉夫达监狱，探望正在进行绝食斗争的圣雄

甘地。

1934年（17岁）

4月完成在浦那的学业后，在孟买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被师尊泰戈尔创办的圣蒂尼克坦国际大学录取。

5月到克什米尔度假。

7月入圣蒂尼克坦国际大学学习，亲耳聆听师尊泰戈尔的教诲。

1935年（18岁）

4月为照料病重的母亲，不得不中止学业，离开国际大学。

5月与堂舅马丹·阿塔尔医生一起陪母亲卡玛拉赴欧洲治病。

1936年（19岁）

2月28日母亲卡玛拉病逝于瑞士洛桑。

10月入英国布里斯托尔市巴德明顿学校补习，为报考牛津大学做准备。

1937年（20岁）

3月通过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的入学考试。

4月返回印度，旋即陪父亲尼赫鲁访问缅甸、马来西亚，所到之处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10月进入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学习。

1938年（21岁）

加入国大党。

1939年（22岁）

访问西班牙。

1941年（24岁）

因英国已处于战争环境，无法继续学习，不得不提前结束在萨默维尔学院的学习，与费罗兹·甘地一起回国。

1942年（25岁）

3月26日与费罗兹·甘地结婚，旋即赴克什米尔度蜜月。

9月11日因参加反英集会而被捕入狱。

1943年（26岁）

5月13日获释出狱。

1944年（27岁）

8月20日生下长子拉吉夫·甘地。

1946年（29岁）

9月父亲尼赫鲁出任印度临时政府总理。

11月随丈夫费罗兹·甘地移居勒克瑙，另立门户。

12月14日生下次子桑贾伊·甘地。

1947年（30岁）

开始协助父亲工作，充当总理府的管家和秘书，同时为了照顾丈夫和孩子，不得不往返奔波于德里和勒克瑙之间。

8月15日印度获得独立，尼赫鲁出任总理。印巴分治引起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大规模冲突和仇杀。英·甘地参与处理和调解教派冲突。

1948年（31岁）

1月30日圣雄甘地被印度教狂热分子暗杀。

12月移居德里总理府，将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协助父亲工作。丈夫费罗兹·甘地仍留居勒克瑙。

1949年（32岁）

陪父亲访问美国。

1951年（34岁）

开始帮父亲在竞选中拉选票。

1952年（35岁）

丈夫费罗兹·甘地当选为人民院议员，迁居德里。

1953年（36岁）

随父亲访问英国，参加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礼。归国途中，单独访问苏联。

1954年（37岁）

10月陪父亲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1955年（38岁）

随父亲到万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

6月陪父亲访问苏联。进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开始在政坛初露头角。

1956年（39岁）

当选为国大党阿拉哈巴德市委主席。

1957年（40岁）

进入国大党中央选举委员会，开始独立参加竞选活动。

1959年（42岁）

2月在国大党那格浦尔年会上当选为党主席。任期内对党的组织机构进行了一些改革，协助解决孟买邦重划问题，并策划解散了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政府。

1960年（43岁）

9月丈夫费罗兹·甘地逝世。

1962年（45岁）

出任国大党全国统一委员会主席、政府国际委员会委员、中央公民委员会主席等职。

1963年（46岁）

国大党主席卡马拉季提出“卡马拉季计划”。辛迪加派形成。

1964年（47岁）

4月访问苏联，参观莫斯科博览会。

5月27日父亲尼赫鲁逝世。担任纪念尼赫鲁基金会主席。

6月9日夏斯特里继任总理，邀请英·甘地入阁，出任新闻广播部部长。

10月赴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会议。随后访问英国、南斯拉夫和苏联。

1965年（48岁）

1月参与处理南印度语言骚乱。

8月在克什米尔参与处理印巴边境冲突，被前方将士称为“老太太内阁中唯一的男子汉”。

1966年（49岁）

1月19日当选为国大党议会党团领袖。

24日宣誓就任印度总理。

3月1日在议会发表施政演说，宣布修订粮食政策，解除1962年开始实施的全国紧急状态。

9日按语言原则将旁遮普邦划分为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

28日访问美国，受到约翰逊总统的欢迎。

6月6日决定将卢比贬值36%。引进墨西哥高产小麦良种，开始开展“绿色革命”。

11月制止沙陀为要求禁止宰牛而挑起的骚乱。

1967年（50岁）

3月12日第四次全国大选获胜，再次当选为总理。

5月公布实施“十点计划”。

9月兼管原子能部、外交部和计划委员会。访问斯里兰卡。

10月访问苏联、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11月访问苏联，参加纪念十月革命庆典。

1969年（52岁）

4月在国大党法里达巴德年会上，英·甘地的经济政策受到国大党主席尼贾林加帕的攻击，英·甘地与辛迪加派的斗争正式拉开序幕。

5月总统扎基尔·侯赛因逝世。围绕新总统人选问题，英·甘地与辛迪加派的矛盾加剧，斗争更加激烈。

7月16日罢免德赛的财政部长职务，自己接管财政部。

19日宣布对14家大银行实行国有化。

8月20日英·甘地提名的V.V.吉里以微弱多数战胜辛迪加派提名的桑吉瓦·雷迪，当选为总统。以此为标志，英·甘地战胜了辛迪加派。

11月1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同时分别在总理府和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总部召开，国大党正式分裂。

12月经最高法院裁决，英·甘地派国大党为真正的国大党，称国大党执政派，辛迪加派称国大党组织派。

1971年（54岁）

3月18日第五次全国大选获胜，第三次蝉联国大党议会党团领袖和政府总理。

8月9日与苏联签订《印苏友好合作条约》。

12月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印度打败并肢解巴基斯坦，成功地遣返了数百万孟加拉难民。

1972年（55岁）

3月印度各邦举行议会中期选举，国大党执政派大获全胜，在绝大多数邦组成新的邦政府。印度发生大旱，经济情况恶化，英·甘地政府面临严重困难。

1974年（57岁）

1月古吉拉特邦爆发抗议物价上涨的大规模群众骚乱。政府派军警镇压，造成死伤数百人的严重后果，邦政府被迫辞职，邦议会被解散。J.P.纳拉扬发起以倒英·甘地为主要目的的J.P.运动。

5月18日印度第一个地下核装置爆炸成功。

1975年（58岁）

4月印度吞并锡金，将其作为一个邦。印度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6月12日北方邦阿拉哈巴德市高等法院法官辛哈宣判英·甘地在1971年大选中犯有舞弊罪，取消其议员资格，此后六年内不得参加选举。

6月25日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大肆逮捕反对派人士，被捕人数达10万之多。对报刊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

7月1日宣布“二十点经济计划”。以后又将次子桑贾伊·甘地提出的“五点纲领”置于其后，开始着手培养次子。

11月7日最高法院宣布英·甘地1971年当选议员有效。

1976年（59岁）

3月决定推迟本应于1976年3月举行的第六届人民院选举。

4月桑贾伊·甘地下令强行拆除德里附近土库曼门的穆斯林居民的棚屋，引起穆斯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桑贾伊·甘地下令军警镇压，酿成“土库曼门血案”。此外，桑贾伊·甘地还强制推行绝育政策。这两件事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使英·甘地失去了民心。

8月16日出席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的第五届不结盟会议。

10月出访毛里求斯、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宣布印度支持南非的解放运动。

11月再次推迟大选。

1977年（60岁）

1月18日宣布在同年3月举行大选。释放所捕反对党人士。民众党、人民同盟、国大党组织派、社会党联合组成人民党，同国大党执政派对抗。

2月1日一贯支持英·甘地的总统法·阿·艾哈迈德逝世。

2日粮农部长贾格吉凡·拉姆辞职，并退出国大党执政派，另组民主大会党，旋即加入人民党。竞选形势对英·甘地极为不利。

3月举行第六届大选，结果国大党执政派惨败，人民党获胜。英·甘地母子及其大部分追随者皆落选。

22日被迫辞职，宣布取消紧急状态。

23日德赛出任总理，人民党上台。

4月人民党政府组成沙阿委员会，调查英·甘地在紧急状态期间的“罪行”。

8月冒雨访问比哈尔邦贝尔奇村，抚慰遭高级种姓袭击的贱民。

10月3日英·甘地被捕，于次日获释。

1978年（61岁）

1月英·甘地另组国大党英迪拉派，自任党主席；原国大党主席布·雷迪自成一派，国大党发生第三次分裂。

11月7日在卡纳塔克邦吉克马加洛选区补选中获胜，重新当选为人民院议员。

12月19日议会以藐视议会罪，宣布取消英·甘地的议员资格，将她逮捕。

26日迫于人民的强大压力，议会两院被迫释放英·甘地。

1979年（62岁）

7月15日德赛被迫辞职，人民党政府垮台。

7月23日国大党（英）宣布支持查兰·辛格组阁，但不参加政府。

8月20日国大党（英）宣布撤销对查兰·辛格内阁的支持，致使后者在执政24天后即告垮台。总统雷迪旋即宣布解散议会，于1980年1月举行中期选举。

1980年（63岁）

1 月印度举行第七届人民院选举，国大党（英）以压倒优势获胜，英·甘地再度出任总理。

2 月赴南斯拉夫参加铁托总统的葬礼，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

6 月任命桑贾伊·甘地为国大党（英）总书记。桑贾伊·甘地旋即因飞机失事丧生。

7 月 18 日印度用自制运载火箭将自制人造卫星 RS-1 号成功地射入轨道。英·甘地在议会中宣布，这是“印度和印度科学史上的一个伟大日子”。

9 月 22 日英·甘地政府颁布“国家安全法令”，授予中央和各邦政府以预防拘留权，用来对付“反国家”和“反社会”分子。

1981 年（64 岁）

6 月长子拉吉夫·甘地在北方邦阿梅提选区当选为人民院议员。

10 月出席墨西哥坎昆会议，分别同中国总理赵紫阳和美国总统里根会晤。

1982 年（65 岁）

2 月印度发起举行有 44 个发展中国家参加的“新德里磋商”，强调不结盟政策是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

7 月访问美国，改善了印美关系。

11 月第九届亚运会在新德里举行，全部筹办工作系由拉吉夫·甘地负责完成。

1983 年（66 岁）

2 月 2 日任命拉吉夫·甘地为国大党（英）总书记，培养接班人的工作至此基本完成。中旬动用军队强行在阿萨姆邦进行选举，结果造成数千人死亡，几十万人无家可归的严重后果。

3 月第七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德里召开，英·甘地当选为不结盟运动主席。

1984 年（67 岁）

4 月宣布旁遮普邦为动乱地区。

6 月下令军队实施“蓝星行动”计划，向盘踞在金庙中的锡克族恐怖分子发起攻击，击毙击伤恐怖分子数百名，但同时使金庙严重受损，严重伤害了锡克人的民族和宗教感情。

10 月 31 日在从萨夫达尔路 1 号总理府去阿克巴路 1 号办公室的路上被两名锡克族警卫刺杀。长子拉吉夫·甘地继任总理。

11 月 3 日拉吉夫·甘地为其母举行葬礼。

11 月 11 日拉吉夫·甘地乘飞机按照英·甘地的遗嘱，将她的骨灰撒在喜马拉雅山之巅。

参考书目举要

1. [印] 因德尔·马尔豪特拉著、施美华等译：《英迪拉·甘地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2. [印] 克里尚·巴蒂亚著、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译：《英迪拉·甘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3. [印] 伊曼纽尔·波奇帕达斯笔录、亚南译：《甘地夫人自述》，时事出版社，1985年第2版。
4. [印] 索尼娅·甘地编、庞新华译：《尼赫鲁家书》迪（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书信选集，1922—193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 [印] 尼赫鲁著、张宝芳译：《尼赫鲁自传》，世界知识社，1956年版。
6. [印] 贾纳丹·塔库尔著、张涵译：《英迪拉·甘地和她的权术》，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7. [英] 迪利普·希罗著、裴匡丽、戴可景译：《今日印度内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8. [印] S.辛格少将著、皓月、宪鹏译：《喋血孟加*拉》，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9. 陈峰君主编：《印度社会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0. 孙培均、刘创源主编：《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1. 方广 等编：《各国手册丛书·印度》，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
12. 培伦主编：《印度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3. 华中师范大学印度史研究室编：《简明印度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14. 李德昌著：《巴基斯坦的政治发展》（1947—1987），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5. Indira Gandhi , My Truth , Presented by Emmanuel Pouchpadass , New Delhi , 1982.
16. Indira Gandhi , The Years of Challenge, Seleted Speeches of Indira Gandhi , 1966-1969 , New De-hi , 1973.

